

田中禾《五月》的文本、转载与传播

李勇军

(郑州大学出版社,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作家田中禾的《五月》在《山西文学》1985年第5期发表后,不仅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重要刊物转载、被《红旗》杂志专题评论,还以排名第一获得第八届(1985—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时还成为一种“现象”,成为当年山西各地作家、文学青年谈论的话题。循着《五月》的发表、转载与传播的路径,我们重回1985年的文学现场,重回那个“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呈现出新奇而又灿烂的面容”的20世纪80年代,会发现当代文学某种真正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田中禾;《五月》;文本;转载;传播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01-05

当代著名作家田中禾的“文学人生”,始于1959年他的长篇童话叙事诗《仙丹花》公开出版。经历20世纪60—70年代的“空白期”之后,以发表在《山西文学》1985年第5期的《五月》为标志,他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站在了全国读者的面前。《五月》发表后,不仅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重要刊物转载、被《红旗》杂志专题评论,以排名第一获得第八届(1985—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时它还成为一种“现象”,成为当年山西各地作家、文学青年谈论的话题。1986年10月,《五月》被收入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编选的小说集《活鬼》,这是《五月》第一次“入集”。1993年7月,《五月》被收入田中禾的第一部小说集《月亮走我也走》。但他这篇得意之作,始终未被用作选集或文集名。1986年10月,《山西文学》在创刊三十周年的重要节点推出田中禾的中篇小说《秋天》,该作仍是头题,仍以“编稿手记”的形式重点推荐,可视为《五月》的“回响”。

有学者认为,2000年之前,田中禾的创作“可以分为《五月》(被称为‘生活流’)、《明天的太阳》(被称为‘新写实主义’)、《轰炸》《匪首》(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三个阶段”^[1]。作家本人也说过:“我的创作

大致以《五月》《明天的太阳》《轰炸》和长篇《匪首》为四个阶段。可以说这是一个现实主义嬗变的过程。”^{[2]101}

无疑,对于作家田中禾来说,短篇小说《五月》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或者说它既是“代表作”又是“成名作”。循着《五月》的发表、转载及收入作品选、文集的线索,我们重回文学现场,深入作家的文学肌理和创作历程。

一、初刊本

“五月”是时间的“巧合”:1985年5月,《五月》由《山西文学》作为该期小说“头条”重点推出。

小说从香雨(奶奶最心爱的“雨雨”)回家这天展开故事。香雨能考上县高中,算是幸运儿,“方圆三四个村,就选她一个人”。然后读大学,又考上了研究生,但“人家妒忌,不让去”。虽然这些她与家人无法沟通,但她回来之后,感受到的是暖暖的亲情——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有些陌生。香雨无疑是全家人的骄傲,“让弯腰驼背的爹,在人前高出几尺;使因为中风而手脚蜷缩的妈,成为全村最受称赞的贤德媳妇”。眼前的家,是她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那大门,其实是两堆黄土留下的缺空,没有门楼,也没有门框门扇。”但是,总有什么在悄悄地发

收稿日期:2025-07-10

作者简介:李勇军(1970—),男,河南兰考人,郑州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编审,研究方向: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期刊史研究等。

生着变化,“她觉得自己烧锅技术不如以前”,“甚至她觉得奶奶那样用心用意为她藏着的腊菜也不如以前好吃”。

虽然,香雨是全家人甚至是“全村人的骄傲”,但是,显然她已经从一个生活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旁观者。

小说真正的主角是妹妹小改(改娃)。家里为了供香雨读高中、上大学,无形中,改娃很早就扛起了全家的重担,担当着“一家之主”的角色,内心有着诸多委屈,家里人——包括奶奶、父亲、母亲,还有姐姐、弟弟,谁真正理解过她?所以,姐姐进了家门,她没有任何惊喜的表示,而是“不做声”,接下来做着每天该做的分内事:“她挤进大门,把担子撂下地,用手拨开妈妈,将地上的草揽好,用膝头压着,俯下身,双手使劲,勒紧草腰子,提起来,扔到院墙角去。”这个鲜明的场景,让读者如见其人,如见其心。多少年,她都是作为姐姐的“陪衬”,而此时她也要以自己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存在。

事实上,在这个家里,改娃与姐姐的感情也许最深。在这个家里,如果有一个能理解她的话,恐怕也只能是姐姐香雨。后来,只有在姐姐的面前,她才能说出事实的真相,让眼泪无所顾忌地流下来。

这种苦恼与隔膜,在香雨与家人、与村里人之间也同样存在,“他们并不知道,一个从农村走出去的丫头,没有父母为她经营,没有亲故可以倚恃,全靠自己去奋斗,那是如何的艰难”。小说还写到她对那个在县广播站工作的“他”不冷不热,还有与所在学校校长的争吵——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宣泄和爆发。

在改娃的内心深处,她又在默默地疼爱着弟弟金成,哪怕自己多担些,也尽可能不让弟弟受累——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在这个家,“重男轻女”是无形的存在。而他又是个不成器的典型:连高中都考不上,回来又不干活,瞒着家长在外面偷偷赌博。这是改娃不认可也最看不惯的,所以要大声教训他:“十几亩地,往后,你得挑一半!谁该养活谁。”

改娃与父亲之间的“代沟”表现得最为充分(母亲则以女性特有的温柔,无形中“回避”了许多矛盾),包括她的感情生活(主要是与大狗之间的交往),也包括对于家里大事的“主见”(包括收麦、打麦、卖麦等),最后矛盾总爆发时,她终于发出为这些年付出的一切而不被理解的令人揪心的呐喊:“打!给你打!打不死你不算爹!”“你就会打我!我是牛,是马,是一条狗,你也怜惜怜惜。”

村里人包括家人都以为改娃与大狗有恋情,但后来谜底揭开,原来她与文气、内敛甚至有些腼腆的

小五才是一对真正的恋人。小说的最后,“小五的四轮拖拉机在公路上向南跑”,“改娃仰面躺在车顶上,的一个洼坑里”,“五月的阳光照在她年轻的脸上”,就像无数个童话的结尾:他们要去寻找全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所以,他们被视为“裹挟着新时期时代气息,深深打印着八十年代的标识”^{[2]102},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青年。

二、转载本

《五月》在《山西文学》发表后,先后被《小说选刊》(1985年第7期)、《小说月报》(1985年第8期)、《新华文摘》(1985年第9期)等重要刊物转载。

据《田中禾年谱》,1985年5月22日,田中禾收到《小说选刊》要转载这篇作品的来函后写道:“我从来没有认为《选刊》是不可逾越的,甚至早就认为它选的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但这毕竟算是八五年取得的小小的突破。”^{[3]127}

田中禾如此表达,可能其时还心存“芥蒂”。原来,这篇作品最早是投给《人民文学》的:

创作《五月》时,我是唐河县文化馆专业创作员,发表时已任馆长。我当时把稿子寄给了《人民文学》,《人民文学》的编辑是位山西老乡,与张石山要好,他认为这篇稿子能获奖,私自将稿子转给张石山,发表在《山西文学》1985年第5期,这位编辑后来受了处分。^{[3]125}

不过,在《五月》发表之前,当他得知《山西文学》对《五月》十分欣赏时,感到“这对于一个作者,够欣慰的了”。

当期的《山西文学》不但将《五月》安排在“头题”刊发,而且还配发了主编周宗奇(署名“宗大可”)撰写的《编稿手记》:

有人说,现在人们(尤其是青年)对农村题材的小说不感兴趣了……但是,读着《五月》,一股纯真之气扑面而来。最可贵的就是,作者完全从自己所观察到、所理解到、所熟悉了的生活出发,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当今农民的多层次、多色调的生活画面:有一家人团聚的快乐,也有隔膜的苦恼;有共同劳动的和谐和愉快,也有父女反目的可怕冲突;有丰收的喜悦,也有用不上电、卖不了粮等种种新的忧愁;有年轻一代对理想和爱情的美好追求,也有无知无聊到以赌为乐……正是通过这些充满生活气息和泥土芬芳的活生生的图画,使人们在一种美的享受中,清醒地认识了当今的农

村现实。

人们难道会对这样的小说不感兴趣吗?^[4]

《小说选刊》在转载《五月》时,没有加“编者按”或其他点评文字,但在这篇作品入选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8年4月揭晓)后,该刊1988年第7期发表了曾镇南的评论文章《时间的磨洗》。严格来说,该文并非专为《五月》而写,它是一篇“获奖短篇小说漫评”,其中涉及《五月》是这样评述的:时间的磨洗具有“无情”和“公正”的力量,《五月》发表之初,并不曾引起“轰动效应”,“但现在读起来,却觉得厚重绵密,情深意远,确是难得的力作”。“从这篇小说中,我又一次感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力量,感受到了被真正的艺术生命灌注了的典型化的艺术原则的力量。”^[5]

《小说月报》1985年第8期转载《五月》时增加了“作者简介”:

田中禾,本名张其华,男,四十三岁,河南唐河县人,兰州大学肄业,作协河南分会会员。现任文化馆馆长。一九七九年以来,发表小说、散文多篇。

此前的1984年10月,田中禾被任命为唐河县文化馆馆长。

《新华文摘》1985年第9期转载《五月》时,虽然也没有增加插图、“作者简介”等“副文本”,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该刊作为大型综合性刊物,始终保持着与当代文坛的“同频共振”:1985年,在《五月》之前之后该刊转载的重要文学作品就有阿城的《孩子王》(第5期),郑义的《老井》(第6期),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第6期),陆文夫的《临街的窗》(第7期)、《井》(第10期)等;而且,这年的第4期上“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获奖作品选刊”,一次就集中选载了13篇作品。

以《五月》为代表,1985年“文学豫军”展现出耀眼的创作实绩。这并非巧合:转载《五月》的《小说选刊》1985年第7期,同期转载了河南作家张一弓的《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小说月报》1985年第8期的封面作家是张一弓;转载《五月》的《新华文摘》1985年第9期,同期转载了张一弓的《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南丁《喧闹的1985》一文(《莽原》1986年第1期)表达了当年他作为中原文坛“盟主”的欣喜之情;《小说月报》1986年第3期刊出《莽原》主编何秋声的文章《豫军从中原大地突起》——这也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出文学“豫军”的评论文章。在第八届(1985—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

说奖”评选中,《五月》以全票名列榜首。在此届19篇获奖小说中,还有两位豫籍作家的作品:乔典运的《满票》(《奔流》1985年第3期)和周大新的《汉家女》(《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8期)。

三、文集本

前述三家刊物转载《五月》时,虽然没有像同一时期《中篇小说选刊》那样,约请作者写一篇“创作谈”,但是《文学知识》杂志《作家经验谈》栏目刊发的《我写〈五月〉》一文,正好“弥补”了上述不足。作家田中禾在这篇约三千字的文章中交代了写作背景和创作动机,还就作品选材、立意以及语言风格的追求等,坦陈了自己的观点:

《五月》所以能够引起不同阶层的广泛的共鸣,首先得力于我是带着饱满的同情心将自己的爱倾注在农民父老兄弟身上的。^{[6]5}

田中禾对当时农村题材的“老套子”有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只有贴近生活,努力保持真实的魅力,才能跳出近两年农村题材的老套子,给人以新鲜感。所以,我还是坚持把《五月》中的人物写成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的真实的人,把当代农村写成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的真实的人世,把它的立意放在既非歌颂也非暴露,只不过为了忠实地当好时代的书记员,尽可能让后人拿了这作品就可以知道中国农民在这段历史中所走过的道路。^{[6]5-6}

他也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视为“乡土文学”——

我是不愿意走“乡土文学”这条路的。可偏偏《五月》又被人称为“乡土文学的又一佳作”。^{[6]6}

关于“写作技巧”,他说:

我决定不在谋篇上取巧,而是对着极为普通的农家生活硬碰硬地展开描写手段。割麦,打场,卖粮,这是很难写的极为单调而又人人见惯的场景。^{[6]6}

他又说:

我的体会就是作家不要回避难写的东西。难写的东西也许正是成功之所在。^{[6]6}

1986年10月,《五月》被收入中短篇小说集《活鬼》,该集为多人集,由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编选、南丁作序,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五月》第一次“入集”。

张宇的中篇小说《活鬼》是河南文坛1985年度

的又一重要收获。这部小说发表在《莽原》1985年第4期,随后被《小说选刊》(1985年第10期)、《小说月报》增刊(中长篇选粹)(1985年第4期)、《中篇小说选刊》(1986年第1期)等重要刊物转载。

事实证明,作为选集的《活鬼》亦经得起考验。除其中的《活鬼》《五月》之外,其他如《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张一弓)、《满票》(乔典运)、《斗羊》(李克定)、《活宝》(段荃法)、《小小吉兆村》(李佩甫)皆称得上“一时之选”。

1993年7月,田中禾的第一部小说集《月亮走我也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该集除收入《五月》,还收入“落叶溪”系列十一题、“青草地”系列五题、中篇小说《明天的太阳》等作品。

无论是中篇还是短篇,被作家田中禾选作小说集名的,应该都是他自己看重的作品,比如《月亮走,我也走》(原载《当代》1983年第4期)、《明天的太阳》(原载《上海文学》1989年第6期)、《印象》(原载《小说家》1992年第6期)等;但是,笔者发现《五月》始终未曾用作选集或文集名。

2014年6月,六卷本《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郑电波主编)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五月》被收入第一卷(中)。

四、《五月》的“回响”

《五月》的结尾有着无奈,也包含着隐忧——

改娃安详地闭着眼,嘴角抿着一个冷峻的微笑。也许她在想:这会儿,爹正耩那火茬子绿豆吧,秋里还会有好收成,粮食棉花可更难卖。

卖粮难、卖棉难、卖烟叶难……类似的叙事,我们从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发表于1988年)、关仁山的《九月还乡》(发表于1996年)里都能读到。也就是说,这类问题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

《五月》发表之后,有一位村干部找到田中禾说:俺村党支部读了《五月》,把上边的摊派顶了,去年每人扣五十三块,今年已经减为二十七块,“村里的群众都说再找个作家写一篇,把咱们棉花压级压价的事说说。你看能不能替我们写?”^[6]⁴——文学源于生活,而它又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回归”到现实生活。

1985年8月,《山西文学》发表雷达的《〈五月〉的感想》。与通常意义的评论文章不同,雷达称之为“感想”——也确实是有感而发。他认为,《五月》并非多么成熟、厚重、深刻的作品,“但它的朴素,它的自然,它的真实,它的对农民的理解”,正是其最可贵之处。

雷达动情地写道:“看吧,这就是我们可尊敬的农民,这就是他们今天的生存和奋斗,这就是他们几乎没有柔情蜜语的爱情,这就是他们淳朴的心胸!”雷达显然是有感而发,因为他深感“身居闹市,正在向现代化奋进的人们”,对农村的现状是如此隔膜,在他们的想象中,现在的农民都已经成了万元户,而某些浅薄的急功近利的作家也在制作着“数量虽不见得多,影响却甚为恶劣的浮夸型、粉饰型的作品”^[7]。

几乎与该文同时,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红旗》杂志1985年第15期(出版时间:8月1日)刊登了张石山的《成熟在丰收时节——读田中禾的〈五月〉》。笔者不知道雷达的评论是不是“自由来稿”,但张石山的文章显然是刊物的约稿(其时他担任《山西文学》副主编,主编是李国涛、周宗奇)。

彼时,作为“中国理论第一刊”的《红旗》杂志(创刊于1958年6月1日),当然要关注时代、关注民生,但是,它的《文艺新作选评》栏目还是注重“从文学出发”。张石山的这篇评论,既有对时代背景的评判(当时的大背景是:全国农村已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更有对作品本身的文学评判:“责任制给广大农村带来一派勃勃生机,但农民的生活,那依然相当陈旧的劳作方式,毕竟是艰难的。正确的政策到底不是神话中打开财宝洞穴的咒语。”这篇小说“将给不了解农村现状的读者以某种程度的真实的展现,使以为农民都是‘万元户’的好心人对农村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清晰的估量”。“《五月》不仅角度新颖,内容厚实,最主要的是写出了在现实生活中出没的活生生的人物,写出了变革时期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具体到小说中的人物,作家“正面落墨精心勾勒”的香雨、改娃,还有“侧面刻画着笔不多”的大狗和小五,“无疑是写得比较成功的”。其中,改娃这一人物又是刻画得最为成功的。“改娃们对新生活奋力追求的进取精神,使我们有理由对他们创造富足、幸福的未来充满信心。”^[8]

据曾担任《山西文学》编辑的评论家段崇轩说:“我当时所在的忻州地区,作家、文学青年都在传阅、谈论《五月》,山西省作协的作家、编辑到各地市下乡,所谈所议也是田中禾和他的《五月》……一位外省作家在《山西文学》发表作品,受到如此‘厚待’,似乎从未有过。”^[9]

1986年,《山西文学》第10期推出了田中禾的中篇小说《秋天》,同样是“头条”,刊物仍以“编稿手记”的形式重点推荐:“《五月》之后,田中禾毕竟不负众望,再一次为《山西文学》的读者们拿出自己的扛鼎之作,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作者在努力而可贵

地突破着自己。”^[10]

对《山西文学》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86年(第10期)该刊迎来“创刊三十周年”,《秋天》可以视为《五月》的“回响”。

随后,该刊1987年第4期刊出郑波光的评论《从〈五月〉到〈秋天〉——评田中禾的两篇小说》。

据《田中禾年谱》,1988年4月11日,“日本学者小林荣来信请教翻译《五月》过程中的方言及其他问题”。日文版《五月》被收入《中国农村百景》第6卷,于1989年在日本出版^{[3]140}。这是《五月》被传播到海外的最早的一条信息。

五、余论

由于第一手的声像资料缺失,有关《五月》被改编为广播剧的叙述,本文只能暂付阙如。

田中禾的“文学人生”始于1959年,这年5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童话叙事诗《仙丹花》。由于个人命运以及时代风云的变幻,整个20世纪60—70年代,他的创作几乎为空白。但“复出”之后,他很快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月亮走,我也走》(《当代》1983年第7期)、《槐影》(《上海文学》1985年第1期),再到《五月》获得第八届(1985—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田中禾不仅恢复了已中断二十年的文学创作,而且一下子就站在了全国读者的面前,他“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我们不得不承认,田中禾天生就是一个优秀的作家”^{[3]3}。

学者张书恒认为,《五月》的现实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与其说这是田中禾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一次飞跃,不如说是他在经过多年探索之后对现实主义精髓与实质深刻理解的表现,是将现实主义从虚假的理想主义中拉回正路,使其回归本位的尝

试^{[2]102}。

就当代文学而言,1985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是奇迹迭出的一年,创造力炽烈沸扬。”“这是民族主体精神和生命力度在艺术领域中的又一次喷涌勃发。也许,在外观上不曾有1976年的波澜壮阔和声势浩大,形态上也不似1980年的天真烂漫与鲜活洁亮,但却是更沉雄、更密实、更遒劲,更显出底蕴丰厚而建树卓著。”^[11]其实不只是文学,包括美术、电影、音乐,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面容。也许,这正是我们一直期待着“重回八十年代”的真正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舒晋瑜.田中禾:没有人强迫给你的大脑植入芯片[N].中华读书报,2019-11-27(18).
[2]张书恒.非先锋的先锋性:论田中禾九十年代的创作转型[M]//徐洪军.田中禾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3]徐洪军.田中禾年谱[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24.
[4]宗大可.编稿手记[J].山西文学,1985(5):26.
[5]曾镇南.时间的磨洗[J].小说选刊,1988(7):111.
[6]田中禾.我写《五月》[J].文学知识,1986(7).
[7]雷达:《五月》的感想[J].山西文学,1985(8):68-71.
[8]张石山.成熟在丰收时节:读田中禾的《五月》[J].红旗,1985(15):48.
[9]段崇轩.《五月》之风:怀田中禾先生[N].光明日报,2024-07-19(14).
[10]直言.编稿手记[J].山西文学,1986(10):5.
[11]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24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Text, Re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May* by Tian Zhonghe

LI Yongjun

(Zhengzhou University Press,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After being published in the 5th issue of Shanxi Literature in 1985, Tian Zhonghe's *May* was not only reprinted by important periodicals such as *Fiction Selections*, *Fiction Monthly* and *Xinhua Digest*, but also commented on in a special feature by *Hongqi* magazine. It ranked first and won the 8th (1985—1986) “National Excellent Short Story Award”. At the same time, it became a “phenomenon” and a topic of discussion among writers and literary youth across Shanxi that year. By following the path of *May*'s publication, reprinting and dissemination, we can return to the literary scene of 1985 and the 1980s when “almost all art forms presented a novel and brilliant appearance”, and discover the true significance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Key words: Tian Zhonghe; *May*; text; re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不一样的“他者”

——论康拉德小说中的“他者”形象

李文军, 苏 磊*

(宁夏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宁夏 固原 756000)

摘要:约瑟夫·康拉德的异域冒险小说,大多以马来群岛和非洲丛林为背景。这样的背景设置,引起了很多争议,即作者是要向西方读者展现不一样的异域风情,还是要把异域“他者”作为文明欧洲的陪衬?事实上,康拉德超越了当时自身所处的白人文化语境,应当属于能够放下白人的文化优越感、以共情态度描写“他者”世界的少有的西方作家之一。康拉德描绘出的作为欧洲地理“他者”的亚非地区的自然景观、历史传统和人文观念等,展示了东方独特的风土人情、不一样的生命活力,以及不一样的精神品质。

关键词:约瑟夫·康拉德;自我;他者;殖民;文化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02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06-06

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Conrad, Joseph 1857—1924)的很多小说,特别是其异域冒险题材的小说,大多以荒蛮的马来群岛和神秘的非洲丛林为背景。例如,以非洲丛林为背景的小说有《黑暗的心》《进步前哨》等;以马来群岛为背景的小说有《阿尔迈耶的愚蠢》《海隅逐客》《救援》《吉姆爷》《胜利》《卡伦:一段回忆》等。在康拉德的小说中,除了《黑暗的心》中写的非洲黑人土著外,他还细致描写了马来群岛上的迪亚克人、华人移民、马来苏丹、阿拉伯王侯等欧洲白人眼中的“他者”人群。康拉德小说中所呈现的各类异国风情和民俗,吸引了大批“自我”(西方)世界的读者,这给作者带来声誉和地位的同时,也带来了误解和批判。安格斯·米切尔(Angus Mitchell)讲道:“1899年春,《黑暗的心》在《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连载的时候,作者约瑟夫·康拉德一定没想到,他的著作会成为下个世纪最引人注目、最具争议的文学作品之一。”^{[1]20}

在众多的争议(如种族、殖民、他者、性别、话

语、身份、文化等)中,人们对康拉德创作异域冒险小说的目的有不同的见解,即作者是要向西方读者展现不一样的异域风情,还是要把它们作为“先进”欧洲的陪衬?比如,尼日利亚作家齐努阿·阿切比(Chinua Achebe)对康拉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对非洲及非洲土著人进行了贬低性的描述,是“一本用极其庸俗的方式写成的宣扬偏见和诬蔑的书……把非洲描写成‘另外一个世界’,欧洲的对立面,因此也是文明的对立面”^{[2]190}。阿切比还激烈地质问道:“一部宣扬非人化、把人类的一个种族非人格化的小说,能被称作伟大的艺术作品吗?”^{[2]188}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爱德华·萨义德比较赞同阿切比的观点,此外,他认为阿切比对康拉德的批评“还不够深刻(does not go far enough)”^{[3]165}。

对于康拉德这样一个以“自我”文化经历为主要素材的小说家,我们不能脱离作者的历史背景去评价他的作品,而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他在作品中呈现的异域色彩。康拉德所处的时代正

收稿日期:2025-03-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文化批评视角下的约瑟夫·康拉德研究”(11XWW006)

作者简介:李文军(1973—),男,宁夏固原人,博士,宁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西文化对比和英美文学研究。

通信作者:苏磊(1987—),男,宁夏西吉人,博士,宁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

值白人种族主义高涨的时期,结合这个历史背景来看,事实上,他超越了当时所处的强大的白人文化语境,应是当时少有的能够放下白人的文化优越感、以共情的态度描写“他者”世界的西方作家之一。正如南非作家穆法里特的评价,康拉德“是为数不多的成功塑造自己文化族群以外人物的伟大的西方白人作家之一”^{[4]125}。也有学者评价道:“也许,由于总是纠缠在那些遥远的地方和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编织的各种文化意义之网中,他(康拉德)比同时代的任何作家更能意识到文化主体在建构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5]16}事实上,康拉德作品中的异域探索之旅,是将欧洲白人置于蛮荒之地,以便“朝着认识自我出发,朝着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迷宫世界中的责任、罪恶和复杂性的认识出发”^{[6]26}。

一、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在康拉德的异域冒险题材小说中,亚非地区的一些蛮荒之地是其主要创作背景,在他心目中,怒吼咆哮的大海,原始古朴的风光,都有着无穷的魅力。康拉德特别钟情于马来群岛,因为当时马来群岛还没有被先前的冒险作家书写过。他说:“马来群岛具有相当多的优势:其环境和风俗具有异域特色;复杂的民族、政治和宗教关系,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冲突、殖民列强之间的争夺等诸多因素,使其更加有趣。”^{[7]101}例如,康拉德的“林格三部曲”(《阿尔迈耶的愚蠢》《海隅逐客》《救援》),都以马来群岛中的婆罗洲(Borneo)为故事的发生地;除“林格三部曲”以外,《吉姆爷》的故事也发生在马来海域,主人公吉姆因受“帕特纳”(Patna)号弃船事件影响,逃避到马来海域的“帕图森”(Patusan)岛寻求庇护。正如弗雷德里克·卡尔所说:“康拉德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及其第二部小说《海隅逐客》的背景设置富有异域情调,如奇特的丛林、未开化的土著人以及狂野的情感等。”^{[8]565}康拉德对东方世界的宁静、天然、纯洁、质朴充满了向往之情,他的异域冒险题材小说,在讲述白人殖民者冒险经历的同时,也把东方的异国风情传达给了正处于想象东方状态中的西方读者。

首先,康拉德被异域世界的自然风光和原始神秘所吸引,他的小说中有许多对东方美丽景观的细节描写。如在小说《黑暗的心》中,康拉德对非洲刚果河的水文、两岸的密林、河中的动物和水草都有详尽的描述,让读者通过文字感受到非洲荒野中原始泥土的芳香和原始文化的魅力,表达了作者对原始自然的敬畏与喜爱的情感。小说中写道:“大地沉寂深深沁入人的心脾——带着它的神秘、它的伟大、它的隐秘生活的可怕的现实。”^{[9]77}在小说《阿尔迈

耶的愚蠢》中,故事的发生地森巴镇是个非常典型的热带地区,那里气候虽然极为炎热,但周围的环境安宁沉静,时间似乎要在那里停滞;棕榈树高耸天际,远方的海水拍打着西里伯斯岛(Celebes)和马卡萨岛(Macassar),火山和热带风暴时不时地打破那里的宁静,好像相互高声对话一样。康拉德在《阿尔迈耶的愚蠢》的《作者笔记》中,表达了自己对这片异域美景的喜爱:“那里的生活画面,同这里的一样,由无数生活细节绘出,亦具有相同的色调。只有在极度晴朗的天空中,在无情、耀眼的阳光下,眩晕的眼睛才会错过它美丽的细节,才会只能看见粗略的轮廓,而色彩在稳定的光线下显得粗陋又无阴影。尽管如此,它仍是美好的生活画卷。”^{[10]2}在文章《马来亚的观察家》(*An Observer in Malaya*)中,康拉德写道:“英国‘以最冠冕堂皇的名义’将休·克利福德先生这样的人送往遥远的异域地区,可他把其流放的那个地方称作天堂,他说它们是如此的亲切,他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11]115}有批评家甚至开玩笑地说,康拉德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作家,但在处理异域自然风景上,康拉德最能使人心悦诚服,评论家们对此观点的争议最少。

显然,异域世界的大自然具有独特的魅力,这里的生物有着多样性与独特性,这里的一山一石、一水一溪、一草一木都与西方白人的日常所见有所不同。一位年轻的美国大学生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在完成非洲之旅后,和康拉德一样,也开始痴迷于异域独特的景色。例如,他在游览过非洲的乌干达之后写下这样的话:“如我所料,这个国家是美丽的。地形多山,但得到了广泛的开发,车前草、豆类和木薯不可思议地遍布每一座高峰。一个个山谷都好像干涸的沼泽,如今种满了茶树,灌木丛齐整地生长,如地毯一般。难怪它被称作‘千山之国’——非洲的瑞士。”^{[12]84}或许,所有西方人,包括康拉德在内,都是以殖民开发的视角在审视所有异域世界,在他们眼中,异域之地都是待开垦的美丽的处女地。斯皮瓦克(G. C. Spivak)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世界化的观点,批判殖民话语建构就是对异域殖民地的地理空间、知识文化和主体认识的他者化过程。她指出:“帝国主义对他者的征服表现为地理空间上对他者栖居空间的勘测和绘制……在此复杂过程中,殖民探险家、征服者、官员和旅行家都形成各种不同的与帝国主义共谋的意识形态和征服欲望。他们都自觉地以欧洲知识型和认知模式来重塑他者并将之原型化,将辽阔的异域空间视为无人居住、尚未开垦的处女地。”^{[13]105}但是无论如何,康拉德将自己

最珍惜的异域记忆描述得如此生动,以至于合上书很久之后,异域土地上的森林、激流、险恶的顽石等都深深地刻在了读者的记忆中。如果康拉德不珍爱自己到过的每一片海域、每一寸土地,他就很难将它们写得如此真切。

其次,在康拉德的小说中,还有大量关于东方文化的描写。西方世界的人们不仅被东方独特的自然景观所吸引,那里的民俗文化,如阿拉伯的民间故事、印度的佛教、中国的瓷器等,更是让他们流连忘返。东方人的肤色,他们奇异的说话方式,充满异国情调的服饰等,都能引起西方白人的极大兴趣。在几部以马来群岛为背景的小说中,康拉德详尽地描写了马来群岛人种的分类、服装配饰,以及那神秘的宗教辟邪仪式等习俗。如康拉德在小说《卡伦:一段回忆》中写到,马来人也喜欢佩戴各种服饰,他们常戴红色包头,爱穿五颜六色的花格围裙和绣着花的白短衣,喜爱随身带弯刀、金环、辟邪物等。该小说中的土著人首领卡伦就是这种文化的缩影,他“遍体是白的,头上裹着布,所带的武器只有一把安着水牛角柄的素朴的短刀,而且他很有礼貌,老是未曾进门就先把那柄短刀藏在围裙的一个褶子里面”^{[14]8}。

在康拉德的马来故事中,除了写马来人的奇异服饰,还写了他们的生活习俗。例如,马来人睡在茅屋藤帘后面的垫子或吊床上,围着营火在铁锅里煮米饭,穿围裙,戴奇异的头饰;他们随身携带匕首和波刃短剑,说话时手按着刀柄,每到一个地方,都很留心把武器放在安全的位置。在《卡伦:一段回忆》中,首领卡伦随身带刀,在他到另一村庄之前,侍者已把他的刀带到那里。尽管卡伦是白人的好朋友,彼此可以自由谈话,但却“不能用手拍他的背脊;因为在某种范围外,我们是不能同一个马来人过于随便的”^{[15]58}。鲁莽的行为会被马来人认为是无礼的举动,往往会引起纷争。正是由于异域土著人天然淳朴的本性,他们才能世代忠诚地坚守着本民族的传统,使祖先创造的古老文化得以传承,最终形成与欧洲相异的、多元的文化和族群特性。

可见,康拉德并未盲从英国传统浪漫冒险作家的视角,对异域“他者”世界进行程式化、想象性、贬低性的描写。相反,康拉德总是以共情的态度,甚至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东方的世界。在他看来,那些需要“一部小说才能表达出来”的东西是东方人的道德品质与智慧,而他要在异域的生活中挖掘出这些相互体恤的品质。在康拉德的回忆录《个人记录》的第一章,他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爱的重要性,回想起他在东方遇见的人和事时说:“他们走过来,带着默默的、不

可抗拒的魅力——这种魅力,我在此强调,吸引的并不是我的自爱或虚荣。它似乎有那么些道德的属性,因为,虽然这些人默默无闻地在烈日下生存,但是对他们的记忆却需要一部小说才能表达出来,若不是由于那神秘的友情将生活在这世上的人们结为一体,成为一个拥有希望和恐惧的社会,那又是什么呢?”^{[16]11}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的“作者注”中,康拉德提到了他对“帝国冒险”的理解,并批评了西方对“他者”的东方主义解读:“评论家和法官似乎认为,在那些遥远的地方,所有喜悦都是一种叫喊和战舞,所有情感表达都是嚎叫和咧嘴露出尖牙,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就是枪管和矛尖。但事实并非如此。”^{[10]2}

二、不一样的生命活力

在康拉德的海洋题材小说中,白人主人公在与大海的搏斗中大多展现了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而在其丛林题材小说中,所谓的白人英雄却一个个羸弱不堪,例如,《黑暗的心》中的库尔茨、《阿尔迈耶的愚蠢》中的阿尔迈耶、《海隅逐客》中的威廉斯、《进步前哨》中的凯亦兹和卡利尔等,当他们身处完全陌生的异域时,变得虚弱无能、不知所措,以至于内心崩溃。然而,与这些欧洲白人殖民者的羸弱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被描述为丑陋的动物、野蛮的土著人,却与周围的环境高度契合,身心健康。例如,小说《进步前哨》中的土著人个个生龙活虎,充满了活力和热情。小说写到,凯亦兹和卡利尔在走廊聊天时看见:“在这片空虚之中,有时却出现了独木舟,手持长矛的人突然聚集在贸易站的院子里……他们裸着乌黑发亮的身子,装饰着雪白的贝壳和闪闪发光的铜丝,手足健美。说起话来,一阵粗野的咕噜声,举止行动很英武,转动不停的圆睁睁的眼睛射出迅速而犷悍的目光。”^{[17]6}这些土著人身上展现出原始、狂野的生命力,与两位白人殖民者的苍白羸弱形成鲜明的对照。

康拉德似乎有一种尚古主义的思想,似乎认为越是原始、越是远离工业文明的人,就越具有天然活力,身心更加健康,和环境也更加融洽。瓦兹认为,康拉德在作品中流露出一丝对“远古某种金色岁月的怀念”,表现出一种“反理性的尚古主义”精神^{[18]74}。在小说《黑暗的心》中,作家就详细描述了非洲土著人在这片被欧洲“文明人”鄙视的土地上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通过小说人物马洛的眼光,我们看到,充满活力的非洲黑人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偶尔从岸边开来一条小船,使我暂时和现实有所接触。划船的都是些黑人。你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他们白眼珠闪闪发亮。……看着他们,使人

感到莫大的安慰。”^{[9]37} 还有，他们孔武强悍、充满激情的舞蹈，就是生命力和激情的最好体现。那些弯弓搭箭、赤身裸体的猎手，手持粗糙武器，跺脚扭腰、摇摆蹦跳，举手投足间表现出强烈的节奏感，展示着他们勇猛的气魄，让现代读者不约而同地想到非洲传统舞蹈。小说写道：“也许在某一个宁静的夜晚，远处会传来一阵阵颤动的鼓声，低一阵，高一阵，巨大的颤动声，微弱的颤动声；这难以理解的声响，有所呼吁，也有所暗示，带着狂野的气息——也许和一个基督教国家的钟声具有同样深刻的意义。”^{[9]57} 另外，当地土著黑人的野性与狂野的非洲融为一体，他们划独木舟冲破波浪，不仅展现出力量之美，也表现出强大的原始生机。“他们呼喊着的，歌唱着的，满身流汗，脸上仿佛戴着十分可笑的面具——这些家伙；可是他们有骨头，有肌肉，有一股狂野的活力和强烈的活动能量，同他们的海岸边的浪头一样，自然而真实。”^{[9]37} 但是，就是这样一群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在法国军舰的肆意攻击中消亡，在欧洲白人殖民者的剥削折磨中逐渐变得冷漠麻木，最后在失去劳动能力后，被一批批遗弃在丛林深处静待死亡。

此外，读者还可从康拉德对非洲女性的描述中看出这种原始的生命活力。在小说《黑暗的心》中，故事结尾处，康拉德用一整页文字描写一位非洲土著妇女——一位易怒的非洲丛林女人，像来自石器时代。这时读者才明白，这位“野蛮”的黑人妇女正是库尔茨的土著情人。作家对库尔茨黑人情妇的刻画广受批评，因为“她的野蛮个性正好是那个有教养的欧洲妇女（库尔茨的白人未婚妻）的对照”^{[2]180}，她们的确彼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康拉德似乎给予库尔茨黑人情妇的是赞美和敬意，而给库尔茨欧洲未婚妻的则是同情和哀伤。他赞美前者的美丽、率真、勇敢、无畏；同情后者的不幸，嘲讽她对库尔茨苍白而虚伪的爱。

从语言描述来看，故事的叙述者马洛，把库尔茨的白人未婚妻“情色化”“妖魔化”了，而与此同时，马洛对库尔茨黑人情妇的讲述，难掩其野性魅力，展示着她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小说这样写道：“她迈开稳重的步子向前走着，身上穿着带条纹和花边的衣服，她骄傲地踏着岸边的泥土前进，满身佩戴着的野蛮人的装饰品闪闪发光，叮当作响……她显得既野蛮又无比高贵，眼神既狂野又威严；在她那不慌不忙的步伐中，既有某种不祥的威严，又有一种庄严的气概。”^{[9]193} 这些文字给库尔茨的黑人情妇赋予一种桀骜不驯、高傲凛然的神态。再加上其他描写，例如，“铜色绑腿”“铜线手套”“头盔”，洪亮的声音，

自然就有一种“野蛮”的气场，让人不由得把她和超自然的事物联系起来。安德烈·维奥拉评论道：“如果我们给她（库尔茨的黑人情妇）增加一些高贵的装饰，就不难想到希腊神话里的女神，雅典娜这个名字亦会立刻出现在脑海中。”^{[19]164} 在马洛看来，库尔茨的非洲情妇就是非洲荒野的化身，是诱惑库尔茨毁灭的土著妖女。德莱顿也评论道：“女性的神秘和男性探索其奥秘的欲望，促成了浪漫、危险的东方蛇蝎美人（femme fatale）的形象。”^{[20]95} 但是，康拉德在字里行间对这位黑人女性旺盛的生命力表达了赞美，让我们看到异域土地上原始粗犷的美和土著人身上那股狂野的活力。

三、不一样的精神品质

当时，与发达的欧洲相比，遥远的非洲或远东地区是贫穷落后的，然而，这并非完全是坏事，因为未被人类侵扰的自然环境保持了原始生态，民众保持了淳朴的本性。因此，那里成为白人逃避喧嚣、逃避物质争夺的理想之地。例如，在小说《青春》中，水手马洛在没有到达东方时，“整个东方全都包括在我那青春的幻想里”；当他初抵东方时，感受到的是“黑夜又柔和又温暖……在这静夜里，忽然间吹来一阵微风，一股轻悠悠、暖烘烘的气息，带着花木的异香”，神秘的东方却是“这么古老，这么神秘、灿烂而又阴森，生机旺盛，而又一成不变，充满了危险和希望”^{[17]62-66}。在小说《吉姆爷》中，吉姆觉得“帕图森”对他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地方。在这里，吉姆“扔掉了”白人世界留给他的耻辱，并赢得了当地土著人的绝对信任，找到了他苦苦追寻的自尊和荣誉；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吉姆像是找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一个精神理想的家，吉姆把当地人称为“我的人民”，一再表示他会留在“帕图森”，永远也不离开。尽管吉姆属于西方文明世界，他是西方白人中“我们的一员”（one of us），但在“帕图森”，他总是“以主人翁的眼光看待那夜的太平，看待那河流，那房屋，那森林永存的生命，那古老人类的生活，那片国土的秘密，他自己内心的骄傲；但是正是这一切又占有了他，使他在思想的最深处，在血液最轻微的跳动中，在生命的最后一息，都是它们的”^{[21]176-177}。

异域“他者”世界成为那些物质与精神上受挫的白人的理想避难之所，不仅因为那里是相对欧洲的遥远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因为在那里会受到淳朴的土著人的精神感召。在康拉德的小说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异域土著人身上的美德，诸如勇敢、忠诚、智慧、友善等。勇敢地保卫家园，坚定地抵抗侵略，是这些土著人首要的精神品质。“几个世纪以来，

由数千个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的马来群岛,它附近的浅海波浪翻滚、激荡流动,成为白人很好的冒险之地”;然而“那个分别抗击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民族,虽然经历过一次次的失败,却从未改变”^{[22]8}。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马来人不容易被征服,他们被击败过,家园曾受到过侵犯,但他们从未放弃,因为他们忠于自己的家园和人民。康拉德说:“他们将对自由的热爱、对首领的狂热忠诚、对友谊和仇恨的盲目坚守——所有合法与非法的本能,一直保持并延续至今。”^{[22]8} 小说《海隅逐客》就折射出马来人与外来势力斗争的历史,如作者写到,马来人坚决抵抗白人殖民者的入侵,在军事抗击失败后,他们没有放弃,以巴巴拉蚩为代表的马来抵抗者决定改变抵抗策略——他们意识到,不能与武装到牙齿的欧洲殖民者硬拼,“因为他对困难的处境了解得一清二楚”^{[23]44}。巴巴拉蚩把阿拉伯商人阿卜杜拉的影响引入森巴镇,同时成功引诱白人威廉斯背叛林格,他要“在森巴镇的社会政治圈中,插手引进新的势力”^{[23]45},来抗衡以林格为首的白人势力。最终,以巴巴拉蚩为代表的马来土著人成功地把欧洲殖民者赶出了森巴镇。正如德莱顿所言:“巴巴拉蚩意识到冒险是过去的事情,而现在能做的只是‘谨慎地狡猾’,这并非小人的邪恶勾当,而是对现实的一种理解,对个人努力的局限性的认识。这些都是阿尔迈耶所不能认识到的。”^{[20]76}除了巴巴拉蚩外,《吉姆爷》中多拉明的独子丹·瓦利斯也是个“出类拔萃的青年”,是土著布吉斯族青年的杰出代表,“他的本族人都很自豪,说他和白种人一样懂得如何打仗”^{[21]187},在他身上,西方人“会惊讶地发现一种熟悉的思想转换,一种毫不含糊的远见,一种不达目的不甘休的劲头,一种利他主义”^{[21]187}。瓦利斯特性安静,目光坚定,脸上常带着一种讥讽的微笑,可是他“彬彬有礼、从容不迫的态度,似乎暗示着深藏的巨人智慧和力量”^{[21]187};最为重要的是,“他有那种胆量——不妨说是在野外的胆量,但是他也有欧洲人的头脑”^{[21]187}。瓦利斯被描述为“帕图森”新生力量的代表,他勇敢坚毅,聪慧友善,是这个古老民族精神的延续。

相对于西方白人而言,异域土著人另一个特别的精神品质就是他们的忠诚。在康拉德的小说中,那些看似愚昧的异域土著人,他们忠于所跟随之人,忠于所做之事,即使面临死亡威胁,也依然忠于职守。如《海隅逐客》中,巴巴拉蚩不仅勇敢,而且忠诚,他对自己的朋友忠心不二。有一次,他与欧洲白人交火时,奋不顾身从大火中救出奥马尔及其女儿,

然后护送他们逃到森巴镇,表现出对老上司、老朋友的忠诚,虽然那时奥马尔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与此相对,康拉德小说中的白人主人公似乎对忠诚并不如此看重,面临迫近的危险时,他们更多会选择逃避义务和责任。如《吉姆爷》中,海水开始灌入渐渐下沉的“帕特纳”号时,吉姆和其他白人官员跳离沉船,放弃职守,逃避责任,他们的懦弱与殖民宣传中的高大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与狂暴和恐慌的白人上司不同,两个马来舵手却平静地待在那里,茫然地看着慌乱中的白人,在危急的关头,“此时还守着舵轮”^{[21]66}。他们既没有试图停船,或同欧洲人一起逃离,也没有试图叫醒几百名沉睡中的马来男人、女人和小孩,只是静静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马来舵手拒绝相信他们的雇主抛弃了他们,当他们接受法庭问询时,其中一个舵手“对继续提出的几个问题,他宽宽的肩膀晃了晃,声称,他当时绝没想到那些白人会因为怕死而要弃船”^{[21]67}。当他们再被问及为什么不和白人官员一起逃走,仍要抓着不可能再改变航向的舵柄时,其中那个年老的马来舵手解释说:“他知道船上出了什么麻烦事了,但是没有命令,他不记得下过命令,那他怎么能离开舵轮。”^{[21]67}他们的回答令白人不可理解。没有人命令他们离开,所以他们还待在沉船上,难道这是“愚蠢”行为吗?他们本能的忠诚和职责告诉他们,应该抓住航船的舵柄不放,无论遇到什么危险。

四、结语

康拉德承袭了英国帝国冒险故事的题材,他的丛林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海隅逐客》《黑暗的心》等,为他赢得了“异域浪漫冒险故事讲述者”的美誉。然而,康拉德的异域故事,却通过对殖民主义的深刻批判与对西方文明的反思,颠覆了这一题材的传统内涵。康拉德对异域土著人表现了足够的同情和尊重,他是少数西方作家之一——视他们为与自己平等的人,而非低等动物。在康拉德的异域冒险题材小说里,读者似乎可以听到来自非洲丛林、马来群岛的遥远的呻吟和召唤。异域“他者”世界不仅充满了异国情趣,同时也是欧洲白人进行自我反思的理想镜像。通过对异域原始与野性的描写,欧洲与异域的相互对照,康拉德似乎在告诉我们,“他者”世界的所谓“原始”土著人,事实上可能比焦躁不安的欧洲人更健康、更智慧、更可爱。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曾写道:“时间来到21世纪,民族主义正在迅速失去地位。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真正的政治权威应该是来自所有人类,而不是某个特定国籍的成员。”^{[24]200}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以及“一

位全球化的世界公民”^[25]¹⁷,康拉德成为西方世界忧郁的思考者和反叛者之一。他思考西方文明的危机,思考如何为失落的西方文明注入新鲜血液。康拉德小说中写到的东方的宁静、东方的活力、东方的智慧,或许给了作家本人某种启迪,因为“康拉德认为,东方人的精神自有一种古朴庄严的伟力,可以清除西方文明中的浊气”^[17]⁶。

参考文献:

[1] MITCHELL, ANGUS. New Light on the Heart of Darkness [J]. History Today, 1999(12).

[2]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 后殖民批评[M]. 杨乃乔,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M]. New York: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1993.

[4] MPHAHLELE, EZEKIEL. The African Image[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4.

[5] RIBEIRO DE OLIVEIRA, SOLANGE. Aspects of hybridism in Joseph Conrad's Almayer's Folly and Heart of Darkness[J]. Ilha do Desterro, 2019(1).

[6] 任一鸣. 后殖民: 批评理论与文学[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7] NAJDER, ZDZISŁAW. Joseph Conrad: A Chronicl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8] KARL, FREDERICK R. Joseph Conrad, an Essay[J]. Literary Review, 1959(4).

[9] 约瑟夫·康拉德. 黑暗的心[M]. 黄雨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0] CONRAD, JOSEPH. Notes on My Books[EB]. The Project Gutenberg Etext. December, 2006.

[11] 约瑟夫·康拉德. 生活笔记[M]. 傅松雪, 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12] ANDREWS, CHRISTOPHER. Words Cannot Describe: A Trip into Rwanda's Heart of Darkness[J].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98(1).

[13] 陶家俊. 世界性/世界化: 后殖民文本政治论的两大根源[J]. 当代外国文学, 2007(4).

[14] 约瑟夫·康拉德. 不安的故事[M]. 关琪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15] 王晓燕. 康拉德小说的人类学解读[J]. 南方文坛, 2012(6).

[16] CONRAD, JOSEPH. A Personal Record[EB]. The Project Gutenberg Etext. October, 1996.

[17] 约瑟夫·康拉德. 康拉德小说选[M]. 袁家骅, 等译, 赵启光, 编选.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18] WATTS, CEDRIC. A Preface to Conrad[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 VIOLA, ANDRÉ. A Black Athena in the 'Heart of Darkness' or Conrad's Baffling Oxymorons[M]. Conradiana, 2006.

[20] DRYDEN, LINDA. Joseph Conrad and the Imperial Romance[M].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Lt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21] 约瑟夫·康拉德. 吉姆爷[M]. 熊蕾, 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22] CONRAD, JOSEPH. The Rescue[EB]. The Project Gutenberg Etext. April, 1999.

[23] 约瑟夫·康拉德. 海隅逐客[M]. 金圣华,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24] 尤瓦尔·赫拉利. 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M]. 林俊宏,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

[25] 马娅·亚桑诺夫. 守候黎明: 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M]. 金国,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责任编辑 刘海燕)

“Others” with Distinctiveness

— On the Image of the “Others” in Joseph Conrad’s Novels

LI Wenjun, SU L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xia Nomal University, Guyuan, Ningxia 756000, China)

Abstract: Joseph Conrad’s imperial romances are mostly set in the Malay Islands and the African jungles. This background setting has caused a lot of controversy, that is, whether the author wants to show exotic East to western readers or take the remote East as a foil “other” to the civilized Europe? Actually, Conrad surpassed the white cultural context he was from, and should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very few Western writers who can put down the cultural superiority of white people and describe the “other” world with empathy. Conrad’s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al landscape,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cultural conventions of Asia and Africa as the geographical “other” of Europe presents a unique East, such as distinctive landscape and customs, distinctive energy and vitality, and distinctive spirit and moral.

Key words: Joseph Conrad; self; other; colonialism; culture

城市发展与生态平衡

——郑州东区鸟类多样性现状及栖息地保护策略

李长看¹, 赵浩然²

(1. 郑州师范学院 自然博物馆, 河南 郑州 450044; 2.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医学、兽医和生命科学学院, 英国 格拉斯哥 G12 8QQ)

摘要:为全面掌握郑州东区鸟类多样性现状与生态系统健康水平, 志愿者项目团队于2025年春季对北龙湖、龙子湖及其连通水系等典型区域系统地开展了鸟类多样性调查, 查阅文献及历年来的监测记录。结果共记录鸟类157种, 隶属16目42科, 涵盖留鸟、夏候鸟、冬候鸟及旅鸟, 鸟类多样性较为丰富。其中, 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共计23种, 包括一级保护动物2种, 二级保护动物21种。调查发现, 北龙湖和龙子湖区域生境多样化、植被层次丰富、水体连通性良好, 为鸟类提供了重要的栖息与繁殖条件。调查发现外来物种干扰、人为活动频繁等生态威胁问题依然存在。基于调查结果, 提出生态功能分区管理、外来物种防控、公众生态教育与长期监测机制等多项保护建议, 以期为郑州城市生态建设与鸟类多样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和管理参考。

关键词:郑州东区; 鸟类多样性; 生态保护; 城市湿地; 生境管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03

中图分类号:X8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12-06

一、前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我国许多地区的生态环境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 原有的自然生态格局被人为活动改变,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面临不同程度的干扰与破坏。与此同时, 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已成为当前各级政府和科研机构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鸟类作为城市生态系统中最为活跃且易于观测的动物类群之一, 因其对生境变化高度敏感, 成为衡量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健康水平的重要生物指示物。通过系统调查和长期监测鸟类群落的组成与变化, 不仅可以动态掌握区域生态环境状况, 而且可以为科学规划城市生态空间、优化绿地结构、完善湿地保护政策提供有力支撑。

郑州地处中原腹地, 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 近年来城市发展速度显著加快, 特

别郑东新区的开发建设, 使得郑州的城市功能结构、土地利用格局和绿地系统发生了深刻变化。郑州东区作为新兴的城市副中心, 其生态环境演变对于整个城市区域生态网络的构建具有关键意义。随着北龙湖、龙子湖及其连通水系生态修复工程的推进, 一系列以“城市绿心”“生态水廊”为目标的建设项目陆续实施, 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生态功能的湿地网络系统。然而, 这些城市生态绿地系统在满足人居功能与景观美学的同时, 是否能够有效承载野生动物, 尤其是鸟类的栖息、繁殖与迁徙需求, 尚需进一步科学评估与实地验证。

鸟类群落的多样性和区系组成直接受区域地理位置、生境类型、水体分布、植被结构及人类干扰程度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城市化进程中, 绿地碎片化、水体硬质化、夜间光污染和人为干扰等问题, 往往会造成部分鸟类的生境退化甚至局部消失。与

收稿日期: 2025-06-15

基金项目: 2023年河南省湿地保护修复项目“河南省域黄河湿地鸟类监测及栖息地本底资源调查”

作者简介: 李长看(1967—), 男, 河南登封人, 郑州师范学院自然博物馆教授, 主要从事鸟类生态学、涉鸟故障研究。

此同时,部分具有较强适应能力的鸟类物种则可能借助城市化带来的新资源获得扩张机会,进而使城市鸟类群落结构发生变化。因此,对城市区域尤其是城市新区的鸟类多样性开展专项调查,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更是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现实需要。

为全面了解郑州东区的鸟类资源现状,科学评价城市新区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与生物多样性承载水平,2025 年 4 月至 5 月,河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郑州师范学院等单位,组织开展了郑州东区鸟类多样性志愿调查工作。本次调查以北龙湖、龙子湖及其连通水系为重点调查区域,通过系统记录春季鸟类的种类、数量、分布及其保护等级信息,并结合历年来的基础监测资料,调查团队对该区域鸟类区系组成及其生态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

本报告旨在通过科学系统的鸟类多样性调查,揭示郑州东区鸟类群落的结构特征与动态变化;结合生态环境变化背景,探讨城市绿地与湿地系统对鸟类生境的支撑能力;并进一步提出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外来物种管理的建议,服务于郑州市未来生态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

二、研究区域与调查方法

(一)郑州市区及调查区域自然条件(降雨量)

郑州市地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时间长,光热资源丰富,无霜期较长。该地区兼受海洋性湿热季风和大陆性干冷气团的交替影响,降水量适中,属中纬度半湿润气候类型,适宜植物生长和动物栖息活动^[1]。

从季节分布来看,郑州夏季受海洋性季风影响,气候炎热多雨,平均气温 26.6℃,历年夏季平均降水量为 350.7 毫米;冬季则受西伯利亚大陆性气团控制,寒冷多风、少雨雪,平均气温为 1.7℃,其中 1 月为最冷月份,平均气温为 -0.3℃。春季气温逐步回升,平均气温约为 15℃,气候温暖但降水较少;秋季气温逐渐降低,平均气温为 14.6℃,雨量较少,天气晴朗干爽。年无霜期为 220 天左右,气候特征表现为冬冷夏热、春暖秋爽,属典型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2]。

近年来,监测区域的郑州东区北龙湖、龙子湖及连通水系建设成效显著,河湖周边种植有大量乔木、灌木及草地,为鸟类等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与活动环境。上述自然与生态条件共同构成了郑州东区鸟类多样性的有利基础。

(二)调查时间与人员组成

本次鸟类多样性调查工作开展于 2025 年 4 月至 5 月,正值春季迁徙与繁殖初期。调查时间选取

在候鸟活跃、鸟类种群更替频繁的关键时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实效性。

调查工作由河南省生态环境厅牵头,联合郑州师范学院等相关单位共同开展。参与人员包括相关高校生态学、动物学、环境科学等专业的教师与学生,以及经过培训的志愿者与市民观察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多学科、跨机构的联合调查团队。

调查团队成员具备较强的鸟类识别与野外记录能力,统一使用标准的记录表格与野外观测设备,确保数据采集的科学性与可比性。

(三)调查方法

1. 调查方式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样线法”与“定点观察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区域内鸟类进行记录。

样线法:在北龙湖、龙子湖及连通水系的典型代表性区域设置多条调查样线,每条样线长度约为 1 ~ 2 km,调查人员沿样线缓慢行进,边走边观察记录目击到的鸟类种类及数量。样线选择兼顾水域、林地、灌丛、草地等多种典型生境类型,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定点观察法:在部分水域交汇处、繁殖活动频繁区域及鸟类活动密集区域设置观察点,调查人员在固定地点使用望远镜、照相机及记录本,对鸟类活动进行不少于 30 分钟的定点观测,记录鸟类的种类、数量、行为特征与生态位利用情况。

以上两种方法结合使用,既能系统覆盖较广区域,又能对局部重要生境进行深入记录,有效提升调查的完整性与科学性。

2. 数据记录与分类标准

记录内容:包括鸟类中文名称与拉丁学名、观察时间、地点、数量、栖息环境、行为特征(如觅食、飞行、鸣叫、繁殖)、是否拍摄照片等。

分类标准:鸟类物种识别参照《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3]进行分类,保护等级依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4]执行。

数量分级:采用“+”“++”“+++”等符号表示观察到的个体数量等级,作为相对丰度参考。

3. 历史资料整理

为增强数据的完整性与纵向对比性,本次调查在实地记录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过去十年间郑州东区相关区域的鸟类监测与记录资料^[5-10],包括环境部门历年春季候鸟观测数据、高校科研团队积累的鸟类调查成果、公众科学平台(如“爱鸟周”记录、自然观察 App 等)中的有效记录。

通过历史数据与本次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可判断鸟类区系变化趋势,分析城市生态系统动态演变过程,为提出科学保护建议提供数据支撑。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 鸟类区系组成

根据 2025 年 4 月至 5 月由河南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的郑州东区鸟类多样性志愿调查结果,结合历年来的监测数据,统计出郑州东区调查区域内共栖息分布鸟类 157 种,隶属于 16 目 42 科,包括留鸟、夏候鸟、旅鸟和少量冬候鸟等多种居留类型。

这些鸟类,涵盖了从大型水禽(如天鹅属、潜鸭属)到小型林栖鸟类(如山雀属、柳莺属、鹁鸪属等)的多种生态功能群,物种分布体现出区域生态生境类型的多样性和分层结构。部分物种如凤头蜂鹰,还表现出迁徙时群体过境的特征,例如 5 月 11 日记录到约百只凤头蜂鹰集中过境,显示出该区域处于候鸟迁徙通道的重要节点。

(二) 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统计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 年修订)》标准,郑州东区调查区域共记录国家重点保护鸟类 23 种(见表 1)。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Ⅰ级)共 2 种:青头潜鸭(*Aythya baeri*)、中华秋沙鸭(*Mergus squamatus*)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Ⅱ级)共 21 种,包括但不限于:大天鹅(*Cygnus cygnus*)、小天鹅(*C. columbianus*)、疣鼻天鹅(*C. olor*)、斑头秋沙鸭、红隼、红脚隼、黑翅鸢、长耳鸮、短耳鸮、纵纹腹小鸮、白琵鹭、红喉歌鸲等。

这些重点保护鸟类的出现,尤其是部分种群数量稳定的种类(如疣鼻天鹅),不仅反映出调查区域在春季具备较高的生态质量,也标志着区域生态系统对濒危鸟类的生态承载能力正在恢复和提升。

(三) 居留类型构成

本次调查期间,鸟类居留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留鸟(R):在区域内全年可见的鸟类,进入繁殖期的留鸟开始筑巢、配对、繁育后代。常见种类包括:环颈雉、山斑鸠、珠颈斑鸠、喜鹊、麻雀、大山雀等。

夏候鸟(S):春季由南方迁飞至郑州地区进行繁殖活动,秋季再迁回越冬地。此类包括夜鹭、黑卷尾、红尾伯劳、家燕、金腰燕等。

冬候鸟(W):秋末冬初由北方迁飞至郑州地区越冬的鸟类。本次调查虽为春季,冬候鸟大部分已北迁,但仍记录到如赤麻鸭、绿头鸭、灰椋鸟等部分未迁徙种群。

表 1 郑州地区调查区域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统计表

种类 Species	保护级别 Conservation class	数量等级 Abundance grade	居留类型 Resident or migrant	区系从属 Distribution realm
一、雁形目 <i>Anseriformes</i>				
鸭科 <i>Anatidae</i>				
1. 疣鼻天鹅 <i>Cygnus olor</i>	Ⅱ	+	W/R	E
2. 小天鹅 <i>Cygnus columbianus</i>	Ⅱ	+	P	E
3. 大天鹅 <i>Cygnus cygnus</i>	Ⅱ	+++	P	Pa
4. 鸳鸯 <i>Aix galericulata</i>	Ⅱ	+	P	Pa
5. 青头潜鸭 <i>Aythya baeri</i>	Ⅰ·J	+	W	E
6. 斑头秋沙鸭 <i>Mergus albellus</i>	Ⅱ·J	++	W	Pa
7. 中华秋沙鸭 <i>Mergus squamatus</i>	Ⅰ·J	+	P	E
二、鸊鷉目 <i>Podicipediformes</i>				
鸊鷉科 <i>Podicipedidae</i>				
黑颈鸊鷉 <i>Podiceps nigricollis</i>	Ⅱ	+	P	Pa
三、鸻形目 <i>Charadriiformes</i>				
彩鹬科 <i>Rostratulidae</i>				
彩鹬 <i>Rostratula benghalensis</i>	Ⅱ·J·A	+	S/P	E
四、鹈形目 <i>Pelecaniformes</i>				
鸬科 <i>Threskiornithidae</i>				
白琵鹭 <i>Platalea leucorodia</i>	Ⅱ·J	+	W	Pa
五、鹰形目 <i>Accipitriformes</i>				
鹰科 <i>Accipitridae</i>				
1. 黑翅鸢 <i>Elanus caeruleus</i>	Ⅱ	+	S/R	O
2. 大鵟 <i>Buteo hemilasius</i>	Ⅱ	+	W	Pa
3. 普通鵟 <i>Buteo japonicus</i>	Ⅱ	+	W	Pa
六、鸱形目 <i>Strigiformes</i>				
鸱鸃科 <i>Strigidae</i>				
1. 红角鸮 <i>Otus sunia</i>	Ⅱ	+	R	E
2. 斑头鸮鹞 <i>Glaucidium cuculoides</i>	Ⅱ	+	R	O
3. 纵纹腹小鸮 <i>Athene noctua</i>	Ⅱ	+	R	Pa
4. 长耳鸮 <i>Asio otus</i>	Ⅱ·J	+	W	E
5. 短耳鸮 <i>Asio flammeus</i>	Ⅱ·J	+	W	E
七、隼形目 <i>Falconiformes</i>				
隼科 <i>Falconidae</i>				
1. 红隼 <i>Falco tinnunculus</i>	Ⅱ	+	R	E
2. 红脚隼 <i>Falco amurensis</i>	Ⅱ	+	P/S	Pa
八、雀形目 <i>Passeriformes</i>				
绣眼鸟科 <i>Zosteropidae</i>				
红胁绣眼鸟 <i>Zosterops erythroleurus</i>	Ⅱ	+	P/S	E
(九) 鹟科 <i>Muscicapidae</i>				
1. 红喉歌鸲 <i>Calliope calliope</i>	Ⅱ	+	P	Pa
2. 蓝喉歌鸲 <i>Luscinia svecica</i>	Ⅱ	+	P	Pa

注:1. 保护级别:“Ⅰ”国家一级保护,“Ⅱ”国家二级保护,“▲”河南省重点保护,“J”《中、日候鸟保护协定》指定种类,“A”《中、澳候鸟保护协议》指定种类;2. 数量等级:(+++)优势种,(++)普通种,(+)稀有种;3. 居留类型:(R)留鸟,(P)旅鸟,(S)夏候鸟,(W)冬候鸟,(V)迷鸟,(U)不详.;4. 区系从属:(E)广布种,(Pa)古北种,(O)东洋种。

旅鸟(P):在春季或秋季迁徙途中经过调查区域,短暂停留,常出现在水体、林缘及农田交错带。典型种类包括小天鹅、凤头蜂鹰、林鹳、青脚鹳等。

这些鸟居留类型的并存,说明调查区域不仅具有栖息功能,而且具有重要的迁徙驿站与繁殖地双重功能。

(四) 各类群代表性鸟种举例

以下为部分典型分类单元及代表性鸟种:

雁形目(*Anseriformes*):大天鹅、小天鹅、疣鼻天

鹅、鸳鸯、青头潜鸭、斑头秋沙鸭、中华秋沙鸭、斑嘴鸭、绿头鸭等水禽类物种。

鸽形目 (*Charadriiformes*): 黑翅长脚鹬、反嘴鹬、林鹬、白腰草鹬、普通燕鸽、红嘴鸥等涉禽与水边种群。

隼形目与鹰形目 (*Falconiformes-Accipitriformes*): 红隼、红脚隼、黑翅鸢、大鵟、普通鵟等猛禽类,虽数量不多,但生态指示意义强。

雀形目 (*Passeriformes*): 包括麻雀、大山雀、白鹡鸰、黄眉柳莺、灰棕鸟、棕背伯劳、喜鹊等,占总鸟种的一半以上,是城市与湿地边缘区域最丰富的鸟类群体。

(五) 栖息地特征与生境利用

调查区域覆盖北龙湖、龙子湖及其连通水系,在生境类型上包括:开放性水面、水岸带湿地、灌丛、林地、城市绿地与人工建设边缘区等多种复合型生态环境。各类鸟类对栖息地的利用情况如下:

水禽(雁形目、鸕鹚目)主要集中在龙子湖、北龙湖开放水面及近岸水生植物区。

林栖鸟类(雀形目、隼形目、鸽形目)多见于湖岸乔灌木交错地带,利用乔木进行夜栖与繁殖。

部分涉禽(鹈形目、鸕形目)、旅鸟常出现在水体交汇处或人工河段边缘带。

城市耐扰性鸟类(如麻雀、喜鹊、大嘴乌鸦、乌鸫、白头鹎等)分布广泛,甚至在人流密集区亦频繁出现。

四、生境变化与生态威胁分析

郑州东区鸟类多样性的调查结果表明,该区域监测记录到多达 157 种鸟类,区系组成多样,生态功能结构完整,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物承载力。然而,在调查过程中,也观察到影响鸟类栖息、繁殖与迁徙的重要因素,包括自然生境变化与人为活动干扰等多个方面。对这些生态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有助于科学理解城市生态系统的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一) 生境质量的总体改善趋势

近年来,随着郑州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特别是以北龙湖和龙子湖为核心的“城市湿地—绿色廊道”生态空间格局逐渐建立,区域的水质、水生植被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根据历年监测数据与本次调查结果对比,鸟类物种数量及重点保护种类的丰富程度均呈现上升趋势,表明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处于向好转化状态。通过多年的监测数据分析,发现鸟类多样性呈

较为显著的上升趋势,表明郑州地区城市生态系统处于持续向好转化的状态。典型案例:

疣鼻天鹅的连续繁殖成功,不仅体现了栖息地水质与隐蔽环境的改善,更代表着城市水生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

北龙湖与龙子湖水域形成相对完整的水体—湿地—植被生态链,为水禽、水岸鸟类等群体提供了稳定的栖息条件。

此外,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在龙子湖岸线形成一定规模的植物带,既可为夜鹭、凤头鸕鹚等水鸟提供筑巢所,也为部分候鸟提供遮蔽与觅食资源。金鱼藻、茨藻等沉水植物则在水体中提供了重要的食物来源。

(二) 外来物种的生态威胁

尽管生境总体改善,但调查期间亦观察到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对本地鸟类栖息地构成潜在威胁,须引起足够重视。

1. 巴西龟的野外种群

在北龙湖水体中监测到外来物种——巴西龟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曾被观测到爬上凤头鸕鹚的水面浮巢,对其繁殖行为造成干扰。这表明该外来龟类已在区域内形成野外种群,其竞争性行为可能对本地水鸟繁殖地构成侵占压力。

2. 麝鼠的出现

在连通水系中,多次观察到麝鼠 (*Ondatra zibethicus*),该种亦为典型外来哺乳动物。麝鼠以挖掘水岸巢穴、啃食水生植物著称,容易造成岸线破坏、水草稀疏等二次生态影响,从而间接影响水鸟的筑巢与觅食环境。

建议管理方加强防控,严禁放生外来物种,以降低其带来的入侵风险。这项建议具有现实紧迫性,特别在生态系统初步恢复的关键阶段,应防止外来物种干扰恢复进程。

(三) 人类活动干扰

调查团队在鸟类活动区域频繁观察到人类干扰行为,对部分鸟类产生持续性或潜在性的负面影响。

1. 钓鱼、野营与烧烤行为

部分水岸区域,特别是在连通水系或人流较大的近岸地带,钓鱼者“几乎比邻而居”,野营烧烤等休闲行为大量存在。这些活动常常造成鸟类的飞离、觅食中断甚至繁殖失败,尤其对筑巢在地面或水面浮巢的鸟类(如凤头鸕鹚)影响显著。

2. “打鸟”行为、遛狗干扰

更为严重的是,“打鸟”行为在某些区域仍时有发生。此类行为不仅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更对

过境迁徙性鸟类构成极大威胁。短暂停留的旅鸟在能量补充阶段极度依赖安静、安全的栖息环境,持续惊扰可能导致其体能下降甚至迁徙失败。遛狗者尤其在无牵引绳的情况下,常对地面繁殖鸟类构成直接干扰,踩踏、惊飞甚至造成鸟巢损毁。

五、保护对策与建议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郑州东区具备较为丰富的鸟类区系组成和良好的生态基础条件,尤其是在北龙湖与龙子湖等区域,已初步形成具备栖息、繁殖和迁徙中继功能的湿地生态系统。该结果不仅反映出区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恢复潜力,而且为后续城市生态环境管理和物种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基础。然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外来物种入侵、人类活动干扰以及生态管理不足等问题,仍对区域鸟类多样性构成一定威胁。为进一步巩固生态系统恢复成效,推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笔者提出如下保护建议。

(一)加强鸟类栖息地分区管理

根据本次调查所掌握的鸟类空间分布信息,建议将北龙湖、龙子湖及连通水系区域划分为不同功能区,以提升管理针对性和生态调控能力。

1. 核心保护区

划定鸟类繁殖和高密度活动区域(如凤头鸊鷉筑巢带、疣鼻天鹅常驻区域)为核心栖息区,实施封闭管理,严禁垂钓、遛狗、烧烤、无人机飞行等干扰行为。

2. 生态缓冲区

在核心区外围设置缓冲带,允许低强度的生态旅游和观鸟活动,但需设立明确步道与警示标识,防止人为进入鸟类活动区域。

3. 公众教育展示区

在人流较大的开放区域,鼓励布设观鸟平台、生态解说牌和互动展板,引导市民以非干扰方式认识和欣赏鸟类生态。

此类“生态分区+分级管控”的模式可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平衡,在提升公众自然意识的同时,保障鸟类关键生境不被破坏。

(二)防控外来物种入侵风险

调查中已明确观测到外来物种巴西龟和麝鼠在部分区域形成野外种群,对鸟类的筑巢与水体生态安全构成威胁。为此,建议:

1. 建立外来物种监测机制

在龙子湖、北龙湖设置定期观察与记录点,重点关注巴西龟、麝鼠等高风险物种的数量与分布动态。

2. 制定清退机制与响应预案

一旦发现外来物种干扰原生鸟类繁殖行为或破

坏生境,应启动人工移除机制,并结合科学研究评估其生态影响。

3. 加强放生活动监管

面向公众开展“文明放生”科普宣传,结合行政执法措施,严禁随意放生非本地水生动物或爬行动物,避免生态系统二次干扰。

(三)减少人为干扰活动

人类活动是城市鸟类面临的主要干扰因素,特别是在繁殖期或迁徙期,其负面影响尤为显著。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 设立鸟类繁殖期管控期

每年4月至6月为留鸟与夏候鸟集中繁殖时段,建议通过公告、栏杆、临时围挡等方式限制核心区域人类进入。

2. 规范钓鱼与遛狗行为

在高频干扰区域设立“严禁垂钓”“严禁遛狗”指示牌,对违规行为进行劝导或处罚,并强制主人使用牵狗绳。

3. 整治非法“打鸟”行为

联合公安、林业和社区管理力量,加强巡查与举报奖励制度,对使用弹弓、网具等非法狩猎器具者依法处理。

(四)加强生态宣传与公众参与

公众生态素养提升是城市鸟类保护的关键因素,应通过多样化渠道推动全民参与。

1. 开展观鸟活动与“爱鸟周”主题教育

由环保、林业部门联合高校与环保组织,定期组织观鸟、讲座与自然导赏,提高市民的自然认知与保护意识。

2. 开发数字科普平台

结合“自然观察”等App平台,建立本地鸟类图鉴与观察日志系统,鼓励市民记录鸟类活动并参与数据共享。

3. 建设校园生态教育基地

在高校及中小学中设立湿地教学点,结合地方鸟类多样性资源,推动生态教育与实践教学深度融合。

(五)推进长期生态监测制度

为准确掌握区域生态系统演变与鸟类群落动态,建议建立稳定、规范的鸟类监测机制。

1. 制定年度固定监测计划

将北龙湖、龙子湖等区域纳入市级生物多样性监测点,每年春秋两季实施定点、定线调查。

2. 整合历史数据与科研资源

由科研机构主导建立长期数据库,结合历年监测资料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研究。

3. 建立制度化数据发布机制

建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定期发布“郑州市鸟类多样性年度报告”,提升数据公开化与社会关注度。

(六) 综合结论与未来方向

综合调查结果,郑州东区鸟类多样性丰富,共记录 157 种,涵盖 16 目 42 科,其中 23 种为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这一成果表明,北龙湖、龙子湖及其连通水系在城市生态建设中已发挥显著作用,区域生态系统的修复和功能提升取得初步成效。然而,外来物种入侵、人类活动干扰仍是主要威胁,须持续加强管控。未来保护工作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化:

建立“科研—管理—公众”三位一体的生态合作机制,推动科研机构、高校与城市管理部门联动,形成常态化交流与反馈体系;强化城市规划与生态保护融合,避免湿地与林带被割裂的情况,保持鸟类活动空间的连续性和生态完整性;积极融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将区域监测数据纳入国家或省级平台,提升郑州在全国生态治理中的示范作用;探索智慧观鸟与市民参与的科学模式,通过数字化、参与式的方式扩大公众对鸟类保护的关注和参与度。

郑州东区的生态建设已初见成效,鸟类多样性的恢复和繁殖群体的稳定,正是生态修复成效的直观体现。下一步须持续加强数据支撑与科学决策,推动生态管理的数字化、制度化,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为郑州市绿色发展注入持久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李长看,王文林,王恒瑞,等. 郑州黄河湿地鸟类区系调查[J].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 43(4): 426 – 431.

[2] 李长看,张光宇,王 威. 气候变暖对郑州黄河湿地鸟类分布的影响[J]. 安徽农业科学,2010, 38(6): 2962 – 2963.

[3] 郑光美. 中国鸟类分布与分布名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23.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R]. 公告 2021 年第 3 号.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R]. 公告 2023 年第 17 号.

[6] 王文林,张丽琴,李长看,等. 郑州鹭类的生态习性[J]. 河南科学,2004, 22(6): 792 – 795.

[7] 张光宇,梁子安,聂爱社,等. 郑州市鸟类调查[J]. 河南林业科技, 2002, 22(4): 26 – 28.

[8] 李长看,赵海鹏,邓培渊,等. 郑州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鸟类区系和多样性[J]. 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43(4): 416 – 422.

[9] 李长看. 黄河(河南段)鸟类[M]. 郑州: 中原农民出版社,2024.

[10] 王恒瑞,赵宗英. 郑州黄河湿地鸟类[M].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刘海燕)

Urba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Balance:

Current Status of Avian Diversity and Habitat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in Eastern Zhengzhou

LI Changkan¹, ZHAO Haochen²

(1.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College of Medical, Veterinary and Lif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Glasgow, Glasgow, United Kingdom, G12 8QQ, Scotland)

Abstract: To evaluate the current status of avian diversity and ecological conditions in eastern Zhengzhou, a comprehensive field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spring 2025 across key habitats including Beilong Lake, Longzi Lake, and their connected water systems. A total of 157 bird species were recorded, belonging to 16 orders and 42 families, including resident birds, summer visitors, passage migrants, and a few wintering species. Among them, 23 species are listed as nationally protected, comprising 2 Class I and 21 Class II species. The surveyed areas, particularly Beilong and Longzi Lakes, support diverse vegetation structures and well-connected aquatic systems, provid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bird foraging, breeding, and stopover. However, ecological threats such as invasive alien species and frequent human disturbances were also observed.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several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functional zoning, invasive species control, public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ng-term monitoring mechanism, aiming to inform urban biodiversity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fforts in Zhengzhou.

Key words: Zhengzhou East; avian diversity; urban wetland; habitat managemen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基于超效率 DEA 模型的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评价

李许卡, 祝月明, 苗 领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发展绿色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基于 2010—2020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综合运用超效率 SBM 模型与全局 GML 指数模型,对我国省域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进行了静态和动态评价。研究表明: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水平总体不高,在区域分布上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依次递减特征,且相较于 2011—2015 年这一时期,2016—2020 年的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提升更为明显。

关键词:绿色经济;效率评价;动态;静态;高质量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04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18-05

一、引言

绿色经济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益和包容性等特点,与我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脉相承,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态破坏、自然资源枯竭等问题开始集中显现,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水源短缺和土地荒漠化等现象,已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大力发展以生态优先、节约集约为基本导向的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当前,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依据学者的研究,可通过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进行判断。在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评价中,需采用科学方法、设定客观评价指标。一般而言,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因不受主观因素影响,被学者们广泛采用。但 DEA 方法下的产出指标无法包含非期望产出要素,这与同时涵盖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要素的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评价需求不相适应^[2]。基于此,学者们提出了

基于松弛的超效率 SBM 模型——这是一种非径向、非角度的非参数 DEA 方法,不仅避免了因未考虑松弛变量而高估评价对象效率的问题,还解决了因未能同时兼顾投入和产出因素而导致的效率失真问题,且能够有效区分和比较效率值大于 1 的决策单元^[3]。不过,基于松弛的超效率 SBM 模型仅从静态角度对效率进行测度。为进一步把握效率的动态增减情况,基于全局 DEA 计算的全局 GML 指数模型开始在学界应用——它不仅可以有效呈现效率值的长期变动趋势,还能够通过指数分解,进一步挖掘导致效率变动的深层次原因^[4]。由此,本文同时选取基于松弛的超效率 SBM 模型和全局 GML 指数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考查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相较于不考虑污染物排放的传统经济发展效率研究,在新发展阶段下,基于绿色视角开展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其二,相较于传统 DEA 模型、单一静态或动态评价方法,在效率评价中纳入非期望产出要素,并同时采用超效率 SBM 模型和全局 GML 指数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

收稿日期:2025-08-25

基金项目:202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问题研究”(24ZDA021); 2024 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课题“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对策研究”(SKL-2024-1728)

作者简介:李许卡(1986—),男,河南许昌人,经济学博士,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绿色经济、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城镇化。

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进行科学评价,以期更全面地把握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实际情况。

二、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评价模型构建

在广泛借鉴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尽可能保障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测度的精准性和全面性,本文同时选择基于松弛的超效率 SBM 模型和全局 GML 模型,分别对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进行静态测度和动态测度^[5]。

(一)超效率 SBM 模型构建

相较于传统 DEA 模型,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不仅可以测度期望产出与正向效率最大化前沿的距离,还能够有效测度包含环境污染物排放等非期望产出与负向效率最小化前沿的距离,充分体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理念。具体而言,将我国每个省份看作生产决策单元(DMU),假定每个决策单元有 m 种投入, $X = (x_1, x_2, \dots, x_m) \in Q^m$, n 种期望产出 $Y = (y_1, y_2, \dots, y_n) \in Q^n$, k 种非期望产出 $P = (p_1, p_2, \dots, p_k) \in Q^k$, 则第 i 个省份在第 t 期的投入和产出值可表示为 $(x^{i,t}, y^{i,t}, p^{i,t})$, 其生产可能性集如下所示:

$$W = \{ (x^m, y^n, p^k) \mid x^m \geq X\lambda, y^n \geq Y\lambda, p^k \geq P\lambda, \lambda \geq 0 \} \quad (1)$$

公式(1)中, λ 代表权重向量,生产可能性函数的 3 个不等式分别表示实际投入不低于前沿投入水平、实际期望产出不高于前沿期望产出水平和实际

$$GTC_t^{t+1} = \frac{[1 + D^G(x^t, y^t, p^t; g^x, g^y, g^p)] / [1 + D^t(x^t, y^t, p^t; g^x, g^y, g^p)]}{[1 + D^G(x^{t+1}, y^{t+1}, p^{t+1}; g^x, g^y, g^p)] / [1 + D^{t+1}(x^{t+1}, y^{t+1}, p^{t+1}; g^x, g^y, g^p)]} \quad (5)$$

上述公式中, $D^t(x^t, y^t, p^t; g^x, g^y, g^p)$ 、 $D^G(x^t, y^t, p^t; g^x, g^y, g^p)$ 分别表示基于非径向、非角度方法构建的当期方向距离函数与全域 SBM 方向距离函数。当 $GML_t^{t+1} > 1$ 时,表明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呈增长趋势;当 $GML_t^{t+1} < 1$ 时,表明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呈下降趋势;当 $GML_t^{t+1} = 1$,表明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处于稳定状态。技术效率指数(GEC_t^{t+1})和技术进步指数(GTC_t^{t+1})的判断标准与此一致。

(三)效率评价和影响因素指标

投入与产出指标的选定。在投入指标上,基于绿色经济发展的理论内涵,选取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能源投入等 3 个指标。其中,资本投入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表示;劳动投入鉴于各省就业人口统计方法和口径的不统一,采用各地常住人口进行衡量;能源投入以用电量来表示。在产出指标上,期望产出指标选取了各省经济总量、居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绿化水平等 3 个指标,其中,各省经济总量用各

非期望产出不低于前沿非期望产出水平。超效率 SBM 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rho^* = \min \frac{1 - \frac{1}{m} \sum_{i=1}^m \frac{z_i^-}{x_{is}}}{1 + \frac{1}{n+k} \left(\sum_{r=1}^n \frac{s_r^n}{y_{rs}^n} + \sum_{r=1}^k \frac{s_r^k}{p_{rs}^k} \right)} \quad (2)$$

$$\text{s. t.} \begin{cases} x_s = X\lambda + Z^- \\ y_s^n = Y^n\lambda - Z^n \\ p_s^k = P^k\lambda - Z^k \\ \lambda \geq 0, Z^- \geq 0, Z^n \geq 0, Z^k \geq 0 \end{cases}$$

公式(2)中, ρ^* 表示规模报酬可变情况下决策单元 i 的超效率值,即第 i 个省份的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值, Z^- 、 Z^n 、 Z^k 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松弛变量。 ρ^* 值越大,表明决策单元的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水平越高。

(二)全局 GML 指数模型构建

相较于 ML 指数,全局 GML 指数通过全局对比的方式对动态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具有可传递性、循环累加性等优势,能够有效解决不同时期效率值的纵向对比问题^[6]。该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GML_t^{t+1} = \frac{1 + D^G(x^t, y^t, p^t; g^x, g^y, g^p)}{1 + D^G(x^{t+1}, y^{t+1}, p^{t+1}; g^x, g^y, g^p)} = GEC_t^{t+1} * GTC_t^{t+1} \quad (3)$$

$$GEC_t^{t+1} = \frac{1 + D^t(x^t, y^t, p^t; g^x, g^y, g^p)}{1 + D^{t+1}(x^{t+1}, y^{t+1}, p^{t+1}; g^x, g^y, g^p)} \quad (4)$$

省 GDP 表示,居民收入水平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城市绿化水平用城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表示;非期望产出指标以污染物排放水平来表示,采用废气中 SO_2 和颗粒物总排放量来衡量^[8]。

(四)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我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10—2020 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集(未包含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投资领域统计年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及年度统计公报等。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另外,以货币为单位的数据均采用对应价格指数进行去物价处理,固定资本投资存量借鉴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

三、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分析

(一)静态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分析

相较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传统经济发展效率,加入污染物排放指标后,全国及各地区绿色经济

发展效率水平显著下降,效率值主要集中在[0.2, 0.5]。但值得肯定的是,全国及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这表明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落地实施、公众生态环保意识的增强以及绿色发展技术水平的提升,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已取得初步成效。从区域层面来看,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呈现“东部>西部>全国>东北>中部”的特征。我国东部地区凭借率先发展的优势,在绿色发展领域同样走在全国前列,通过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大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切实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西部地区虽受气候、自然条件及历史发展基础等因素制约,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但始终重视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保护了本区域脆弱的生态环境,为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国家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近年来中部地区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达到8.6%,位居各地区首位,东北地区也逐渐走出了经济低迷状态。但受重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滞后、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过程中环境约束不足等因素影响,中部与东北地区在经济发展中面临较大的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因此,在“双碳”目标约束下,这两个地区未来需进一步加大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力度,重点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加快构建与环境约束匹配的绿色发展模式(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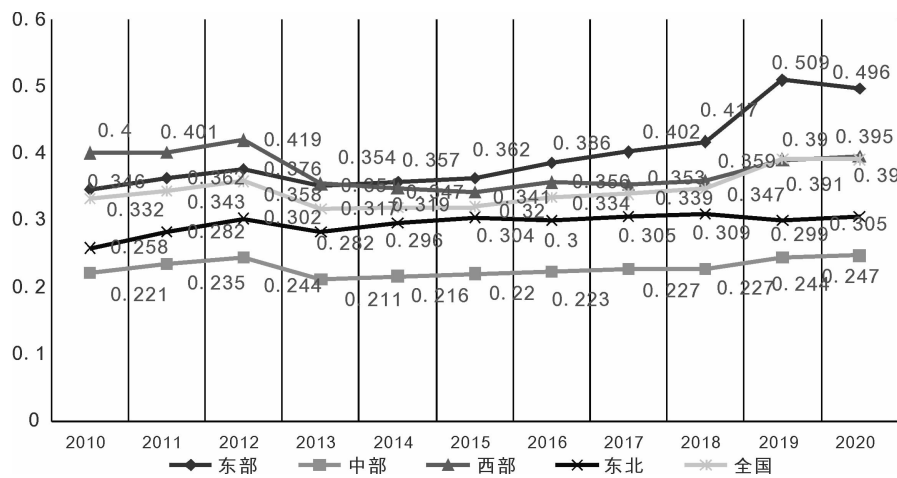


图1 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变动趋势

从省份层面来看,各省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差异显著:效率值最高超过1.2,最低不足0.15,且多数省份的效率值波动区间主要集中在[0.2,0.3],但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从2020年数据来看,超效率SBM值>1的仅有北京、上海、海南和青海等4个省份,相对其他省份,这类地区或因是经济社会发展成熟(如北京、上海),或因是全国重要生态功能涵养地(如海南、青海),在经济发展早期便实施了严格的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机制,从而有效保障了经济的绿色高效发展;超效率SBM值位于0.3~1之间的省份有天津、吉林、黑龙江和福建等9个省份,在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均有分布,这类省份在严格的环境约束下,仍实现了较高质量的发展,绿色转型成效较为突出;超效率SBM值处于0.2~0.3之间的省份有山西、内蒙古、辽宁和江苏等12个省份,这意味着我国较多省份的绿色经济发展效率仍处在中游水平,未来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超效率SBM值<0.2的省份有河北、山东、河南、四川和广

东等5个省份,尽管这5个省份的综合发展程度存在差异,但共同特征都是人口大省,常住人口均位列全国前六,且均为经济大省,承担着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也面临着较大的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压力,未来能否妥善解决这些省份的绿色经济发展问题,对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见表1)。

(二) 动态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分析

前文已从静态角度分析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基本情况,现结合全局GML指数及其分解结果,从动态视角考查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时间演变特征。为更清晰地观察数据趋势,在测算各年度全局GML指数的基础上,将研究时段划分为2011—2015年和2016—2020年两个时期,通过几何平均值集中呈现各时期的效率变动水平。

从全国来看,两个研究时期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MI)均大于1,表明2011—2020年期间,全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呈持续增长态势。其中,2011—2015年,年均增长0.2%;2016—2020年,年均增长

2.8%；第二时期的增长幅度显著高于第一时期。这一差异表明,随着我国绿色发展政策的深化落实,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成效愈发凸显。进一步结合全局GML指数分解结果,从增长动力来看,两个时期的效率增长均以技术进步(TC)为核心驱动因素,且2016—2020年TC对效率增长的推动作用更强,反映出我国绿色技术研发、应用能力的持续提升。分地区来看,首先,在2011—2015年这一时期,东部和东北地区MI均大于1,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呈增长趋

势,但推动效率增长的原因不同,东部是由TC推动,而东北地区是由EC(技术效率)优化推动,同期,中部和西部地区的MI均小于1,绿色经济发展效率都呈下降趋势,且均是由TC下降导致;其次,在2016—2020年这一时期,所有地区的MI均大于1,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呈上升趋势,且均是由TC上升所推动,说明TC在提高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效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表2)。

表 1 2010—2020 年各省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省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北 京	0.475	0.524	0.548	0.581	0.611	0.641	0.690	0.742	0.759	1.213	1.019
天 津	0.408	0.454	0.482	0.478	0.495	0.518	0.551	0.591	0.598	0.554	0.578
河 北	0.161	0.169	0.175	0.148	0.150	0.151	0.152	0.155	0.156	0.157	0.158
山 西	0.241	0.265	0.273	0.244	0.243	0.245	0.242	0.254	0.257	0.261	0.262
内蒙古	0.265	0.287	0.306	0.279	0.289	0.286	0.292	0.273	0.283	0.284	0.282
辽 宁	0.192	0.207	0.221	0.211	0.219	0.224	0.201	0.219	0.226	0.236	0.246
吉 林	0.310	0.345	0.376	0.342	0.368	0.381	0.391	0.386	0.387	0.353	0.361
黑龙江	0.271	0.295	0.309	0.293	0.302	0.306	0.309	0.311	0.315	0.309	0.309
上 海	0.421	0.456	0.475	0.491	0.521	0.548	0.596	0.657	0.732	1.007	1.013
江 苏	0.147	0.157	0.165	0.152	0.158	0.164	0.171	0.181	0.192	0.205	0.212
浙 江	0.217	0.229	0.239	0.224	0.227	0.229	0.236	0.237	0.242	0.269	0.274
安 徽	0.217	0.233	0.234	0.197	0.203	0.206	0.209	0.210	0.213	0.237	0.238
福 建	0.296	0.311	0.324	0.286	0.286	0.294	0.303	0.308	0.315	0.358	0.355
江 西	0.281	0.295	0.311	0.275	0.277	0.278	0.280	0.279	0.281	0.292	0.301
山 东	0.140	0.149	0.158	0.136	0.140	0.135	0.135	0.140	0.142	0.137	0.135
河 南	0.146	0.151	0.157	0.129	0.134	0.136	0.140	0.144	0.146	0.171	0.176
湖 北	0.213	0.225	0.237	0.206	0.212	0.218	0.223	0.227	0.229	0.254	0.253
湖 南	0.226	0.238	0.249	0.217	0.228	0.237	0.246	0.245	0.238	0.250	0.251
广 东	0.153	0.166	0.174	0.157	0.159	0.163	0.168	0.174	0.175	0.183	0.180
广 西	0.257	0.280	0.294	0.244	0.250	0.249	0.255	0.252	0.246	0.260	0.257
海 南	1.041	1.008	1.021	0.857	0.818	0.774	0.854	0.833	0.855	1.010	1.032
重 庆	0.316	0.341	0.373	0.330	0.337	0.348	0.361	0.361	0.354	0.389	0.406
四 川	0.178	0.186	0.197	0.161	0.164	0.170	0.175	0.179	0.180	0.193	0.192
贵 州	0.275	0.303	0.317	0.273	0.276	0.287	0.285	0.284	0.286	0.294	0.301
云 南	0.256	0.274	0.288	0.241	0.244	0.251	0.255	0.256	0.257	0.280	0.274
陕 西	0.275	0.299	0.315	0.262	0.265	0.269	0.267	0.269	0.271	0.273	0.281
甘 肃	0.276	0.296	0.312	0.277	0.276	0.268	0.275	0.269	0.273	0.290	0.286
青 海	0.925	1.004	1.026	0.803	0.759	0.711	0.787	0.812	0.844	1.013	1.008
宁 夏	1.024	0.786	0.820	0.711	0.656	0.621	0.681	0.634	0.648	0.699	0.751
新 疆	0.348	0.359	0.356	0.311	0.302	0.289	0.283	0.290	0.309	0.312	0.305

表 2 各地区全局 GML 指数及其分解

地区	2011—2015 年			2016—2020 年		
	MI	EC	TC	MI	EC	TC
全国	1.002	0.999	1.003	1.028	0.975	1.055
东部	1.013	0.976	1.039	1.045	0.965	1.082
中部	0.998	1.018	0.981	1.026	0.985	1.041
西部	0.984	0.999	0.985	1.021	0.980	1.041
东北	1.033	1.040	0.993	1.003	0.964	1.040

具体到每个省份,首先,从2011—2015年这一时期来看,MI大于1的省份有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和贵州等15个省份,这一时期这些省份的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是持续提高的;从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分解来看,北京、天津、内蒙古、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等7个省份的效率增长主要是由TC提升推动的,其中绝大部分为东部发达省份,这意味着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和绿色发展上,东部再次走在了全国前面;而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重庆和贵州等8个省份的效率增长主要是由EC提升推动的,同时也意味着这些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省份的技术进步相对不够理想。这一时期MI小于1的有河北、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广西、海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15个省份,说明这些省份在这一时期的绿色经济发展

效率是下降的;进一步来看,安徽、江西、广西、海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等 10 个省份是由 TC 下降所导致,说明这些中西部省份科学技术发展相对落后,未来需着重加大对科技发展的支持,而河北、福建、山东、河南和新疆等 5 个省份是由于 EC 下降所导致,主要是规模效率偏低引起的,意味着这些省份的规模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其次,在 2016—2020 年这一时期,除内蒙古和吉林两省 MI 小于 1 外,其他 28 个省份的 MI 均大于 1,绝大部分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呈上升趋势,相对于 2011—2015 年,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改善明显。具体而言,从内蒙古来看,其 MI 下降主要是由 EC 下降引起,而吉林 MI 下降是由 EC 和 TC 同时下降导致,综合考虑两省的现实情况,其原因很可能是这两个省份过度依赖资源开发、传统重工业转型升级进程滞后和劳动力大量流出。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省份来看,所有省份的 MI 增长都是由 TC 推动的,充分说明伴随我国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和科研投入的持续增加,科学技术进步确实已成为推动各省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提升的主要力量,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继续坚定把科学技术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见表 3)。

四、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2010—2020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 SBM 模型和全局 GML 模型,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对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展开评价,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其一,从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评价结果来看,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效率水平总体不高,但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其二,分地区来看,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值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依次递减的特征,东部和西部地区优于全国,而东北和中部地区在经济绿色转型发展上相对滞后。其三,具体到每个省份来看,不同省份的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差异较大,较多省份的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值分布在[0.2,0.3],超效率 SBM 值>1 的仅有北京、上海、海南和青海等 4 个省份,这些省份为全国绿色经济发展做出了表率,但河北、山东、河南、四川和广东等 5 个人口和经济大省的绿色经济发展效率不足 0.2,未来处理好这些省份的绿色经济发展问题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其四,从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变动来看,它是持续增长的,且相对于 2011—2015 年这一时期,2016—2020 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增长更为明显,达到 2.8%;从全局 GML 指数分解结果来看,技术进步在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效率增长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表 3 各省全局 GML 指数及其分解

地区	2011—2015 年			2016—2020 年		
	MI	EC	TC	MI	EC	TC
北 京	1.062	1.000	1.062	1.093	1.000	1.093
天 津	1.049	1.000	1.049	1.022	0.896	1.141
河 北	0.988	0.976	1.012	1.009	0.989	1.020
山 西	1.003	1.006	0.996	1.014	0.978	1.037
内 蒙 古	1.016	0.952	1.067	0.997	0.943	1.058
辽 宁	1.031	1.018	1.013	1.018	0.983	1.036
吉 林	1.042	1.046	0.997	0.989	0.947	1.044
黑 龙 江	1.025	1.055	0.971	1.002	0.962	1.041
上 海	1.055	1.000	1.055	1.128	1.000	1.128
江 苏	1.022	0.952	1.073	1.053	0.948	1.111
浙 江	1.011	0.943	1.072	1.036	0.965	1.074
安 徽	0.989	1.029	0.962	1.030	0.999	1.031
福 建	0.998	0.986	1.012	1.039	0.982	1.058
江 西	0.998	1.015	0.982	1.016	0.980	1.036
山 东	0.993	0.928	1.070	1.001	0.937	1.068
河 南	0.986	0.978	1.008	1.053	1.000	1.053
湖 北	1.004	1.033	0.972	1.030	0.985	1.046
湖 南	1.009	1.047	0.964	1.011	0.970	1.043
广 东	1.013	0.972	1.042	1.020	0.943	1.081
广 西	0.994	1.011	0.984	1.006	0.969	1.038
海 南	0.950	1.000	0.950	1.053	1.000	1.053
重 庆	1.019	1.033	0.986	1.032	0.985	1.047
四 川	0.991	1.022	0.970	1.025	0.994	1.031
贵 州	1.008	1.015	0.993	1.010	0.972	1.039
云 南	0.996	1.004	0.992	1.018	0.994	1.024
陕 西	0.995	0.998	0.997	1.009	0.979	1.030
甘 肃	0.995	1.001	0.994	1.013	0.979	1.035
青 海	0.949	1.000	0.949	1.071	1.000	1.071
宁 夏	0.909	1.000	0.909	1.039	1.000	1.039
新 疆	0.963	0.961	1.002	1.011	0.971	1.041

参考文献:

[1]汪彬.绿色经济效率影响机制[J].上海经济研究,2022(6):66-72.

[2]李许卡.绿色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2023(4):43-50.

[3]王迪,王靖宇.我国碳交易政策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2025(4):70-85.

[4]刘金科,肖翊阳.中国环境保护税与绿色创新:杠杆效应还是挤出效应[J].经济研究,2022(1):72-88.

[5]杨万平,李冬.中国八大区域经济绿色发展转型:动力差异与结构分解[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8):90-105.

[6]钱龙.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8(8):160-170.

[7]李长远.中国养老服务财政支出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2(6):101-107.

[8]杨一杰,曹维林.基于模糊交叉效率评价的绿色建筑设计方案选择研究[J].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2(5):32-3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下转第 37 页)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财富分配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周 迪

(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重庆 400020)

摘 要: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演进重构了财富分配范式。从历次技术革命到如今的数据驱动与平台经济,相关发展虽推动生产力提升,但也带来数据控制不平等、平台垄断风险、算法偏见等新分配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剖析数字劳动中的“产消者”角色、数据资本化进程中的价值分配异化等现象,有助于阐述新质生产力与三次分配的协同机制。然而,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技术赋能与分配正义悖论、要素配置空间失衡、制度供给滞后、伦理风险凸显等现实困境。为此,提出构建数据要素分配基础制度、完善三次分配动态均衡机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技术治理等实践路径,以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和共同富裕。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财富分配;数字经济;公平正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05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23-06

新质生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时代变革的标志性力量^[1]。其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深度融合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等现代技术要素,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催生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形态和经济模式。从智能制造的广泛应用到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从新能源领域的持续突破到生物技术的创新发展,这些变革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为社会财富创造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和渠道。然而,在新质生产力推动财富增长的进程中,财富分配问题日益凸显。一方面,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价值创造与分配机制尚不完善,拥有数据资源和技术优势的少数企业或个人获得巨额财富,而普通劳动者和传统产业从业者却面临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失业困境;另一方面,区域间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导致财富分配不均衡,东部发达地区凭借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创新环境,率先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财富积累加速,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则因受到多方面限制,在新质生产

力发展上相对滞后,与东部地区的财富差距呈现扩大趋势。鉴于此,深入研究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财富分配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及实践路径,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有益探索 and 创新发展,更是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

一、理论逻辑:新质生产力重构财富分配的新范式

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对财富分配产生了多方面深远影响。从历史上的技术革命到当今的数据驱动和平台经济,每一次变革都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和分配关系的调整。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演进与分配效应

历次技术革命推动分配关系变革。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技术进步与社会财富分配之间的紧密联系。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带来了机械化生产和工厂制度的确立。这一变革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使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马克思在《资本论》

收稿日期:2025-08-12

基金项目:2025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社会工作项目“重庆市重点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研究”(25SGS05)

作者简介:周迪(1989—),男,重庆人,博士,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工商管理、理论经济。

中指出,资本家通过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实现财富的积累,而工人阶级则陷入了相对贫困的境地。这种分配不均现象引发了社会矛盾,推动了劳工运动的兴起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初步建立。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电力的应用使得生产过程更加自动化和高效化,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和资本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了高端位置,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任务,这种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得财富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状态。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的突破和应用为核心。知识和信息成为重要生产要素,知识工作者和创新型人才的价值得到凸显,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分配问题。一方面,知识和技术的垄断使得少数科技企业和高科技人才获得了巨额财富,而传统产业和低技能劳动者则面临着淘汰和失业的风险;另一方面,“数字鸿沟”的出现导致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在获取和应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进入数字时代后,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重塑初次分配。平台企业通常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构建起连接多个用户群体的虚拟交易平台。它们通过提供交易撮合、信息共享、资源调配等服务,实现供需双方的高效对接,创造出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进而改变了传统财富分配模式。网络效应使得平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显著的优势,容易形成垄断地位。一旦平台企业取得垄断地位,就可以通过控制价格、抽取佣金、设置规则等方式获取超额利润。在平台经济模式下,平台企业与用户、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关系需要重新审视。平台用户作为数据的提供者和交易的参与者,为平台创造了价值,但他们在财富分配中的话语权相对较弱。这种不对等的分配关系可能导致平台企业与用户、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影响平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算法权力介入再分配过程,然而算法的应用并非完全中立和客观,其设计和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各种偏见和歧视,从而导致某些群体在财富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算法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使得人们难以理解和监督其决策过程,普通用户和受算法影响的群体往往缺乏足够的技术知识和资源来质疑和挑战算法的公正性,导致算法权力缺乏有效制衡,使算法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偏离公平正义原则。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阐释

数字劳动中的“产消者”角色与剩余价值捕获机制。用户不仅是消费者,也是数据的生产者,即“产消者”。以社交媒体为例,用户在平台上分享内

容、互动交流,为平台创造大量数据。这些数据被平台企业收集、分析和利用,用于精准广告投放、市场趋势预测、产品优化升级等商业目的,从而产生利润。然而,用户作为数据的生产者,并未从中获得相应的报酬,剩余价值被平台企业捕获^[2]。平台企业通过控制数据资源,实现对用户数据劳动的剥削,进一步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平台用户数据被资本化后的价值分配异化。平台企业将用户数据商品化,通过数据交易和广告等方式获取利润。这种资本化过程导致价值分配的异化:用户的数据劳动未得到合理补偿,而平台企业则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资料,其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集中,使得平台企业能够垄断数据资源,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获取超额利润。数据资源的垄断与传统生产资料的垄断类似,都导致了财富向少数企业集中,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此外,数据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理想情况下数据应被全社会共享。然而,目前数据主要被私人企业占有和控制,这种占有模式与数据的公有属性存在矛盾。

(三)新质生产力与三次分配协同机制

新质生产力推动智能技术、数字税、区块链等创新要素在三次分配中的应用,形成财富分配的协同机制^[3]。在初次分配中,智能技术提升生产效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资本与劳动的合理分配;在再分配中,数字税与数据资产核算为政府提供财政工具,调节高收入群体与企业的财富分配,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在第三次分配中,区块链技术保障慈善捐赠的透明度与公信力,激发社会成员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使慈善捐赠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助力共同富裕。

智能匹配降低交易成本,但算法歧视加剧收入分化。新质生产力借助智能技术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智能匹配系统通过精准对接供需双方需求,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市场运行效率^[4]。然而,算法中的偏见可能导致某些群体在就业、信贷等方面受到歧视,加剧收入不平等。例如,招聘算法可能基于历史数据对某些群体产生偏见,导致其获得工作机会的概率降低。这种算法歧视不仅影响个体的收入水平,还可能进一步固化社会阶层,阻碍社会流动。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提出将“算法可解释性”作为分配正义的技术保障,要求算法决策过程透明、可理解和可问责,以防止算法歧视和不公平现象。

数字税与数据资产核算纳入财政调节工具。为了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均,各国政府开始探索数字税和数据资产核算等财政工具。数字税是对大型科技企业的数字服务征收的税种,旨在增加财政收入并用于提升社会福利。例如,某些国家对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征收数字税,以确保这些企业在享受各国数字市场带来的利润时,也为当地社会作出贡献。数据资产核算则是将数据作为一种重要资产纳入企业财务报表,反映其真实价值。这有助于合理分配数据要素的收益,保障数据生产者的权益。通过数字税与数据资产核算的结合,政府能够更有效地调节财富分配,缩小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

区块链技术赋能慈善透明化。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性,为慈善捐赠的透明度和信任度提供了技术保障。在传统的慈善捐赠中,信息不对称和信任缺失常常导致捐赠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甚至出现挪用、滥用等问题。区块链技术通过智能合约和分布式账本,确保每一笔捐赠资金的流向和使用情况都可追溯、可验证。捐赠者可以实时查看捐赠资金的使用进度和效果,从而增强对慈善机构的信任。这种透明化的捐赠过程不仅提高了第三次分配的效率,还促进了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使慈善捐赠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弱势群体,助力共同富裕。

二、现实困境: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财富分配的四重矛盾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财富分配的多重矛盾呈现复杂的表现形式,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特殊性使得传统的分配理论和制度难以适应。

(一)技术赋能与分配正义的悖论

智能技术的接入差异逐渐成为新的社会分化因素,它所导致的数字贫困代际传递风险也在与日俱增。该风险影响范围广泛,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的技能差距上,更在区域和群体层面进一步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均衡。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劳动者若想在就业市场中立足,必须具备更高的数字素养和技能。然而,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却使得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在获取数字技能培训方面面临重重困难。贫困地区的孩子由于缺乏优质的教育条件和学习资源,难以掌握先进的数字技术,在未来就业市场中自然也就缺乏竞争力,难以获得高薪工作,从而难以摆脱贫困的代际传递,形成恶性循环。

头部企业对数据资源的高度集中进一步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均。在数据为王的时代,数据的控制权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型科技企业手中。这些企业凭

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地位,海量收集和垄断用户数据,并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商业化应用获取巨额利润。然而,普通用户作为数据的生产者,却未能从中获得相应的报酬。这种不平等的数据收益分配模式,使得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企业及其股东手中,进一步拉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根据二八定律,少数头部科技企业占据了大部分市场资源。这种数据垄断现象不仅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空间,还使得市场活力受到抑制,竞争环境日益恶化。大型平台企业凭借其市场支配地位,控制数据流动和算法设计,进一步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大量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足够的市场机会和发展空间,无法实现自身的成长和壮大,进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均衡度。以上技术赋能与分配正义的悖论,成为新质生产力下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5]。

(二)要素配置的空间失衡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要素配置的空间失衡问题逐渐凸显,其中区域创新能力分化和人力资本错配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区域创新能力分化来看,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明显。长三角地区的数字经济密度达到西部地区的4.6倍,这一数据直观反映出要素配置在空间上的不均衡现状。东部地区依托坚实的经济基础、有力的政策支持以及丰富的人才资源,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数字技术在东部地区迅速生根发芽,数字产业不断壮大,创新能力持续攀升。反观中西部地区,情况则大相径庭。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通信等硬件条件不够完善,中西部地区数字产业的发展受到硬件瓶颈的制约;同时,市场环境不够成熟,市场需求不够旺盛且不稳定,中西部地区难以吸引足够的数字企业投资入驻。这些生产因素相互交织,导致中西部地区难以有效承接东部地区数字产业的转移和创新资源的扩散。

人力资本错配问题,深刻揭示出算法管理下的“零工”困局。算法被广泛应用于任务分配、绩效评估和薪酬计算等各个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运营效率和管理精准度。然而,算法管理并非完美无缺,它往往存在忽视劳动者个体差异和技能提升需求的问题。以网约车司机为例,平台算法通过实时定位和订单分配,快速将乘客需求与司机进行匹配,显著提高了车辆运营效率。但与此同时,算法管理却在无形中异化了司机的职业劳动:司机严格按照算法指令完成重复的订单任务,工作形式单一,长期处于低技能操作状态。由于缺乏多样化的任务和学习提升

机会,司机很难积累新的技能与经验,难以突破职业瓶颈,收入也难以实现显著增长,长期被困于低收入的“零工”状态。从宏观层面来看,大量劳动者被困在低技能岗位上,无法向高技能、高附加值岗位流动,这直接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

(三) 制度供给的滞后性

制度供给的滞后性是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财富分配矛盾的重要诱因之一。在数字产权制度方面,其缺失导致要素收益分配出现扭曲,成为制约数字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瓶颈。我国目前在数据产权制度建设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一方面,数据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得产权界定和交易规则的制定面临较大挑战——实际操作中,数据往往可被多个主体同时使用而不损耗其价值,这一特性使得传统的产权界定理论难以直接套用;另一方面,数据生成往往是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结果,如何区分各主体的贡献、合理划分数据产权,仍是亟待解决的复杂问题。这种制度缺失直接导致数据要素的收益分配缺乏合理依据和规范:大型科技企业在数据收集和利用方面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而作为数据源头的生产者,其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无法公平参与数据收益分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随着全球化发展,跨国科技企业的数字服务收入日益增加,其业务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传统税收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部分跨国科技企业通过巧妙的业务安排和财务操作,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地区,从而逃避了大量税收。传统税收制度基于实体经营和地域原则建立,难以适应数字经济的无边界、虚拟化特点,导致数字服务的税收征管出现明显漏洞。为了争夺数字税源,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各自的数字税政策。例如法国、英国等国家先后实施了数字服务税,这使得国际税收竞争和规则冲突日益加剧。跨境数字税制的不协调不仅扰乱了国际经济秩序,也给我国数字企业“走出去”带来诸多挑战。我国出海企业在拓展国际业务时,需面对不同国家数字税政策的不确定性,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更制约了我国数字经济在国际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四) 伦理风险与治理挑战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还带来了伦理风险与治理挑战,其中算法黑箱和人工智能替代效应对劳动者权益的影响尤为突出。以骑手配送为例,平台借助算法优化路径和时间管理,确实能提高配送效率,让订单更快送到消费者手中,但这一过程却隐藏着对骑手的劳动剥削。算法通过极限压缩配送时间、仅关

注效率最大化,迫使劳动者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这种单纯追求效率而忽视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做法,实际上是对骑手劳动价值的剥夺,违背了公平与正义的原则。而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份额的下降。研究表明,制造业中机器人渗透率的提升与劳动份额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由技术进步引发的就业结构变化,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治理均构成了巨大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大量重复性、程序化的工作岗位被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取代。从短期来看,企业确实能通过这一方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利润水平显著提升;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趋势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结构性失业逐渐显现,许多劳动者因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失业,长期面临就业困难;另一方面,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就业质量受到严重影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剧。失业人群,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新的就业环境、重新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生活逐渐陷入困境。

三、实践路径: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财富分配的优化策略

(一) 构建数据要素分配的基础制度

数据产权制度是数据要素分配的基石,须尽快构建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数据资源持有权明确数据的初始归属,保障数据来源的合法性与可控性,为数据要素的流通和使用奠定基础。在个人数据领域,数据资源持有权赋予个人对其产生数据的控制权,个人有权决定是否允许企业收集和使用其数据。数据加工使用权规范数据在处理和过程中的使用范围与条件,确保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数据产品经营权则侧重于明确数据产品在市场流通中的权利边界,促进数据商业价值的有效实现。

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制定严格的授权程序与标准,对申请公共数据授权的企业或机构开展资质审查,确保其具备相应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安全保障措施。在授权过程中,应充分考量公共利益,避免公共数据被滥用或垄断。对于医疗、教育、交通等涉及民生领域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时应优先选择能够提供普惠服务的企业或机构;同时,需建立动态评估与监督机制,对授权对象的数据开发利用情况进行定期评估,确保其行为符合授权要求和公共利益。

促进企业数据共享交易。企业数据共享交易是提高数据要素配置效率的关键环节。政府应主导建

立区域性或行业性的数据交易平台,为数据交易提供基础设施和制度保障;同时,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交易规则与标准——包括数据质量规范、数据定价机制、数据交易合同范本等,降低数据交易的风险和成本,提高数据交易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如金融行业,建立数据共享交易平台可以促进金融机构之间的数据流通,进一步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

保障个人数据收益权。个人数据收益权是实现数据要素公平分配的重要方面。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个人数据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但个人往往无法从其数据贡献中获得相应收益。为保障个人数据收益权,一方面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个人数据的财产属性,赋予个人对其数据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另一方面需推动企业建立个人数据收益分享机制,例如通过数据分红、股权激励等方式,让个人能够切实从其数据贡献中获得经济收益。

深化数字税制改革。数字税制改革是调节数据要素收益分配的重要手段,设计科学合理的数字税种与税率,区分数据存储税与算法应用税,实现精准征税。数据存储税可依据企业的数据存储规模、类型等征收。算法应用税则根据算法的商业应用价值、数据使用量等确定税率。通过数字税制改革,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能调节数据要素的收益分配,防止数据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

(二)完善三次分配动态均衡机制

初次分配突出精准激励与数据赋能,核心是构建数据要素贡献度评价指标体系。政府应牵头成立跨部门、跨领域的专家委员会,吸纳统计学、数据科学、经济学等多领域专家,深入调研新质生产力下数据要素参与生产的全流程,剖析不同产业、不同类型企业数据应用的典型案例,精准识别数据在各环节的关键贡献点,进而设计多维度、可量化的数据要素贡献度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不仅需考量数据规模、质量等基础指标,还应聚焦数据创新性、时效性等关键要素,避免传统评价体系“一刀切”的弊端,让数据贡献衡量更精准,为数据生产者获取合理报酬提供坚实依据。同时,鼓励企业探索数据要素收益共享新模式。针对数据生产者多为普通用户的特点,可借鉴共享经济的分成逻辑,搭建数据收益共享平台。具体而言,可探索互联网平台企业从基于用户数据挖掘产生的广告收入、增值服务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通过积分兑换、现金奖励、股权期权等多种形式回馈用户,让数据源头的创造者切实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进一步激发数据生产活力。

再分配强调数字税收与精准保障,精细化设计数

字资产税收政策。联合组建数字资产税收政策研究专项小组,深入调研数字资产形态特征、价值创造路径与流转规律,区分数据资产、数字知识产权、虚拟货币等不同类别,针对性制定差异化税收政策:对于具有公共属性的基础数据,实行税收减免,鼓励数据共享与流通;对于高价值的数字知识产权,设置累进税率,在保障创新激励的同时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对于虚拟货币等投机属性较强的资产,加强交易环节税收征管,严厉打击避税行为,确保数字资产税收政策精准调控财富分配。同时,打造数字化社会保障管理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精准识别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需求差异,实现保障资源的精准分配,确保社会保障体系数字化转型成功。通过平台实时监测中低收入群体、数字贫困群体的收入与生活状况,动态调整保障标准,优化保障项目。尤其要为中西部偏远地区居民定制包含数字技能培训补贴、远程医疗服务套餐的综合保障方案,借助数字技术提升保障效能,助力缩小区域与群体间的财富差距。

第三次分配鼓励慈善创新与社会协同,探索区块链慈善平台监管机制与激励扶持政策。一方面,制定区块链慈善平台建设与运营规范,明确技术标准、数据安全、信息公开等核心要求,同时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工具,鼓励慈善组织搭建区块链慈善平台;另一方面,建立区块链慈善平台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定期发布评估报告,对运营规范、透明度高的优秀平台给予表彰与奖励,对违规操作、信息不透明的平台责令及时整改并依法处罚,以政策引导营造健康、透明、高效的区块链慈善环境。此外,创新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引导与激励机制:适时修订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将数据共享、数字扶贫等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公益行动纳入评价体系,并细化评价指标,提高评价科学性;设立国家企业社会责任专项奖励基金,对于在第三次分配中表现突出的企业——如积极参与贫困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援建、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公益项目的企业,给予资金奖励、授予荣誉称号,并在政府项目采购、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优先待遇,充分激发企业参与第三次分配的积极性。

(三)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技术治理

“东数西算”工程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需迭代实施“东数西算”2.0工程。从资源禀赋来看,东部地区在数据处理、应用创新方面具有技术与人才优势,而西部地区则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和土地资源。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可将东部地区的海量数据处理需求与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深度结合,实现算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价值分配的均衡化。

为保障工程落地,需加强东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协同建设,确保算力网络的高效运行,重点提升西部地区的网络带宽、数据中心存储与计算能力等,弥合新质生产资料在区域间的差距。

推进跨区域数据共享,打破数据孤岛,建立跨区域数据共享平台与合作机制。由国家或省级政府牵头,搭建统一的跨区域数据共享平台,整合各区域的政务数据、经济数据、社会数据等资源,实现数据的集中存储、统一管理和共享交换;同时,建立常态化跨区域数据共享合作机制,加强区域间在数据治理、数据开发、数据应用等领域的协同合作,联合开展数据价值挖掘与创新应用项目,推动数据要素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财富公平分配。

推广数据跨境流动“分类分级”模式。积极参与国际数据治理标准制定,主导并提出数据跨境流动“分类分级”模式,根据数据的类型和敏感程度实施差异化分类管理,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合规流动。这一模式既符合国际数据治理的发展趋势,又能有效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及企业、个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推动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国际推广,提出“人类中心主义”技术治理框架,明确技术应用需符合人类核心价值观与道德准则,有效规避技术发展可能引发的国际冲突与潜在风险,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结束语

新质生产力时代的财富分配改革需突破技术决定论的单向思维,建立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发力的治理范式。通过数据要素的产权重构、分配机制的动态优化和全球治理的方案创新,实现生产力发展与财富分配正义的辩证统一。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数字时代的理论拓展,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实践命题。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深入探讨数字剩余价值的计量方法、智能算法的分配效应评估以及数字税制的国际协调机制等前沿问题,为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 黄世旺,高金龙. 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J]. 中州大学学报,2024,41(2):28-33.
[2] 周文,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2023(10):1-13.
[3] 任保平,豆渊博. 新质生产力: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J]. 经济与管理评论,2024(3):5-16.
[4] 周文,韩文龙. 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与共同富裕[J]. 中国社会科学,2023(10):4-23.
[5] 任保平. 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J]. 经济研究,2024(3):12-19.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oretical Logic ,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Wealth Distrib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ZHOU Di

(institute of Marxist Studies ,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Chongqing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 Chongqing 400020 ,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has reconstructed the paradigm of wealth distribution. From previou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to today's data-driven and platform economy, although it has promote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t has also brought about new distribution problems such as unequal data control, platform monopoly risks, and algorithm bia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alyzing the role of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in digital labor, the alienation of data capitalization value distribution, and other phenomena, and elaborating on the synergy mechanism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ertiary distribution.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paradox of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spatial imbalance in factor allocation, lagging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ethical risks. To this end, practical path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basic system for data element allocation, improving the dynamic balance mechanism of the three distributions, and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governance are proposed to achieve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wealth distribution,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ealth distribution; digital economy; fairness and justice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经验证据

王海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改革开放与国际经济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1464)

摘要: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推动了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水平的影响因地区发展水平、传统基础设施发达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同存在异质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南方地区、传统基础设施发达地区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反之则不显著。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会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水平,还会通过促进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绿色发展水平及乡村电商发展水平,进而对乡村振兴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数字基础设施;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数字经济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06

中图分类号:F323;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29-09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农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立国安民之根本大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新一轮数字革命不仅引领世界经济发生颠覆性变革,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与新动能。为让乡村地区共享数字技术发展的红利,我国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工程。目前,学界尚少有研究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振兴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进行讨论。因而,以乡村振兴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及中间机制,探究如何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与发展差距、更好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和重要动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政府、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与平台保障;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是破解“数字鸿沟”问题、推进区域间与城乡间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的必要路径。近年来,学界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影响效应的研究日渐丰富。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评价指标方面,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指标体系:部分学者以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等单一指标度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水平(孙倩倩等,2023)^[1];另有部分学者通过构建指标体系予以综合测度,如张晔和陈绘宇(2023)^[2]构建了包括固定数字基础设施、移动数字基础设施、宽带服务器类基础设施等二级指标,以及每百人固定电话订阅数、行业数字强度等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37个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了测度与研究;祝志勇等(2022)^[3]构建了涵盖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及利用率3个维度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选取光缆密度、数字电视用户比例等12个三级指标,通过熵值法测算了各省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赵星(2022)^[4]则以长途光缆线路长度、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工业机器

收稿日期:2025-08-27

基金项目:2025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基本科研项目“特朗普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及内在逻辑”(25E062)

作者简介:王海霞(1987—),女,河南开封人,经济学博士,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改革开放与国际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与财政理论、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

人拥有量、互联网接入端口数4个指标,构建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方面,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了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与此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动技术创新及绿色发展(赵星,2022)^[4],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高远东等,2023)^[5],并可通过改善人力资本、提高就业创造率、缩小贫富差距以增强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方福前等,2023)^[6],进而带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学界围绕乡村振兴及其影响因素已积累了丰富研究。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共产党人农村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行动纲领与目标要求(张海鹏等,2018)^[7]。乡村振兴战略包含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方面总体要求,其推进既是对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豆书龙等,2019)^[8],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王星,2023)^[9]。学界围绕这五方面要求,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张挺等(2018)^[10]以乡村振兴为一级指标,将五方面的总体要求设为二级指标,筛选出包含乡村产业结构、自然环境宜居、文化教育建设、乡村法治建设、农民收入水平等15个三级指标及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等44个四级指标,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分析。此外,闫周府和吴方卫(2019)^[11]、徐雪和王永瑜(2022)^[12]等也构建了乡村振兴指标评价体系,并进行结果测度与分析,各研究在三级、四级指标的选取上存在差异。

目前,学界关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振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部分研究直接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刘钊等(2023)^[13]的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有效促进科技创新,进而提升乡村振兴质量;何雷华等(2022)^[14]通过构建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出数字经济会通过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改善对乡村振兴发挥推动作用;程莉等(2023)^[15]则分别从乡村生态、产业等不同维度,论证了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对乡村振兴产生直接影响。从二者关系来看: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同时有效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增强城乡发展的联动性与协调性;另一方面,其能为乡村创造就业岗位、拓宽发展渠道、扩大发展空间。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我国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已成为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要障碍。

上述研究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我国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科技创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通过赋能数字经济发展与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贡献了积极力量。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较多研究聚焦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鲜有针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振兴的专门研究,而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基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其二,在少量涉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乡村振兴关系的研究中,多数停留于逻辑推理与理论分析层面,尚未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开展实证检验与分析,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与可靠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从研究视角来看,本文是国内较早关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影响的文献之一,为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目前相关研究文献的焦点多集中于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对省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测度,从实际建设层面分析其对乡村振兴产生的影响,可更直观地反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具备实际参考价值。二是从研究方法来看,本文在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开展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及影响机制检验,相对全面、深入地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乡村振兴的效应及路径。三是从研究意义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对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分析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农业强国目标的根本保障。这对夯实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字基础设施涵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数字创新基础设施及数字融合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与坚实保障。因此,本文从以下六个维度出发,系统阐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

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促进生产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

快速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数字技术正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田秀娟等,2022)^[16]。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数字技术应用的资源基础,通过推动数字要素和数据技术向外扩散,使数字经济真正惠及各个区域(尹西明等,2023)^[17]。在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我国城乡之间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问题,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距是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表现之一。近年来,为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向农村延伸;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强渗透性、广覆盖性,能够通过搭建数据要素和技术要素向农村流入的桥梁,为农村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多层次数据保障与信息支撑。因而,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可有效缓解城乡间信息不对称与要素流动不畅问题,通过弥合“数字鸿沟”,促进生产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与优化配置,并推动乡村要素的数据化与资本化,进而为乡村提供更多样、更公平的发展机遇,提升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效率,助力乡村振兴。

二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拓宽农民的技能提升渠道,提升乡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其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升乡村地区的网络通信水平,为农民搭建起学习知识技能、了解世界最新动态的窗口与平台。当前,政府、各类公共机构及企业均通过公众号、知识学习平台、短视频 App 等提供各类线上授课及技能指导,农民可足不出户参与各类学习活动,快速实现扩展性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劳动技能与认知水平,进而提高自身劳动能力及收入水平。其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破解城乡间的信息流通障碍,让更多城市居民看见并了解农村,吸引部分城市劳动者流向农村参与工作与建设,缓解乡村人才短缺及人力资本水平偏低等问题。其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提供丰富信息资源,改善农村劳动力与岗位不匹配的问题,提高劳动力与岗位的适配性,从而提升人力资本价值,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数字农业发展,增强农业经济韧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现代化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保障,随着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与应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增强农业经济韧性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增强农业经济的抵抗力,另一方面提升农业经济的恢复力。其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保障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高效开展,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为高标准农田的规划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有助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缓解农业经济发展中有效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推动农作

物种植科学化。其二,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下,农业经济能够通过自身调节机制有效对冲外部风险,并为农业灾后重建与生产力恢复提供保障。其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动数字农业发展,提升农户预期收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有效为乡村地区搭建农业细分产业系统,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精耕细作的地区优势农业结构,增强农业产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与此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供技术与平台支撑,使农业发展突破地域限制,催生“互联网+农业”的各类新模式与新形态,通过直播平台直销、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形式,促进农村产业融合。

四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乡村消费升级,推动城乡共享美好生活,提高乡村生活质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生产、乡村流通、社会治理、生活服务、文化传播等应用场景赋能,促进乡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数字经济通过将数据要素纳入农业生产、将数字产品和服务融入农民生活、将数字化思维融入乡村政务服务,助力农业产业向多元化与集约化转型、满足乡村居民技能提升与精神生活需求、推动乡村治理向数字化与智能化升级。此外,随着乡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农业产业得以从需求侧推动智能化升级与绿色化改造:其一,革新生产方式,注重绿色生产。其二,优化产品结构,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字技术对农业生产、质量监控、物流追踪等环节的全过程管理作用,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其三,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加速乡村生产与生活方式改变,引领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升级,促进乡村消费升级。伴随城乡融合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居民得以共享美好生活,乡村生活质量持续提高,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力。

五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数字金融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融资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数字技术发展、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的同时,增强了金融机构的信息揭示能力,降低了金融机构的监管成本,倒逼企业提升内部治理能力与信息披露质量,进而缓解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金融机构的贷款意愿与贷款效率。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改善乡镇企业经营绩效、降低企业财务风险,还有利于吸引更多金融资本下乡,提高信贷资金配置效率,缓解乡镇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融资便利。

六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电商发展,拓宽农村经济发展渠道。其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

大了农村地区的网络覆盖范围,提高了带宽质量,使农村居民能更便捷地接入互联网,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撑,让农民可方便地开展线上购物与销售活动。其二,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手机支付、网上银行等电子支付手段得以普及,这些便捷的支付方式为农村电商提供了支付保障,既方便消费者进行线上交易,也推动了农村居民消费习惯的转变。其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涵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快递配送、冷链物流等物流网络,能够保障农村电商商品及时送达,提升服务质量与用户体验。其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互联网接入农村,为农村电商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拓展空间,农村地区的特色产品、农副产品等可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既拓宽了销售渠道,也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通过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改善农村人力资本、赋能数字农业、推动乡村消费升级、促进乡村数字金融发展等路径赋能乡村振兴。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具有正向影响,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高,乡村振兴水平越高。

假设 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乡村振兴,还会通过作用于科技创新水平、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农村电商发展水平,间接对乡村振兴产生影响。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乡村振兴的回归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rrn_{it} = \alpha_0 + \alpha_1 di_{it} + \sum \alpha_j X_{it} + \mu_i + v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rrn_{it}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地区 i 在时期 t 的乡村振兴水平; di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代表地区 i 在时期 t 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X_{it} 代表与乡村振兴水平相关的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集合; μ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地区个体侧面不随时间变化但会对乡村振兴水平产生影响的不可观测因素; v_i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随地区个体变化但随时间变化且会对乡村振兴水平产生影响的不可观测因素; ε_{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α_0 为截距项, α_1 、 α_j 为变量系数。

(二)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1. 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乡村振兴水平(rrn)。依据党中央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核心内容,参考张挺等(2018)^[10]、闫周府和吴方卫(2019)^[11]、贾晋等(2018)^[18]的指标构建方法,本文将五大核心内容作为一级指标;结合指标选取的合理性及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共选取 31 个二级指标,采用熵权法测算乡村振兴水平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的指标设定见表 1。

表 1 乡村振兴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属性
产业兴旺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kw	+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kg	+
	农业劳动生产率	hw/h	+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元	+
生态宜居	农药化肥施用量	kg	-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	+
	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	+
	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的行政村占比	%	+
	卫生厕所普及率	%	+
	农村绿化率	%	+
乡风文明	安全饮用水普及率	%	+
	村庄道路硬化率	%	+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	+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例	%	+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
	有线电视覆盖率	%	+
治理有效	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重	%	+
	乡村文化站数量	座	+
	已编制村庄规划的行政村占比	%	+
	已开展村庄整治的行政村占比	%	+
	农村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
	村委会覆盖率	%	+
生活富裕	村主任书记一肩挑比例	%	+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
	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	%	+
	每百户汽车拥有量	辆	+
	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
	人均道路面积	平方米	+
	城乡居民收入比	-	+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
	农村贫困发生率	%	-

(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di)。在充分理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本文参考祝志勇等(2022)^[3]关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评价的指标构建方法,将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应用普及度及服务水平 2 个维度设为一级指标,选取光缆密度、移动基站密度、数字电视用户普及率等 12 个二级指标,采取熵值法测算各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具体指标选取如表 2 所示。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如下变量作为主要控制变量:产业结

构高级化水平(*inc*),主要以各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与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财政分权水平(*fsd*),主要以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值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lnopen*),主要以地区进出口总额衡量,并进行对数处理;乡村居民消费支出(*lncc*),主

要以乡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衡量,并进行对数处理;财政科教支出(*fse*),主要以财政科技支出与教育支出之和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衡量;经济发展水平(*lnpgdp*),主要以 2011 年为基期的实际人均 GDP 衡量,并作对数处理。

表 2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衡量公式	单位
X_1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i>di</i>)	X_{11} 光缆密度	$\frac{\text{各省份光缆线路长度}}{\text{省域面积}}$	公里/平方公里
	X_{12} 移动基站密度	$\frac{\text{各省份移动电话基站数量}}{\text{省域面积}}$	个/平方公里
	X_{13} 数字电视用户普及率	$\frac{\text{各省份数字电视实际用户数}}{\text{各省份户数}}$	%
	X_{14} 宽带互联网用户普及率	$\frac{\text{各省份宽带互联网用户数}}{\text{各省份户数}}$	%
	X_{15}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量	$\frac{\text{各省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量}}{\text{各省份人口总数}}$	个
X_2 数字基础设施应用(<i>sub</i>)	X_{16} 每百人域名拥有数量	$\frac{\text{各省份域名数}}{\text{百人为单位的各省份人口总数}}$	个/百人
	X_{17}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X_{21} 移动电话普及率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X_{22} 信息技术类单位就业人员占比	$\frac{\text{各省份(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text{各省份城镇单位总就业人员}}$	%
	X_{23}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	$\frac{\text{各省份电信业务总量}}{\text{各省份人口总数}}$	元
	X_{24} 每百人计算机使用量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	个
	X_{25} 电商企业平均销售额	$\frac{\text{电子商务销售额}}{\text{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	亿元

2.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 2011—2021 年我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由于港澳台地区及西藏自治区在数据统计口径与完整性上存在较大差异,故在研究中予以剔除。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EPS 数据库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保证数据连续性,极少数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填补;为避免因异方差及数据波动对实证结果产生干扰,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rrn</i>	330	3. 014	1. 793	0. 078	9. 405
<i>di</i>	330	0. 251	0. 110	0. 072	0. 721
<i>inc</i>	330	0. 495	0. 089	0. 327	0. 837
<i>fsd</i>	330	0. 496	0. 189	0. 151	0. 931
<i>lnopen</i>	330	7. 951	1. 089	4. 448	10. 537
<i>lncc</i>	330	9. 214	0. 382	8. 258	10. 211
<i>fse</i>	330	0. 185	0. 032	0. 106	0. 262
<i>lnpgdp</i>	330	10. 875	0. 444	9. 706	12. 123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前文的变量选择及模型构建,本部分报告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乡村振兴的线性估计结果(见表 4)。模型(1)结果显示,在不控制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显著为正,这初步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省份固定效应以控制地区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通过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时间固定效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且通过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各控制变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估计系数有所上升。综合而言,上述结果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和稳健性,能够充分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有效促进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1。其中可能的原因包括: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弥合了“数字鸿沟”,吸引并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向乡村流动,进而推动乡村经济增长。第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居民提升劳动技能、开展学习提供更多机会与平台,促进乡村人力资本发展。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为乡村居民发展线上农业、参与线上

就业等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有效拓宽乡村居民的就业渠道、提升乡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改善乡村居民生活条件。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推动数字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科技化水平,从而减少农业污染,改善乡村生态环境。

就控制变量而言,如模型(4)所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inc*)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有效促进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意味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及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既有利于打破单一化的低附加值农业生产局面,又有利于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多技术与商业支持,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推动更多乡村劳动力向工业及服务业生产部门转移,提高收入水平。财政分权水平(*fsd*)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现阶段财政分权对乡村振兴产生负面影响。可能的原因是: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意味着地方财政自主权越大,而在地方财力有限的约束下,地方政府既需满足“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基本要求,又面临完成经济增长指标的政绩压力,因而倾向于将财政资金投向短期内更易产生经济价值的项目,进而降低对乡村振兴的财政投入力度,不利于乡村振兴水平提升。对外开放水平(*lnopen*)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乡村居民消费支出(*lncc*)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乡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可显著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从消费视角看,乡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既有利于吸引更多生产要素向乡村流动,又能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从而活跃乡村经济。财政科教支出水平(*fse*)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财政科教投入可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水平提升。科教投入能够促进乡村人力资本水平与创新能力提升,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动力。经济发展水平(*lnpgdp*)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当前经济增长对乡村振兴的直接拉动作用尚不明显。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实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在上述控制省份与时间效应、加入各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采用以下四种方法开展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1. 考虑滞后效应。参考尹西明等(2023)^[17]的研究思路,表5第(1)(2)列展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滞后1期及滞后2期的影响结果。可以看出,无

论是滞后1期还是滞后2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本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证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这一结果也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其影响不会随时间立即消失。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变量	<i>rrn</i>	<i>rrn</i>	<i>rrn</i>	<i>rrn</i>
<i>di</i>	8.022*** (0.780)	4.083*** (0.213)	1.964** (0.766)	2.538*** (0.824)
<i>inc</i>				1.311* (0.717)
<i>fsd</i>				-0.750* (0.434)
<i>lnopen</i>				0.070 (0.049)
<i>lncc</i>				0.479* (0.268)
<i>fse</i>				2.640** (1.271)
<i>lnpgdp</i>				0.009 (0.132)
省份效应	否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	330	330	330	330
R-squared	0.244	0.984	0.991	0.992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2.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测量方法。参考杨建等(2024)^[19]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重新测度,得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替代变量(*dis*),运用该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上文的基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从表5第(3)列可以看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高度吻合,印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 剔除民族区域自治区样本。鉴于国家对民族区域自治区乡村发展有较多的特殊性政策及财政资金倾斜,为避免对回归结果产生干扰,此处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相关样本进行剔除,继而按照基准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第(4)列所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会有效推动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较好地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4. 剔除2017年及以后的样本。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此后国家陆续出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等一系列专

项政策,全面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这一政策冲击可能影响实证结果的准确性。为排除该干扰,本文剔除 2017 年及以后的样本,仅保留 2011—2016 年的数据代入基准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5 第

(5)列所示。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促进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1)	(2)	(3)	(4)	(5)
	滞后一期	滞后二期	主成分分析法	剔除自治区	Year < 2017
变量	<i>rrn</i>	<i>rrn</i>	<i>rrn</i>	<i>rrn</i>	<i>rrn</i>
L. <i>di</i>	2.400 *** (0.697)				
L2. <i>di</i>		3.097 *** (0.672)			
<i>dis</i>			0.549 *** (0.113)		
<i>di</i>				2.594 *** (0.808)	1.996 ** (0.80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300	270	330	286	180
R - squared	0.993	0.994	0.992	0.993	0.996

注:***、**、*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三) 内生性检验

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黄群慧等(2019)^[20]、赵涛等(2020)^[21]的研究方法,将 1984 年省级层面人均邮电业务量(与个体变化相关)与上一年互联网上网人数(与时间变化相关)构建交互项,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表明采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仍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在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后,本文的估计结果可信。

表 6 内生性检验结果

	(1)	(2)
变量	<i>di</i>	<i>rrn</i>
lnppotel	-0.110 *** (0.032)	
<i>di</i>		8.975 *** (2.518)
控制变量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300	300
R - squared	0.977	0.989

注:***、**、*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培育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已成为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重中之重。因而,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对于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完善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文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了乡村振兴水平的提升。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相关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是阻碍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应进一步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其一,加快乡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其二,推进乡村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与数字化转型,建设统筹城乡的数字平台。其三,大力推动数字乡村应用场景的培育与建设,释放农业农村发展的“数智”活力。一方面,搭建乡村数据库、数字农业服务平台等大数据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开发各类农业乡村场景下的应用软件及信息化产品,既有利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有助于城乡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深入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服务的数字化发展,为城市教

育、医疗及社会服务下乡提供数字平台,助力广大乡村居民享受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二是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应用创新,不断激发各地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广泛应用对于推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激发农业农村内生动力等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之间的发展差异还长期存在,各地区乡村的自然禀赋、发展条件也存在较大差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地农业农村的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以及数字人力资本情况,不断调整和优化不同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政策,引导数字产业向乡村地区合理转移,有效缓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区域发展差距较大等问题。

三是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农村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其一,建立健全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框架,明确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社会参与的原则,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和可持续性。其二,加大对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农村数字化建设,包括网络覆盖、智能农业设备购置等方面,以满足农村科技创新的基础需求。其三,加强农村数字化人才培养,建立农村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包括开展培训课程、设立奖学金资助、引进优秀科技人才等,提升农村居民的整体数字素养。其四,建立农村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和孵化器,为农村科技创新提供场地、设备和技术支持,吸引农村创新创业人才,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其五,建立健全政策评估和监督机制,定期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及时调整政策措施,确保政策的有效性。

四是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其一,设立专项资金用于乡村基础设施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包括配置智能环保设备、建设绿色能源设施等方面,以提升农村绿色化发展能力。其二,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农村传统产业转型及绿色产业发展,包括有机农业、生态旅游、清洁能源等,以提高农村产业的绿色化水平。其三,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村环境监测、污染治理、生态恢复等目标,确保乡村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参考文献:

[1] 孙倩倩,鞠方,周建军.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创新:

基于技术分工视角的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23(7): 178-192.

[2] 张皦,陈绘宇. 数字基础设施对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基于 DSTRI 的调节作用[J]. 世界经济研究,2023(10):89-103.

[3] 祝志勇,刘畅畅. 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126-140.

[4] 赵星.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J]. 统计研究,2022(4):80-92.

[5] 高远东,裴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J]. 财经问题研究,2023(8):116-129.

[6] 方福前,田鸽,张勋. 数字基础设施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性: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研究,2023(5):79-97.

[7] 张海鹏,卮亮亮,闫坤. 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创新和实现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2018(11):2-16.

[8] 豆书龙,叶敬忠.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及其机制构建[J]. 改革,2019(1):19-29.

[9] 王星. 共同富裕视域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若干关系和基本原则[J]. 重庆社会科学,2023(3):75-86.

[10] 张挺,李闯榕,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8(8):99-105.

[11] 闫周府,吴方卫. 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经济学家,2019(6):90-103.

[12] 徐雪,王永瑜.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及动态演进[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5):64-83.

[13] 刘钊,于子淳,邓明亮. 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乡村振兴质量的实证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12):47-57.

[14] 何雷华,王凤,王长明. 数字经济如何驱动中国乡村振兴[J]. 经济问题探索,2022(4):1-18.

[15] 程莉,王伟婷,章燕玲. 数字经济何以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 中国环境管理,2023(6):105-114.

[16] 田秀娟,李睿. 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基于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J]. 管理世界,2022(5):56-74.

[17] 尹西明,陈泰伦,金璐,等. 数字基础设施如何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 279 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23(12):90-101.

[18] 贾晋,李雪峰,申云. 乡村振兴战略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J]. 财经科学,2018(11):70-82.

[19] 杨建,徐康,陈彬. 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2024(1):69-74.

[20] 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 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

The Impact Effec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WANG Haixia

(Institute of Reform, Opening-up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146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empirically investigated using a two-way fixed-effects model.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 that, as a whol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China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heterogeneous depending on the leve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outhern region, the region with developed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region with high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nd vice versa is not significant. The results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est show tha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the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indirectly positively affects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promoting the level of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level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the level of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Key words:digital infrastruc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green development;digital economy

(上接第 22 页)

Evaluation of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Super-efficiency DEA Model

LI Xuka, ZHU Yueming, MIAO Li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Party School of He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Promoting gree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10 to 2020, the super efficiency SBM model and global GML model are used to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China's green economy statically and dynamic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iciency level of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not high on the whole, but the overall trend of fluctuation is rising, showing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astern > western > northeast > central. Compared with the period of 2011—2015, the growth of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 in 2016—2020 is more obvious.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the main force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Key words:green economy; efficiency evaluation; dynamic and static;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基因根脉、 演进历程及当代回响

李开庆¹, 林少婷², 陈珍萍³

(1.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2.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贵港 537100; 3. 桂林生命与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公共基础部, 广西 桂林 541199)

摘要:根据所处历史方位确立文化使命并为之接续奋斗,不断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因根脉,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革故鼎新到社会主义文化的破旧立新,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化传承创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骏业日新,践行了以文化救国、文化立国、文化兴国、文化强国为主题的文化使命,取得了丰硕成果。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要以马克思主义“魂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展现文化格局的开放性;以人民为中心彰显文化价值取向的人民性;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指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基因根脉;演进历程;当代回响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07

中图分类号:D2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38-07

2023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1]。这不仅指出了新时代新征程上党肩负的文化使命,还展示了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并贯穿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与伟大复兴”百年奋斗历程之中。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因根脉,梳理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演进历程,从培根铸魂、精神底气、人民至上、大国形象四个方面展现其当代

价值,这对于增强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掌握文化建设的主动权具有深远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基因根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与灵魂,蕴含着“精忠报国,爱我中华”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以及“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等精髓要义,深刻滋养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

(一)“精忠报国,爱我中华”的爱国情怀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尽忠”“爱国”“报国”的优秀品质,无数仁人志士公而忘私、视死如归,义无反顾

收稿日期:2025-07-11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新中国70年价值观教育的历史演进及经验研究”(19XKS024);2024年度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革命文化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XYCBZ2024002);2025年度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政治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XYCS2025034);2025年度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民办高校德育体系连续统模式的构建和实施路径研究”(XYCB2025011);2024年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公众形象塑造研究”(2024XJKYC02)

作者简介:李开庆(1996—),男,广西北流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及党的建设。

顾地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从古代的岳飞“精忠报国”，到近代的林则徐“虎门销烟”，再到现代的科学家用实际行动默默奉献，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尽忠”“爱国”“报国”的深刻内涵。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领导者要思考如何做有利于民众的事，即“尽忠”。这种思想强调了领导者对民众的责任和义务，将“忠”与“利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对民众利益的高度重视。这种“忠”的观念不仅是对个人品德的要求，更是强调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曾子看来，孝是道德修养的起点，悌是继孝之后的道德修养次序，信体现道德的敦厚，而忠则体现道德的纯正。这种对“忠”的理解，不仅将其视为一种个人品德，更突出了“忠”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中的重要作用。这种观念在古代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传播，并逐渐凝练为“精忠报国”的精神追求，为近代“振兴中华”理念的形成奠定了思想根基。在古代上层社会中，这种价值取向被广泛接纳，并通过各种方式加以推广和传承，从而更好地维护了国家权威。总之，“尽忠”“爱国”“报国”的优良品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家繁荣和民族复兴而奋斗，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中国共产党人要传承这种精神，让它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新时代，树立忠诚意识具有特殊意义。“守诚信”作为立身之本，“崇正义”作为行事之基，二者共同构成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道德支柱。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必须将忠诚正义精神深深融入党的文化基因之中，使之成为全体党员的精神标识。

（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肩负着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使命。中华文明五千年积淀的智慧结晶，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大同理想”的社会追求、“民胞物与”的博爱精神，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的责任意识、担当精神与价值追求。这些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高度契合。首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体现了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责任观，强调每个人都应心系国家命运，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种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

焉”的担当。其次，“大同理想”则代表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社会的向往。这与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内在一致性。而“民胞物与”的哲学思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共荣，体现了中华文化对公平正义、生态和谐的深刻思考。这些思想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也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既源于中华文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示，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从国内来看，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调“四个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种自信不仅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来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国内治理中践行责任担当，更在国际舞台上践行大国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对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理想的现代诠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共建国家经济合作共赢，使中华文化中的“协和万邦”“美美与共”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实践。

中国共产党要履行好文化使命，关键在于培养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为政以德”，而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更应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强烈的责任意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唯有强化责任担当，弘扬使命意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前进，才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周易·乾·象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名句，深刻表达了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闪耀，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在困境中奋发图强，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屈原便是这种精神的杰出代表，他被放逐江南之时，依然“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彰显了他即使身处人生低谷，也决不放弃的乐观、奋发、向上的进取之心。这种精神正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动写照，他的事迹激励着后人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勇往直前；郑板桥则以托物言志的方式，直面坎坷人生。他的名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展现了他在面对困难时的坚定信念和顽强精神。这种精神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一脉相承,都强调了在逆境中保持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刘禹锡屡遭挫折却矢志不移,他的名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不仅表达了他在政治斗争中不屈不挠的斗志,也反映了他对真理和理想的坚定追求。以上种种旷达胸怀和进取精神,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困难时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气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新时代国家提倡的“奋斗观”相吻合,与党的文化建设坚持“革故鼎新、守正出新”是一脉相承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2]面对国内外环境的诸多挑战,党担负文化使命的任务更为艰巨。新征程上,只有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唯有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守正创新的锐气,以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激扬自信自强的精气神,展现更加主动的历史担当,更好地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共产党践行文化使命提供了源头活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精忠报国,爱我中华”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共同构成了赓续不绝的精神血脉,形成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4]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党十分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汲取文化繁荣兴盛的不竭动力,推动着党和国家不断发展进步。

二、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演进历程

回顾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演进历程,一方面要探寻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使命的丰富内容,另一方面要提炼不同时代背景下文化使命的鲜明特征。

(一)文化救国与革故鼎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使命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塑造的重点是:在救国救民的道路探索中,以文化救国与革故鼎新为己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巩固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为传播现代民主理念、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提供动力支持。

中国共产党以“文化救国”为导向,深刻践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

文化救国的道路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明确自己的文化使命,积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中共明确提出要革除“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5]。这为革除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产物奠定了基础。党将“把被旧文化统治的愚昧落后中国变为被新文化统治的文明先进中国”确立为这一阶段的文化使命,而这种新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这是党对文化使命的深刻认识,是党领导革命文化事业的集体智慧结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精神资源。一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文化建设为劳动人民践行“文化救国”树立了榜样,通过加强工农群众思想文化建设强化了党的文化使命。1929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即成立专门的文化教育组织机构。该机构开办劳动学校、补习夜校,创办报刊、阅报社、俱乐部和红军战士剧社,并对这些文化活动作出了具体规定;采取“阶级文化教育原则”,创办列宁小学、业务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加强扫盲教育,促进工人、农民的思想文化启蒙。毛泽东指出:“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6]二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日臻完善。党高举文化统一战线旗帜,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教育,培养了一批无产阶级文化教育工作者。这一时期党的文化使命同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相适应,将党的文化理念上升为文化实践,服务于特定时代主体,有助于中国人民应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压迫。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7]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救国”进程中秉持强烈的爱国取向,突出文化使命的人民性,进一步明确其重点在于为人民服务。新民主主义文化标志着中国革命在文艺界的易帜,使党具备独立实践文化使命的力量,从而将党员先进性、纯洁性与复兴中华文化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这些重要思想阐释,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改造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行动指南,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文化的改造指明了方向。

(二)文化立国与破旧立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化使命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转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其主要任务是:在推进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改造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于新中国文化事业和人民需求,提高人民文化水

平,引领思想文化领域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为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奠定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以文化立国为导向,在破旧立新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文化破与立的关系上,党将清理旧文化放在优先位置,以批判与改造旧文化作为建设新文化的开路先锋。一是移风易俗,整顿不良社会风气。在思想文化领域,党开展一系列提倡增产节约、查禁黄赌毒、打击贪污腐败等运动,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落后和腐朽文化。通过揭露旧中国政府的反动、专制和卖国行为,批判帝国主义侵华的本质和恶劣行径,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和生活的腐朽性,揭露其带给中国人民的严重危害,激起广大民众对其厌恶情绪,形成瓦解旧社会、旧政权的舆论力量。这一系列举措有效转变了群众观念,整顿了社会负面风气,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二是确定文化发展方针。在文学与艺术发展问题上,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双百”方针允许不同题材、内容、形式的作品自由发展,充分调动了知识分子的创作积极性,推动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学术氛围日益浓厚。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彰显时代精神的劳动模范和讴歌艰苦奋斗的文艺作品,如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人民公仆”焦裕禄、“草原英雄小姊妹”龙梅和玉荣等,他们是这一时期体现爱国精神的先进典型;文艺作品《红岩》《谁是最可爱的人》《纪念白求恩》等,这些都是文化改造过程中诞生的优秀作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巨大反响,起到榜样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三是在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上,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主张。这既要吸收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又要创造性地借鉴外国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8],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博采众长”,为民族文化创新性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三)文化兴国与传承创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化使命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基于世情国情,明确其文化使命: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实现富起来”为历史任务,高度重视文化的独立性和先进性。这一时期,中国面临“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凝聚力量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中国共产党以文化兴国为引领,在传承创新的

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党中央全面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征程。一方面,率先在宣传思想、文学艺术、科技教育层面进行拨乱反正,确立“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根本方向,为发展改革开放事业扫除思想障碍。党通过阐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引导人们树立“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价值目标,激发广大民众投身改革的积极性;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号召全社会尊重知识分子;鼓励影视文艺创作并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极大促进了新时期文化事业发展。另一方面,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导向,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培育“四有”新人。邓小平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战略方针,即“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党牢牢把握文化领导权,积极发展人民喜闻乐见的主流文化,将其纳入文化使命的新内涵;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包含对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阐释,即“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将文化的先进性上升到党的纯洁性高度,实现了党在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新飞跃。党以先进理论引领文化的前进方向,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奋斗方向。“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9]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党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奋斗目标及主要任务。1995年,党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完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布局;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将其确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科教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领域,其战略地位的明确,表明党对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有了更具体的认识^[10]。胡锦涛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导的和谐文化建设,并提出了“和谐文化”概念,进一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可见,党从国家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了全新诠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内涵,初步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路。

(四)文化强国与骏业日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文化使命,这一使命成为新时代新征程的战略任务。

以文化强国为目标指向,推进党的文化建设呈现骏业日新的时代特征。党持续推进文化自信,不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文化自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坚守,为党

更好地践行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一是深化对文化战略价值的认识。党中央将文化繁荣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结合,推出了一系列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举措。二是将文化自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根”与“魂”,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站稳脚跟的精神支柱。三是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推动文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党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与世界同行的正确选择,为新时代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改革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更高目标,推动文化工作“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11]。党始终坚持不忘本来的文化工作方针,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培根铸魂。党始终坚持“吸收外来”的文化建设方针,在立足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有益文明成果,也要弘扬中国精神、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构建中国文化话语体系。可见,中国共产党践行文化使命的诸多举措,其目的在于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党必将继续高举文化自信旗帜,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展现中国共产党强烈的责任担当,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局面提供强大精神能量。

三、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当代回响

当代回响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逻辑归宿,主要通过培根铸魂、精神底气、人民至上、大国形象四个层面向全社会展现其价值旨趣。

(一)培根铸魂:以马克思主义“魂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中国共产党担负文化使命的百年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结合时代特征赋予文化使命新的内涵:党将中华民族的丰富智慧融入马克思主义,使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贯通,转化为新的理论优势,扎根于中国人民内心深处和祖国广袤大地上。

从新的文化使命来看,必须要精准把握“六个必须坚持”。其一,坚持人民至上,用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文化基因。从孔子“德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到孟子的“民贵君轻”,再到荀子的“君舟民水”,这些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理念。要树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理念,让民本思想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焕发当代价值。其二,坚持自信

自立,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动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党通过“两个结合”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以历史主动精神为基点,促进中华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进而激活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其三,坚持守正创新,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固本开新”的文化基因。守正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是维护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前提;创新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其四,坚持问题导向,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文化基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思想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深沉智慧,要求我们善用辩证智慧来解决问题。其五,坚持系统观念,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万物一体”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将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看成有机的整体系统。例如,“天人合一”“万物并育”“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等哲理与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紧密相连。其六,坚持胸怀天下,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的文化基因。今天,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赓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中华文化精神,汲取“和平、和睦、和谐”的思想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价值共识,为“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提供了中国智慧。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有机衔接,在传承“老祖宗”智慧的同时推进新时代文化创造,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二)精神底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展现文化格局的开放性

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使命型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百年演进的鲜明特征,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兴盛的精神底气。无论是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都能在重要的历史节点,科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凝聚团结奋进的力量,为党持续推进伟大工程提供精神支撑。唯有如此,我们党才能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发展,引领社会主流文化前进,并勇于应对世界范围内的各种风险挑战。“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2]借鉴世界各国有益的文明成果,不断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从而更好地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兼收并蓄而注入活水,因博采众长而经久不衰”的气魄。同时,提升国家

文化软实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最为深沉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展现文化格局的开放性,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从而更好地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要立足本土,又要面向世界。其一,要深挖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以批判继承、推陈出新为原则,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向心力和生命力,激发全体人民的文化创造力,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二,要善于借助媒介平台,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文化话语权。新征程处于“媒介化生存”阶段,需通过向世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提高其国际影响力,为加快建设我国对外话语体系提供契机。充分利用融媒体矩阵传播的特点,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立体化的形式呈现,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象化传播,从而更好地展现东方文明大国的良好形象。新征程上,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展现出高度的文化使命意识。只有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才能站在时代前沿引领文化前进方向,推动其繁荣兴盛,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蓬勃发展。

(三)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彰显文化价值取向的人民性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的人民性。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根本政治立场,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执政智慧,深入挖掘历史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对传统民本理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汲取了传统文化中“以百姓心为心”的民本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趣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在担负文化使命的实践中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全国人民浴血奋战、视死如归,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结束了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削的历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实现了中华民族最为深刻的变革;改革开放新时期,党通过推进农村和城市改革,让人民解决温饱、尽快富裕起来;新时代,党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重要落脚点,带领人民攻克

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众多事关长远的大事。因此,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价值取向。首先,注重“落实”,将其融入生活。文化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为人们提供“行”的遵循,逐步促进人们文化自觉的养成。要注重“知行合一”,将文化传承工作落实到实践之中。要充分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训家风文化、孝老爱亲思想,以及乡村规约习俗等思想资源,将其内化为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外化为日常交往的伦理准则,服务家庭美德教育,引领社会道德风尚。其次,新时代党的文化使命强调“文化实效”,要求文化工作“深得民心”。一方面,文化内容上要推陈出新,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优质产品。例如,《闪耀吧! 中华文明》《中国考古大会》《如果国宝会说话》等包含传统文化元素的节目,因内容有内涵、形式有新意而深受群众喜爱;另一方面,结合时代趋势创新传播载体与路径。凭借互联网优势,创新“科技+文创”的传承方法,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

(四)大国形象: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

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国际价值,在于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以开放包容的文化品质融入世界,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基因。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党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推进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涵养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精神基因,契合当代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这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契机,也为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互鉴提供平台,助力向世界更好地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13]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深知自身肩负的文化使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在互利共赢中构建全球文明共建共享的“百花园”。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肩负的不同文化使命,构成了百年文化建设波澜壮阔的史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党立足当代实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担负的文化使命充满荣光与挑战,必须牢记党百年奋斗的初心和使命,激扬信仰力量,凝聚价值共识,才能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使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上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选编(1921—1949)(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4.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人民日报,2023-10-09(001).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3.

[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02).

[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2.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5.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

[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3.

[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2.

[9]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30.

[10]杨凤城,耿化敏,吴起民,等.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3:334.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60.

[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8.

[13]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7.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Genetic Roots, Evolutionary and Contemporary Reflections on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the CPC

LI Kaiqing¹, LIN Shaoting², CHEN Zhenping³

(1. College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2. College of Marxism, Guangxi Logistics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Guigang, Guangxi 537100, China; 3. Public Foundation Department, Guilin Life and Health Career Technical College, Guilin, Guangxi 541199, China)

Abstract:The basic experience of the CPC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is to establish cultural mission according to its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continue to strive for it, and constantly promote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entennial proces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CPC has take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its genetic root, From 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new democratic cultur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from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continuous renewal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have achieved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cultural salvation, cultural establishment, cultural rejuvenation, and cultural strengthening, and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On the new journey, the CPC people should activate the “roo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the “soul” of Marxism; Showcasing the openness of cultural patterns with a high degre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onfidence; Putting the people at the center to demonstrate the people-oriented 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 Presenting the spiritual symbol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providing strong spiritual guida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modernized cultural power.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ultural mission; genetic roots vein; evolution process; contemporary reflections

备案审查中比例原则适用问题研究

王潇阳

(吉林大学 法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比例原则已被明确纳入我国备案审查制度,并作为一项审查标准,用于指导备案审查工作。在将比例原则纳入我国备案审查工作之前,实践中存在审查标准模糊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在理论、规范和实践三个层面均有体现。比例原则在备案审查工作中发挥的法治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规范立法层面的权利限制行为;二是约束普遍存在的立法裁量权。在备案审查工作中适用比例原则,应当遵循“目的正当性、手段适当性、手段必要性、手段与目的均衡性”的具体审查步骤,进而推动备案审查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关键词:比例原则;备案审查;审查标准模糊;法治功能;审查步骤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08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45-07

备案审查工作是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统一的重要制度安排,是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的关键环节。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决定》第11条关于“明确审查重点内容”的规定,提到了“应当重点审查:……(六)采取的措施与其目的是否符合比例原则”。这被认为是首次将比例原则明确引入我国备案审查立法,并且将其作为一项审查标准,以指导备案审查工作。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2]。其中第九部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第33条提到了“完善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制度”,明确了备案审查工作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要求的进一步落实,具有重大深远的战略意义^[3]。比例原则作为一项关系限度衡量的标准性原则,适时将其引入我国备案

审查工作,将为当前面临的实践困境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因此,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探索比例原则在备案审查工作中适用的具体安排,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将比例原则引入备案审查工作的理论基础

(一)比例原则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一般认为,比例原则的思想源头来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思想。亚里士多德追求“过度”与“不足”之间的平衡状态,这种“适度”的追求体现了比例原则所蕴含的伦理基础,强调行为与目的之间应符合一定的合理尺度。作为现代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初见於1802年德国学者冯·贝格的《德国警察法手册》,书中强调警察权的行使须以必要为前提,这一观点被视为比例原则在公法领域的滥觞^[4]。作为行政法领域的“皇冠原则”,比例原则的应用已从最初的行政法领域扩展至宪法领域。近年来,随着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入,比例原则开始向包括私法在内的其他法律领域扩张,并呈现跨学科适用的广泛性特点^①。

真正赋予比例原则规范意义上地位的,当属德

收稿日期:2025-08-18

基金项目:2025年度河南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课题“‘两个结合’视域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必然和优势功效研究”(RDYJ(2025)A05)

作者简介:王潇阳(2002—),男,河南唐河人,吉林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国“药房案”^{[6]156-174}。作为比例原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案例,1958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审理的“药房案”,通过司法裁判正式确立了比例原则的宪法地位及其核心要素。审理过程中,法院基于比例原则构建了三层级的审查框架,即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均衡性原则,对案件展开了全面的论证。其中,适当性原则是指公权力行为所采取的手段能够对目的的实现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若手段完全不发挥作用甚至阻碍目的实现,则属于不适当;必要性原则,即“最小损害原则”,要求在多项适当手段同时存在时,公权力机关应当选择对公民个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手段;均衡性原则又被称作“狭义比例原则”,是指所采取的手段与意欲实现的目的之间要合乎比例,即不能出现“损益相抵”甚至“损大于益”的情况。早在我国春秋时期,就有了“杀鸡焉用牛刀”的思想,这正是均衡性原则的一种体现;德国学者则用“不以大炮驱赶麻雀”这一俗语,形象地描述了该原则的内涵。

在比例原则的构成上,历来存在三阶层说和四阶层说之争^②。三阶层说认为,比例原则的内容包括适当性、必要性与均衡性。四阶层说则在三阶层说的基础上,于适当性审查之前增设目的正当性审查这一环节。其中,四个审查环节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目的正当性是前提,手段适当性是基础,手段必要性是关键,手段与目的均衡性是保障。必须承认,在行政法领域,采用三阶层比例原则审查模式有其合理性。三阶层比例原则的依据在于,立法目的的正当与否是立法过程中重点审查的对象;由于依法行政的要求,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必须严格以法律为依据,行政目的往往被包含在立法目的之中,行政行为的实施是为了实现这些正当的立法目的。^[5]因此,在执法阶段再次审查目的正当与否,既无必要,也不符合效率原则。备案审查中的比例原则与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在适用时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比后者多出了目的正当性审查这一审查步骤。在备案审查工作中,相较于传统比例原则的三阶层审查模式,四阶层比例原则审查模式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更为完善^{[6]111-114}。备案审查工作的审查对象,正是被行政行为视作依据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此情形下,目的正当性审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立法作为行政行为的起点,若某项立法在立法目的的正当性上存在瑕疵,那么行政机关依据该立法作出的数量庞大的行政行为,将会把这一瑕疵的影响无限放大。因此,在备案审查工作中运用比例原则,应当采取四阶层的审查步骤,以确保

立法目的具备充分的正当性。

(二)备案审查工作引入比例原则的规范依据

实践中涌现的一系列审查标准模糊等问题,催生了将比例原则融入备案审查工作的需求。当前,我国已通过不同规范层级的法律文件,为这一新兴审查标准提供了明确的规范依据,具体在宪法、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指引中均有体现。首先,在宪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规定要求立法限制公民权利时,必须基于正当目的且手段合理,与比例原则的精神内涵高度契合。其次,在法律法规层面。在《决定》出台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通过的《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第39条规定了发现法规、司法解释存在明显不当问题时应提出意见的情形,其中包括“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明显不合理,或者为实现立法目的所规定的手段与立法目的明显不匹配”的情形^{[7]111-113}。而《决定》则首次明确将比例原则纳入我国备案审查工作,并将其确立为一项独立审查标准。2024年新修订的《监督法》第39条规定了上级人大常委会对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作出的不适当的决议、决定,以及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不适当规范性文件予以撤销的情形,其中包括“超越法定权限,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的”情形。这一规定表明,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合乎比例,严禁滥用。最后,在政策层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制度”,将其作为深化立法领域改革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备案审查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强调了比例原则在推动备案审查工作提质、促进法治中国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备案审查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深化比例原则在备案审查工作中的应用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理论指导。

二、备案审查工作因缺失比例原则而存在的问题

(一)理论层面

将比例原则融入我国备案审查工作,其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审查标准层面,即要求公权力行为应当符合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四重标准。在《决定》出台以前,我国备案审查工作未明确将比例原则纳入审查标准体系,导致审查标准较为抽象模糊。这使得实践中审查机关可能仅依据形式合法性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难以通过明确标准

对规范性文件的实际影响开展科学评估。除此之外,未将比例原则的精神明确引入备案审查工作,还会导致公权力运行缺乏可预期性:审查主体可能以抽象价值判断替代法律理性分析,大幅增加审查工作的不确定性,最终不利于从备案审查维度推进法治中国建设^[8]。

(二)规范层面

比例原则在规范层面的作用,体现为对“适当合理”标准的认定,既包括从正面认定“合理”,也包括从反面认定“不适当”。首先,对“合理”的正面认定存在标准模糊问题。《立法法》第7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该条款明确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但何种程度的“适当性”才符合《立法法》规定的“科学合理”标准,《立法法》本身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此类高度抽象的概括性规定,缺乏具体、明确的参考依据,实践中需结合具体法条解读;而备案审查作为维护法制统一的必要程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若缺乏比例原则作为审查基准,审查机关对“合理性”的认定便无明确标准可循,长期如此必将阻碍我国法制统一的进程。其次,规范层面还存在对“不适当”标准认定模糊的问题。例如,《立法法》第107条规定“……(四)规章的规定被认为不适当,应当予以改变或撤销的”,但对于“不适当”需达到何种程度才属于“应当撤销”的范畴,《立法法》未作出明确界定。这种模糊会导致不同地方备案审查机关因主观认定标准差异,出现审查尺度不一的情况,最终不利于我国法制统一建设。

(三)实践层面

在我国备案审查工作的发展实践中,虽已对“不适当”的程度作出区分——认为并非所有存在“不适当”因素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都需撤销,仅当“不适当”达到一定程度时才需启动撤销程序——但在具体认定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是否适当”的问题上,仍缺乏确定性,现有区分努力尚不足以实现适当性认定方式的标准化。实践中,关于适当性与合理性的认定标准多为抽象概括,缺乏明确、具体的判断依据,导致实际备案审查工作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审查主体的主观自由裁量。这直接使得备案审查工作的功能未达到理想预期:审查主体在认定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适当性时,因标准主观化而存在较大随意性,进而损害法律的公正性与权

威性,对法治体系的基础性建构造成不利影响。^[9]

三、比例原则在备案审查工作中的法治功能

作为备案审查的一项重要内容,比例原则要求立法机关履行职权时,须选择既能实现公共利益目标又属必要的措施,同时必须权衡所实现的公共利益与所干涉的公民合法权利,确保二者之间适度比例。这一要求对于推动备案审查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展,进一步发挥备案审查在保障公民合法权利、提升立法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法治价值^[7]¹¹¹⁻¹¹²。

(一)规范立法之权利限制行为

在我国,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权力可对公民权利进行适当合理的限制。此种限制包括行政限制、立法限制等。多年来,学者们多将研究重点放在公民权利的行政限制上,即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对特定公民做出的权利限制行为。此类行为直接作用于公民的具体权利义务,对公民的现实行为模式具有明确指向作用,因此更容易为人所感知,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相较于来自行政执法领域的行政限制,学者们对公民权利的立法限制关注甚少。这一方面是因为立法行为更具抽象性,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如执法那般直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公民对自身权利受公权力限制的接受度较高。有些表面上以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的法条,若深入剖析其内涵,也可能解读出限制公民权利的效果^[10]。我国法律中也不乏直接限制权利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对各种具体罪名法律责任的设定,便体现了立法机关对潜在犯罪人行为的限制。相对于行政限制,立法限制的影响力更为深远。这是因为行政行为的作出需以法律为依据,若法律设定存在偏差,数量庞大的行政行为会将该偏差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因此,一旦立法限制出现问题,其危害可能具有持续性、长久性与普遍性^[11]。为防止公权力主体为达成特定目的而采取失当手段,过度限制公民权利,在对这类制裁性规定及相关措施开展备案审查时,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进行衡量,以保障法治体系的整体良好运行。

(二)约束普遍存在的立法裁量权

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上位法因此必然要为下位法预留一定空间,并通过下位法制定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12]。在此情形下,赋予立法主体在立法过程中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显得尤为必要,而在备案审查工作中引入比例原则,能够有效推动立法主体正确行使立法裁量权。在我国,下位法的制定并非完全照搬上位法,还需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作出必要的灵活性调整,这一特点通常体现为下位法开篇即明确其制定依据为某部上位法。例如,《河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第1条规定:“……根据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这便是立法中的“根据”原则,而在依据该原则制定下位法的过程中,难免会运用立法裁量权^[13]。除此之外,基于我国现实国情,立法裁量权具有本土适用需求。例如:因适应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习惯而授权的立法、为支持新的国家级新区建设需要而授权的立法、为契合特别行政区的特殊传统而授权的立法等^[14]。在这些情形下,立法机关享有的自由裁量权甚至会更大。

立法裁量权在我国普遍存在。根据裁量权具体内容不同,可分为实体裁量与程序裁量。其中,实体裁量是指立法主体在实体内容层面的裁量,主要体现为将抽象法律概念具体化过程中所运用的裁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第4款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不得在每日二十二时至次日八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这一规定正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6条第2款“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要求,所作出的实体内容具体化措施。程序裁量则是指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对具体立法程序的选择裁量。例如,《立法法》第74条第1款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该条款所列举的“听取意见”方式均为合法合理的程序选项,而实际选择何种程序开展工作,便属于立法主体的自由裁量范围^[10]。因此,在备案审查工作中引入比例原则,能够有效规范立法过程中存在的裁量权,将其限定在合理范围内,进而彰显备案审查作为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凸显法治的“中国”维度^[15]。

四、比例原则在备案审查工作中的适用建议

在我国备案审查工作中,比例原则的四个审查步骤具有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前一步骤的通过是开展后一步骤的前提。具体而言:目的正当性审查是整个审查流程的首要环节,若立法目的不具备正当性,则无需进入后续的手段适当性审查;手段必要性审查需以各备选手段“具有相同有效性”为前提,比较不同手段对公民权益的损害程度,且只有通过适当性审查的手段,才具备进行必要性审查的资格;手段与目的均衡性审查,需以手段通过适当性与必

要性审查为基础——这是因为在满足手段适当性与必要性要求后,仍需通过均衡性审查判断手段对立法目的的促进程度,权衡手段成本与目的效益,最终明确其在实践中的实际作用。

(一)目的正当性审查

目的正当性是比例原则的逻辑起点,正因其对立法目标的审查至关重要,后续所有审查步骤均以目的合法为前提^[16]。备案审查的对象为法规和规章,根据立法权来源的差异,可将其分为职权立法与授权立法两类,分别展开目的正当性审查^③。

第一,关于职权立法的目的审查。职权立法是指国家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直接赋予的立法权所开展的立法活动,其立法目的需接受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及中央重大方针政策的引导与检验。《立法法》第5条明确规定“立法应当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这表明对职权立法目的的审查,需从“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三个维度展开。宪法规定是我国宪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包含部分不得修改的宪法规范,即宪法原则。宪法原则是其他一般宪法规范的基础和前提。而宪法精神是宪法价值的主要载体,其不仅存在于宪法规定与宪法原则之中,还存在于宪法文本之外^④。这就存在可能符合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但违背宪法精神的立法目的。此时,目的正当性审查就应当着重考量立法目的是否也与那些游离于宪法文本之外的宪法精神相契合,确保立法目的在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三个维度均能得到合理阐释,不存在冲突与偏差。

第二,关于授权立法的目的审查。授权立法是指立法机关通过专门授权决定,授予特定机关部分立法权的立法活动。由此可见,授权立法本质上是在授权立法决定框架下开展的立法活动^⑤,其立法目的天然被限定在授权立法决定设定的范围之内,故对其立法目的正当性的审查,需纳入更多维度的考量。实践中,授权立法包含自治立法与变通立法两种特殊类型,需分别明确审查重点。一是自治立法的目的审查。根据《立法法》第85条第1款,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这一规定对自治立法的目的正当性提出了双重要求:既需满足不违背宪法和上位法的基本准则,又需将立法目的严格限定在民族自治事项的范畴之内^[17]。因此,对自治立法的目的正当性审查,应在确认其符合宪法及上位法精神的基础上,重点审查其立法目的是否属于自治事项范围——若超出该范围,即便

其目的就一般事项而言具有正当性,也应依法予以撤销。二是变通立法的目的审查。《立法法》第101条赋予自治地方和经济特区对法律法规作出变通规定的权力,第109条则要求变通立法报送备案并说明变通情况。这两项规定表明,对变通立法审查不能仅聚焦于变通后的规范本身,还需深入考察其变通目的的正当性^[18]。因此,变通立法的目的正当性审查包含两层内容:一方面审查变通后报送的规范是否符合宪法及上位法规定,另一方面重点审查作出变通的动机与目的是否正当,最终确保授权变通立法的原初目的得到最大程度实现。

(二) 手段适当性审查

手段适当性的核心判断标准并非“手段能否完全实现立法目的”,而是“手段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目的实现”——只要手段对目的达成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可认定具备适当性;反之,若手段对目的实现无任何助益甚至产生障碍,则不具有适当性。实践中曾出现典型的不符合适当性要求的案例:2018年,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某市快递网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开展审查时发现,《办法》第18条规定:“快递网点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收寄、分拣、存储快件露天作业或者存在抛扔、踩踏、坐压快件行为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设置快递网点的快递企业或者分支机构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19]从法律关系来看,保证快件完好是快递企业与寄件人之间的合同义务,仅涉及民事主体之间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无直接关联,不应通过行政罚款这一公权力手段进行干预;进一步而言,对该类处置快件的行为施以行政处罚,与“保证快件完好”的目的之间缺乏直接因果关系,因此,该行政处罚规定可被认定为不具备适当性。

通常情况下,实现某一立法目的会存在多种具备不同适当程度的手段可供选择。实践中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立法主体在制定法律时,基于当时的认知确信某一手段能够实现立法目的,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与动态性可能导致立法预期出现偏差,先前于立法目的有益的手段而后可能起不到应有的作用^{[6]225-226}。因此,手段适当性审查在我国备案审查工作中的意义不在于确定哪一个手段是最能实现立法目的,而在于排除那些对于实现立法目的完全起不到作用的手段^[20]。

(三) 手段必要性审查

必要性原则所指的最小损害,并非绝对的最小损害,而是在各个手段的“有效性”相同的条件下具

有最小的损害^[21]。某个手段可能具有更小的损害性,但其对于实现立法目的起到的作用也更小,因此在对立法目的实现程度相同的条件下,其未必具有更小的损害性。总之,应当在有效性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不同手段的损害大小。在相同有效性的条件下所造成的损害最小的手段,才是效果最优的手段,“相同有效性”是比较各个手段损益大小的前提。

“相同有效性”的情形易于理解且不存在太大争议,但是现实生活中,对于某一立法目标,往往存在的是若干具有“异同有效性”的手段。“异同有效性”是指对于某一立法目标,存在若干均通过了适当性审查的手段,即各个目标均有利于实现立法目标。但是,其中“有效性”较大的手段带来的损害相对较大,“有效性”较小的手段带来的损害也相对较小。此时,再适用“相同有效性”的规则便无法解决此种情形下该采取何种手段的问题。此种情形下,就要用到一个新的概念:“相对有效性”(用 V_r 来表示)。“相对有效性”就是需要将各种具有“异同有效性”且损害也各不相同的手段进行换算,将其转化为同一量级后再进行比较与抉择。在这一过程中,要用到两个概念,分别是“有效性总量”(用 V_t 来表示)与“损害总量”(用 D_t 来表示)。由此,“相对有效性”计算公式的完整表述就是:

$$V_r = \frac{V_t}{D_t}$$

这样一来,关于具有“异同有效性”的手段间如何选择的问题,也有了科学确定的判断标准。然而,这样一个公式并不能囊括所有情形。试想这样一种情形:假设立法目标所意欲实现的目的值为100,手段 M_1 的损害为30,有效性为60;手段 M_2 的损害为45,有效性为90。此时该作何选择?能够注意到的是,这两种手段经上述计算公式运算所得出的值相等,即“相对损害量”都是0.5。如此一来,仅凭借上述公式作为一切“异同有效性”手段的判断标准便显得不够全面了。那么,在此情形下,本着尊重立法目的,致力于最大程度上实现立法目标的原则,在“相对有效性”相同的情形下,应选择有效性最接近立法目标的手段,使得立法机关能更多地增进社会公共福利,实现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民个人利益损害最小化的目标。因此,在上述假设的情形中,应选择手段 M_2 。因为手段 M_1 与 M_2 的“相对有效性”相同,而手段 M_2 更接近立法目标的期望值。

(四) 手段与目的均衡性审查

备案审查工作中,均衡性审查的内容是在所采用手段带来的损害与所欲实现的立法目的之间进行

价值衡量。只有当手段所造成的损害小于立法目的实现所带来的利益时,该项立法才满足均衡性原则的要求,否则其不能产生相应的立法效益。我国备案审查工作中均衡性审查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实现该项立法目的过程中手段所造成的损害与立法目的实现所带来的收益之间的权衡与比较。均衡性原则力求实现低损害、高收益的方式实现立法目的,从而最大程度上增进公共利益^[22]。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审查纠正《某市机动车停车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实践,集中体现了均衡性原则在我国备案审查工作中的适用。《条例》针对停车人不按时交纳停车费的情形,作出“由区停车管理部门进行催缴,并处2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的规定,该规定不符合备案审查工作中手段与目的均衡性的要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法律体系的整体性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该市关于违规停车的相关规定,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违法者处200元罚款;在设有禁止停车标志、标线的地点停放车辆或临时停车的,处100元罚款。从社会危害性程度来看,通常情况下,“不按时交纳停车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低于违规停车行为,立法应当体现这一价值倾向。而对不按时交纳停车费的行为处以起步200元的罚款,甚至高于违规停车的罚款金额,这有违建设科学法治体系的要求。二是从该手段与所欲实现目的的关联性本身来看,不按时交纳停车费的行为,多数情况下并非行为人有意识的违法,具有涉及主体多、涉及数额小、社会危害性轻微的特点。对该行为处以起步200元罚款,罚款金额往往远高于实际未交纳的停车费数额;同时,由于该行为多为“无意识违法”,行为人不具有主观违法意图^{[7]325-327}。综合来看,《条例》规定的处罚方式,超出了规范停车费用交纳秩序所需要的处罚限度,罚款数额与未交纳的停车费数额存在明显失衡,不符合比例原则中手段与目的均衡性的要求。因此,应当对《条例》的相关规定作出调整,以最大程度适应社会发展需求^⑥。

五、结语

《决定》的通过,标志着比例原则被明确纳入我国备案审查制度,并成为一项重要的审查内容,从而更好地适应我国备案审查制度的发展需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备案审查工作作出了更为精细化的规划,这一举措是加强我国备案审查能力建设、提高备案审查工作质量的重要一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备案审查主体在适用比例原则时,应当

遵循“目的正当性、手段适当性、手段必要性、手段与目的均衡性”的具体审查步骤,进而探索出一套适合我国现实国情的比例原则备案审查适用机制,推动备案审查制度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发展,进一步发挥其在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注释:

- ①关于比例原则在不同法学领域适用的讨论,相关文献参见陈景辉:《比例原则的普遍化与基本权利的性质》,《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蔡宏伟:《作为限制公权力滥用的比例原则》,《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范进学:《论宪法比例原则》,《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郑晓剑:《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及展开》,《中国法学(文摘)》2016年第2期;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政法论坛》2016年第3期;李海平:《比例原则在民法中适用的条件和路径:以民事审判实践为中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
- ②早期,比例原则多侧重强调“依法行政”,即关注手段而忽视目的。这可能是因为比例原则最早诞生于行政法领域,目的本身经过立法环节检验,因此在执行环节没必要对立法目的再进行审查。而如今基于公权力行为审查时手段与目的均重要的特点,公法学者开始关心目的正当性原则。关于三阶层说与四阶层说的比较分析,参见雷磊:《比例原则的规范论基础与方法论定位》,《政法论坛》2025年第1期。
- ③关于我国立法体制和立法权限的介绍,详见张文显:《法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第306-314页;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第324页。
- ④莫纪宏教授认为,不能认为宪法文本中的宪法精神穷尽了宪法精神的全部内容,可以从宪法文本之外去寻找更加广义上的“宪法精神”。关于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三者关系的详细介绍,参见莫纪宏:《宪法原则的双重透视》,《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 ⑤学者多对授权立法决定的法律属性予以肯定。关于授权立法决定性质之详细探讨,参见江国华,梅扬,曹榕:《授权立法决定的性质及其合宪性审查基准》,《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5期;邢伟星,刘旺洪:《授权立法决定是法律吗?——源自规范立场的分析》,《学海》2022年第3期;邢伟星:《论立法法中授权决定的功能与效力》,《人大研究》2024年第5期;江国华,郭文涛:《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的实证分析: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21个授权决定为样本》,《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 ⑥有学者认为,不交停车费不属于“违法”行为而属于“违约”行为,因此不应施以行政处罚手段。具体分析详见刘嫚:《未交停车费罚两百元?全国人大:合法停车未交费不宜行政处罚》。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参考文献: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EB/OL]. (2023 - 12 - 29)[2025 - 05 - 12].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312/t20231229_433986.html.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J]. 党建,2024(8):8-24.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求是,2022(21):4-35.

[4] 梅扬. 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限度[J]. 法学研究,2020,42(2):57-70.

[5] 蒋红珍. 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中的定位[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2):55-65.

[6] 蒋红珍. 论比例原则:政府规制工具选择的司法评价[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7] 张勇,严冬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理解与适用[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4:111-113.

[8] 刘小平. 法治中国需要一个包容性法治框架:多元现代性与法治中国[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21(5):168-180.

[9] 朱振. 论作为核心概念的“法治体系”[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25,31(1):25-39.

[10] 梅扬. 比例原则的立法适用与展开[J]. 甘肃政法大学

学报,2022(4):1-14.

[11] 陈乾. 备案审查中的比例原则适用问题研究[J]. 备案审查研究,2023(3):11-19.

[12] 刘义. 行政立法裁量的宪法论[J]. 浙江社会科学,2018(2):35-46.

[13] 叶海波.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规范内涵[J]. 法学家,2013(5):20-33.

[14] 江国华,梅扬,曹榕. 授权立法决定的性质及其合宪性审查基准[J]. 学习与实践,2018(5):12-21.

[15] 刘小平. 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走向一个实质法治概念[J]. 社会科学战线,2020(5):201-213.

[16] BURNTON S. Proportionality[J]. Judicial Review,2011,16(3):179-181.

[17] 郑毅. 《立法法》修改后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权与自治立法权关系研究[J]. 法学评论,2018,36(4):126-141.

[18] 王旭. 论比例原则在备案审查中的展开[J]. 环球法律评论,2024,46(4):54-71.

[19] 朱宁宁. 备案审查进行时:《法治日报》新时代备案审查报道集萃[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180.

[20] 王镔. 比例原则在备案审查中的运用:以适当性审查为中心[J]. 地方立法研究,2023,8(5):1-16.

[21] 刘权. 论必要性原则的客观化[J]. 中国法学,2016(5):178-195.

[22] 刘权. 均衡性原则的具体化[J]. 法学家,2017(2):17-30.

(责任编辑 刘成贺)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Recording and Review

WANG Xiaoyang

(School of Law,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has been explicitly incorporated into China’s Recording and Review system as a critical review standard to guide its implementation. Prior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to China’s Recording and Review practice, issues such as ambiguities in review criteria arose, which manifested in theoretical, normative,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fulfills two key rule-of-law functions within Recording and Review: first, regulating the legislative restriction of rights, and second, constraining the pervasive legislative discre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in Recording and Review should follow a structured review framework: legitimacy of purpose, appropriateness of means, necessity of means, and proportionality between means and ends, thereby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refinement of the Recording and Review system.

Key word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recording review; ambiguity in review criteria; rule-of-law function; review procedure

新中国成立前宁夏党组织建设： 工作历程、核心策略与当代启示

张玉梅

(宁夏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党组织建设是革命胜利的关键基石与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前宁夏党组织建设历经早期党组织创建与革命启蒙、抗战时期组织重建与统战策略、解放战争时期地下斗争与解放准备三个阶段,围绕不同阶段需求,精心谋划并实施了四大核心策略: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注重基层党组织建设、严格经费管理、发挥基层党组织宣传作用。其积累的宝贵经验,不仅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更对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前;宁夏;党组织建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09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52-06

党组织是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为革命胜利保驾护航。宁夏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坐标,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目前,宁夏党组织建设的研究现状呈现出“史料丰富、学术薄弱”的特征。研究多停留在档案文献的整理与展示层面,如《中国共产党宁夏简史(1926—1949)》一书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前宁夏党组织的发展历程,但不能高度契合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需求;徐建国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党组织建设述论》^[1]详细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党组织建设,聚焦党组织制度建设及组织建设、强化党员教育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为剖析宁夏党组织发展提供了研究路径;刘玫的《乡村的民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2]聚焦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党组织正确处理与非党组织、各党派的关系的专题研究,提出了从乡村民意角度审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为研究党组织建设提供了全新视角;王今诚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考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3]是针对党的乡村基层党组织如何真正发挥作用的研究阐释,

从理论创新、制度建设、实践检验三个角度对党组织的运作方式进行探索研究;刘文鑫的《虎克敏:宁夏农村第一位共产党地下党支部书记》^[4]还原了红军西征时期虎克敏作为宁夏一名农村党组织的支部书记开展党的工作的状况,为研究宁夏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宝贵素材;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第一个在青海开展工作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5]结合档案文献,梳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的发展策略,收录的有关宁夏党组织建设状况的史料为研究宁夏党组织提供了支撑。这些成果以陕甘宁地区为聚焦点,展开了系统性分析。宁夏作为陕甘宁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研究者虽也对宁夏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展开探讨,梳理了其历史轨迹,为宁夏党组织建设研究提供了多元思路,但整体而言,宁夏党组织相关研究在庞大的陕甘宁研究成果体系中,所占比例相对有限。关于宁夏党组织的系统研究相对薄弱,关于其在整个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战略策略及其实践经验的研究,尚未构建起一套具有普遍适用性与广泛影响力的理论范式,难以从宏观层面把握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核心

收稿日期:2025-07-07

基金项目:2023年度国家哲学社科规划项目“当代宁夏移民记忆与档案的历史书写研究”(23BZS155)

作者简介:张玉梅(1982—),女,宁夏银川人,宁夏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

规律。

鉴于此,全面梳理新中国成立前宁夏党组织建设的战略,有助于弥补当前研究碎片化、缺乏系统性的短板。本文旨在通过对宁夏党组织各阶段战略的深入剖析,完整呈现宁夏党组织在复杂历史环境下的战略演变过程,进而构建起相对系统的研究体系。

一、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宁夏党组织发展脉络梳理

宁夏地区的革命历程,自1926年宁夏第一个党组织创建起正式开启,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宁夏全境解放,可归纳为三个阶段:早期组织创建与革命启蒙阶段(1926—1936年),抗战时期的组织重建与统战工作阶段(1937—1945年),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地下斗争与解放准备阶段(1945—1949年)。

(一)早期组织创建与革命启蒙(1926—1936年)

1.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建立与解体

宁夏是我国民主革命思想和马列主义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1926年9月建立的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标志着宁夏有组织的革命活动的开始^{[6]38}。1927年3月后,宁夏党组织先直属中共陕甘区委领导,后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927年9月,国民党开始在宁夏地区进行“清党”运动,中共党员被驱逐,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被迫解体。

2. 宁夏党组织的四次重建

1929年宁夏省成立后,中共北方局和陕北特委派党员干部来到宁夏,先后四次恢复党的组织,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分子,开展革命活动。第一次是1930年建立国民革命军骑兵四师中共特别支部。1930年,按照中共陕北特委安排,刘志丹、谢子长指导骑兵四师的中共党员成立了特别支部,特别支部共有30多名党员,下辖4个党支部,特别支部原则上不与宁夏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1930年5月,苏雨生部队离开宁夏赴甘肃靖远,骑兵四师的中共特别支部及所属共产党员也随之离开;第二次是以杜润芝为负责人的宁夏党组织建设。1930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杜润芝以特派员身份来宁夏恢复和建立中共宁夏党组织。1931年,宁夏党组织受到敌人迫害,组织建设瘫痪,被迫开展秘密工作;第三次是重建以张德生为书记的中共宁夏特别支部。1932年6月,中共陕北特委派在陕北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张德生等赴宁夏,组建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继

续秘密开展工作。1932年冬,因党员身份暴露,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再次处于瘫痪状态。1932年12月,中共甘宁青特委在兰州成立,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受中共甘宁青特委领导的中共宁夏区委,在1933年7月中共甘宁青特委遭破坏后,活动也随之停止^{[6]41};第四次是重建王森任书记的中共宁夏特别支部。1934年8月,中共党员李德铭、李清华与赵子明一起建立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王森任书记。1935年5月,因特别支部的党员相继被捕,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再次被敌人破坏。

(二)抗战时期的组织重建与统战工作(1937—1945年)

1. 中共宁夏工委的革命活动

1936年5月17日,中共陕甘宁省委、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同步成立,建立了中共盐池、豫旺等县工委和固原县工委、苏维埃政府。1937年10月,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建立,先后任命杨一木、李仰南为宁工委书记,工委采取灵活隐蔽策略,但在马鸿逵“防共反共”政策的压迫下,1939年宁夏党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1939年10月,中央再次研究宁夏地区党的工作。1940年3月,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重建,崔景岳任书记。同年4月13日,崔景岳被捕,中共宁夏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工作陷入停滞状态。

2. 中共金灵工委、甘宁工委、河东工作组及回汉支队的建立

宁工委被破坏后,党在宁夏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主要由中共三边分区党委(后改为地委)统战部负责。中共三边分区委员会通过建立诸如金灵工委等机构的形式开展宁夏党的工作。1942年9月成立了中共金灵工委(又称河东工委)^{[7]327}。金灵工委以移民安置为切入点,逐步恢复宁夏周边地区党组织。但金灵工委成立仅几个月时间,因整风运动于1943年3月撤销。1943年,甘宁工委成立。1944年5月、7月,中共三边地委分别在三段地、盐池县建立了工作据点,并设立了统战部,积极开展宁夏工作。1945年4月,中共河东工作组成立,开展宁夏工作。1945年底将余庄子、红井子两个工作据点改为工委。1946年底,三边地委、三边军分区将余庄子、红井子游击队和定边回民游击支队合并,组建回汉支队,该支队政治上隶属宁绥工委,军事上受三边军分区领导。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地下斗争与解放筹备(1945—1949年)

为了加强党对宁夏工作的领导,宁夏党组织建

设在该时期经历了宁夏工委的两次重建,以及宁绥工委对其工作的接替。1946年3月15日,中共三边地委就宁夏工作作出决定,正式恢复和重建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1946年6月17日,高峰、赵忠国传达西北局指示,宣布宁夏工委成立。1947年1月17日,西北局讨论宁绥地区工作,决定将宁夏工委与伊克昭盟工委合并为宁绥工委,朱敏为书记,赵忠国为副书记,宁绥工委的工作人员日常工作仍与三边地委人员一同开展,对外仍以三边地委统战部名义开展工作^{[7]383}。1948年8月31日,中央西北局决定撤销宁绥工委,成立宁夏工委。1949年9月,宁夏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已配合解放军提供情报、策反敌军,为和平接管银川创造条件。9月23日,宁工委随中共三边地委进驻银川市。1949年10月,中共宁夏省委正式成立后,于12月迅速整合老区干部与本地党员干部,开启政权建设新阶段。中共宁夏省委正式成立后中共宁夏工委随之撤销。

二、新中国成立前宁夏党组织的核心工作策略

新中国成立前,宁夏党组织在复杂的环境中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宁夏党组织通过灵活且具有针对性的工作策略实现自身在组织建设各领域的全面发展,这些策略在党员队伍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经费管理及宣传工作等关键领域展现出显著的实践特点。

(一)党员队伍建设:规模扩张与质量强化并重的递进式发展策略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是提升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核心保障。宁夏党组织将其置于重要战略地位,采取规模扩张与质量强化协同推进、分阶段递进的发展策略,为革命胜利筑牢坚实的组织堡垒。

1. 党员队伍动态化规模扩大策略

扩大党员队伍是增强革命力量、拓展群众基础的关键举措。宁夏党组织依据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形势,灵活调整党员发展策略。

早期探索与艰难起步(1926—1936年):1926年9月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建立,开启了党组织在宁夏的发展历程。至1927年,发展党员14名,共青团员30余名。宁夏党组织的党员发展工作虽因1927年国民党“清党”活动受阻,但中央于1927年10月28日迅速制定《陕西省委在宁夏发展党员计划》,明确发展目标与任务,以行政指令式策略推动党员队伍建设,要求宁夏支部在1927年10月到1928年1月期间发展20名党员,并建立严格的考核与问责机制。例如,对不积极执行发展计划或到期发展的党员成分过差的情况,该党部负责人要受

到严格的处分^{[7]21},充分体现出党组织在初创期主动突破困境、谋求发展的决心。

抗战时期的战略拓展(1937—1945年):依托中共中央《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宁夏党组织结合抗战需求,实施重点群体突破策略。以工人、城市劳动群众、贫雇农、知识分子及学生为主要发展对象,精准扩大党员队伍规模。1939年宁夏各地党员发展至300多人,1945年抗战末期至1946年期间,中共河东工作组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发展党员、建立统战关系,展现出党组织在复杂环境下利用政策红利、扩大影响力的能力。

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面渗透(1945—1949年):宁夏工委提出“充实和加强各据点,发力发展党员”^{[8]266}的明确要求,采用“派出去,叫进来”^①的双向互动策略。宁夏工委所属党员总数由1946年6月工委成立初期的221人增至1947年元月的420人^{[8]264}。同时吸引进步分子到边区培养入党,实现党组织在马鸿逵统治区13县(市)的广泛分布(除中卫、磴口外)^{[8]267}。注重在移民、难民中发展党员,这些党员经秘密工作训练后派往宁夏各地。1946年底,回汉支队成立时共有干部、战士240余人,分别是余庄子工委游击队80余人、红井子工委游击队50余人、三段地据点游击队10余人、回民支队约100人^{[8]269}。在成立后的三年中,回汉支队不断发展壮大,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党员干部,成为党员干部培养的重要平台,体现党组织将党员发展与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紧密结合的战略眼光。

2. 多维度质量管控策略

注重党员质量是确保组织纯洁性、提升战斗力、应对复杂斗争的核心要求,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可靠政治保障。1940年,陈云在《关于党员问题》中,提出了党员“质量的发展重于数量的发展”^[9]的著名论断。宁夏党组织按照中央部署,严格把控党员质量,构建起涵盖政治、阶级、纪律、思维等多维度的质量管控体系。

第一,政治标准首位策略。在入党审查环节,将政治立场作为核心考量因素。在入党过程中,宁夏党组织严格开展政治审查。中共宁夏特支发展党员时,重点考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度和反帝反封建立场,如吸收马云泽等本地进步青年前,通过秘密读书会、革命理论学习等方式检验其思想纯度。第二,阶级成分精准筛选策略。结合宁夏民族地区特点,在回民聚居区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优先培养阿訇、教长等宗教人士及贫苦回民,如金灵工委通过清真寺建立联络点,发展马思义等回民党员,增强党组

织在民族地区的公信力。第三,纪律与纯洁性保障策略。建立严密的组织纪律体系,采用单线联系与层级保密机制。优先吸纳工人、贫农及进步知识分子,注重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审查,确保党员队伍的革命性。例如,金灵工委时期,入党需先经社会关系核查,由党组织对申请人所在地区的区乡长、保长、地方士绅名流等开展社会调查,与他们逐渐交成政治上的朋友,并吸收经长期考验过的、个别好的、可靠的分子入党。第四,纪律执行与保密机制策略。宁夏各级党组织严格按照组织纪律开展党员教育管理,采取单线联系与层级保密的方式。抗战时期宁夏工委采取“纵向联系、横向不交叉”机制,党员仅与上级单线对接,有效降低组织暴露风险。1946年3月召开的“三月会议”,提出有关宁夏建党的具体方针,明确了在宁夏发展单线党员的规定及具体方法^{[8]265}。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平东工委遵循“精干隐蔽、蓄积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的原则,采取“单线联系、易地领导”的方式,在隶属关系上实行“谁发展归谁领导”^{[8]199}。通过正风肃纪运动,强化纪律教育,严厉惩处叛徒,处决变节分子,有效确保组织纯洁性。第五,自我革新提升策略。宁夏各级党组织始终将自我剖析与反思作为常态化工作机制。1947年2月1日发布的《宁绥工委关于宁夏工委工作总结报告及今后任务》中,专门就宁夏工委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总结,从备战准备工作推进不足、干部军事经验薄弱等六个方面客观开展自我剖析,部分内容加入实际案例进行说明,从而针对存在问题及宁夏时局提出对策建议,体现党组织自我净化、自我提升的能力,确保党员队伍始终保持先进性与战斗力。

(二)基层党组织建设:架构规范与功能强化的系统性构建策略

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凝聚革命力量、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关键环节。宁夏党组织采用系统性构建策略,从规范组织架构与强化功能发挥两方面协同发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与领导力。

1. 标准化架构建设策略

规范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夯实党的组织根基、提升凝聚力与战斗力的关键举措。宁夏党组织严格遵循中央相关规定,结合地方实际制定标准化建设策略。依据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要求,明确规定支部成立的具体细则,确立了支部为党的基层组织,细化了支部内部组织建设的具体方法。1936年8月15日,中央组织部给陕甘宁省委发来《关于党内组织上几个问题》

的来信,对党支部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形式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朱敏等谈宁夏接管问题》^[10]中,中共三边地委副书记贾怀济明确要求宁夏在工人、农民、学生群体中分别建立工会、农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三个党员以上建立支部。宁夏工委加强党组织标准化建设,规定半年内需在每乡建立五人以上的党支部,并且对原有支部进行严格审查教育。金灵工委利用选拔教育后的党员,逐渐在金灵一带的矿井(如石沟驿、磁窑子)、市镇(如吴忠堡、惠安堡)及中心乡村中建立基层党支部,目的是紧密联系群众、践行群众路线。金灵工委在工作中严格遵守“绝对保密、长期打算、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构建起覆盖广泛、运转高效的基层组织网络,实现党组织与群众的紧密联结。

2. 多元化功能拓展策略

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是汇聚各方力量、攻克发展难题、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支撑。新中国成立前,宁夏党组织通过多元化功能拓展,使基层党组织成为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

第一,组织与宣传双轮驱动策略。基层党组织兼具组织建设与思想宣传双重职能。在组织建设方面,宁夏党组织始终发挥组织职能,构建严密的基层组织体系。在宣传工作中,通过创办刊物、举办讲座等形式,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理念,为革命斗争奠定思想基础。第二,社会变革推动策略。宁夏党组织聚焦民生问题,将党组织建设与社会变革紧密结合。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封建压迫与剥削的斗争,争取人民的基本权益。在土地分配、苛捐杂税等问题上为群众发声,通过组织斗争推动社会变革。积极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抗租等斗争,打击反动势力,动摇反动统治根基,为宁夏的解放事业创造条件。第三,人才战略储备与培养策略。宁夏党组织将人才培养作为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使命,通过举办培训班、组织学习小组等方式,提高党员和进步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斗争能力。这些培养举措为革命事业储备了大量骨干力量,这些力量成为推动宁夏解放的核心人才资源,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在人才战略中的关键作用。

(三)严格经费管理:制度导向与精细管控的保障型策略

经费管理是党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宁夏党组织构建起以制度为导向、以精细管控为手段的保障型策略,确保经费合理使用与高效运转。新中国成立前,宁夏地区党组织建设面临诸多困难,宁夏党组织通过多措并举,保障了自身的正常运转。第

一,制度规范引领策略。宁夏党组织将制度建设作为经费管理的核心,1948年9月24日,制定《宁夏工委经费开支制度》(草)^{[7]391}等规范性文件,明确经常费和实业费的开支范畴、单据管理、报告流程等内容。通过制度明确经费管理纪律,规定额外收入必须交公处理,形成覆盖经费管理全流程的制度体系,为经费管理提供刚性约束,确保经费使用有章可循。第二,精细化管控策略。首先是规划先行理念。新中国成立前,宁夏党组织秉持节俭使用原则,对经费支出进行科学规划。如实业费支出初期本着“正确适当”的原则使用,避免浪费。工委委员有权批准每次采购肥皂十两(旧制),采购量超过十两的须经正副书记批准。其次,细化财务管理。宁夏工委按月制定详细的经费开支决算表,对掩护费、统战费、派遣费、招待费、化妆费、瓦解敌军费、工作费、路费、特别费等十余项费用进行细致分类统计,并附单据备查。金灵工委明确经费支出比例(70%工作费、30%招待费),实现经费使用的精细化管理。决算书须经党组织领导及经办人签字盖章,确保经费支出透明、可追溯,提升经费使用的规范性与安全性。

(四)注重党组织宣传:多维协同与精准动员的传播策略

党组织宣传是凝聚群众力量、推动革命进程的重要途径。宁夏党组织采用多维协同与精准动员相结合的传播策略,从领导中心工作、传播思想、动员群众等维度开展宣传,推动革命进程。

第一,“军事一政治”协同宣传策略。宁夏党组织以军事行动为核心,将宣传工作与军事战略紧密结合。“在国民军联军进驻宁夏时,中共党员发挥宣传队作用,沿途向群众讲演,散发传单,宣传国民军‘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宗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8]34}。红军长征时期,为补充长征途中的兵力,中央红军将扩大红军队伍、巩固统一战线作为宣传工作的重点任务。在宁夏境内,通过张贴标语宣传党的战略主张,诸如“拥护西北人民解放军!”“青年们积极参加解放军为亲朋复仇!”^{[11]160}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同时回汉支队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帮助各地建立人民政权。军事需求与宣传动员的有机融合,为军事行动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推动了地方革命发展。第二,思想传播分层渗透策略。宁夏党组织针对不同群体与革命阶段,采用分层渗透的思想传播策略。在宁夏党组织创立初期,著名共产党员宣侠父、钱靖泉在宁夏街头演讲,散发

《告甘肃民众》的传单,传播革命道理^{[8]34}。1926年中共宁夏特别支部通过在各军政机关、学校、团体普遍建立“列宁室”“中山俱乐部”,陈列进步书刊供群众阅读等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深度理论传播。中央红军进入宁夏地区后,因陋就简,开展以标语为主的宣传活动,面向农民群体进行通俗化宣传,逐步提高群众阶级意识^{[11]161}。通过分层思想传播,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不同群体、不同层面的有效传播,扩大党组织思想影响力。第三,群众动员组织化策略。宁夏党组织将宣传工作与群众组织建设紧密结合,通过成立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等团体,构建群众动员组织网络。各革命团体发挥群体优势,开展革命活动、传播进步思想。“宁夏旅平学生会”通过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该会通过出版进步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思想^{[8]84},将宣传动员转化为具体组织行动,实现对群众的有效动员与组织,使党组织宣传工作落地生根,为革命斗争凝聚强大的群众力量。

三、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前,宁夏党组织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开展建设,对宁夏解放和党的发展意义重大,在多个方面展现出不可忽视的价值。在推动宁夏革命胜利进程上,宁夏党组织深入开展宣传,通过发放传单、在据点宣传等形式,激发民众反抗意识,使其踊跃投身革命,为革命武装提供核心人力支撑。同时,党组织积极壮大党员队伍,为革命武装提供人力保障,为宁夏革命武装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宁夏党组织还积累了宝贵的党建经验。在经费管理方面,宁夏工委、金灵工委等通过制作决算表、明确支出比例等方式,规范经费使用,为新时代经费规范化管理积累了经验。在党组织建设上,严格遵循中央要求,规范党支部组织和工作形式,探索出科学化、规范化的建设模式,对新时代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新时代党建要重视宣传思想工作,借助多元媒体创新宣传形式,通过传播党的理论政策凝聚精神力量。还要强化组织和经费管理,借鉴宁夏党组织经验,严格党员发展标准,规范党组织架构,健全财务制度,保障党建工作顺利开展。总之,新中国成立前宁夏党组织建设的历史,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智慧借鉴与精神滋养。传承其优良传统,在党建工作中不断探索创新,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实组织保障,续写新时代党的辉煌篇章。

注释：

①“派出去”指宁夏基层党组织在移民、难民中发展党员，并选拔其中的积极分子，加以秘密工作的训练后，派到宁夏各地；“叫进来”指宁夏基层党组织党员通过各种关系、渠道，介绍进步分子到边区来，经过培养后吸收入党。资料出自：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 中共宁夏党史档案资料选编（1926—1949）[M]. 内部资料，1986.

参考文献：

[1] 徐建国.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党组织建设述论[J]. 福建党史月刊, 2015(2).
[2] 刘玫. 乡村的民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J]. 前沿, 2017(6).
[3] 王今诚.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考察：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18(11).
[4] 荆文鑫, 虎克敏. 宁夏农村第一位共产党地下党支部书记[J]. 宁夏画报, 2023(4).
[5] 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 第一个在青海开展工作的党

组织：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J]. 党的生活, 2025(1).

[6]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宁夏简史（1926—1949）[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
[7] 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 中共宁夏党史档案资料选编（1926—1949）[M]. 内部资料，1986.
[8]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宁夏史（1919.5—1949.12）[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陈云文集[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295.
[10] 朱敏等谈宁夏接管问题宁夏调查委员会会议记录[Z]. 宁夏档案馆藏档案号：宁档宁工委全宗 27 号卷，1949：47.
[11] 张玉梅. 宁夏红色标语的整理与作用研究[J]. 红色文化资源, 2021(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Ningxia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y, Work Strategies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ZHANG Yumei

(Institute of Marxist Studies, Ningx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inchuan, Ningxia 75002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s the key cornerstone and core guarantee for the victory of revolution.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Ningxia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early Party Organization creation and revolutionary enlightenment, organiza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united front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underground struggle and liberation preparation during the Liberation War. Four core strategies were carefully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members,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establishing strict funding management systems, and leveraging the propaganda role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it has formed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and has important enlightening value for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Key words: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ingxia;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非正式权力正式运作:民间传统文化复建的生产动员

——以安徽合肥T氏宗谱编修过程为例

陈 继

(安徽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农村社会中的宗谱、祠堂、庙宇等民间传统文化载体,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其中,宗谱作为宗族血脉传承的关键载体,是宗族成员寻根问祖、追本溯源的核心依据。20世纪末农村地区兴起的宗谱续修工作,既体现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与追寻,也饱含着对乡愁记忆的深情诠释。其编修动员过程呈现出乡土领域非正式权力运作的多元形态,折射出传统宗族治理的现代转型。鉴此,以安徽合肥T氏家族宗谱编修为个案,探讨其突破传统宗族权威框架,通过组织化动员、思想性动员、责任制动员等新型运作方式,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新乡贤的乡土情怀、宗谱的文化符码价值以及乡村社会的共享性文化观念,在破解乡村集体行动“搭便车”困境、规避投机行为方面具有现实意义,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文化支撑与价值引领。

关键词:民间传统文化;复建过程;动员策略;乡村治理;非正式权力正式运作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10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58-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同时强调,需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农村社会的宗谱、祠堂、庙宇等民间传统文化资源,作为宗族成员集体身份的外在表征与绵延不绝的文化符码,记录着乡土风貌与历史变迁,凝结着宗族成员的集体认同,承载着家族源流。这些资源不仅具有历史传承、留住乡愁、寻根问祖的基本价值,更对农村社会凝心铸魂、振兴乡村文化具有促进作用。宗谱编修、祠堂兴建、庙宇庆典等传统文化的符码构建,在中国农村社会自发生成并体现为一种集体性行动。然而,此类集体行动多数会呈现奥尔森在《集

体行动的逻辑》中所阐述的“搭便车”现象^[2]——个体在集体行动中不承担成本却共享群体利益的投机行为。但田野观察发现,农村宗族文化实践基本规避了这一困境,展现出宗族成员全心响应、全力参与、全面投入的显著格局。为何会出现这种格局?这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民间传统文化发展的波折与复建

回溯过往,民间传统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传承过程曾受外部因素制约,历经波折与恢复。20世纪末,农村民间传统文化得以重建,呈现出复苏向好的态势,其中宗谱编修活动更是方兴未艾。国家著史,记载朝代变迁与政事兴衰;地方编志,记录地域沿革与乡风民俗;家族修谱,考订世系传承与宗支脉络。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我国史学体系的核心。宗谱,又称家谱、族谱、世谱等,以图表与书谱相

收稿日期:2025-07-21

基金项目:2023年度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城乡融合背景下返乡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及其实现机制研究”(2023AH050889)

作者简介:陈继(1976—),男,安徽合肥人,社会学博士,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社区治理与发展。

结合的形式记录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在传承宗脉、记载史实、辅助国史编纂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正所谓“盛世修志,族旺续谱”。修志续谱作为延续文化记忆与历史传承的重要方式,在传统中国社会广泛流行,自宋代起便与民众生活紧密相连。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宗谱、祠堂等文化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宗谱修纂被迫停滞。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逐步复苏,国家对农村文化资源的重视与保护力度日益加大,加之民众修谱意识不断增强,宗谱编修活动也逐渐恢复并逐步普及。如今,宗谱编修已成为农村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也是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据史料记载,现存最早的宗谱之一是宋代内府抄本《仙源类谱》,至今已有近千年历史^[3]。与此同时,宗谱编修的学理性研究也日益受到学者关注,形成了围绕宗谱序列、姓氏宗族支系溯源的研究方向。

关于宗谱编修的基本论述,既往研究多有探讨,且主要聚焦历史事实与文化价值两大层面。其一为历史事实层面。有学者提出,宗谱作为一种“文化密码”,具有文化基因的功能^[4]。而作为文化密码载体的宗谱资料,实则是历史事实的呈现——它真实还原了不同历史时期各大家族的姓氏门房序列,以及宗谱编修、印刷的基本体例。其二为文化价值层面。部分学者以宗谱核心作用为出发点,结合国家主流政治语境与民众日常生活实践展开研究^[5],进一步揭示了宗谱文化对传统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促进作用。此外,冯尔康指出,明清士大夫编纂宗谱的活动与朝廷推行的伦理政治相呼应,带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6]。改革开放后,亦有学者通过分析宗谱样本中的政治词汇与观念,探讨了主流政治思想在基层社会的表达路径,以及其参与民间政治秩序建构的具体机制。可见,以宗谱与宗族为媒介,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象征、彼此隐喻的共生互动关系^[7]。这种关系既体现了国家以宗谱与宗族为媒介对基层社会的文化整合,也反映了民间社会通过宗族文化实践对国家秩序的主动回应。

二、非正式权力正式运作:民间传统文化复建的一个分析概念

非正式权力与正式权力的区分,源于二者的运作逻辑差异:前者依托传统权威与乡土规约,具有人格化特征,近似韦伯所述传统型或卡里斯马型权力;后者基于政策赋权,依托科层化刚性规则,对应法理型权力。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农村四种权力模式:一是社会冲突中产生的横暴权力,二是社会合作中产生的同意权力,三是社会继替中产生

的长老权力,四是激烈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时势权力^[8]。这四种模式本质上构成了乡土社会长期形成的非正式权力体系。从运作方式看,正式运作遵循明确流程与固定程式,呈现层级化、科层化特征;非正式运作依赖传统风俗、宗族规约及情感原则,多为口头约定与模糊操作,具有简略化特点。理论上,农村宗谱编修、祠堂复建等文化活动属于民间自发行为,应通过非正式权力实现乡土性运作。但实证显示,改革开放后此类集体行动普遍采用体制框架下的正式运作模式,形成“非正式权力正式运作”的独特样态,其学理根源与实践基础,亟待深入阐释。

(一)既往学者相关研究概念的迁移

学界对权力运作模式已有较多研究,形成“正式权力正式运作”“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等分析框架。其中“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9]源于孙立平等对华北某县定购粮征收的研究,后续研究循此理路,从组织自主性与组织力切入,构建了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分析框架^[10]。“正式权力正式运作”由李怀在城中村改造研究中提出,他发现村级干部通过索要红头文件等,将正式权力作为与上级博弈的工具^[11]。另有研究聚焦村级干部在产业项目中的正式权力运作,将其细化为正式行使、非正式行使及强化行使等样态^[12]。需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多以体制内政策文本赋予的正式权力为核心,强调权力的规范性运作。此外,黄宗智提出乡村“第三领域”存在“半正式行政”,即依靠无体制身份的准官员(乡绅、地保),通过智识、威望与地方惯习开展治理^[13];金江峰在此基础上提出“新半正式行政”,强调新时期乡村治理非正式运作的新特征^[14]。但这些研究仍默认乡村治理的权力基础是体制性正式权力,其运作模式遵循规范性路径。本文聚焦的民间传统文化复建实践,在应然状态下本应基于乡土社会的非正式权力(如费孝通所述长老权力、同意权力),运作体现情感性、关系性特征。但实证发现,农村集体行动组织者将体制内权力运作逻辑迁移至乡土场景,形成“非正式权力正式运作”模式——以传统权威(如家族长老权力)这类非正式权力为基础,采用明确流程、规范操作的正式方式。这一模式相较于既有研究,实现了概念的迁移与创新,其生成逻辑与实践效能值得深入探讨。

(二)过往宗谱编修等民间活动开展的借鉴意义

文本分析显示,宗谱编修这类农村集体活动,通常由宗支代表或宗族长老牵头,发动各房支人员参与,形成一体化运作。为落实任务,组织者会通过细

化分工、包干到人,建立明确的责任体系,呈现出规范有序的正式运作流程。例如:《弼佐刘氏家谱》记载,编修委员会成立后,先确定主编、副主编等核心人员,再对“总体协调、资料管理、入户登记、信息释义解难”等工作进行分工、责任到人;同时,编修委员会运用现代通信技术,设立QQ群、微信群,其中“弼佐刘氏宗亲”微信群在半小时内便有216人入群^[15]。这种分工与行动方式,能推动宗族成员快速形成统一认知与共享意识,实现“总体牵头、分工负责”的包干制效应,达成宗谱编修的基本目的。可见,过往宗谱编修实践为此次活动提供了灵感,组织者采用充分动员、任务包干等方式,本质上是对过往有效举措的历史性借鉴。

(三) 牵头人个体的工作经验

当前宗谱编修、祠堂复建等活动,牵头或参与人员多为族中“长老式”权威(族长、房长等)、宗族知识精英(传统有功名者及无功名士人)、本族出身的体制内在任或退休官员。这些参与者具备三重特质:一是拥有可转化的文化与政治资本,既是乡土文化传承者,也是主流价值基层传播者;二是善用体制经验进行移植,因长期受体制规训,倾向采用网格化管理、层级负责制等正式运作模式,认为能高效推进集体事务;三是能实现本土化调适,在保留“工作布置—督查验收”等正式架构的同时,构建适配宗族场景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引导宗族成员观念认同、行动参与,形成“体制资源借用+本土经验融合”模式。这一实践本质是农村宗族行动者对体制运作逻辑的创造性迁移,通过“共享观念塑造+正式流程落地”,实现集体行动的有效动员。

鉴此,本文在援引既有学者相关概念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学理源泉与经验基础的双重支撑,提出阐释农村社会传统文化活动复建与组织动员机制的核心概念——“非正式权力正式运作”。下文将沿循这一思路,以宗谱编修活动为例,将此纳入所援引概念体系中展开分析。

三、民间传统文化复建的生产实践——宗谱编修的社会事实

(一) 案例概况与研究方法

祠堂复建、宗谱编修等农村传统文化活动,是传承集体记忆、共享宗族文化资源的核心,也是文化溯源与代际传承的关键。本文以安徽合肥T氏宗谱编修为研究对象,采用目的性抽样法,结合口述史料与宗谱文本,探究其生产动员机制。选择该案例基于三点:一是典型性,T氏为当地望族,历史上名人辈出,现仍有族人在重点大学(任教授、研究员等)、

国家机关(担任行政职务)等机构任职,宗谱编修影响力强;二是资料可及性,笔者研究领域与之契合,且家族长辈全程参与编修,易通过其获取第一手资料;三是实践可复制性,T氏宗谱编修准备充分、组织周密,耗时不足两年便完成此项工作,高效动员策略具有示范价值。文本分析显示,完整宗谱档案包含“谱名、谱序、凡例、姓氏源流、世系考、世系表”^[16]等内容,既是传承宗族信息、延续历史记忆的载体,也是族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T氏宗谱亦循此范式,按谱名、谱序等类目及规范体例编排,以概念图呈现、层级化设计,清晰记录了从第一世至第二十五世的世系分支与人口脉络。

此外,本研究还关注以下问题:作为一项集体行动的宗谱编修,其生产动员过程如何规避集体成员的“搭便车”行为,进而探索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路径?这一实践过程,对当下农村社会文化复兴及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何种借鉴意义?基于此,笔者于2022年12月起,历时三个月对T氏宗谱编修开展回溯式调研:首先访谈牵头长辈,随后通过电话访谈、实地拜访等方式,与八大房主事、部分采编人员及宗亲代表进行交流;在形成访谈资料后,将其与宗谱文本相互验证,最终实现资料饱和。

(二) 依据时间分期的生产流程

宗谱既是历史事实的载体,其编修流程亦属社会事实范畴。宗谱编修的完整生产过程,主要包含牵头倡导与正式启动、信息登记与审核、定稿印刷与赠送售卖等环节。

1. 编修发起阶段:清晰的组织层级

宗谱编修发起阶段包含牵头倡导与正式启动两个环节。其一为牵头倡导环节。据调研可知,T氏宗谱修编最初由宗族两位长辈发起:一位是退休未满两年的某中职学校原校长TRZ,他结合宗族现状及族人发展繁衍情况,提出了续修宗谱的建议;另一位是原CH机械厂的退休宗亲TSQ,他积极响应这一建议并表示支持,还与TRZ约定分头联络在外地工作或退休以及本县体制内的T氏族人。TRZ表示:“宗谱修编是记录宗支繁衍的载体,也是族人寻根问祖、世系清晰延续的体现。所以我们几个老人商量后,决定牵头做这件事。集体的事有时费力不讨好,要贴时间、耗精力,甚至倒贴钱,但好在我们都有工资,能承担得起这些开销。家里人虽不支持也未明确反对,毕竟这是宗族集体事务。”在此背景下,宗谱编修工作按要求进行筹备:一是成立修编工作筹备委员会并明确分工,在T氏祠堂设立办公室,挂牌“T氏宗谱编修筹备委员会”,由TRZ担任

主任,委员会下设副主任、秘书长、会计及成员;二是登报宣传,以便长期失联的族人知晓修谱事宜,及时提供家庭人丁信息,确保其按时入谱、明晰宗族源流。

二是正式启动环节。根据早年 T 氏宗谱记载,T 氏宗族共有八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员的流动,统一登记人丁信息变得较为困难。由于宗谱一般十多年才能续修一次,每次编修都需要尽可能准确、完整地摸排人丁信息,纳入谱系序列。首先,成立了 T 氏宗谱编修组委会,作为宗谱编修筹备委员会的具体实施机构。TRZ 担任总领修,TSQ 担任主编,TYD 担任会计,一房至八房宗亲代表担任主事,各房主事再配备一定数量的采编人员。T 氏宗谱编修自 2012 年冬季开始筹备,2014 年 3 月正式启动,2015 年年底基本结束。其次,发布倡议书。倡议书详细阐述了编修宗谱的重大意义,并对牵头人基本情况以及捐款标准做出了规定。对于农民,不作捐款要求;对于公职人员、离退休人员、企业家、知名人士或有经济实力的族人,则倡议其捐款,数额不限。具体规定为:捐 500 元及以上者录名字;捐 1000 元及以上者赠本房宗谱一套;捐 3000 元及以上者赠宗谱汇编以及本房宗谱各一套;捐 5000 元及以上者赠全套宗谱;捐一万元以上者赠全套宗谱,另录个人简历;捐两万元以上或巨款者赠全套宗谱,并设专业版面介绍其个人情况。同时,倡议书中还提到,对于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做出一定成绩的人员,如本县域内科级、县域外处级、厅级等族人,可附个人简历;对于学业有成人员,如获得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人员,也将在宗谱中予以标注,以激励后人。最后,举办启动仪式。组委会于 2014 年清明节期间举办了宗谱编修启动仪式。仪式流程为:参加人员先在祖坟集中祭祖,然后到 T 府酒楼集中开会。在仪式现场,工作人员宣读了倡议书、介绍了增修内容,张贴了捐款光荣榜、优秀学子光荣榜、企业家名录及现代名人榜等。同时,对宗谱编修内容与时间节点提出了要求,对人丁信息、学历、功名、索引译注以及代表联系方式、信息登记截止日期等进行了详尽介绍与周密部署。

2. 编修中坚阶段:明确的责任分工

宗谱编修中坚阶段是整个编修工作的核心与主体,其主要工作量体现在人丁信息登记与审验等方面。人丁信息的准确是编修宗谱的前提,也是世系支流延续的关键,因此这一阶段耗费时日最多,牵涉人员、经费等问题也较为突出。在这一阶段,各房主事按照总体要求和时间节点,前往各自分工片区开

展工作,对人丁信息进行摸排、登记、核对。

一是人丁信息登记环节。按照分工原则,由八大房主事牵头负责本房本支系的人丁信息登记事宜,并有一定数量的采编人员提供辅助。通过上门入户、电话、微信等方式,登记相关人员信息。为了便于统计以及后期校对,登记过程中均按“宗房长辈、子辈、孙子辈、重孙辈”等世系树模式进行草稿登记。在时间序列上,早期宗谱成员登记顺序按照“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同治、民国”等朝代顺延记录,新登记人员则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公元纪年方式,并在不同时期按照天干地支确定人员出生年代和生日时辰。例如,顺接以前编修体例,自重公:乾隆戊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子时生;安治公:嘉庆庚申年九月初一日申时生;仁惠公:民国戊午年九月初七日午时生。之后,采用公元纪年方式,倩倩: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未时生,等等。

二是人丁信息审验环节。各房主事和采编人员按照各自分工,对人丁信息(含姓名字号、出生年月、学历程度、工作职位等)进行初步校对。由于本次编修是在上次编修二十年后重新启动,且面临交通不便、经费不足等问题——需要徒步采集人丁资料,手抄谱卷。此外,近年来外出人员增多、流动性较大,导致人丁信息登记阶段耗费时间较多,延缓了整体工作进度。尽管如此,各房主事与采编人员仍克服困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谱卷初稿,并及时进行了初步校验。六房主事 TYH 表示:“我们几个年龄较大的宗亲代表担任主事,负责牵头本房编修登记,然后分工到村民组,由采编人员上门登记、现场核实,尽量减少错漏。但由于工作量巨大,且采用传统手抄、手誊方式,难免出现差错。还有一些外地的、失去联系的、不方便上门的情况,我们就通过电话问询基本信息,如姓名、生辰、外迁地点等。由于对这些人群不太熟悉,报送人丁信息时可能会出现登记差错。”

虽然此次编修工作细致,T 氏宗亲也尽职尽责,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仍存在不少问题。谱卷汇总并形成样本后,根据 T 氏宗谱序言记载,该样本存在的错漏与不足主要集中在:名字反映不准确:许多宗亲名字未按字辈起名,或随母亲姓,或名字为两个字,而谱系中仅按本宗派立名;个人信息登录不全:应按名字,又名,出生年月,配偶姓名、生辰,生子女字序,学历,住址登录,外迁宗亲需注明外迁年份与地名,有功名成就者还可附录简短文字;校对不仔细:表现为校对时未逐字逐句逐页进行,而是笼统行事、一目十行,导致错漏较多。因为错漏一处字词,

就等于错漏一处历史。不过,经过后期多轮校验,这些问题均被及时发现并纠正。主编 TSQ 对此表示理解:“各房主事都是年龄较大的老人,有的都 70 多岁了,还在操心此事。家里人心疼他们,虽不好明确反对,但也会叮嘱他们注意身体。而且这些主事自身条件有限,知识水平不高,不会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有的反复折腾两三次,才最终把信息搞准确。原计划三年完成任务,现在提前一年完成,应该给予表扬,在宗谱里为他们记上一笔。”

3. 编修完结阶段:生成共享性价值

这一阶段主要包括定稿印刷与赠送售卖环节。一是定稿印刷环节。各房采编先将登记信息统一交由主事汇总,主事再将汇总信息转交主编审阅。随后,总领修与主编共同将汇总稿送至印刷厂制作清样。清样印出后,主编及相关宗亲代表再次进行详细校对,确保人员信息准确无误。整本宗谱定稿后,采用线装书形式印制。纸张选用不易腐烂、不易变色的宣纸;字体排版采用正楷体三号字,以便阅读与辨认;格式上采用概念树呈现,清晰明了。整本宗谱成文后采用线装书模式。从成文宗谱资料来看,整本宗谱通常比 A4 纸略大,封面采用古旧色设计,封皮选用牛皮纸——该材质不易沾染其他颜料,既显高端大气、古色庄严,也能保障宗谱长久保存、世代传承。例如,T 氏宗谱完整卷共有二十八卷,具体分布为:一至二卷是总卷,三至五卷是长房卷,六至十卷是二房卷,十一卷是三房卷,十二至十七卷是四房卷,十八卷是五房卷,十九至二十卷是六房卷,二十一卷是七房卷,二十二至二十八卷是八房卷。此外,在宗谱扉页,还登录了部分在宗谱编修中做出贡献人员或赞助较多人员的照片,以彰显他们对宗谱编修工作的支持。

二是赠送售卖环节。组委会在特定节日开展宗谱售卖与赠送活动,以推动宗谱在 T 氏家族内部流传。其中,清明时节是主要选择。一方面,族内在职人员恰逢放假,外出务工人员也会返乡祭祖;另一方面,农村留守人员尚未进入正式农忙阶段,各方人员齐聚,能够为活动营造浓厚氛围。售卖价格为内部定价,单房单本通常 600 元,总卷、整房宗谱 1000 元,全套宗谱 5000 元。赠送范围主要包括宗谱编修突出贡献人员,如八大房主事、部分采编人员、极少数年龄较大且健在的最年长长辈,以及其他赞助较多等特别贡献人员。具体赠送标准如前文所述:“捐 1000 元及以上者赠本房宗谱一套,捐 3000 元及以上者赠宗谱汇编以及本房宗谱各一套,捐 5000 元及以上者赠全套宗谱,捐 1 万元以上赠全套宗谱一

套,捐 2 万元以上者或巨款者赠全套宗谱”等。

赠送与售卖活动结束后,组委会在特定时间再次召集八大房主事及部分宗亲代表开会,公开本次宗谱编修的收支账目,以确保信息透明、账目清晰。组委会会计 TYD 表示:“每次开会,主事加上采编有好几百人。这些人参与其中,花费自然不少,但总体费用在可控、透明、公开的情况下明细各项收支。如收入中的赞助费、售谱款,以及会务、餐饮、差旅、印刷等费用支出,都详细列表在组委会内部会议公开。各房主事及宗亲代表都比较满意,达到了预期效果。”

四、民间传统文化复建的动员策略——非正式权力正式运作

T 氏宗谱编修作为一项民间传统文化活动,其运作流程与动员方式呈现出独特的实践样态。在此过程中,相较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农村社会长老权力、同意权力等非正式权力形态,此次编修较少依赖人情、面子、关系等非正式运作逻辑,更多采用体制内常见的正式运作方式。具体表现为三大特征:一是结构体系化的组织动员,二是价值认同导向的思想动员,三是内容包干式的责任动员。

(一)组织动员:结构体系化约制与层级化管理

修家谱、建宗祠是宗族凝聚的标志,表明族人不再是散沙无统理,而是有组织的^[17]。宗谱作为联结宗族成员子系统的关键载体,对宗族成员具有记录世系、教化思想、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虽然 T 氏宗谱编修属于家族、宗族内部事务,是民间自发行为,但在借鉴既往经验的基础上,其运作过程严格遵循体制性框架。在发起阶段,牵头人首先在省城召集宗族代表聚会,成立宗谱编修筹备委员会。随后,在长房宗亲的推动下,经过与各房代表的沟通与磨合,成立了宗谱编修组委会,下设主事及采编等岗位,分工到房支代表,再由房支代表细化任务到各家各户收集基本人丁信息,形成了以发起人 TRZ 为总领修(主任)、TSQ 为主编(副主任)、房支代表为主事的完整组织架构。TRZ 主任表示:“这套架构是我和 TSQ 商议后提出的初步意见,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可行,毕竟多年在体制内工作,多采用这种方式。形成初步意见后,与宗族其他成员简单沟通,就确定下来了。”

T 氏宗谱编修遵循组织体系规范,在完成人财物基础配备后,通过召开编修成立大会推进宗族内部思想统一。组委会依照会务标准组建专班,统筹会场布置、人员通知、嘉宾邀请等环节,并实施点对点接待与全流程跟踪服务。大会现场通过集体祭

祀、编修章程宣读、捐款标准议定等仪式化程序,严格参照体制内常规会务流程执行,确保活动有序开展。项目推进采用“三阶段控制法”:将总体时间规划与分段节点控制相结合,针对人丁信息登记、审核校对等核心环节,均制定明确操作标准。通过将宗族成员纳入组织架构,构建网格化管理格局,形成“非正式权力正式运作”的行动策略。在资金筹措方面,组委会依据家庭代表的身份类型、职业特征及经济实力差异,制定差异化捐款标准。后续工作中,通过定期召开汇报会、碰头会等机制,持续强化流程规范性与执行透明度。整个修编过程突出“四统一”原则,即标准统一、节点统一、内容统一、字派统一,最终在组织体系内高效完成宗谱编修工作。主编 TSQ 回忆道:“整个动员过程,我们依托体制内经验,遵循组织规章的基本路径和行事原则,明确人员、岗位和职责。两位牵头人更是经常沟通、碰头,事无巨细。真正启动的时间有限,特别是动员大会当日的各项议程,都提前安排、彩排好,毕竟邀请了镇里和县上的一些领导到场,他们对细节要求较高。”

(二)思想动员:价值认同性分享与地方性知识内化

宗谱是传承家风家训的主要载体,是宗族内部探本溯源、理顺宗族支流脉系的依据,更是增强宗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根本依托,能够在心理层面实现宗族人员的价值认同与心理共鸣。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认同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随着时间和情况的变化,这些认同各自轻重分量也会变化,它们有时相辅相成,有时也会彼此冲突”^[18]。李文治等人研究指出,宗族制是以血缘为核心的家庭共同体,包括以孝悌伦理为主的思想意识结构、实现孝悌伦理的组织机构(设置族房长,建祠修谱,制定族规)以及为聚合族众追宗祭祖而设置的祭田^[19]。在宗族传承方面,“中国人注重历史、崇拜祖先,时刻想到自己是从祖先那里来,要传到子孙那里去,于是,在‘上有老、下有小’的血脉联系中,忠实于自己的家庭,心灵受到安慰,得到安顿”^[20]。因此,在宗谱编修发起阶段,全体宗族人员统一认识,积极响应编修宗谱的提议;在中坚阶段,主动配合宗族代表开展人丁信息登记;在编修完结阶段,支持组委会完成售卖、赠送等工作。从而实现宗族成员内心认同的价值共享以及文化传承上的集体观念,形成地方性道德观念与地方性知识的内化与自觉。

组委会的宣传策略强调,宗谱作为同宗共祖的

血缘世系载体,记录了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人物事迹及风土人情等内容,既反映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与自然变迁,又记录家庭随时代演进的历史印记,旨在激发宗族成员的内在认同与行动自觉。例如,倡议书提出:T氏作为名门望族,人丁兴旺。今为祭祀祖宗、聚族旺宗,启动修编工作。由于修编宗谱需要一定资金,望各位族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智出策,齐心协力办好这一族人的大事。谱卷中还提到:为彰显捐款者对修谱工作的支持和厚爱,在编修中专设一卷“功德卷”,以作永久纪念。八房主事女儿 TY 认为:“宗谱编修的作用及能否凝聚族内成员尚不确定。我父亲都 70 多岁了,身体不好,那段时间却整天忙于此事,上门收集资料、登记和核对人丁信息。我们心疼他,劝说无果后,便一起帮忙,也算帮他完成了心愿。”

(三)责任动员:内容包干性承诺与委托—代理制表达

由上文可知,无论是发起阶段的组织层级化构建、中坚阶段的人丁信息登记与审核,还是完结阶段的宗谱赠送与售卖,均在宗谱编修组委会统筹协调下推进。过程中充分发挥八大房主事在宗亲、房支层面的影响力,通过委托—代理模式推进精细化基础工作:其一,在宣传动员方面,八大房主事及采编人员以宗支代表身份,按分工负责本片区、本房支人员的思想引导,推动形成共享观念;其二,在信息采集与资金筹措环节,通过动员宗支派系及家族成员广泛参与,以出钱出力的实际行动,体现其对宗谱编修工作的认同与宗谱文化的内化。八房采编 TFC 回忆:“我参与了组委会代表会议,明确了修编原则、标准与时间。在主事牵头下,我们房的采编都很积极,按包干的村、户登记人丁信息。只觉得这是自家事,又在组织统一管理下,怕拖后腿,所以都尽心尽责。”

这一行动过程中,八大房主事需按要求将组委会分配的任务细化,再分包给采编人员;采编人员通过上门入户或电话问询完成信息登记,审验校对环节亦遵循此模式。简言之,该阶段在组委会领导下实行包干制:各房主事作为本房支“总承包人”,承接总领修、主编委托的事务,再分配给房内采编人员,要求其按时完成。这一运作模式体现出明显的委托—代理特征。五房采编 TD 则表示:“这么大的活动需要很多人参与,只要调配合理就能拧成‘一股绳’。要是这时候打退堂鼓、拖后腿,在族里会失信于人。所以即便没明确责任到人,大家心里都认可这事,愿意多做些。”

综上,本研究聚焦宗谱编修的三种主导性动员方式:组织动员、思想动员与责任动员。这些方式充分彰显了族内成员的责任感与执行力,核心是通过结构化组织、价值观引导及责任包干机制,激发宗族成员的归属感与自主参与意识。尽管体制内的正式动员包括奖惩动员、法理动员等类型,但本研究基于行动者视角,重点呈现了上述三种动员模式。同时,该系列动员策略的深层目标,是构建宗族成员的“自我组织”机制——通过获取宗族群体的价值认同、道德肯定与舆论支持,推动地方性知识的共享与传承。在此过程中,宗族成员形成了“自己的事自己办”的行动逻辑,以高度的责任心与实践感主动参与宗谱编修,在思想认知与实际行动上摒弃了“搭便车”、出工不出力等投机行为。

五、结论与启示

文章以宗谱编修为例,从价值中立视角分析民间传统文化复建的社会事实与生产动员机制,重点呈现行动者遵循的“非正式权力正式运作”实践路

径。需说明的是,本文无意评说宗谱编修的社会意义、家族情感及历史传承等符码价值,而是聚焦其生产动员过程,揭示农村社会推进具体事务的集体行动逻辑,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实践参照(详见图1)。通常而言,宗谱编修、祠堂修建等家族事务属于村民自治范畴,本应由家族领头人依托村规民约、习俗惯例以及人情、面子等非正式手段开展动员。但实证观察发现,在实际操作中,这类事务却采用了体制内通行的组织化运作模式:成立专项组织、开展思想动员、召开工作部署会、明确任务节点与质量标准,并构建起网格化、层级化的组织架构与委托—代理责任体系。这种融合组织化动员、思想性动员与责任制动员的运作方式,与基层治理中正式权力的行使逻辑高度契合。该模式有效规避了传统集体行动中“搭便车”、磨洋工等投机行为,理论上拓展了正式权力运作的研究边界,实践中则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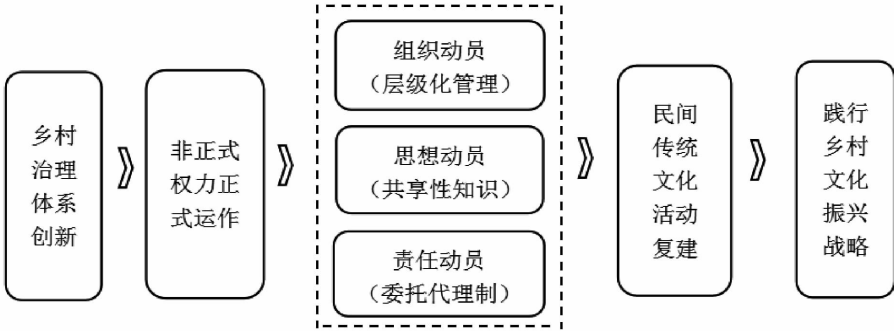


图1 非正式权力正式运作的行动逻辑图景

其一,激活乡贤群体治理动能。新时代乡贤兼具现代思维与文化、社会资本,其乡土情怀与反哺意愿在乡村产业振兴、文化记忆复兴中具有示范作用。基层组织需积极引导乡贤参与治理,推动人才与资本回流,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其二,释放传统文化符码的现代性价值。宗谱、祠堂等文化载体蕴含历史智慧,对重塑农村价值体系、凝聚宗族共识、增强文化自信意义重大。基层组织应依托这些文化符码,构建集体行动者的共享思维与知识网络,形成价值认同与行动合力,推动乡村治理创新。

其三,以实践例证助力治理现代化。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困境是治理难题,而本案例显示:通过共有价值引领与共享知识构建,可有效规避投机行为。这一行动模式与玛丽·道格拉斯阐述的制度性思维相契合,即“制度不能建立在功利性或实用性的基础之上。恰恰相反,制度必须建立在人们都

能接受的基本的理念规范之上,而这种理念规范常常是隐含在自然或自然世界中”^[21]。可见,塑造共享观念、构建知识体系并将其制度化,是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路径。宗谱编修等传统活动的实践验证了该模式的有效性,可为基层治理提供重要参考,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37-38.

[2] 曼瑟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 郭宇峰, 李崇新,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6-61.

[3] 朱丽莉. 陕西当代新修族谱的编纂及其史料价值[J]. 青海民族研究, 2013(3):138-143.

[4] 朱贻庭. 解码“慈孝文化”[J]. 道德与文明, 2009(3): 36-38.

[5] 多贺秋五郎. 中国宗谱[M]. 周芳玲, 阎明广,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188-204.

- [6] 冯尔康. 中国宗族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261.
- [7] 张星久, 陈青霞. 从族谱看传统政治思想的民间表达与实践[J]. 江苏社会科学, 2019(6): 232-260.
- [8]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92.
- [9] 孙立平. 现代化与社会转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60-382.
- [10] 刘凤萍, 李海金. 自主性与组织力: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形态与效能研究: 基于赣南 F 村 4 个社会组织的比较分析[J]. 地方治理研究, 2023(3): 51-63.
- [11] 李怀. 争夺城市空间: “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制度分析: “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民族志观察[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1): 10-22.
- [12] 陈继. 新时代村级干部正式权力实践过程的运行逻辑[J]. 农村经济, 2021(11): 86-94.
- [13] 黄宗智. 集权的简约治理: 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半正式基层行政[J]. 开放时代, 2008(2): 10-29.
- [14] 金江峰, 吴春来. 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半正式行政”: 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2): 68-76.
- [15] 刘志家. 浅谈新时代家谱编修的创新: 以重修《弼佐刘氏家谱》为例[J]. 福建史志, 2020(3): 53-56.
- [16] 胡宇浩, 倪丽娟. 家谱档案价值发掘路径探究[J]. 山西档案, 2021(6): 107-112.
- [17] 冯尔康, 朱凤瀚, 刘敏, 等. 中国宗族社会[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271.
- [18] 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 程克雄,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21.
- [19] 李文治, 江太新. 中国宗法宗族制度和族田义庄[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7.
- [20] 杨宜音. 当代孝道蕴含何种内涵[N]. 北京科技报, 2005-02-23(3).
- [21]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8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Formal Operation of Informal Power: Production Mobiliza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Folk Tradit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

— Take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 Genealogy as an Example

CHEN J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such as genealogy, ancestral halls, and temples in rural society plays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mong them, genealogy,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lan bloodline inheritance, is the core basis for clan members to trace their roots and origins. The continuation work of genealogy that emerged in rural areas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reflects both attachment and pursui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s well as a deep interpretation of nostalgic memories. The process of compiling and mobilizing it presents a diverse form of informal power operation in the local field, reflect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lan governance. In light of thi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 family genealogy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its practical path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clan authority framework and adopting new operational methods such as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mobilization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local sentiment of Xinxiang elites, the cultural code value of genealogy, and the concept of shared culture, which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solving the “free riding” dilemma of rural collective action and avoiding speculative behavior, providing cultural support and value guida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Key words: folk traditional culture; reconstruction process; mobilization strategy; rural governance; informal power formal operation

小三线建设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以上海八五钢厂为例

李 云¹, 朱孟远²

(淮北师范大学 1.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作为上海小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八五钢厂不仅为国防战备作出重要贡献,也对贵池地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该钢厂填补了贵池钢铁产业空白,加强了上海与贵池两地经济协作,密切了人脉联系,并通过提供就业岗位、完善基础设施等途径改善了当地民生,进一步促进两地的交流与融合。然而,受市场环境变迁、资源禀赋限制及区位优势等因素影响,昔日辉煌的八五钢厂最终走向衰落。深入剖析其衰落原因,对贵池在后续同类工业建设中规避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亦为区域产业规划与战略调整提供启示。

关键词: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贵池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11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66-06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此时中苏关系已彻底破裂,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周边国家也不断向中国挑起事端。中央领导层决定实行以备战为目标的国防三线建设,将沿海各地的工业、国防相关科研机构及部分专业院校迁往内地,建设后方工业基地,促进我国工业布局的合理化和均衡化。“调整一线,建设三线,改善工业布局,加强国防,进行备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富有远见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1]三线建设分为西南、西北地区的大三线建设和沿海各省市的小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初期以军事备战为首要目标,进入 70 年代以后,其发展进程逐渐突破单一备战功能的局限,对项目落地区域的工业体系构建与城市化演进产生了显著的带动效应。因国防需求,上海按照国家小三线建设部署,在安徽贵池布局建设一批小三线企事业单位,其中,八五钢厂建设项目作为一项重点工程,对贵池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目前,学界现有研究多以宏观区域为单元^①,聚焦具体企业、剖析企地互

动关系的成果较少,该领域研究存在拓展空间。文章以八五钢厂为个案,拟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梳理其在贵池的建立背景与发展历程;剖析其推动贵池工业、基建及社会结构变迁的表现;总结其衰落原因并进行针对性反思,以期为类似区域发展及企业与地方互动研究提供参考。

一、八五钢厂在贵池的发展历程

贵池地区的小三线建设单位主要集中于梅街、棠溪山区,总数达 14 家。八五钢厂作为上海小三线规模最大的企业,基于国防、资源、区位等综合因素考量,选址于贵池梅街。在八五钢厂的发展周期中,其先后经历了勘探选址、建成投产与调整交接三个关键阶段。

(一)1968—1969 年为勘探选址阶段

钢铁厂是小三线建设的重点领域。毛泽东强调:“小三线没有钢厂,不行”,“最好一个省搞一个”^[2]。1968 年 3 月,全国小三线建设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要抓紧”的一

收稿日期:2025-07-12

基金项目:2023 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长三角一体化视阈下的小三线建设与区域经济研究(1964-2022)”
(2023AH050300);2023 年度国家社科一般项目“三线建设时期西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23BMZ019)

作者简介:李云(1978—),女,安徽淮北人,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三线建设史。

系列指示。1968年6月1日至11日,上海市革会贯彻全国“六八·三”会议精神,召开上海小三线工作会议。经研究,计划在1969—1971年三年内,于上海后方基地建设特殊钢厂、“57”高炮生产厂及“57”高炮弹生产厂等项目。上海相关部门随即启动了后方基地的勘探与选址工作。1968年8月5日,上海冶金局根据工作安排组织了上钢五厂、钢铁研究所、冶金设计院、水文地质大队和市政设计院等单位参加钢厂选址工作。八五钢厂作为上海小三线建设规模最大的企业,最终选址在贵池梅街,其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地理位置优越。贵池梅街乡距离上海市区约510公里,作为战备后方远近适中。

其次,贵池县的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的金属矿有铜、铁、锰、铅、锌、钨、金银等,非金属矿有硫、磷、煤、萤石、硅石、花岗石、白云石、石英、大理石和水泥石灰石等12种。全县矿藏储量,据初步估算为:铜6.6万吨、(金属量)铁473万吨、锰227万吨、钨195万吨、金铁矿石12万吨、硫铁1031万吨、煤3920万吨。”^[3]

此外,流经贵池县的河湖众多(包括黄盆河、秋浦河、九华河和青通河等),水资源充足,可满足工厂生产的用水需求。境内长江可通航,对外交通方便。

最后,贵池依山为屏,地势隐秘,符合“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要求。

(二)1970—1984年为建成投产阶段

八五钢厂共有炼钢、锻造、轧钢和拉管等八个车间,1969年开始进山筹建,拟定在1970年4月26日炼出第一炉钢。投产后,根据产品定位不同,该厂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1970—1978年的军工生产时期和1979—1984年的军民品生产结合期。

在军工生产时期,八五钢厂作为一个集炼钢、轧钢、化工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冶金工厂,其产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全国各地,为国家的国防建设贡献力量。“八五钢厂名义上是钢厂,实际上是为军工配套的毛坯件厂,其中有一个车间专门加工炮管,为五七高炮生产过炮管。”^{[4]5}八五钢厂以生产特种钢为主,配套的基础设施完善,除了自身具备的各类车间外,还有专门的运输车队“683”车队和专用码头“507”码头。

1979年前后,随着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及国家发展方针的调整(从“备战”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八五钢厂逐渐由单一的军工生产,转向“军民品生产相结合”的模式。1980年,国家压缩国防支

出,军工生产任务急剧下降,小三线厂陆续转产民品。八五钢厂亦是如此。“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自筹资金并投资245万元把原轧钢车间扩建改造为30250/300轧机,生产当时市场急需的08M/M12M/M四钢和线材,并根据锻材任务严重不足的情况,把原军工三辊工段改建为拉丝工段,生产01-6M/M滚珠轴承钢、缝纫机针钢丝以及低碳结构钢丝等产品。”^[5]

(三)1985—1988年为调整交接阶段

八五钢厂规模较大,交接工作也比较复杂。根据原八五钢厂第一副厂长许汝钟与原上钢五厂厂长侯树庭的口述回忆,这一交接工作不仅涉及资金调配、设备迁移等财务与实物内容,还需充分考虑工人返沪后的安置事宜^[6]。经过沪皖双方的多次协商,八五钢厂的具体交接工作最终开展如下。

上海市政府于1985年10月宣布将八五钢厂职工整体纳入上钢五厂。1986年,八五钢厂与地方接收方正式启动交接工作,并在该过程中采用动态交接的实施方式。1986年1月,上海市政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规定,将八五钢厂7000万元固定资产全部交由安徽省贵池县接收,5000多名职工分期分批返沪。1986年3月27日,沪、皖双方本着团结协作、平稳过渡的原则,采取“先进后出”的办法,即安徽方面先派一批管理人员和工人进厂熟悉情况、接受技术培训,上海方面待安徽人员适应后再逐步撤出原有团队。1987年12月28日,在贵池县委小礼堂内,原上海八五钢厂厂长庞耀昌和贵池县人民政府代表张泽海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完成八五钢厂的交接工作。1988年1月1日,上海八五钢厂与安徽省贵池钢厂举行换牌仪式。

历经3年交接筹备,八五钢厂正式转交于安徽省管辖,更名为贵池钢厂,其企业属性也从国营军工企业转变为地方性民用钢铁生产企业。为保障贵池钢厂生产运营的平稳过渡,上海八五钢厂、马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马钢”)和贵池三方协定:首先由马钢对贵池钢厂实施为期三年(1989—1991年)的承包经营,待运营机制逐步稳定后,再移交贵池地方政府进行自主经营。然而,自1996年起,因原材料价格上涨、流动资金紧缺、运输成本高昂等原因,企业连年亏损处于半停产状态,于1999年5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正式宣告破产。

二、八五钢厂推动贵池地区的发展

从企业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八五钢厂对贵池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其一,推动贵池钢铁产业从无到有,实现关键跨越;其二,强化贵池与上海之间的

联系,搭建招商引资平台,拓展外部资源引入渠道;其三,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条件,提升生活质量。

(一)实现贵池地区钢铁业的从无到有

在农业“以粮为纲”的年代,贵池因耕地资源少,农民普遍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在此背景下,发展工业、兴建钢铁厂几乎无从谈起。然而,八五钢厂的建设实现了当地钢铁产业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八五钢厂带来了先进设备和专业人员。八五钢厂系由上钢五厂抽调人员赴贵池包建的后方军工配套单位。在该厂建设初期,上海市的技术力量、资金资源与专业人员均向贵池地区集中投入,为工厂筹建提供支撑。“1969年11月24日,冶金部批复上钢五厂革命委员会八五工厂筹建组:上海后方五〇七工程八五钢厂建厂方案已由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规模年产钢3万吨,人员4650人,总建筑面积124400平方米,投资在5000万元以内。投资包括搬迁设备在内。”^{[4]237}八五钢厂移交给贵池后,成为安徽省仅次于马钢、合钢的第三大钢铁企业,被安徽省冶金厅列为地方冶金骨干企业,“拥有电炉、电渣炉、锻压、轧钢、铁合金、冷拔无缝钢管等成套设备,具有年产钢5~6万吨,硅铁2400吨,冷拔无缝钢管6500吨,锻材1.5万吨,轧材10万吨生产能力”^{[7]161}。

贵池钢厂为当地钢铁工业发展树立榜样。1988年,八五钢厂正式易名为贵池钢厂。1991年,贵池钢厂正式转交贵池地方政府接管经营。此后,贵池钢厂主动适应市场环境变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经营策略,积极探索转型路径,谋求自身持续发展。“1992年,贵池钢厂以市场为导向,生产不锈钢管新产品;1992年12月10日至15日,贵池钢厂在黄山市新安江宾馆隆重召开的九三年产品订购会上,超额完成了明年全年的销售合同订签任务。”^{[8]250}“1993年有职工1336人,产钢3.8万吨,销售收入11506万元,实现利税509万元,利税、销售收入分别居池州地区企业的第一、二名。”^{[7]161}“1996年,贵池不锈钢首批钢带销往浙江,钢厂发展进入新阶段。”^{[8]292-293}

贵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实现当地钢铁业的新发展。在国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背景下,“1995年,由李氏三兄弟投资100多万元的贵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主要生产以轴承钢、齿轮钢、低合金钢为主的特种钢材。至2000年底,有职工100多人,固定资产1231万元,实现产值1500万元,利税220万元”^{[7]161}。2009年5月5日,时任市委副书记的张

曙光在实地调研时指出:“坚定投资信心,抓住国家的优惠政策,把贵航特钢项目打造成为贵池乃至池州工业发展的脊梁。”^[9]2013年,“在公司董事长李玉仁带领下,企业找准产品定位,顺利实现易地搬迁改造建设年产100万吨特钢项目”^[10]。如今,贵池前江工业园区已形成以该企业为龙头的特钢产业集群。

(二)加强贵池与上海地区的联系

八五钢厂坐落于贵池梅街,但隶属于上海,其在日常运营中通过物资调配、人员派驻等跨区域协作,无形之中加强了贵池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同时积累了一定的跨区域人际资源。

首先,八五钢厂注重与贵池开展密切的经济协作。在建成投产时期,八五钢厂本着“厂社结合、援建地方”的原则,积极支援当地经济建设,形成企地互助的良好格局。“1973年7月28日,本厂与地方102个单位有协作关系,支援地方工业93个品种,发生金额17.8万元。地方也大力支持了本厂。”^{[4]247-248}小三线职工还积极引导贵池当地群众突破单一农业生产的局限,鼓励其兴办地方企业以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并明确表示,若地方在兴办企业过程中存在需求,三线厂将提供相应支持。这一引导行为不仅有助于转变当地群众的传统思维方式,更对培育其市场经济意识与经营理念具有积极作用。1985年1月,“上海市委确定以汪道涵市长为团长,朱宗葆副市长为副团长的上海市政府代表团出访华东四省,商谈经济技术合作。到安徽谈两件事情,即经济技术合作和小三线交接”^[11]。1987年11月25日,贵钢党政领导邀请当地区乡领导座谈,以加深企业与当地的联系,密切经济合作。座谈结束,姜宗良说:“我们牵线搭桥,搭的是团结合作、共同前进、友谊长存之桥。区乡经济要借钢厂的翅膀腾飞,钢厂要利用当地资源‘下蛋’,互相支持,共同努力,把贵池经济搞活。”^{[8]215-216}

其次,八五钢厂为贵池当地的招商引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搭建了有效平台。该厂不仅为贵池留存了厂房设施、资金储备等有形资产,更通过长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产业资源与合作网络,为后续地方招商引资提供了重要支撑。1988年,由八五钢厂等小三线单位集资筹建的“贵申水榭”落成,这是贵池与上海两地情谊的见证,有利于贵池获得上海各界的经济援助。正如上海机电局局长李嘉康所言:“你们贵池在上海有一万多个耳目。一万多张嘴为你们说话,有一万多双眼睛为你们观察行情,有一万多双耳朵为你们打听信息,有一万多双腿愿意

为你们跑路，有一万多颗心在关心着贵池人民。”^{[8]233-234}依托贵申情谊，在上海老朋友的帮助下，贵池与外界达成了许多经济合作项目，如生产双生筷子的合资项目、“力士可乐”饮料项目、加工火车轮轴项目等。

（三）改善贵池梅街人民的生活

通过系统性建设，八五钢厂有效提升了当地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丰富了其精神文化生活，使梅街一度享有“小上海”的美誉。

“通水、通电、通路”的“三通”建设。贵池地处皖南山区，受地理条件限制，早期存在供水设施不完善、交通出行不便等问题。而八五钢厂的落户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状况，缓解了此前用水与出行的困境，为区域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钢厂在当地铺设水管，解决老百姓吃水用水难的问题。原来的泥泞小路变成了沙石路，水泥桥和电灯也相继出现^{[4]30-31}。由此可见，八五钢厂在为职工及车辆的出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便利了梅街民众的出行。

日用品种类的多样化。在计划经济时代，日常生活用品非常有限，而且要凭票购买。但是八五钢厂职工依托单位分配或内部供应渠道，获取香烟、肥皂、洗衣粉、白糖等基础日用品，再以这些物资为交换媒介，从农民手中换取粮食、蔬菜、家禽等农产品。这种互助性交换模式突破了计划供给体系的局限，使当地农民得以便捷获取此前难以接触的日用品，有效改善了基本生活条件。此外，“梅街人穿衣服都是紧跟上海最新潮流，外面买不到的‘的确良’面料，梅街能买到；吃的更是如此，70年代就能吃上带鱼等海产品，吃上冰棒”^{[4]110}。如果没有八五钢厂，这些在当地不可能出现得这么早。

为当地提供医疗服务。“长江医院是皖南小三线建设者的医疗后勤保障基地之一，主要为八五钢厂等贵池境内三线厂服务。”^{[4]95}但当地群众若有重大疫病，该院也会积极救治相关患者。“长江医院一直以救死扶伤、服务群众为宗旨，所有病人来就诊都是先看病、后给钱，不少百姓经济困难，免除了医疗费用。医院医生还主动到交通不便、行动不便的村民家上门就诊。”^{[4]96}因此，小三线职工和当地群众的关系就更加紧密，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

带动部分就业。八五钢厂初建时，因厂区基础设施建设（含配套水利设施修建、厂区场地平整、山地开垦等工程）需大量劳动力投入，为当地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就业渠道。彼时，部分贵池本地群众通

过参与钢厂基建工作成为临时务工人员（即“小工”），主要承担修坝筑堤、山地开垦、土方开挖等基础性体力劳动，成为钢厂初建阶段基建队伍的关键补充力量。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工资也都很规范，“一天8小时，到时间就收工。到月就给钱，从不拖欠”^{[4]30}。原八五钢厂04车间工人许春华回忆：“兴建八五钢厂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改变，钢厂的存在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招录一些本地人进厂做小工。再者，我们种的蔬菜也有了销路，总之，我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4]67}可见，八五钢厂通过提供规范化就业岗位、保障稳定收入、拓展农产品销路等多重路径，切实改善了贵池本地居民的生活条件，推动了区域民生水平的显著提升。

丰富当地娱乐生活。八五钢厂位于山区，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会定期放电影、看电视，这些娱乐活动开阔了当地人的眼界。据原上海八五钢厂副厂长兼工程师许钟汝回忆：“我们有专门的电影放映队，农民都来看，最远的来自30公里之外。他们有些人从来没看过电影。”^{[4]45}而且，“这时候的观众，早已不分上海人、本地人，更无论是城里人、农村人，共同的精神文化需求，暂时替代了文化、生活习惯的地域差异的现实”^[12]。此外，厂里还时常举行文艺汇演，由年轻人参与表演唱歌、跳舞等节目，以供职工或农民观看。如此，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多了一份共有的连接，彼此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推动当地文明建设。八五钢厂在贵池建立了一所“八五子弟学校”，不仅解决了职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还有助于改善当地教育资源供给。“每年‘六一’儿童节，钢厂都会组织‘八五子弟学校’的教职工和学生到本地学校搞联谊，给学生免费理发，发奖状、本子、铅笔，讲故事，开展打球、拔河和赛跑等娱乐活动。”^{[4]111}钢厂图书馆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许来祥就是受益者之一。他回忆道：“《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到第四版我都是在钢厂图书馆借阅的。后来钢厂撤走时，图书馆管理员还送了我一套《毛泽东选集》和《列宁选集》。”^{[4]112}此外，征地工在与上海职工朝夕相处中，一些人学会了上海话，逐渐形成规章制度意识，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对当地的文明建设具有推动作用。

综上，尽管八五钢厂已不复存在，却为贵池留下了丰厚资产。既包括钢铁、生产设备、厂房设施、水电供应系统、道路交通等有形资产，也涵盖生产技术、工作作风、人际交往准则等无形资产。这些资产构成了贵池长远发展的坚实根基，同时也是上海小

三线建设价值的具体呈现。

三、对八五钢厂命运的认识与反思

前文已详尽论述了八五钢厂对贵池地区的积极影响,下文则对钢厂在建设及运营期间的问题展开反思,深入剖析,汲取经验,进而为当地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借鉴。

(一)对八五钢厂命运的认识

攀枝花钢铁厂作为西南三线建设的重点钢铁工程,自建设以来,在区域工业发展、国防保障等领域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同为三线建设背景下的钢铁企业,八五钢厂的发展轨迹与最终命运却与攀枝花钢铁厂存在显著差异,导致这一差异的核心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战略定位不同。攀钢立足于振兴西南,开发西部,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 21 次提到三线建设和攀枝花建设,其中明确提到攀枝花的就达 6 次。”^[13]八五钢厂则是隶属于上海小三线建设系统的企业,主要依托上钢五厂援建,自身生产能力有限。因此,当钢厂交接给贵池自营时,由于贵池地方缺乏匹配的技术、资金支撑,难以弥补钢厂自身生产能力的短板,其发展前景每况愈下,最终于 1999 年破产。

其次,区域资源不同。攀钢至今仍是我国钢铁业的翘楚,得益于其所在地的资源优势。“攀西地区已探明钒钛磁铁矿储量达到 100 亿吨,占全国同类型铁矿储量的 80% 以上,其中钒的储量占全国的 87%,钛的储量占全国的 92%。”^[14]相较之下,贵池地区的矿产资源禀赋远不及攀枝花,资源储备与开发条件均不突出。这种资源层面的短板,使得八五钢厂在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与成本控制上缺乏持续支撑,进而难以维系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最后,品牌知名度不同。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攀枝花钢铁厂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型钢铁企业,其钒钛磁铁矿的综合应用在全国范围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较之下,八五钢厂规模较小,且仅作为军工产品的配套工厂,服务范围也仅限于当地及周边地区,因此在拓展市场、吸引客户方面相对处于劣势。

(二)对八五钢厂命运的反思

八五钢厂作为上海小三线建设规模最大的企业,在军工产品制造领域贡献显著。但在后续发展中,该厂亦暴露出许多问题。如“生产车间分布在不同方向的几个大山冲里,水电煤气和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太高,加上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之后,原材料价格上涨、流动资金紧缺等,同时人才战略眼光滞

后,转型升级理念较苏浙沪地区落后”^[15]。

为规避类似八五钢厂的产业发展问题,贵池产业发展应从以下三方面着力。其一,选址要精准。产业选址作为区域产业发展的基础前提,需综合评估选址区域的资源禀赋、交通配套、生态承载能力及长期发展潜力等因素,同时摒弃短视行为,从源头降低因选址不当导致的运营成本过高、发展空间受限等风险,为区域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其二,人才战略要具有前瞻性。贵池应充分依托毗邻上海等长三角发达城市的地缘优势,主动搭建与发达城市的人才交流合作平台,并结合贵池产业发展实际需求,针对性培育一支具备先进技术能力、创新思维与行业视野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其三,当地小三线遗产要活化。依托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结合本地特色发展旅游业成为时代趋势。具体到贵池梅街,即依据八五钢厂等小三线工业遗产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例如建设上海小三线历史展览馆、开设三线文化研学课程等。这一举措不仅能够有效保护小三线遗址,还能提升公众对三线文化的认知,弘扬艰苦创业、勇于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为贵池的产业发展注入文化动能。

综上所述,八五钢厂在贵池经历了勘探选址、建成投产和调整转交三大阶段,并在各个阶段积极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任务。一方面,作为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大型企业,八五钢厂联动贵池其他小三线建设单位,以国防战备为目标进行军工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钢厂始终秉承支援后方、建设地方的理念,在贵池兴建了一系列基础工程,助力贵池发展。从企业与地方发展的理论视角出发,贵池充分利用以八五钢厂为典型代表的小三线建设留下的各类遗产,以推动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此外,八五钢厂的命运并非孤立个案,众多小三线工厂均面临类似处境,但这并不能否定八五钢厂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通过对其发展轨迹及最终命运的深入反思,总结其中蕴含的经验与教训,有助于实现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区域发展提供具有借鉴价值的思路与方法。

注释:

①参见以下文献:段伟:《安徽宁国“小三线”企业改造与地方经济腾飞》,《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李云,张胜,徐有威:《安徽小三线建设述论》,《安徽史学》2020 年第 5 期;李云,徐有威:《后小三线建设时代的企业与地方经济:以安徽池州为例》,《学术界》2022 年第 1 期;张胜:

《小三线建设中厂办集体企业研究:以安徽为考察对象》,《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2期等。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33.

[2]陈发兴.小三线钢铁厂冶金军工史(1965—1986)[M].未刊,1989:74—75.

[3]贵池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池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4:145.

[4]贵池区委党史研究室,贵池区委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小三线在贵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

[5]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M].(内部资料),60.

[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331—353.

[7]池州市贵池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池市志(1988—2000)[M].合肥:黄山书社,2009.

[8]中共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大学文学院.安徽池州地区上海小三线档案报刊资料选编[M].(内部资料)

2017.

[9]程昭.张曙光在贵航金属制品公司调研时强调:解放思想 坚定信心 打造贵池工业旗舰[N].(2009—05—06)[2024—10—27].<https://www.chizhou.gov.cn/News/show/54995.html>.

[10]伍晶晶.贵航金属:一家企业带动一个产业[N].(2013—04—11)[2024—10—27].<https://www.chizhou.gov.cn/News/show/28258.html>.

[11]中共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大学文学院.安徽池州地区上海小三线口述史资料汇编[M].2017:28.

[12]路岐.难以抹去的青春痕迹:我与上海“小三线”[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2016:139.

[13]宁志一.论开发建设攀枝花战略决策的形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3):44.

[14]四川省攀枝花市志编纂委员会.攀枝花市志[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48.

[15]徐有威,陈东林.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四辑)[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249.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Small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Guichi:
A Case Study of the 85th Steel Plant

LI Yun¹, ZHU Mengyuan²

(1. School of Marxism,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2.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Anhui 235000, 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hanghai’s small-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the 85th Steel Plant not only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national defense and combat readiness but also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Guichi. It filled the gap in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of Guichi, strengthened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nterpersonal ties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and improved the local people’s livelihood through such approaches as provid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upgrading infrastructure,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two regions. However, it declined due to market changes,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locational disadvantages. Analyzing its decline offers critical insights for Guichi to avoid risks and pursu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subsequent industrial projects, providing lessons for regional industrial planning and adjustment.

Key words:Shanghai’s small-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85th Steel Plant; Guichi

• 71 •

《黑神话：悟空》的跨文化传播探赜

王起扬¹, 潘钰霖², 孔 瑞^{2*}

(1. 北京语言大学 信息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3; 2. 山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1)

摘要:《黑神话：悟空》的全球火爆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化迅疾传播,“神话母题激发互鉴—文化符号双向转译—古建活化交互体验”的层层递进跨文化传播体系有益于消融文化差异,激发文明互鉴。“拯救与复生”的神话母题激活中西文化共鸣,在跨文化传播中实现深层价值观互鉴。“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构建跨文化转译传播的符号桥梁,达成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可理解性创造性转换。中国古代建筑通过数字活化技术得以生动复原,世界受众通过具身交互式沉浸体验生成文化认同。

关键词:《黑神话：悟空》; 跨文化; 传播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12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72-06

2024年8月,中国3A游戏《黑神话：悟空》发布后迅速火爆全球,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化迅速传播,开辟了中国文化以现代传媒方式多模态、创新化的出海路径。该现象级游戏不仅激发了世界多元受众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还引发了国内外学界诸多领域的研究热潮,学界或从比较文学的形象学视域^[1],或从中国游戏的“民族性”视域^[2],或从文化研究的中国文化自信视域^[3],或从传播研究的现代国际传播视域^[4],或从产业研究的文化产品推介视域^[5]等方面开展研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为中华文化国际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路径,《黑神话：悟空》通过构建“神话母题激发互鉴—文化符号双向转译—古建活化交互体验”体系,形成层层递进的跨文化传播机制:神话母题作为跨文化叙事原型搭建情感共鸣基础,文化符号双向转译作为桥梁实现精准传播,古建活化交互体验深化文化认同,“基础—桥梁—深化”机制构建了跨文化传播递进式创新体系,有益于消融文化差异、激发文明交流互鉴。在叙事内核维度,基于“拯救与复生”的神话母题激活中

西文化的精神共鸣,神话母题既承载着中国佛教渡劫成佛的修行哲学,又暗合西方基督教救赎原型,在跨文化传播中实现深层价值观互鉴。在文化转译维度,游戏通过“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构建起跨文化传播符号桥梁,既保留文化主体性,又增强可理解性,达成文化编码的创造性转换。在传播载体层面,游戏运用数字活化技术复原中国古代建筑的文化场域,虚实相生的场景构建与哥特式等西方场景形成中西鲜明视觉感知差异,受众在具身交互的沉浸式体验中重构文化认知,形成跨国界的文化认同。

一、拯救与复生:神话母题的跨文化价值互鉴

《黑神话：悟空》英语译为 *Black Myth: Wukong*, 神话 (Myth) 源于希腊语 *Muthos*, 常用于描述神、英雄等传说故事。古希腊先哲柏拉图 (Plato) 认为 *Muthos* 是通过形象化语言表述真理和智慧。神话是世界文明源泉,不仅是构成西方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社会仪式、宗教历史的重要传承基因,也是中华文化之根和民族精神之源,蕴涵着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黑神话：悟空》是基于中国古典神话名著《西游记》的改编和重构,

收稿日期:2025-06-28

基金项目:2024年度山西省外事智库课题“山西神话赋能中西文化融通研究”(课题编号:17)

作者简介:王起扬(1999—),男,山西临汾人,北京语言大学信息科学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

通信作者:孔瑞(1973—),女,山西临汾人,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

以拯救、复活大圣孙悟空为游戏攻关的最终目标,通过“暗黑”视觉叙事外壳传播“寻光”文化精神内核,蕴涵着深刻的人类精神共通价值和文化内涵。孙悟空完成西天取经后被封为斗战胜佛,他回到花果山后逍遥自在,然而天庭不能容忍孙悟空的叛逆行为,派二郎神攻打花果山,最终孙悟空被紧箍咒所困殒命,悟空虽身已死,然魂犹在,灵魂化作“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散落四方。悟空身死是对《西游记》经典叙事的重新诠释,旨在引发游戏主角“天命人”的拯救行动,完成重整世界秩序的使命和生命重生的升华。“天命人”是一只形似悟空的持棍猿猴,可视作悟空分身或化身的具身存在,他继承悟空顽强不屈的精神,具有特殊的使命和能力,肩负拯救的责任与大义,须不畏艰险,重走西游,打败妖怪,集齐六根,复生大圣。

神话母题指神话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承载着人类共同的情感、愿望和价值观,“死而复生”的中西神话母题承载着人类关于苍茫宇宙中人类生命、死亡、复活、灵魂等思考,揭示了人类深层心理结构对文化叙事的形塑作用。人类先祖基于自然界四季交替、植物荣枯等现象,形成对自然规律的顺应和对生命循环的信仰,“死而复生”的神话母题是人类赋予生命超越死亡的期望,体现了尊重生命和精神升华的文化内涵,看似超验的死而复生概念实则是集体无意识原型的符号化显现。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指出,人类交流的本质是基于“共同经验”原理,只有当传者和受者各自存储的经验在共同心理感知范围内发生交叉时才得以实现有效交流^[6]。中西神话文化均有关于“死而复生”的故事记载,神话人物“死生转化”与“生命变形”的神性体现了对生命再生的肯定^[7]。中国古代神话《山海经·大荒西经》有黄帝之孙颛顼死后复生,化为半人半鱼之形体,承载着沟通人间与上天的责任;太阳神炎帝之女瑶姬,死后被安葬在巫山之南,其灵魂寄于灵芝香草,最终化身为巫山掌管云雨之神;炎帝还有一个女儿名女娃,溺死于海里,其灵魂变为鸟,称为精卫等。西方古埃及神话中冥王奥西里斯(Osiris)死而复生,成为农业和丰饶之神,苏美尔文明中的女神伊南娜死而复生等。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其名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从神话和仪式角度阐释人类的死而复生,“灵魂永恒寄藏于动物、植物或其他物品,继而进一步实现图腾,成为信仰和崇拜的载体”^[8]。原始人类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死,因此可以死而复生,体外灵魂的观念使得灵魂可在不同载

体间转移,实现生命延续。《金枝》常被“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学派视为重要基石,“神话—原型批评”方法亦可用以解读中国古代的死亡—复活信仰以及神话原型^[9]等,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与神话的宗教性本质共同指向人类文明集体无意识中关于死亡焦虑的心理补偿深层机制。人类学家勃洛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指出神话具有宗教性,宗教教义以神话为载体,仪式以神话为指南,宗教道德功能以神话信仰为前提^[10]。西方基督教神学体系中的救赎论(Soteriology)构成核心教义之基,其本质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实现人类从罪性到圣化的转变,救赎过程在《圣经》文本中呈现为完整的神圣叙事,揭示了基督教救赎观的基本架构:人类因原罪陷入灵性死亡,上帝通过道成肉身的圣子完成救赎,最终指向永恒生命的应许。基督教救赎观通过十字架与空坟墓的双重记号,构建了完整的救赎叙事,从原罪论到称义观,从代赎理论到复活确据,从圣礼实践到末世盼望,既保持了神圣超越性,又实现了人性更新的内在转化。

《黑神话:悟空》中“天命人拯救悟空”的情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顺应天命、维护天道秩序的观念表达。“天命”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思想,强调社会责任和道德使命,以及对天地和谐、秩序恢复的追求。由于游戏背景设定在佛法流传世间的正法、像法和末法的最后阶段,彼时已是天地失衡,魔道昌盛,社会道德沦丧,悟空被困的遭遇正是末法时期的混乱体现。天命人肩负着拯救苍生、恢复天地秩序的重任,体现了中国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以及英雄主义明辨善恶的正义观。西方记载于《诗体埃达》和《散文埃达》的北欧神话中著名末日预言“诸神的黄昏”(Ragnarök)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命运观与责任感,蕴涵着人类社会关于秩序及善恶等道德观念,成为现代西方文化母题,如漫威电影《雷神3:诸神黄昏》、游戏《战神:诸神黄昏》《刺客信条:英灵殿》的资料片《诸神黄昏的预兆》等。诸神明知末日之战不可避免,秉持英勇和正义信念,为了维护世界秩序,毫不畏惧地与邪恶势力殊死战斗,其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的文化内涵可成为现代社会精神内核和力量。西方基督教神话中,上帝信仰代表善,而撒旦诱惑则代表恶,人类因其社会行为而被界定善恶,接受上帝的审判。人类违背上帝旨意的道德失规行为和恶行,导致世界充满苦难和混乱,宗教文化中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牺牲来救赎人类,为人类提供向善的道路和力量。由此可见,拯救历程在中西方文化交汇中均蕴涵着关于牺牲与

救赎、善恶与责任、英勇与正义等社会道德观念,体现了社会层面的道德启迪和个体灵魂的精神升华,反映了人类多元文化对于社会秩序和和谐的共同追求。

“拯救与复生”神话母题的叙事结构具有深刻的原型意义和集体无意识特征。叙事结构具有相似范式,首先是英雄遭遇困境后命运堪忧,继而是拯救者勇担使命,最后是死而复生后的生命升华。这种相似范式本质上是人类面对生存困境的集体心理投射,英雄的困境隐喻着个体或族群的现实危机,拯救者的使命担当体现了对超越性力量的信仰,而死而复生的升华则象征着对生命永恒的追求。中西方文化“拯救与复生”的神话母题体现了人类多元文明文化的共通性和精神道德内涵的契合,跨越文化界限的共同点蕴涵着宇宙宏阔视域下关于人类命运的深刻反思,昭示着人类文明中生生不息的生命意识,以及人类社会坚信正义和希望的强大道德内核,成为连接历史和现代的中西文明基因的跨文化传播的深层动力机制。这种基于人类集体无意识原型意象的对话模式,既保持了东方文化特有的哲学底蕴,又通过现代化叙事重构赋予其普世性价值阐释,有助于破解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困境,印证了原型叙事在跨文化认知中的解码效力。

二、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跨文化差异解码

在全球化语境下建构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既要坚守中华文化基因,保持文化独特性,又要创新话语表达来契合文化适配性,才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11]。中西文化差异往往导致某些文化元素在翻译时无法找到完全等值的表达,这种现象被称为“文化不可译性”,因此,翻译的核心关涉跨文化传播中的差异性深层思维、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等。《黑神话:悟空》的英语配音和字幕巧妙运用归化与异化语言翻译策略化解“文化不可译性”,不仅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展示文化自信,还有益于世界各国受众理解文化背景,接受故事情节。翻译是以原文为基础的有目的协商行为,译者遵循德国功能主义学派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提出的“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的目的论原则,借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翻译策略,运用归化原则,尽力接近目的语受众,符合目的语语言规则和文化价值观,将原作者带入译入语中;运用异化原则,让读者靠近原作者感受异国风情,尽力还原原作风格面貌^[12]。

《黑神话:悟空》灵活使用英语翻译的归化策

略,将源语言文化元素转化为目标语言文化中易于理解的元素,通过对文化符号的适度转化降低目标受众的理解难度,减少文化隔阂。吸引国外文化受众深入理解游戏主旨。如黄眉大王是假扮佛祖的邪恶妖怪,擅长利用幻术伪装自己,其英译台词融入了西方《圣经》宗教文化内涵。他的八句台词“不杀生,仇恨永无止息;不偷盗,强弱如我何异;不邪淫,一切有情皆孽;不妄语,梦幻泡影空虚;不馋酒,忧怖涨落无常;不耽乐,芳华刹那而已;不贪眠,苦苦不得解脱;不纵欲,诸行了无生趣”,源自佛教文化典籍《佛说斋经》的八关斋戒,佛教原意为禁止这八件事,然而黄眉妖怪以此蛊惑天命人。英文译者仿用《圣经》“十诫”中“thou shalt(你必须)”的古英语拼写和句式表达,“十诫”首句为“Thou shalt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继而每句都沿用“Thou shalt”句式。归化翻译策略体现了文化转码智慧:在语言层面,“Thou shalt”古英语表达既保留了源文本的宗教庄严感,又为目标语受众建立了熟悉的接受语境;其次,在文化层面,通过基督教句式承载佛教教义,实现了异质文化间的意义嫁接;最重要的是,译文在归化过程中并未消解佛教文化的独特性,核心教义通过新的语言形式得以完整保留,形成“形式归化,内容异化”的辩证统一。此外,字幕译文灵活运用承载文化价值观的英语成语,言简意赅的短语形式凸显了目的语的鲜明特点,使得语言更具有灵动性和感染力。如游戏开篇悟空护送师父完成取经任务后却反受天庭围剿,他的话语表达了极其愤懑不满的情绪,“人,我保住了,经,我取到了。”英文翻译“My Master, safe! The Scriptures, sound!”不仅语言表意准确,句式对仗工整,音律流畅整齐,还通过巧妙用英语成语“safe and sound”(意为“安然无恙的,平平安安的”),联通西方文化,促进中西语言文化融通。还有,英文翻译使用音律增强语言和情感的表現力,例如悟空在与二郎神大战前夕,冷笑着说道,“就数你最会扯淡,最能逗老孙开心!”“扯淡”(talk the tallest tales)的英文头韵表达通过重复词首辅音,不仅增强了悟空台词语言的音乐美、节奏感和韵律感,还使得语言声情交融、音义一体。由此可见,《黑神话:悟空》英译归化策略有益于促进中国文化高效传播,增强跨文化交流的接收效果。

《黑神话:悟空》使用英语翻译异化策略保留源文化特色,通过文化符号的陌生化吸引受众,实现中国文化有效传播。主要角色名字的音译和直译既坚守文化主体性,又契合全球化表达。如“悟空”的过往译法有猴王(Monkey King)、美猴王(Handsome

Monkey - King)等,然而这些英语表达实际泛指“猴群之王”,缺乏中国文化的辨识度。《黑神话:悟空》直接音译为“Wu Kong”,更能体现悟空的独特性和唯一性,译名既保留了中华文化的鲜明元素,又在国际传播中树立了独具一格的大圣形象,成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中国文化符号。孙悟空的标志性技能“七十二变”译为“Seventy - two Transformations”,象征涵盖世间万物的变化形态,保留了“七十二”的特殊数字表述,呼应中国文化的五行八卦,有益于激发西方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探索欲。《黑神话:悟空》某些角色在中东西方文化的形象、背景和象征意义上具有显著差异,如“妖怪”直接音译为“guai”或“yao guai”,没有使用“monster”,因为西方文化中的“monster”指庞大怪物或恶魔,无法完全准确表达文化背景和内涵。而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妖怪具有与人类相同的生命特征,译名既有益于传达“妖怪”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性和具体含义,又能保持中国文化原意准确性,从而避免文化概念导致西方受众的理解歧义。“四渎龙神”也直接使用音译法,用“loong”而不用“dragon”的策略具有深刻的符号学意义。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来看,中国龙(loong)与西方 dragon 本质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象:前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集体记忆,象征着权力、吉祥与民族认同;后者则是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邪恶生物,通常与破坏、贪婪等负面价值相关联。采用“loong”译法不仅有益于维护中国龙的文化主体性,避免其被西方受众曲解,还有益于在全球化和文明互鉴语境下,保持文化符号的独特性与准确性。

中西方文化差异和中英语言符号系统的非对称性容易导致西方受众对于中国文化产生误读现象,难以产生共鸣和认同,不仅阻碍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甚至还会影响中国形象和声誉,更无法实现文明互鉴和融合。归化与异化翻译理论有助于解码跨文化差异,归化祛除认知理解屏障,异化守护源语文化基因。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既需守护各自文明独特的意义密码,亦需在语言巴别塔的砖石中嵌入赋能跨文化传播理解的解码器,归化与异化策略的动态平衡,有助于促进人类多元文明从复调喧哗走向和声共鸣,继而在差异互鉴中照亮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家园。

三、感知与认知:具身体验的跨文化认同生成

《黑神话:悟空》呈现的中国古代建筑场景蕴涵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蕴与艺术美学价值,中国古代建筑以飞檐翘角、木构斗拱、雕梁画栋、对称布局等

独特风格,构建了迥异于西方哥特式尖拱和巴洛克波浪形立面等石砌文明的建筑美学,强烈的视觉差异激发了西方受众的新鲜体验和探索东方异质文化的好奇心。游戏中数字赋能中国古建的可游性与西方教堂穹顶的可望性,形成儒家修身齐家的现世关怀与基督教彼岸超越终极追问的哲思差异。

《黑神话:悟空》在中国选择的 36 个游戏场景取景地中,山西就占 27 个,这一精心选择绝非偶然。作为全国地上文物最丰富的省份,山西素有“中国古代建筑宝库”之美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积淀为游戏提供了绝佳的文化素材。黄河流域和黄土高原的特殊地理条件,不仅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更因气候干旱而奇迹般地保存了从北魏至明清的完整建筑谱系。先民利用茂密的森林和坚实的黄土建造的大量土木建筑,涵盖寺观、殿堂、城墙、民居、官府、塔楼、桥涵、陵墓及石窟寺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悬空寺、觉山寺、善化寺、永安寺,朔州崇福寺、应县木塔,忻州佛光寺、南禅寺,晋中镇国寺、双林寺,临汾隰县小西天、洪洞广胜寺,长治观音堂、崇庆寺,晋城玉皇庙、铁佛寺、西溪二仙庙,以及运城的鹳雀楼、永乐宫、关帝庙等。这些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屹立的建筑瑰宝,构成了中华文明最生动的物质见证。

游戏的火爆掀起了世界各地游客“跟着悟空游中国”“跟着悟空游山西”的探访取景地的文化旅游热潮,他们实地探访古建筑文化和历史遗迹,具身体验游戏中的奇幻场景。

这一现象印证了数字技术赋能文化遗产传播的巨大潜力:玩家通过虚拟体验产生文化认同,进而将其转化为实地探访的文旅消费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取景地大多分布在 20 世纪 30 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考察路线上。当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多次赴山西进行古建筑考察,通过系统的测绘与研究,首次将中国古建瑰宝纳入学术视野,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建筑的独特价值,这条重要的考察路线后被学界称为“梁林线”。如今,游戏开发者以数字技术重新诠释这些文化遗产,在新时代延续着文化传播的使命。这种跨越时空的呼应,不仅彰显了山西古建永恒的艺术魅力,更揭示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多重路径——从学术研究到数字呈现,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传播,最终实现文化价值的最大化释放。

中国古建与游戏场景深度契合,场景真实性与剧情虚拟性构建了精妙绝伦的互文空间,增强了国外传播的异质文化体验。游戏精细还原了晋地古建

的斗拱结构、彩绘纹样等特征,使玩家得以在虚拟世界中领略梁林当年发现的建筑之美,实现了建筑遗产保护与数字创新的巧妙结合。游戏的虚拟性构建起光怪陆离的神话剧情,玩家以“天命人”角色的除魔打怪经历,充满了妖魔鬼怪、仙佛斗法等奇幻元素。“天命人”既置身于虚拟剧情里,又身处数字活化的真实场景之中。他时而在古寺大雄宝殿与妖邪激战,时而在古老道观后院探秘仙境。古建场景为虚拟剧情提供了具象空间依托,使神话故事不再虚无缥缈;反之,剧情又赋予了古代建筑新颖体验与活力,因此古代建筑不再仅仅是似乎已蒙尘的历史遗迹,而是成为神话故事重述和演绎的活力舞台。二者相互呼应,彼此补充,通过时空交错下的多模态、跨媒介互文叙事,共同构建出引人入胜、亦真亦幻、充满魅力的中华文化瑰宝探寻之旅。强大的体验交互空间为世界受众带来极大程度的主动建构欲与参与感,通过数字多模态传媒,游戏受众通过参与式创作构建了互文性空间的跨媒介叙事,世界受众会因场景真实性和现代感而对虚拟剧情更有代入感和体验欲,同时以全新视角去解读中国古老建筑背后的宗教文化与神话传说。

具身理论(Embodied Theory)强调人类的认知、情感和意义生成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动态互动实现^[13]。《黑神话:悟空》中华古建的跨文化认同生成机制为:具身感知——文化认知——价值认同。首先是具身感知层面,身体体验是文化认同的初始界面。高度逼真的游戏环境采用虚幻引擎5(Unreal Engine 5)的Nanite虚拟化几何体技术实现了高细节环境渲染,Lumen全局光照系统营造极其自然、动态的光影效果^[14],将山西佛光寺、应县木塔等古建的飞檐斗拱、斑驳墙体以微米级精度还原。中国古代建筑通过数字活化技术得以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游戏场景的细节画面中,玩家借助手柄震动感知敦煌壁画飞天的飘带动势,通过VR设备测量斗拱结构的力学逻辑,这种“虚拟肉身”(Virtual Embodiment)体验突破了传统视觉主导的认知模式。游戏设备被转化为感官延伸媒介,使玩家在触摸虚拟砖瓦时触发触觉反馈,在光影流转中感受古建筑的时间肌理,形成跨文化身体共情基础。游戏中的数字分身(Avatar)消解了物理空间的文化区隔,在共时性的虚拟场景中实现文化情境的混合重构,数字技术与文化共生的机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提供了创新路径。游戏受众宛若置身于真实的中国古代历史遗迹之中,沉浸式体验古代建筑风格、布局装饰等文化美学,深度感受历史沉淀下的厚重与真实。

其次是文化认知层面的符号系统的身体实践与解码转译。当感官刺激升华为文化理解,古建空间的符号系统通过玩家的身体实践完成意义转码。大雄宝殿的轴对称布局暗示等级秩序,悬空寺的险峻结构被转化为解谜路径,玩家在攀爬跳跃中领悟“道法自然”的营造智慧。游戏将建筑构件转化为交互性文化文本:斑驳墙壁的裂纹成为剧情线索,佛像手势暗藏战斗技能激活机制。这种设计遵循具身认知的双向互动模型,玩家不仅解读空间符号,更通过肢体动作重构符号意义,使斗拱的榫卯逻辑、壁画的宗教隐喻转化为可操作的文化语言。最后是意义共生层面:情境化体验的价值认同构建。在虚实交织的互文空间中,游戏通过多模态叙事实现文化意义的再生产。“天命人”角色在数字活化的古寺中除魔卫道,古建既是战斗场景的物理载体,又是神话叙事的符号载体。这种时空折叠策略产生双重效应:佛光寺的数字化复原强化了场景的历史真实性,而妖神对决的奇幻剧情则赋予古建当代叙事活力。玩家在探索中完成价值认同的三重跃迁——从建筑美学的视觉震撼,到营造技艺的理性认知,最终升华为对“天人合一”哲学观的体悟。Steam社区中外国玩家自发考据游戏建筑原型的现象,印证了这种跨文化意义共识的形成。《黑神话:悟空》的实践表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需突破“视觉奇观”表层,构建“感官-认知-意义”的完整体验链。当古建空间成为可触摸、可解码、可叙事的具身化场域,文化差异便转化为共享的体验框架。这种以身体为介质的传播范式,为破解文化折扣困境提供了新路径:在虚拟世界的飞檐斗拱间,全球玩家正以身体为尺,丈量中华文明的精神维度。

结语

在全球化文明差异与数字技术重构文化生态的双重语境下,《黑神话:悟空》通过神话母题实现文化价值的符号共鸣,借助译介策略完成文化符号的适应性转换,依托数字活化古建场景构建文化认知的沉浸场域。不仅为数字时代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实践范式,更通过游戏叙事开创了文明互鉴的新维度,为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注入创新动能。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本质是技术哲学与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是文化主体性与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统一。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既需要坚守“各美其美”的文化自信,更要深谙“美美与共”的传播智慧,激发中西受众的共情和共鸣,推进中西文化的共通和共融,才有助于促成天下大同的文化愿景。

参考文献:

[1] YUAN, WENJIE. An Imag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Video Game *Black Myth: WuKong* [J]. *Signs and Media* 2024, 3 (1-2): 55-75.

[2] 耿弘明. 如何评估《黑神话:悟空》的民族性? [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24(6): 145-150.

[3] 林升栋, 李悦. 《西游记》的分身: 论《黑神话:悟空》的文化自信与国际传播[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6(11): 16-28.

[4] 曹书乐, 石闵龙, 何威. 玩法为器, 文化为魂: 《黑神话:悟空》的国际传播与游戏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创新机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6): 119-131, 171-172.

[5] 李闯. 文化唯物主义视角下文化、技术与产业的共生演进: 以《黑神话:悟空》为案例[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6): 83-95.

[6] 威尔伯·施拉姆, 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M].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7] 闫德亮. 中国古代神话死亡读解[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41(6): 117-120.

[8]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金枝[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9] 苟波. 关于死亡—复活信仰的中国古代神话和早期神仙传记故事解读[J]. *中国比较文学*, 2018(2): 182-195.

[10] 马林诺夫斯基.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11] 邹广文. 文化中国的憧憬: 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12] 劳伦斯·韦努蒂. 译者的隐身[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13] MERLEAU-PONTY, M.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M]. Paris: Gallimard, 1945.

[14] CHIANG, JOE. *Black Myth: Wukong - The Science Behind Its Highly Detailed Environments* [J]. *Medium*, 2024(8): 28.

(责任编辑 林川)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Black Myth: Wukong*

WANG Qiyang¹, PAN Yulin², KONG Rui^{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of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2.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31, China)

Abstract: The worldwide popularity of *Black Myth: Wukong* has accelerated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y constructing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mythological motifs fostering mutual learning, bidirectional transcoding of cultural symbols and revitalized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the game establishes an innovative system that dissolves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stimulates intercultural exchange. The mythological motif of redemption and resurrection resonates with universal values across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enabling deep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core ideologies through cross-cultural dialogu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ombining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bridge cultural gaps, achieving a creative balance between preserving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ensuring global comprehensibility. Through digital revitalization technologies,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al wonders are vividly reconstructed, while embodied interactive immersion fosters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mong global audiences.

Key words: *Black Myth: Wukong*;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 77 •

黄河文化在短视频领域的传播策略研究

许萌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河南郑州450044)

摘要:随着网络短视频平台的迅速发展,黄河文化的传播迎来了新的机遇。通过分析多个短视频平台的相关案例,总结黄河文化在短视频领域的发展现状,剖析了其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提升内容质量、构建系统性的传播内容、拓展传播渠道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传播策略,旨在为黄河文化在短视频领域的有效传播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黄河文化;短视频;传播策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1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78-05

一、引言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灿烂的黄河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涵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根据2024年3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10.53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4145万人,占网民整体的96.4%^[2]。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具有传播速度快、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等特点,为黄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因此,研究黄河文化在短视频领域的传播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黄河文化在短视频领域的传播现状

(一)短视频的去中心化特点降低了黄河文化传播门槛

短视频的去中心化特点是指在短视频平台上,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不再由单一的中心机构或权威主导,而是呈现出分散、多元的特点。在传统的媒体环境中,黄河文化的相关视频往往以专业的新闻专题片或纪录片形式呈现,视频制作的专业性较强,难度较高。此类内容的制作主要由专业的媒体机构和影视从业人员完成。而在短视频平台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者,只要有一部具备摄像功能的普通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拍摄、编辑并上传自己的短视频作品。黄河文化视频传播的门槛大大降低,这种打破技术垄断的趋势,为黄河文化的视频传播提供了广泛的用户基础。在如今的短视频平台,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通过短视频了解和传播黄河文化。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涌现出了大量以黄河文化为主题的短视频,内容涵盖黄河的自然风光、历史遗迹、民俗文化等方面,吸引了众多用户的关注和点

收稿日期:2025-03-04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项目:“融通跨界实战——新闻传播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2024SJGLX0208);2023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跨媒介传播”(2023CWX043);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一般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河南实践研究”(2023XWH013)

作者简介:许萌(1988—),男,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讲师,中级记者,研究方向为短视频传播、新闻实务。

赞。以抖音短视频平台为例,截至2024年8月31日,在抖音检索话题关键词“黄河”,所有带这一话题的短视频总体播放量已经达到46.9亿次,相关短视频及创作者更是不计其数。

(二)短视频内容的多元化特点使黄河文化的传播形式日趋丰富

短视频创作主体的分散性使短视频的内容也呈现多元化特点,不同的创作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生活经历和专业特长,创作出具有独特风格和价值的短视频作品。黄河文化相关短视频同样呈现了内容形式多元化的趋势,相关短视频的内容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纪录片、宣传片、创意短视频等。其中,纪录片以其真实性和权威性,向用户展示了黄河文化的深厚底蕴;宣传片则通过精美的画面和生动的解说,展现了黄河文化的魅力;创意短视频则以新颖的形式和独特的视角,吸引了年轻用户的关注,为黄河文化的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抖音账号“与辉同行”,在2024年6月发布一条关于黄河边鹳雀楼的创意宣传短视频,在视频中,知名主播董宇辉和其他嘉宾登上鹳雀楼,展示了黄河边的风光美景。现场吟出诗人王之涣的名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该条视频点赞量达到6.7万,引来热门评论2000多条,向广大网友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壮美风景和文化。短视频平台聚集了大量的内容创作者,为了提高视频的关注度和美誉度,黄河文化相关的短视频内容形式不断丰富。

(三)短视频庞大的用户基数为黄河文化传播提供受众基础

网民规模的扩大为短视频平台提供了庞大的用户基数,也为黄河文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受众基础;通过短视频平台的传播,黄河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推广。目前在多个热门短视频平台,许多黄河文化相关短视频的播放量和点赞数都很高,一些优秀的短视频还被用户转发到其他社交平台上,进一步扩大了黄河文化的影响力。同时,短视频平台的互动性也使得用户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黄河文化的传播中来,增强了用户对黄河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例如《我的黄河故事》系列短视频,由山东省广播电视局策划立项、济南广播电视台拍摄制作,该系列紧扣时代主题,以优质的视频质量和喜闻乐见的展现形式,获得了较高的流量^[3]。自2021年12月以来,被“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人民网、新华社等央级媒体以及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头部短视频平台先后重点推介,全网点击量突破5000万。单篇点击量保持在10万以上,最高点击量达38万,“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总点击量超500万。“学习强国”济南学习平台设立了《我的黄河故事》系列短视频专题。

三、黄河文化在短视频领域传播存在的问题

(一)黄河文化短视频内容质量参差不齐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然而,在短视频领域,黄河文化的呈现却存在着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一方面,一些优秀的黄河文化短视频以其精美的制作、深入的文化解读和独特的创意吸引了大量观众。例如,部分媒体机构或传媒公司专业制作团队制作的黄河文化纪录片式短视频,通过高清画质、专业解说和精心编排的内容,生动地展现了黄河流域的历史变迁、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让观众对黄河文化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黄河文化短视频存在着质量问题。一些创作者为了追求流量和关注度,制作的视频内容浮浅、缺乏深度,仅仅是对黄河文化的表面呈现,如简单地拍摄黄河的景色或展示一些常见的民俗活动,没有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掘和解读。其中大量的视频还存在制作粗糙、画面不清晰、音效不佳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观众的观看体验。截至2024年6月,在抖音短视频平台的搜索栏检索关键词“黄河”,能够查询到大量相关视频,但精品视频数量却不多。例如,某题为“壶口瀑布”的短视频,画面内容只是用手机竖屏拍摄的壶口瀑布镜头,拍摄时缺乏构图意识和技巧,画面抖动比较严重,视频配乐为某一流行音乐,全片没有解说,除了画面之外,不能让人了解关于壶口瀑布的更多详细信息。该条短视频发布一个月后的点赞量仅为36,评论量为7。

(二)黄河文化短视频传播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

黄河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涵盖了历史、地理、民俗、艺术等多个方面。然而,在短视频领域,黄河文化的呈现往往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许多黄河文化短视频都是孤立地展示某个方面的内容,缺乏对黄河文化的整体把握和系统梳理。例如抖音平台上一些关于黄河历史的短视频,只是简单地讲述了某个历史事件或人物,没有将其与黄河文化的发展脉络相结合,使得观众难以理解这些历史事件或人物在黄河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再如,一些关于黄河民俗的短视频,只是展示了某个具体的民俗活动,没有对该民俗在黄河流域的分布、演变以及与其他民俗的关系进行探讨,导致观众对黄河民

俗的认识较为片面。

此外,黄河文化短视频之间也缺乏连贯性,各个视频之间的主题和内容关联不大,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使得观众在观看这些短视频时,难以构建起对黄河文化的完整认知框架,不利于黄河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比如,抖音平台某一个短视频账号发布的黄河文化短视频,今天讲黄河的传统美食,明天讲黄河的民间艺术,后天讲的内容又与黄河关联不大,内容跳跃性较大,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观众在观看时很难将这些零散的信息整合起来,难以形成对黄河文化的系统性认识。

(三)黄河文化短视频传播渠道相对单一

尽管短视频平台为黄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但目前黄河文化短视频的传播渠道仍然相对单一。大多数黄河文化短视频主要依赖于几个主流的短视频平台进行传播,如抖音、快手等。虽然这些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但由于平台上的内容繁多,每天都有大量的精彩内容更新,黄河文化短视频很容易被其他类型的视频淹没,难以获得足够的关注度。

(四)黄河文化短视频的传播人才短缺

黄河文化短视频的制作和传播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素养、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然而,目前在这一领域,人才短缺的问题较为突出。

一方面,缺乏既懂黄河文化又懂短视频制作的复合型人才。黄河文化涉及历史、地理、民俗、艺术等多个领域,需要创作者具备扎实的文化知识和很强的研究能力。同时,短视频制作又需要掌握拍摄、剪辑、后期制作等专业技能,以及具备创新的思维和创意能力。然而,目前能够同时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才相对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黄河文化短视频的质量和创意水平。

一些创作者虽然对黄河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但在短视频制作方面缺乏专业技能,导致视频的制作质量不高。例如抖音平台某条题为“黄河水要变清吗”的科普类短视频,全片从历史角度讲述黄河的相关内容,文案内容有一定的深度。但全片并没有多少原创拍摄镜头,大部分是从网络搜集的图片或者视频,由于创作者使用的视频资料清晰度不一致,这些品质不一的视频资料剪辑整合在一起,短视频播放过程中,画面时而清晰时而模糊。视频中的解说声音也并非真人配音,而是剪辑软件自动生成的配音,听起来生硬呆板。该条内容虽有一定深度,但制作粗糙的短视频发布一个月后点赞仅为9,评论量为0。而一些专业的短视频制作人员却对黄河文

化的内涵理解不够深入,难以创作出具有文化深度的作品。例如,抖音平台某条题为“无人机视角下的黄河”的短视频,画面内容为航拍镜头,制作精美,配乐与画面相得益彰,但全片只是简单镜头的拼凑,没有关于黄河文化的深入讲述,结果该条制作精美的短视频一个月内仅有7个点赞、2条评论。

另一方面,黄河文化短视频领域的人才培养机制还不够完善。目前,专业培训和教育资源相对匮乏,无法满足市场对黄河文化短视频人才的需求。这使得许多有志于从事黄河文化短视频创作的人缺乏系统学习和实践的机会,难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能力。

综上所述,黄河文化在短视频领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存在着内容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传播渠道单一、人才短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黄河文化在短视频领域的传播效果,也不利于黄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黄河文化短视频的内容创作、系统规划、渠道拓展和人才培养,推动黄河文化在短视频领域的健康发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黄河文化。

四、黄河文化短视频的传播策略

(一)提升黄河文化短视频的内容质量

优质的内容是吸引观众的关键,对黄河文化短视频来说更是如此。要提升黄河文化短视频的内容质量,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涵

创作者应深入研究黄河文化的历史、地理、民俗、艺术等方面的内涵,将其融入短视频中。例如腾讯视频平台“小凯哥寻古探今”账号制作的一系列短视频,通过对黄河流域的历史遗迹、传统技艺、民间故事等深入挖掘,以生动的形式展现了黄河文化的深厚底蕴。在其中一期题为“万里黄河嘉应观”的短视频中,博主结合黄河文化的历史和民俗知识讲述了嘉应观的前世今生,语言风趣幽默,使观众对黄河文化以及嘉应观的历史有了深入的了解。该条短视频点赞量近3000,转发量在9000以上。

2. 提高短视频制作水平

提升短视频的制作水平不仅可以有效提升视频质量,还能观众的观看兴趣,应重视视频的拍摄技巧、剪辑效果和音效设计,提升视频的观赏性。例如抖音平台账号拥有300多万粉丝的文化自媒体博主“顾小贝”,从视频的成品质量来看,短视频团队具有较高的制作水平。在其中一期题为“黄河对中国的影响力”的短视频中,博主以真人口播的形式讲

述了黄河文化,使用了大量的高清图片和视频资料,并配以特效手段对地图做标注,使观看者清晰直观地了解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拍摄时,也使用了高清的航拍画面,让观看者感受黄河流域风光。制作团队在拍摄口播视频中使用了专业的无线麦克风设备,博主吐字清楚,收声清晰,使观众能够更好地感受黄河的魅力。该条黄河文化主题的短视频点赞量超过10万,评论量达到4800,以专业的制作让观看者清晰直观地重新认识了黄河。

3. 创新短视频内容表现形式

通过新颖的表达方式和视角,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例如短视频作品《盛世长河》,以1分钟的3D动画展示了黄河的历史文化,呈现了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在全网多个平台发布后,获得观看者一致好评。又如,山东卫视在抖音平台发布的《黄河边的母亲为黄河写歌》这一短视频,歌手用当下年轻人喜欢的说唱形式歌唱黄河情,网友纷纷点赞评论“为母亲河点赞”“为文化自信点赞”。

(二) 构建系统性的黄河文化传播内容

黄河文化内涵丰富,构建系统性的传播内容有助于观众更全面地了解黄河文化。

1. 制定系列主题

根据黄河文化的不同方面,制定一系列主题,如黄河历史、黄河民俗、黄河艺术等,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例如,2024年4月陕西历史博物馆在哔哩哔哩平台发布了以“大河上下,和合共生”为主题的黄河流域文明故事系列短片,该系列一共10期,每期以2分钟左右的竖屏短视频形式,展示黄河流域的文明故事,形成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主题系列。这种以某种主题系列形式展开的短视频传播,有助于在受众群体中形成更具针对性的传播效果,使受众形成更好的记忆点。

2. 建立知识体系

将黄河文化的知识点进行梳理和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例如,2023年,济南广播电视台推出一部集科普性和趣味性为一体的系列短视频《从河说起》,该系列共30集,以山东省沿黄河九城市博物馆珍贵的馆藏文物为切入点,通过动画的形式和年轻人喜欢的语言风格讲述黄河流域的知识和文化,30集短视频系统地讲述了黄河流域5000年的历史知识。该系列短视频因制作精良,知识体系完整,科普性强,一经上线,迅速引发全网关注,上线10天全网点击量破亿,实时热度连续登上腾讯视频、优酷视频历史类纪录片榜的前三位^[4]。这种

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科普形式,既是一种有效尝试,也是对黄河文化在短视频领域知识体系的新丰富。

3. 加强内容关联

在不同短视频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使观众在观看过程中能够形成连贯的认知。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新闻账号的做法值得借鉴,该账号的创作者在制作短视频时,注重前后内容的呼应和衔接。闪电新闻在2023年推出的“黄河文化系列短视频”中,将所有类别的黄河文化相关短视频分为“声”“诗”“歌”“水”“遗”等不同板块,比如在展示黄河非遗这一板块中,讲述黄河流域的某一非遗时,会提及该非遗与当地历史、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它对周边地区民俗文化的影响,让观众能够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黄河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三) 拓展传播渠道

单一的传播渠道会限制黄河文化短视频的传播范围,因此需要拓展多元化的传播渠道。

1. 社交媒体平台与传统媒体融合

社交媒体平台有其在网络端的传播优势,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传统媒体有其在覆盖面和权威性上的传播优势,在黄河文化短视频的传播中,二者可以相互融合,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例如,闪电新闻在推出的“黄河文化系列短视频”,其的制作方是传统媒体,短视频制作完成后,在闪电新闻客户端、腾讯视频号平台都有发布,这种融合不仅提升了黄河文化短视频的影响力,也为传统媒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2. 以丰富形式开展线下活动推广

举办黄河文化短视频展映、主题讲座等线下活动,增强与观众的互动和交流。例如,目前多地有不同类型的黄河文化短视频大赛,在比赛结束后,可以组织优秀作品线下展映,吸引众多观众前来观看。同时,还可以邀请专家学者现场讲解和交流,进一步加深观众对黄河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四) 加强相关人才培养

人才是推动黄河文化短视频发展的重要力量,加强相关人才培养是提高黄河文化短视频质量的关键。

1. 专业培训塑造懂黄河文化的复合型传播人才

在黄河文化相关知识培训方面,应邀请资深的黄河文化学者、历史学家担任讲师。他们通过生动的讲述,带领学员领略黄河文化从古老的文明起源到现代传承发展的历程。这不仅能为学员的短视频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更能激发他们对黄河文化的热爱与敬畏之情。

短视频制作基础理论培训可分多个模块进行。在摄影技巧模块中,专业摄影师可以详细讲解相机的基本操作、不同拍摄模式的适用场景、如何运用光线和构图法则营造震撼的视觉效果。在画面构图方面,教授学员如何运用对称构图、三分法构图、引导线构图等技巧,使画面更加美观且富有表现力。剪辑原理培训则要让学员明白如何选取合适的镜头、进行流畅的剪辑过渡以及把握视频节奏。在音频处理部分,指导学员如何选择合适的背景音乐、添加音效以及进行音频的混音处理,增强短视频的感染力。

2. 以黄河文化传播为主题开展实践

实践是提升短视频创作动手能力的关键,应多组织实地拍摄活动。带领学员深入黄河流域各个特色地点,如到壶口瀑布感受其雄浑壮丽,到古老的黄河渡口体会历史的韵味,到传统的黄河边村落领略民俗风情。在实地拍摄中,安排专业摄影师全程指导,教授学员如何根据不同场景选择合适的拍摄角度和光线,捕捉动态画面和精彩瞬间。同时,鼓励学员发挥创意,尝试不同的拍摄手法,如特写、航拍等,以丰富视频内容。

五、结语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短视频为黄河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分析黄河文化在短视频领域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传播策略,希望能为黄河文化在短视频领域的传播提供有益参考。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充分利用短视频的优势,不断提高黄河文化相关短视频的质量和传播效果,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热爱黄河文化,为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焕. 黄河文化的本位回归与传承路径: 人与自然共生的视角[J]. 理论导刊, 2021(8): 123 - 129.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R/OL). (2024 - 03 - 22) [2024 - 08 - 10]. <https://www.cnnic.net.cn/NMediaFile/2024/0325/MAIN1711355296414FIQ9XKZV63.pdf>.

[3] 山东省广播电视局. 山东省沿黄九市视听发展联盟组建成立 (EB/OL). (2021 - 12 - 04) [2024 - 08 - 15]. <http://gd.shandong.gov.cn/articles/ch02360/202112/976befe3-173e-4a43-9589-9b9380f841bdmobile.shtml>.

[4] 于娜. 《从河说起》以热爱赢得热爱 济南广电以人文致敬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J]. 大众电视, 2024(22): 29 - 32.

[5] 张家豪. 去中心化的短视频之美学传播: 以李子柒短视频为例[J]. 今古文创, 2022(4): 102 - 104.

[6] 李欣. 传统影视内容短视频传播对观众接受与参与的影响研究[J]. 新闻传播, 2024(10): 40 - 42.

[7] 隗斌贤. “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战略及其对策[J]. 浙江学刊, 2016(2): 214 - 219.

[8] 朱伟利. 刍议黄河文化的内涵与传播[J]. 新闻爱好者, 2020(1): 32 - 35.

[9] 魏晓阳, 侯雪彤. 黄河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J]. 理论月刊, 2022(8): 86 - 90.

(责任编辑 林川)

Research on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n the Short Video Field

XU Me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online short video platforms,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has encountered new opportun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relevant cases from multiple short video platforms,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s presence in the short video field, discusses prominent existing issues, and propose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improving content quality, constructing systematic dissemination content, expand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strengthening talent cultivation. The aim i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n the short video domain.

Key words: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short video; communication strategy

试论经典学术文的教育策略

杨道麟¹, 徐昌才²

(1. 华中师范大学 中文系, 湖北 武汉 430079; 2. 衡阳师范学院 中文系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经典学术文,指的是以进行系统研究、形成专门成果、推进学问发展等为特定对象来提出全新理念、全新认识、全新构想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不但具有见解的独创性的特质,而且具有论证的缜密性的特质,更加具有术语的学科性的特质。因而在对其教育策略予以实施时,要求施教者必须以文章学为统领,引导受教者既要把握经典学术文的争鸣性、发展性、开拓性等基本类型,又要把握经典学术文的对照式、开合式、多样式等大体结构,还要把握经典学术文的叙议结合、诠释完美、论辩切当等表达技巧,更要把握经典学术文的细致周密、清晰透明、精练确切等出色语言。唯有如此,才能促使他们成为“求真”“向善”“崇美”的创造性的人才和“健全的人格”,并进入“人的发展和完整性建构”的全新境域。

关键词:经典学术文;教育策略;基本类型;大体结构;表达技巧;出色语言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14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83-09

经典学术文兼具专业性与典范性,是古今文化传承与学术发展中极具价值的核心资源,指以系统研究学术问题、形成专门研究成果、推进学科学问发展为核心目标,提出全新理念、全新认识、全新构想,为学术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方法的一种文体^[1]。这类文体兼具见解的独创性、论证的缜密性与术语的学科性^[2],既为学术研究注入活力,也为文化传承奠定坚实基础。

在探讨其教育策略时,要求施教者必须以文章学为统领,结合学科特性,引导受教者既要把握经典学术文的争鸣性、发展性、开拓性等核心属性,又要把握对照式、开合式、层进式等具体结构,还要把握叙议结合、诠释完美、论辩切当的表达技巧,更要把握细致周密、清晰透明、精练确切的语言特质。通过

这样的教学引导,以期让受教者既能从中“求真”,助力实现“探索品质的养成”,又能从中“向善”,推动“道德良知的觉醒”,进而能从中“崇美”,达成“自由心灵的建构”^[3]。

一、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基本类型

把握核心属性是经典学术文教育的策略之一。经典学术文的核心属性包括争鸣性、发展性与开拓性,这与文艺学重点关注的、以虚构为主的经典文学作品(如经典诗歌、经典小说、经典戏剧)的品类有所区分。

(一)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争鸣性

经典学术文教育必须重点把握其争鸣性。具有争鸣性的经典学术文,通常是作者既破除“袭用通说”、摒弃“苟因旧说”,又辩驳“异见邪说”,对他

收稿日期:2025-09-12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课题“经典文章教育的美学观照”(CCNU15A0603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课题“母语非汉语藏族中小学生汉语语用失误研究”(17BMZ07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研究”的子课题“语文教育观研究”(AHA120009)

作者简介:杨道麟(1959—),男,湖北潜江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华南师范大学讲席教授,贵州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喀什师范学院特聘教授,泰国班颂德皇家师范大学外聘教授,主要从事语文教育哲学和语文教育伦理学及语文教育美学的研究;徐昌才(1967—),男,湖南新晃人,泰国班颂德皇家师范大学哲学博士,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文教育研究。

人研究中存在分歧的问题展开辨析,进而提出鲜明观点的文章。朱光潜的《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与李贽的《童心说》,便是这类学术文的典型代表。

以《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为例,作者核心观点是:因观察事物的立足点不同,不同心态的人对同一事物会产生不同反应。在绘画家眼中,这棵松树呈现出暮色苍茫、老干虬枝、白云奇渡的景象,其线条、颜色、形象、气概与神韵意趣,均成为审美对象。从审美角度而言,绘画家的心理活动以直觉为主,核心是聚焦事物的外在形象,松树在其感知中转化为富有情趣的审美意象,最终实现美感的高峰体验。在植物学家眼中,松树的枝叶花果、形态特征、生长环境,以及“为何能在岩石上顶风傲雨数百年”等问题均是研究对象。从科学角度而言,植物学家的心理活动以理性为主,宗旨是厘清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会由宏观到微观地分析松树的外形结构与生长属性。在木材商眼中,松树的质地、市场报价、经济价值与实用用途,是关注重点。从功利角度而言,木材商的心理活动以知性为主,意图是判断事物对自身的效用,仅关注松树的实用价值及与之相关的属性。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解读,施教者引导受教者分析不同视角下的认知差异,受教者能学会以多元视角看待生活中事物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再如李贽的《童心说》,作者针对好友耿定向指责自己“以妄乱真”的观点,围绕学术思想分歧展开辩驳,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文中提出,“童心”即赤子之心,是“一念之本心”,主张个体应追求“绝假纯真”——这种未受外界污染的“童心”,兼具完善性与美好可能性,因此个体需真实坦率地表露内心情感与人生欲望。这种观点实则是对宋明理学中“性善论”的继承与创新性发挥,在当时具有鲜明的叛逆性,体现出反教条、反封建、反权威、反传统的思维特质。文章强烈抨击道学教育的反动性与虚伪性,倡导心灵自由与个性解放,已然具备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个性情感、摧残精神理智的抗争,是对个性彻底解放与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倡导,更是封建名教重压下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这种认知洞见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契合,在当时道学与名教僵化的思想环境中,具有振聋发聩的进步性与深刻性。通过对这类争鸣性学术文的深度解读,施教者引导受教者体会文中“发露童心自出之言”的勇气与“博采众长为文”的智慧,受教者会被作者

鲜明的学术立场与创新见解深深折服。

(二)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发展性

经典学术文教育必须重点把握其发展性。具有发展性的经典学术文,通常是作者既衔接学术研究的“交界之区”、填补“交接之处”的空白,又整合“交汇之面”的关联内容,对他人研究中一笔带过的问题深入开掘,进而提炼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认知的文章。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便是这类学术文的典型代表。

以《〈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为例,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科学方法,将“正确评价鲁迅”视为当时思想、文艺、文化战线的重大任务。为此,他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整体政治经济背景与思想文化状况,深刻阐述鲁迅的核心思想特点及其思想发展道路,全面分析鲁迅在新文化运动、左翼文艺运动及整个思想战线的引领作用,高度肯定鲁迅在中国现代文艺史、文化斗争史上的崇高地位,精准诠释鲁迅杂感文在“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斗争中的重要价值。这是首次对鲁迅及其杂感文作出中肯客观的评述与准确全面的判断,对鲁迅的创作轨迹与思想发展脉络作出清晰梳理与精准阐释。文中将鲁迅的思想发展高度概括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 and 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这一概括不仅清晰勾勒出鲁迅的思想转型路径,也为当时及后世研究鲁迅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解读,施教者引导受教者体会其学术梳理与思想阐释的深度,受教者定会感受到鲁迅杂感文中燃烧的批判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对当时猥劣腐烂的黑暗现实的冲击力量。

再如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者充分阐释小说的社会作用、社会影响与社会价值,不仅提升了小说作为文体的地位,更明确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以此向传统文学史观发起强劲挑战。其理论贡献在于两方面:一是提出对小说文体与社会关系双向影响的新认识,二是形成对小说文体及理论范式革新的新认知。这种贡献具体体现为两点:首先,文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包括对小说“移人”这一文体特征的重新认知,以及基于此认知的小说书写内容选择与功能实现路径等——事实上为周氏兄弟、陈独秀、胡适等讨论新文学建设方案时

所借鉴,为后来新文学阵营内部的多元探索提供了思想与逻辑起点。其次,文中对文学“移人”特性的揭示、通过“熏”“浸”“刺”“提”四力解说构建的、以“情感”为纽带的“共同体”营建思路,为新文学在时代启蒙工程中发挥独立作用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与实现路径,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生成的重要基础之一^[4]。通过对这篇文章的深度解读,施教者引导受教者分析其对传统文论的突破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建构意义,受教者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论与文学观念现代性转型等关键议题。

(三)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开拓性

经典学术文的教育必须把握开拓性。具有开拓性的经典学术文,是作者既深挖学术研究的“空白之点”、开拓“处女之地”,又垦殖“洪荒之域”的新领域,对他人研究中未触及的问题展开探索,进而提炼具有前沿性的学术结论的文章。袁行霈的《诗与禅》(节选)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十则》,便是这类学术文的典型代表。

以《诗与禅》(节选)为例,作者提出诗与禅均需敏锐的内心体验,均重视启示与象喻,均追求言外之意——这种对诗与禅核心共性的挖掘,打破了以往学界对二者孤立研究的局限,属于典型的学术空白开拓,也使二者具备了互相沟通的可能。作者进一步指出,诗与禅的沟通表面看似双向,实则主要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具体体现为“以禅入诗”与“以禅喻诗”:诗赋予禅的仅是形式,而禅赋予诗的却是内省功夫。在作者看来,禅既是哲学与宗教,更是一种生命体验与存在形态,其作为中国佛教的基本精神,蕴含着心灵主体的超越解脱、物我合一的特殊境界,这些特质与诗的本质高度契合——诗本就是心境的投射与外化、心情的流露与咏叹、心志的坦陈与抒发。诗与禅之所以能融通,正因其价值取向、情感特征、思维方式、语言表现等方面存在微妙关联,诚如元好问所言“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这一比喻精准概括了禅对诗的赋能作用,也印证了作者对诗禅关系的创新性解读。同时,作者还注意到禅宗发展的趋势:其愈发剥落宗教观念而肯定个人主观感受,愈发否定传统修持功夫而笃信现实生活,而心性发抒、心底吐露、生活表现本就是诗的核心任务——这一发现进一步夯实了诗禅沟通的理论基础。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解读,施教者引导受教者体会其对学术空白的开拓价值,受教者能清晰理解诗与禅虽可融通,但分属不同意识形态,核心归趣存在差异。

再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十则》,文中诸多见解是作者接受西洋美学洗礼后,以全新视角选择性融入中国传统批评的创新性尝试,关键在于创新性提出贯穿全书的“境界”说,且该理论已初具体系。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词论侧重形式技巧的局限,因此在以往词论界被众多学者奉为圭臬:作者既将其视为创作原则,又当作批评标准——无论是论断诗词演变,还是评价词人得失、作品优劣、词品高低,均以“境界”说为核心依据。可以说,“境界”说既是作者文艺批评的出发点,也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文中十则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则为总纲,置于全书之首,作者开门见山提出“境界”说,并高度概括其核心意义;第二至第六则从不同角度阐释“境界”说的特征,进一步强调其在艺术创作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七至第十则探讨诗人的思想与艺术修养,以形象比喻将“境界”说与人生体验相结合。通过对这篇文章的深度解读,施教者引导受教者分析“境界”说对传统词论的开拓性贡献,受教者不仅能掌握“境界”说的核心概念,还能学会运用该理论赏析、分析诗词。

二、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大体结构

把握大体结构是经典学术文教育的又一核心策略。经典学术文的大体结构主要包括对照式、开合式与多样式三类,这与文艺学着力关注的、以虚构为主的经典文学作品(如经典诗歌、经典小说、经典戏剧)的大体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一)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对照式结构

经典学术文教育必须重点把握对照式结构。采用对照式结构的经典学术文,通常是作者开篇提出中心论点,再通过正反两方面论据展开分析讨论,最终明确某一方面的正确性,以期使论证更具逻辑性与形式美感。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与刘开的《问说》,便是这类结构的典型代表。

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例,文章紧紧围绕“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核心论题,通过“成绩一问题一对比深化”的对照式结构层层展开论述,让“为什么要改造学习”的论证更具说服力。第一部分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总结经验并肯定已有成绩,从正面论证“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必要性;第二部分从现状分析的角度,列举党内在学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反面论证“改造学习”的紧迫性;第三部分将主观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对立学风进行对比论证,进一步深化“改造学习”的必要性——这一部分由表及里、说理透辟,既揭示了主观主义学风的

实质与危害,也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本质与特点,是对第二部分内容的理论升华,堪称全文的精彩之处。此外,文中在指出主观主义学风“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时,对应提出马克思主义学风“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鲜明的正反对比,不仅强化了对主观主义危害的批判,也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学风优势的认知。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解读,施教者引导受教者体会对照式结构的论证价值,受教者能深刻理解“理论知识需与生活实践结合并转化运用,才能彰显生命力”的核心道理。

再如刘开的《问说》,文章首段破题立论,从“学”与“问”相辅相成的关系切入,明确“好学必须勤问”的核心观点,随后通过“正面论证—反面批判—总结升华”的对照式结构,层层辨析“为何要勤问”的议题。正面论证分为两层:一是阐明“为何要问”与“问有何益”,指出向“贤于己者”“不如己者”“等于己者”三类人提问均能有所收获;二是列举古人“不择事而问、不择人而问”的典范,强调“取善之弘”的问学态度。反面批判同样分为两层:一是批评部分人“师心自用、当问而不问”,如“学有未达却强以为知”“理事未安却妄以臆度”;二是批判部分人“问而不得其法”,如对“贤于己者忌而不愿问”、对“不如己者轻而不屑问”、对“等于己者狎而不甘问”。文末总结升华,反复叮嘱勤问的重要性,恳切感人。这种“立正确观点—破错误做法—再立行动准则”的“立—破—立”构筑艺术,本质是对照式结构的高阶运用,尽显作者的智慧与胆识。通过对这篇文章的深度解读,施教者引导受教者分析对照式结构在观点论证中的作用,受教者能清晰认识到“好学需勤问、学中要问、问中求学”的深刻内涵。

(二)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开合式结构

经典学术文的教育必须把握开合式结构。所谓开合式结构的经典学术文,是指作者围绕中心论点展开“论”或“述”时,需通过舒卷交替、收放自如、伸缩有致的节奏形成律动,以契合形式美的规则。林庚的《说“木叶”》与宋濂的《文原》,便是极具代表性的范例。

以《说“木叶”》为例,作者巧妙运用开合式结构,未故弄玄虚地搬弄术语,而是将深奥的文学理论附丽并渗透于古诗“木叶”意象的捕捉与阐释中。该文最终得出结论:诗歌语言具有富于暗示性的特质。“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

的背后”,并成为“潜在的力量”,诗人“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成为令人玩味无穷的“精妙”诗歌语言。在吟咏之间,这些“潜在的力量”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感染、启发受教者,使其情思灵动、视通万里。全文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至三段为第一部分,列举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个现象——“木叶”是诗人笔下钟爱的形象,而“木叶”形象的关键在于“木”字;第四至六段为第二部分,阐释“木”的两个艺术特征及形成原因;第七段为第三部分,作为全文小结,指出“木叶”与“树叶”在概念上相差无几,但在艺术形象上却几乎一字千里。作者如此论述,若施教者引导受教者研读,受教者定会在“潜在的力量”的影响下,自发参悟其中深蕴,进而走进诗歌的殿堂。

再看《文原》,作者同样巧用开合式结构,将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追溯文章的来源并论及文章本体,下篇探求写作方法并论及文章弊端,集中体现了自身的文章思想。他认为,文章的本质在于查究本源、表现物理、发明事功,三者需合而为一。该文强调,文章“非专指辞翰”,而是道之“象”的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何处,文亦在何处。文中主要探讨了三类不同价值的“文”:其一为“天地自然之文”。这是最高层次的“文”,既包含“至道”,也涵盖“制器尚象”,甚至“凡有关民用及一切弥纶范围之具”皆在其列。其二为“圣贤之文”。主要指大禹、孔子、子游、子夏等圣贤所作之文,即夏、商、周三代之文,是“正三纲”“齐六纪”且与宇宙相终始之文。其三为“文人之文”。这类文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明道”与“用世”两方面的缺失或不足:要么“佶屈聱牙”,要么“浅易轻顺”,根源在于“四瑕”“八冥”与“九蠹”。作者这般论述,若施教者引导受教者研读,受教者定会从文中彰显的古文价值序列与书写层次中,领悟体道与为文的亲密关系。

(三)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多样式结构

经典学术文的教育必须把握多样式结构。多样式结构的经典学术文,是指作者在服务中心论点或观点的前提下,切实做到既有曲折又有变化,灵活而不散乱,统一而不呆板,以符合形式美的标准。施向东的《义理、考据和词章》与黄宗羲的《原君》,便是极具代表性的范例。

以《义理、考据和词章》为例,作者采用多样式结构展开论述,通过“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材料的准确性”“要有好的形式”三个小标题,阐发整篇文

章中观点、材料与形式的重要性。从总体上看,这是一种并列式结构;但三者的内在联系十分紧密——观点是灵魂、是统帅,材料是说明观点或产生观点的依据,形式则是使观点、材料得以完美表现的手段,因此三者之中又蕴含一定的阶梯关系,形成了递进式结构。此外,文章每一部分的论证,还各自构成独立的论证结构。例如高中语文教材曾为该文第一部分的八个自然段制作结构图表,较为充分地揭示了多样式结构综合运用特点。这八个自然段按论证结构排列的图表,也符合形式美的要求:既有整齐一律之美(第二、三、五、六、七自然段的并列),又有对称均衡之美(第一、四自然段与第八自然段的前后呼应)。可以说,并列式结构呈现整齐之美,对照式结构呈现对比之美,递进式结构呈现阶梯之美,总分式结构呈现辐射之美,而这些结构的综合运用则呈现和谐统一之美^[5]。作者如此论述,若施教者引导受教者研读,受教者便能理清文中观点、材料与语言表达的逻辑关系。

再看《原君》,作者以启蒙思想家、历史学家独有的审视眼光与思想视角,对君主的来源、君主的真正职分以及古今民众对君主的好恶等问题展开系统且全面的探讨,尤其文中采用的多样式结构,值得称道。文章第一段采用演进式结构,作者紧扣论题,从君主的起源说起,阐明君主的应有职分——其职责应是为百姓千万倍勤劳,却不独享利益,这一论述实则已暗含核心论题。第二段采用平行式结构,作者刻画了今时君主背离为君职分的阴暗心理与卑鄙情态:他们“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颠倒了“天下”与“君主”的关系,最终酿成巨大祸害。第三段采用对比式结构,作者探究今时君主背离职分的根源及由此产生的恶果,通过古今百姓对君主的不同态度,肯定了人们将专制君主“视如寇仇”“名为独夫”的合理性。第四段采用纵贯式结构,作者对明晓为君职分的古代君主与孟子,以及不明为君职分的今时君主与浅陋儒生作出评判,并以惨痛史实告诫今时君主:必须固守君主的职分,否则终将招致“无穷之悲”。作者这般论述,若施教者引导受教者研读,受教者定会从文中着重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王权的思想中,获得深刻的启迪与宝贵的教益。

三、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表达技巧

把握表达技巧是经典学术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策略。经典学术文的表达技巧,既包括叙议结合的技巧,也涵盖诠释完美的技巧,还涉及论辩切当的技巧。这与文艺学倾尽全部精力关注的品类——经典

诗歌、经典小说、经典戏剧等以虚构为主的经典文学作品——在表达技巧上存在显著差异。以下主要从经典学术文教育中叙议结合、诠释完美、论辩切当三类技巧的把握展开阐发。

(一)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叙议结合的技巧

经典学术文教育必须重点把握叙议结合的技巧。运用叙议结合技巧的经典学术文,是作者通过以介绍为主的“叙”与以阐释为主的“议”的和谐搭配,规避论据堆砌与空洞说教,进而实现深化意旨的效果。在这一技巧的运用上,吴炫的《一幅恬淡明丽的春之图——读老舍的〈济南的冬天〉》与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极具代表性。

以吴炫的评论文章为例,作者运用叙议结合的技巧,将老舍《济南的冬天》所描写的“特区”(济南)纳入一个兼具阳光、温暖、绿草、笑脸、蓝天与灿烂晚晴的恬淡明丽春景之中,令接受者叹为观止。文中指出,老舍在《济南的冬天》里,首先以“电影镜头”的手法拉开视角、升高画面,让读者得以俯瞰济南冬天的全貌:“一座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它们唤醒”,营造出理想高雅的境界与温馨出色的画面。接着将镜头拉至中景,集中摹写济南的“小山”,以“小摇篮”喻“小山”、以“睡在摇篮里的娃娃”喻济南,生动地赋予“小山”以灵性,极具感染力。随后又勾勒出一幅自称为“唐代水墨画”的图景——“山坡上卧着点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这幅景致兼具古诗画韵味,作为秀美的远镜头,在济南的冬天呈现出鲜明的艺术表现力。作者通过这样的“叙”与“议”结合,施教者若引导受教者深入研读,受教者定会被文中将老舍笔下的冬日济南解读为“恬淡明丽春之图”的独特视角所打动。

再看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作者同样以叙议结合的技巧展开论述。首先,他对前代诗歌进行总体历史评价,明确提出自己倡导的诗歌应具备“汉魏风骨”与“兴寄”气派,希望重现类似“正始之音”且能让“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诗歌风貌,号召世人继承并弘扬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创作出高扬政治理想、彰显强烈个性、兼具慷慨激昂气势与朴实刚健风格的诗篇。其次,对于《修竹篇》中从拟人化表达、寓言式构思及丰富奇特想象等多维度描写修竹品性、功用与志向的内容,陈子昂给予高度认可,这一态度也折射出他当时积极的人生抱

负与豪放的乐观心态。最后,他借评析东方虬《咏孤桐篇》,阐述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诗歌创作模式——“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在他看来,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之所以能成为创作典范,核心在于二者兼具“风骨”与“兴寄”:既有具体充实的内容(言之有物、寄怀深远、因物喻志、托物寄情),又具备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与精要健劲的语言风格。作者通过这样的叙议融合,施教者引导受教者研读时,受教者定会坚定地继承与弘扬文中所主张的古代诗歌“风骨”与“兴寄”的优良传统。

(二)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诠释完美的技巧

经典学术文的教育必须把握诠释完美的技巧。在经典学术文中运用诠释完美的技巧,指的是作者通过对物理、事理、情理等的梳理,以期澄清糊涂的认识、消除思想的顾虑,从而达到更加明确具体、生动形象的效果。像朱德熙的《谈朱自清的散文》和李清照的《词论》等就极具代表性。

以《谈朱自清的散文》为例,作者运用诠释完美的技巧,认为朱自清的散文擅长以唯美的笔调描绘出一个圆融的意境,不论是美景还是一切生灵,均蕴含着深厚的人生哲理,因而显得格外睿智走心。作者开篇便指出朱自清的散文“能够在朴素自然的风格中立新意,造新语,于平淡之中见神奇,平正通达而又富于创造性”,这是全面的评价。接着,作者分别摘引朱自清散文的八个段落作具体分析:第一、二两个段落注重品评朱自清散文朴素自然的风格,这是基础与前提,以此明确朱自清散文风格的总体定位;第三、四、五、六等四个段落说明朱自清的散文善于在朴素自然之中创造新鲜意境,写得饶有情趣韵味;第七个段落表明朱自清的散文善于把静态的东西写成动态的东西,以增加其生动性与灵活性;第八个段落则说明朱自清的散文在锤炼语言方面下苦功夫的情况。经过作者仔细的品评,朱自清散文那朴素自然、清新优美、趣味盎然的艺术风格充分彰显出来。施教者引导受教者阅读,受教者便能从本文整体评价与细部揣摩相结合的鉴赏方法中把握朱自清散文的价值。

又如《词论》一文,作者寥寥不足千言,既要言不烦、言简意赅,又精辟独到、句句在理。李清照由汉魏乐府及随燕乐而兴之词,从南唐词到江西诗派,大致对五代、北宋词坛名家一一进行了点评,论说考证,颇有洞见。该文对南宋中后期形成的一个声势

空前的江湖词派的词学理论具有深刻影响,且其词学理论不出苏门论词的畛域,不仅所讨论的问题一致,而且连词学观点也有一定的承传关系。李清照论词为何出自苏门呢?她的父亲李格非曾游学于苏轼门下,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多与苏门诸君子、学士等切磋交流。她跟随其父生活于都城汴京,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前辈词人的影响。所以,由她来荟萃苏门的词论顺理成章。李清照除继承前人论词观点外,还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认为“词别是一家”,好词必须格调高、有情致、协音律,这就是本色雅正论和宋词才学化的发展趋向,体现在她把北宋词人分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以及她对两类词人的批评和回护态度上^[6]。施教者引导受教者阅读,受教者便能从该文对先前各家的系统评价中明晰优秀词作的标准,并深深敬服。

(三)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论辩切当的技巧

经典学术文的教育必须把握论辩切当的技巧。在经典学术文中运用论辩切当的技巧,指作者通过合理争辩或清晰辩解,评定、明辨是非、正误与妍蚩,进而阐述对事物或问题的见解,以此彰显主观立场与价值取向。像周先慎的《简笔与繁笔》和韩愈的《原道》等,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以《简笔与繁笔》为例,作者运用论辩切当的技巧,明确文章议论的核心议题——“简笔”与“繁笔”的辩证关系。在明确核心议题后,作者针对当时不少作品“写得过长”的创作现实,着重申述理由,倡导“简练为文”,旗帜鲜明地反对“繁冗拖沓”的不良文风。他认为“简笔”指文字简约、用语扼要,需惜墨如金,力求数字乃至一字传神,实现言浅意深、意蕴丰富的效果;“繁笔”则指文字详尽充分,需用墨如泼,即便十字、百字、千字也不吝篇幅,以达到描摹物态穷形尽相、表达情感或心理细致入微的目的。从内容表达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看,“简笔”与“繁笔”的运用需遵循“当简则简,当繁则繁”的原则——“简而淡”会失之单薄,“繁而冗”则显累赘。作者进一步强调:“文章的繁简,又不可单以文字的多寡论”,无论繁简,若以“无可削”“不得减”为标准,便都需经过提炼;最终点明“简笔”与“繁笔”应“各得其宜,各尽其妙”的核心要义。这样的论述逻辑下,施教者引导受教者阅读,受教者便能从中学习如何运用辩证观点论述问题,掌握精粹、全面、深刻阐述见解的方法。

又如《原道》一文,韩愈运用的论辩技巧极为成

功。文章以“明儒道,反佛老”为核心内容,回顾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对儒道的冲击,指出仁义道德之说因此趋于混乱的历史脉络,同时对当下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状深表忧虑。全文立论正大、气势磅礴,行文起伏跌宕、抑扬顿挫,论辩技法之精妙,堪称可与孟子比肩。从论证结构与层次来看,韩愈“明儒道,反佛老”的观点通过三个清晰步骤展开:第一步,明确儒家道统与老子“道德仁义”的内涵差异——提出儒家“道德仁义”的正统性,指出老子“煦煦为仁,孑孑为义”是“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通过对比凸显儒家思想的合理性;第二步,分析儒道衰微与佛道盛行的影响——指出佛道“扰乱”儒家“仁义道德”的危害,再以“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为例,论证老子“去圣去仁”主张的不合理性;第三步,驳斥佛家思想的核心弊端——批判佛家“弃君臣,去父子,禁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清净寂灭”的主张,进而提出儒家应对之策,即“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让僧道还俗、焚毁佛家典籍、将寺庙改为民居)。整个论证过程层层深入、步步推进,逻辑严密到让对手无辩驳之力,堪称无懈可击。透过这样的论述,施教者引导受教者研读,受教者可从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中,获得思想启迪与价值认同。

四、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出色语言

把握出色语言,是经典学术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策略。经典学术文的出色语言,既指细致周密的语言,也指清晰透明的语言,还指精练确切的语言。这与文艺学重点关注的、以虚构为主的经典文学作品(如经典诗歌、经典小说、经典戏剧)的出色语言存在差异——后者更侧重情感渲染与审美建构,而前者更服务于学理的精准阐释。

(一)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细致周密的语言

经典学术文的教育必须把握细致周密的语言。在经典学术文中运用细致周密的语言,指作者通过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的思索,揭示复杂艰深的学理,使读者(或受教者)能领悟到学理背后回味无穷、余韵悠长的内涵。像宗白华的《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和司空图的《与李生论诗书》,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以《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为例,作者运用细致周密的语言,系统阐明了中国艺术(涵盖诗歌、绘画、书法、戏曲、建筑、音乐、舞蹈等)表现中的“虚”与“实”,其中重点剖析了绘画与戏曲的“虚”

“实”关系。文中“虚”与“实”的具体含义,至少包含“有与无”“多与少”“形与神”“真与假”四组关系;在这几组关系中,“虚”的内涵更复杂,也更难把握。“虚”的最表层含义是“无”,例如绘画中有“人物而无背景、音乐中短暂的停顿寂静、书法中墨迹外的大量空白、舞蹈中有程式而无道具与背景等”;其深层含义则指向各类艺术的最高表现境界——“粹”,这也是艺术创作的最终追求。文章第一部分提出“全”与“粹”、“虚”与“实”的统一,是中国艺术传统的重要手法;第二部分阐述中国绘画、戏曲中的空间表现手法,核心是“虚实结合、虚实相生”;第三部分说明中国绘画、书法、戏曲、建筑等的空间感与空间表现,均源于舞蹈动作的延伸。可见,全文语言运用既谨严又邃密,学理阐释层层递进。在这样的论述中,施教者引导受教者阅读,受教者便能通过文中列举的各类艺术现象,进一步体察“虚”“实”手法在不同艺术领域的有效运用。

又如《与李生论诗书》一文,司空图同样以细致周密的语言,通过“辨味”说详细阐释“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这也是其诗歌评论的核心议题。文章着重围绕诗歌的“韵味”展开,明确指出“辨味”是诗歌评论的关键——唯有精准辨别诗歌的韵味,才能真正达成评论的目的。司空图认为,诗歌的妙处在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即需从艺术形象之外的“虚空”处探寻深意,从文字未直接言说的留白中领会“韵外之致”。这里的“韵外之致”,将诗歌的内涵分为“韵内”与“韵外”两层:“韵内”指诗歌的语言、文字、声韵及其直接表达的意义,是呈现给读者的“实在”内容;“韵外”则指语言、文字、声韵及表面意义之外隐含的意味,是一种“虚空”的深层内涵,包含悠远的意境与弥散的艺术空间。二者并非割裂,而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韵内”是基础,“韵外”是升华。二者需紧密联系、相互涵化、相互渗透,唯有“韵内”表达精细到位,方能通向“韵外”的深层境界。透过这样的论述,施教者引导受教者研读,受教者可深入领会文中强调的“以精准有限的语言表达无尽韵味”的深刻内涵。

(二)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清晰透明的语言

经典学术文的教育必须把握清晰透明的语言。清晰透明的语言的经典学术文,就是作者通过有条不紊、由浅入深的思考来展示十分透辟而异常睿智的学理,以期能够尽情地享受到无懈可击、滴水不漏

的兴致。像朱自清的《文学的标准与尺度》和柳宗元的《封建论》等就极具代表性。

如《文学的标准与尺度》一文,作者采用清晰透明的语言,表达了他自己素来从事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观念——“标准”与“尺度”,并仔细地辨析了这两个概念:“我们接受的传统的种种标准”即是所谓“标准”,而“我们修正了的传统的种种标准,以及采用的外来的种种标准”则是所谓“尺度”。也就是只称不自觉的种种标准为“标准”,并“对这些标准本身并不怀疑,并不衡量,只照样接受下来,作为生活的方便”;而改称自觉的种种标准为“尺度”,并对这些尺度“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大概多少经过我们的衡量,而这种衡量是配合着生活的需要的”,以此来显示二者的区别。“标准”原也离不了“尺度”,但“尺度”似乎不像“标准”那样固定,人们常说“放宽尺度”,既然可以“放宽”,那就不是十分稳固的了。这种“标准”和“尺度”的分别,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最容易让人们觉得出来,在道德方面是如此,在学术方面也是如此,都是恪守新的标准和遵循新的尺度。其语言的运用是清楚明白的,也是异常流畅的。作者这样论述,施教者引导受教者读之,他们定会把握好“标准”和“尺度”的分别并努力地使新的尺度成为新的标准。

又如《封建论》一文,作者也是采用清晰透明的语言,论证了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阐述了分封制是过时的制度,抨击了藩镇们维护分封制的谬论,肯定了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将无力改变这一大趋势,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战斗性。从作者的驾驭语言来看,即使比不上贾谊的激情澎湃、韩愈的夸张恣肆,但是他运笔如神,笔力也雄峻深切,含而不露,自是一家风格。像开笔的“天地果无初乎”与“生人果有初乎”虽然是设问,但在“有”与“无”之间表明该文所阐发的是天、地、生民等大事。从西周至中唐两千年的兴亡得失,虽头绪万千,但作者善用正确的观点统率史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三言两语就讲到了问题的实质——“失之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与“失之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当谈论到郡县制的益处之时,则说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全文的观点、史实、论据及论证,融会贯通,言近旨远,骈散相间,透亮通明。作者如此论述,施教者引导受教者读之,他们定会对文中客观地正确评价郡县制的历史进步意义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三)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把握精练确切的语言

经典学术文的教育必须把握精练确切的语言。在经典学术文中运用精练确切的语言,指作者通过严谨细致、精准无误的思考,呈现深邃厚重的学理,让读者(或受教者)能真切感受到文本表达天衣无缝、自然妥帖的质感。像朱光潜的《咬文嚼字》和王国维的《论教育之宗旨》等,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以《咬文嚼字》为例,作者运用精练确切的语言,阐明了“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的中心论点,以及“语言的审美本质与特征”这一美学命题。文章不以深奥理论唬人,所列举的例子并非偏僻的典故,却在作者的运用下被赋予独特的美学意蕴。作者挑选的例子均十分典型,解说更是精辟有力,且例子本身的趣味会随着分析自然转化为受教者的欣赏愉悦。他对这些例子或评析或点拨或品味或议论,娓娓道来,既生动活泼又不失幽默,仿佛与受教者促膝谈心,字字句句都能沁入心田。除了例子选择与解说精妙外,作者运用材料的手法也极具匠心——每个材料的运用都毫无刻意痕迹,仿佛是从例子本身自然流淌出来的精髓,完全看不到被“利用”“发掘”的生硬界限,这正是文章在语言运用上的高超之处。此外,全文的道理与例子、观点与材料结合得极为紧密:材料为观点服务,观点又建立在材料基础之上,让受教者既能明晰其中道理,又能在不知不觉中领悟语言的魅力。在这样的论述逻辑下,施教者引导受教者阅读,受教者不仅能体味文中精微奥妙的思想,还能领略作者扎实过硬的语言功底。

又如《论教育之宗旨》一文,王国维同样以精练确切的语言,提出“教育之宗旨在于培养‘完全之人物’”的观点,即培养能力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才,且论述始终以身心兼顾为出发点。他将人的能力分为内外两类:“精神之能力”为内在能力,“身体之能力”为外在能力。因此“完全之人物”需是身体与精神均发达且调和的人。进一步地,他将人的精神能力划分为“知力”对应的“真”,“情感”对应的“美”,“意志”对应的“善”三个部分,语言准确简明、连贯得体,并得出“‘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情感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的论断。他强调:“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这意味着,培养“完全之人物”,必须让“知力”对应的智育、“意志”对应的德

育、“情感”对应的美育均得到发展。在分别阐述智育、德育、美育三育后,王国维又考察了三者间的关系,认为只有“三者并行”且协调发展,才能“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再结合“身体之训练”对应的体育,方能真正培养出“完全之人物”。透过这样的论述,施教者引导受教者研读,受教者能清晰把握文章论及培养“完全之人物”时主张四育并举的核心旨趣。

五、结束语

经典学术文作为经典文章中的经典专业文类别,在语文教育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对受教者语文(语言、文章、文学)^[7]素养的全面提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上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经典学术文的教育要求:引导受教者把握经典学术文的争鸣性、发展性与开拓性等基本类型,把握对照式、开合式与多样式等大体结构,把握叙议结合、诠释完美与论辩切当等表达技巧,以及把握细致周密、清晰透明与精练确切等出色语言。这些论述基本涵盖了经典学术文的教育策略,施教者若以此指导经典学术文教育,将助力受教者有效实现“提高智能水平”“弘扬人文精神”“追求审美境界”^[8]的理想目标,并切实迈入“人的发展和完整性建构”^[9]的全新境界。

参考文献:

[1]杨道麟.美学视野下语文学科的文章教学浅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130-132.
[2]杨道麟.语文教育学导论(修订本)[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315-317.
[3]陈满铭.“真善美融合”之三探:杨道麟博士的语文教育美学核心思想述评[J].焦作大学学报,2012(4):106-110.
[4]朱晓江.小说的文体特征、功能及其与五四文学变革之关联: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学术月刊,2021(3):160-169.
[5]王钦韶.语文美育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207-208.
[6]郭锋.李清照《词论》新解[N].光明日报,2006-07-28.
[7]曾祥芹.论“一语双文”的语文内容结构观[J].课程教材教法,2015(4):67-69.
[8]杨道麟.语文教育美学研究[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2011:10-11.
[9]曹明海.让语文点亮生命[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7(9):13-14.

(责任编辑 许峻)

On the Educational Strategies of Classical Academic Writings

YANG Daolin¹, XU Changcai²

(1.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1, China)

Abstract: Classical academic writings refer to a style of writing which puts forward new ideas, new understandings and new insights with the specific object of systematic research, formation of special achievements, and promo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This style not only has the originality of opinion, but also has the meticulous nature of argumentation, and has the disciplinary nature of terminology. Therefore, when carrying out the educational strategy, teachers should take the study of articles as guidance and guide the students to grasp the basic types of the classical academic works, such as contending, developing and pioneering, etc.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grasp 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classical academic works, such as contrast, opening and closing, and various styles, as well as the expressive skill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narration and discussion, the perfection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appropriateness of debate, and moreover, to grasp the classical academic careful, clear, precise use of words and other excellent language.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y become creative talents and sound personalities who seek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and enter a brand-new realm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integrity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lassic academic writings; educational strategies; basic types; general structure; expressive techniques; excellent language

新工科背景下高校数学建模教学中 课程思政的挖掘与应用

庞进丽,徐自立,李文龙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基础科学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基于数学建模课程学科特点,探讨课程思政与数学建模教学的有机融合策略及其对学生未来发展的深远价值。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课程思政的内涵与目标,剖析当前数学建模实践教学存在问题,并提出优化路径与具体举措,具体包括:数学建模教学设计创新、思政资源挖掘及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等。通过将数学建模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及思想方法融入教学,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创新实践能力、综合素质及社会责任感;同时结合学生实际需求,强化教育实践的可操作性与落地性,探索数学建模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团队协作能力及全人格培育中的独特作用。

关键词:课程思政融合;社会实践应用;教育评价改革;信息技术整合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15

中图分类号:G641;O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92-06

一、数学建模课程思政的内涵与意义

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数学建模不仅是理工科教育的核心基础课程,还承担着传授知识、培养学生能力的双重职能。但传统数学建模教学过于强调应用层面的工具性,忽略了学生正确价值观及家国情怀、科学精神等情感素养的培养。

课程思政强调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科知识深度融合,旨在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育的有机统一。随着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相关政策的实施,数学建模课程中丰富的文化价值与思政元素亟待挖掘,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教学内容与环节,使其成为高效的育人载体。

(一)数学建模课程思政的内涵与目标

数学建模课程思政的本质在于立足学科特点,将数学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引导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内涵要求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深度融合,通过课堂教学、实践活动及案例研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责任感。

数学建模课程思政的具体目标包括:

1. 激发学生的社会担当:通过建立数学与社会实际问题的紧密关联(如疫情传播趋势预测、防控资源优化配置等数学建模应用),引导学生主动关注社会发展与公共利益,强化社会担当意识。

2. 促进数学文化与哲学思想的渗透:通过梳理数学发展史、提炼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如微积分思想中的辩证思维、数学建模“简化—抽象—求解”过程中的科学方法论),帮助学生领会科学思想的演变,理解数学建模背后的哲学意义,深化文化认同与思维素养。

3. 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通过小组课题研究、跨学科协作等方式,引导学生在团队中共同探索问题解决路径,培养协作意识、沟通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

(二)数学建模课程思政的特点

1. 融合性:数学建模课程思政强调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数学建模的专业知识传授中。通过挖掘数

收稿日期:2025-08-20

基金项目:2024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新工科背景下课程思政融入高等数学课堂教学方法途径探索”(ZGJG202415B)

作者简介:庞进丽(1969—),女,河南商丘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基础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应用数学。

学建模案例中的思政元素,如递归方法在疫情数据分析中的应用^[1],利用递归公式分析疫情传播的动态变化,讲解模型建立与数据预测方法;引导学生用递归公式模拟疫情传播,理解数学在公共卫生管理中的重要性;组织学生分组建立疫情传播模型,预测未来病例数并设计防控建议。通过这一系列设计,引导学生将思政认知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在掌握建模方法的同时增强社会责任感,意识到科学技术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实现价值引领与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

2. 实践性:数学建模课程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并求解的过程,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例如,在讲解线性规划基本理论与求解方法时,结合资源分配实际问题(如水资源、能源分配)展开分析,通过案例讨论有限资源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引导学生设计资源分配方案,讨论不同方案的优劣并进行数学验证。通过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在数学应用中的道德思考能力,树立社会正义观念;同时引导学生运用数学建模方法分析和预测实际问题,在实践中培养社会责任感与应用意识,充分体现课程思政的实践性。

3. 创新性:数学建模课程鼓励学生自由探索和创新,同时要求学生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建模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还能通过团队协作提升其沟通能力与团队协作素养。通过融入思政元素(如结合我国科技领域建模成果案例),主动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奠定基础。

4. 启发性:数学建模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往往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际问题呈现,有助于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其从多个角度审视问题。例如,通过分析传染病模型,探讨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效果评估方法,同时潜移默化渗透政治认同、国家意识等思政要素,引导学生理性理解和支持政府科学决策。

(三) 数学建模课程思政的意义

1. 逻辑思维与科学精神的培养

数学建模通过系统的知识体系和严谨的逻辑推理训练,极大地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课程思政通过以下途径进一步增强学生的逻辑思维与科学精神:

(1) 数学思想的培养:数学建模中的极限、微分、积分等概念要求学生具备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这种思维方式对学生解决复杂问题具有长远影响。

课程思政通过强调科学家精神、科学探索和批判性思维,激发学生理性思维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2) 系统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通过讲解数学建模中的模型建立和解题策略,学生能够学会将复杂问题分解成可处理的子问题,培养出系统的分析能力和严谨的推理习惯。课程思政则通过强调数学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进一步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通过数学建模课程中的案例分析,如传染病模型、交通流模型等,学生可直观认识到数学建模在公共卫生、城市规划等领域的应用价值,进而深刻理解科学的实用性与重要性。

2. 全球视野与国际化能力的增强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具备国际视野和国际化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课程思政在数学建模教育中帮助学生拓展国际化视野,具体表现为:培养国际视角,通过展示世界数学领域的最新发展,解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学问题与前沿研究,帮助学生树立全球视野;通过与国际接轨的数学建模教学内容,使学生既了解全球数学建模前沿,又为未来走向国际化舞台打下坚实基础。

3. 综合素质与人格文化素养的深度培育

课程思政的融入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借助数学建模的历史与文化背景,让学生深刻理解数学与人文学科的紧密联系(如数学与艺术的交融),提升文化素养;在数学建模与课题研究,通过团队项目培养学生的跨团队协作与高效沟通能力;同时,建模过程中的挑战能锻炼学生的坚韧品质,如坚韧不拔、勇于攻坚克难的精神。

4. 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在解决复杂实际问题时,团队成员需协同合作。数学建模活动通过引导学生交流观点、协商思路、共同推进项目,培养团队合作意识与高效沟通能力。在课程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共同面对挑战、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学会倾听意见、尊重观点、协调行动,以达成共同目标。

课程思政则通过强调个人在团队中的责任与角色,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使其认识到个人努力是团队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最终成效。

5. 国家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强化

在数学建模课程思政中,强化学生的国家意识、社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是重要教育目标。结合数学

学科发展史,通过学习国家历史与文化,增强学生的国家意识,激发其为国家和社会贡献的动力。

数学史中诸多知识点与中国数学家的贡献密切相关,通过这些故事可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例如,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将“function”翻译为“函数”,“函”字的解释蕴含中国文化中深厚的语言智慧。讲述其翻译过程及文化背景,既能帮助学生理解函数含义,又能让其感受中国数学家的贡献与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2]。

结合数学史教学,介绍刘徽的“割圆术”及其在求解圆周率精确值上的贡献。刘徽在技术手段有限的情况下虽无法实现“无限”概念,但其探索精神为后人提供了启发。这种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是中国数学家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通过这一案例,可引导学生思考数学建模的演进逻辑,同时激发其学术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2]。

极限思想与《庄子》中“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相契合。结合刘徽割圆术的故事,既展示中国古代数学家在极限思想上的探索,也体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通过这些历史案例,帮助学生理解极限的严谨性与数学文化的重要性,培养科学精神和爱国情怀^[3]。

6. 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的提升

课程思政通过引入创新案例、学科前沿和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在数学建模课程中,鼓励学生突破常规思维,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例如,通过讲述黎曼、陈景润等数学家的创新思路,激励学生突破常规思维、勇于挑战学术难题。同时,鼓励学生将数学建模应用于实际问题(如疫情数据分析、环境监测等),提升其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综上所述,课程思政与数学建模教学的融合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4]。通过深入挖掘思政资源、创新教学方法、优化评价机制、强化教师团队协同及重视学生反馈,可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协同统一。这不仅为数学建模教学注入新活力,也为培养具有科学素养与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奠定基础。

二、数学建模课程思政的现状

近年来,尽管部分高校已开展课程思政实践,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面临挑战,如数学建模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融合不足,教学理念滞后,学生兴趣不高、接受度低,教师能力与团队建设薄弱,思政资源挖掘不足等。(见图1)

数学建模课程思政现状问题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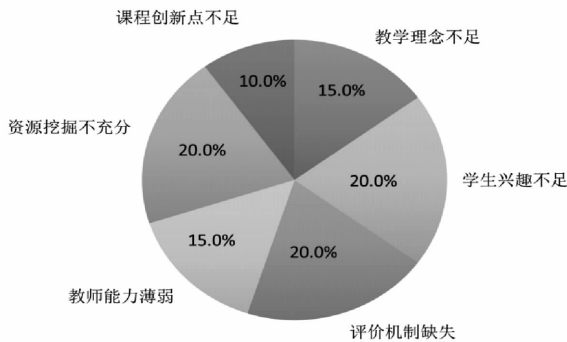


图1 数学建模课程思政现存问题分布

(一) 教学理念与实践的脱节

在数学建模课程思政的推广过程中,教学理念与实际操作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1. 理论层面:部分高校仅停留在文件要求和政策解读上,将课程思政视为任务性工作,缺乏系统的实施方案,未将其内化为教育目标的一部分^[5]。

2. 实践层面:由于课程思政与数学建模教学内容的融合难度较高,许多教师采取“贴标签”式方法,将思政内容生硬嵌入课堂,未能真正触动学生思想。

3. 学生层面:部分学生对数学建模知识理解困难,本身兴趣不高,加之思政元素引入方式刻板,进一步削弱了学习数学建模的积极性。

4. 教材层面:多数数学建模教材未充分体现课程思政要求,缺少贴近现实生活、能激发学生兴趣的思政素材。

5. 资源利用层面:未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虚拟仿真、交互式课件、人工智能等)呈现数学的美学价值与应用价值。

(二) 学生对融入课程思政的数学建模课兴趣不高,接受度偏低

1. 出勤率偏低:相较于其他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数学建模课出勤率更低。学生可能认为这类课程多为考查课,且建模案例难度大、部分案例中思政元素衔接牵强,进而出现逃课现象。

2. 课堂参与度低:即便出勤,学生课堂积极性也不高,存在不专心听讲、低头看手机或做其他事情的行为,对思政与建模内容的融合缺乏兴趣。

3. 考试与作业重视度低:对于融入思政的数学建模课程考试与作业,部分学生持敷衍了事的态度,答题时从网络搜索相似题目照搬。

(三) 评价机制与激励手段不足

1. 单一化的评价标准:当前对学生的考核主要

围绕学习成绩,忽视了逻辑思维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等关键素养的评估。

2. 反馈机制不完善:教学过程中的学生参与度和对思政内容的反馈缺乏有效记录,难以根据学生实际需求优化课程内容。

3. 教师激励不足:课程思政教学成果在教师考核、职称评定中的权重较低,削弱了教师参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

(四)教师能力与团队建设不足

1. 专业能力单一:数学建模教师大多专注于数学教学本身,缺乏对课程思政理论的深入研究与实际操作经验;思政课教师则缺乏数学专业知识支撑,难以深度参与建模课程思政设计,导致课程思政实施效果较不佳^[6]。

2. 团队协作薄弱:教师团队间协作不足,多数数学建模教师孤军奋战,未能形成以思政目标为核心的跨学科协同育人机制^[7]。

(五)思政资源挖掘不足

1. 知识点挖掘片面:思政资源挖掘大多仅集中在数学史或数学家精神层面,忽视了数学思想方法及其哲学内涵(如极限概念蕴含的辩证思想)与现代社会应用(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中的数学支持)的结合。

2. 缺乏对学生需求的关注:学生更希望看到数学建模与日常生活、社会发展的联系及其中的思政元素,但建模课程内容大多仍停留在理论应用层面,难以激发学生对数学建模及其价值的兴趣。

(六)数学建模中课程思政创新点研究不足

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具体实践路径与评估机制缺乏科学支撑。数学建模课程中涉及的抽象概念与思政内容的结合,仍需更深入的实践探索与案例积累。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提供具体课堂教学实践案例及评估模型,为数学建模课程的课程思政实施提供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三、课程思政与数学建模教学的交互融合路径

(一)挖掘与整合课程思政资源

1. 数学文化与历史:通过引入数学史中的重要人物、事件及成果(如祖冲之的“割圆术”、欧拉公式的推导历程与数学美感),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与科学探索精神。

2. 数学应用与社会发展:结合实际案例展示数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例如,讲解线性代数时,可分析线性代数知识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中的应用,增强学生对数学的现实

认同感。

3. 数学建模思想与哲学方法:通过讲解数学建模的逻辑严谨性及抽象思维,如极限理论中的“无限接近”思想,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与对事物本质的洞察力。

(二)创新教学手段与方法

1. 结合历史与现实:通过引入数学史中的重要事件与人物故事(如牛顿与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发展的学术争论),帮助学生理解科学发展历程的曲折性与学术探索的严谨性,培养理性思辨意识。

2. 注重案例教学:结合社会热点与实际问题的设计教学活动,如讲解优化问题时,通过分析“绿色能源分布模型”“资源分配方案”“环境保护规划”等案例,引导学生关注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理解数学知识的现实价值与应用场景。以“极限的概念”教学为例,具体实践设计如下:

(1)内容设计:讲解极限的定义与典型应用场景,引导学生思考事物的变化规律与“无限接近”的核心思想。

(2)思政融入:将中华诗词与数学概念结合,既能凸显传统文化魅力,又能具象化数学的含蓄之美。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淋漓尽致地刻画了极限的意境——“帆影”随时间推移逐渐趋于零,与极限“无限接近”的核心思想高度契合。这种多感官联动的教学方式,能帮助学生加深对极限概念的理解与记忆,同时感受数学概念之美带来的愉悦。

(3)课堂活动:引导学生用数学表达式模拟“帆影”随时间变化的过程,讨论“帆影”随时间变化的最终趋势,体会极限思想的意境与内涵。

(4)价值引领:通过中华诗词与数学概念的关联分析,增强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文化认同与现实感知,激发对传统文化与数学学科的双重兴趣。

3. 强调跨学科融合:讲授数学建模中的概率论与统计学知识点时,结合人工智能(如数据训练中的概率分析)、大数据(如趋势预测中的统计模型)等热点技术的应用场景,帮助学生认识数学建模在科技领域的应用前景。

4. 多媒体与信息技术融合:利用数学软件与可视化工具(如 GeoGebra、MATLAB 等)展示数学模型的结构特征与内在美感,提升课堂趣味性、参与度及学习体验。

5. 项目式学习:引导学生参与跨学科小组实践

项目,通过解决复杂现实问题(如构建疫情传播模型分析防控策略有效性),增强社会责任感与实践应用能力。

6. 智能化教学平台建设: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技术开展个性化学习分析,为教师提供精准教学反馈及教学改进建议,实现跨地域、跨时空的数学建模课程思政教育。

7.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结合线上学习与线下互动,通过线上视频讲解、网络讨论与线下课堂研讨、实践操作,深化学生对数学建模知识与思政教育内容的理解。

(三)构建协同育人的教学团队,强化教师培训与团队协作

1. 强化多学科教师协同合作:推动数学建模教师与思政课教师深度协作,共同设计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内容。双方需通过常态化交流,探讨思政元素与建模知识的融合路径,打造课程思政导向的综合育人模式。例如,在数学建模课程中嵌入“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主题讨论,丰富课程的思想深度与内容广度。

2. 优化教师培训与能力提升体系:组织数学建模教师定期参与跨学科培训,重点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内容,提升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水平与实践能力。教师不仅需精通数学专业知识与建模教学技能,还需掌握思政内容与课堂教学的有机融合方法。

3. 搭建跨校教师交流与经验共享平台:通过组织校际教师交流、教学研讨等活动,分享课程思政教学成功经验与实践案例,实现互学互鉴,进而优化数学建模课程思政融入的教学方案与思政内容实施策略。

(四)评价机制的构建与优化

当前数学建模课程的评价体系主要集中在学生学习成绩这一单一维度,未来需从多个维度评估学生的全面发展水平,构建多维度综合评价体系:

1. 构建多维度综合评价维度:课程评价体系不仅要关注学生的数学建模知识掌握情况,还应覆盖逻辑思维能力、创新精神、团队合作能力、社会责任感等综合素质维度。可依托课题研究、小组合作项目、创新设计、企业合作实践项目等多元化载体,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

2. 完善常态化学生反馈机制:建立常态化的学生反馈机制,定期收集学生对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及思政元素融入效果的反馈。通过系统分析学生反

馈,及时调整教学方法与内容,使课程更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学习特点及实际情况。

3. 构建双向激励机制:通过课外活动、学科竞赛等形式,激励学生积极参与课程思政相关实践活动(如主题建模竞赛、思政案例设计等),并将参与情况纳入学校评价体系,给予相应的激励(如评优加分、实践学分认定等)。对教师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创新实践与贡献,学校也应给予适当的认可与奖励(如教学成果认定、绩效倾斜等),激发教师持续改进教学方法的积极性。

(五)学生反馈与数据分析

通过学生问卷反馈可直观了解课程思政元素的实施效果。例如,数学建模课程中“思政环节”活动后,学生普遍表示课程内容更生动有趣,学习兴趣与逻辑思维能力显著提升。

数学建模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改革,不仅为学生的知识学习提供价值引领,还显著提升学生课程参与度、强化团队合作精神。改革效果可从学习成果提升、学生反馈积极、教学方法改进三方面具体体现。

1. 学习成果的提升

经过一学期的课程改革,学生的建模能力与学业水平显著提升。以某班学生为例,期末综合成绩数据显示:平均分:从改革前的 67.37 分提高至 74.02 分,提升约 9.9%(接近 10%);优秀率:从 15.87% 提升至 26.56%,表明更多学生达到较高知识掌握水平;不及格率:从 25.40% 降至 17.19%,不及格人数明显减少,说明更多学生达到课程基本要求^[8]。

2. 学生反馈的积极性

问卷调查显示,学生对课程改革的接受度较高:85.9% 的学生支持“建模那些事儿”课堂活动,认为该形式能有效提升学习兴趣;56.1% 的学生更认可“传统讲授+思政活动结合”的教学方式;72.7% 的学生倾向于课堂问题讨论与实际问题解决,体现了学生对学术挑战的强烈需求。

学生普遍反映,课程思政帮助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与学习观。通过学习历史上的数学文化案例和数学在现代技术中的应用,他们深刻理解数学的现实意义,同时增强了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

3. 教学方法的改进

教学实践中,教师的教学方法更具创新性与针对性:

课堂互动性增强:通过“数学建模那些事儿”等

创新活动,学生课堂参与度显著提升,尤其在小组讨论、案例分享及挑战题环节,学生表现出较高的兴趣与投入度;

过程性评价体系更完善全面:将单元测试、课堂表现、小组项目、期末大作业等多维评价方式结合,使学生的学习过程与结果均得到有效评估。

未来数学建模课程思政的优化路径,应从整合课程思政资源、开展系统化教师培训、创新教学手段与方法、完善评价机制、深化跨学科融合及应用信息反馈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持续创新与优化,课程思政将进一步增强数学建模教学的深度与广度,推动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培养具备创新精神、社会责任感及全球视野的高素质人才,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四、结语

数学建模课程思政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在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综合素质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育人作用。未来的教学改革应进一步优化课程设计、深化思政资源挖掘,旨在实现数学建模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培养更多兼具数学建模专业素养、科学精神与家国情怀

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姜鑫.课程思政与高等数学教育融合的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3(10):187-188.

[2]陈佳.教学课堂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探析:以高等数学为例[J].现代商贸工业,2023,44(5):221-222.

[3]舒红,张穗.高等数学中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初探[J].科教导刊,2022(9):121-124.

[4]李萍.课程思政融入高校数学专业教育的意蕴、现状及路径研究[J].大学,2023(36):88-91.

[5]龙奕羽.素质教育视野中高数教学与课程思政的融合[J].现代职业教育,2021(23):184-185.

[6]何其慧,王军.数学建模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探讨[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23(5):48-49.

[7]李万军.课程思政理念下数学教育目标解析[J].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2020,33(2):76-80.

[8]李广玉.课程思政理念指导下的高等数学过程考核实施方案[J].高等数学研究,2022,25(1):124-127.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ation & Application of Ideological Ed. in Math Modeling Teaching under New Engineering Ed.

PANG Jinli, XU Zili, LI Wenlong

(School of Basic Sciences,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urs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urses and mathematical modeling instruction, as well as its far-reaching impact on students' future development. It elucidates the connotation and objectives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urse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alyzes the current issues in practical teaching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such as innovative instructional design for mathematical modeling, exca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and establishment of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By incorporating the cultural value, aesthetic value, and methodological thinking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into instruction, it cultivates students'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Meanwhile, by considering students' actual needs and emphasizing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practic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nique role of mathematical modeling in nurturing innovative spirit, team collaboration ability, and holistic personality shaping.

Key words:ideological Ed. integration; social practice App.; Ed. evaluation reform; IT integration

大学化学课程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王焕锋¹, 李玉玲¹, 王利平¹, 李晓静¹, 赵建波²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郑州轻工业大学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以大学化学课程为依托,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导向,针对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基础化学课程教学中存在课堂教学方法单一,缺乏系统完善的创新性教学案例库、教师的科研项目与学生的认知水平存在断层、创新性教学停留在表面等问题,通过师生共建创新教学案例库、科研项目分层次转化为教学资源、智慧化创新教学等方式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策略,为专业课程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指导。

关键词:大学化学;应用型本科高校;课程教学;创新型;人才培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16

中图分类号:G642;O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098-05

2018 年召开的第一次新时代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金课”概念,要求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持续改进”的 OBE 理念。“金课”的评价标准被设定为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性,这三大标准为高校课程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方向。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高等教育育人理念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有效衔接、良性互动,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为高校化学化工、材料及工程等专业的必修基础课,大学化学涵盖“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普通化学”等课程,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专业基础的夯实效果与创新思维的启蒙。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依托基础学科建设培养具备创新思维的高素质人才,其探索成果对后续专业课

程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学化学课程创新人才培养研究现状

大学化学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与实践,首先在国内部分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及拥有特色优势学科的地方本科院校推进,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华大学、东北石油大学等。这些院校依托学科优势或区域特色,为大学化学创新人才培养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北京大学率先在其优势学科——化学学科开展“拔尖计划”,形成“低年级统一培养、高年级个性化培养、本科生参与科研、选修前沿课程”的分层培养与全面把关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了多样化、个性化的立体课程体系。

然而,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定位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实践探索中仍存在诸多问题:缺乏系统完善的创新性教学案例库;教

收稿日期:2025-08-03

基金项目:2024 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金课背景下依托大学化学课程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2024SJGLX0569);“教育数字化背景下以自主学习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2024SJGLX0566);“新工科和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地方高校化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2024SJGLX0135);2024 年度河南省本科高校研究性教学示范课程“应用化学综合实验”(教高[2024]403 号);2023 年河南省本科高校研究性教学示范课程“分析化学”(教高[2023]36 号);2021 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基础化学教学中的立体课程思政构建”(KCSZJG202102)

作者简介:王焕锋(1985—),女,河南新密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基础化学课程教学与改革。

师的科研项目的深度与广度同学生的认知水平存在断层;教师科研素养不足,跨学科知识融合教学能力有限,导致创新性教学仅停留在表面。这些问题与应用型本科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定位不匹配,难以满足地方对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因此,探索切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大学化学课程体系,为地方经济建设输送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势在必行^{[1][2]}。这不仅完善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化学教学体系,也能为地方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二、大学化学课程创新性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课堂教学方法单一,缺乏系统完善的创新性教学案例库

传统课堂教学以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难以激发学习兴趣与创新能力。同时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师生已形成的教、学习惯与方式需时间逐步转变,且需知识积淀支撑,导致教师难以准确把握学生的学习需求^[3]。在实践教学中,由于学生知识深度有限,综合性、创新性实验在有限课时内难以有效开展,通常以“教师讲解演示、学生按实验教程重复操作”的形式进行。这种“被动模仿”的实验模式制约了综合创新能力与思维的提升。

此外,现有创新性教学案例存在三方面问题:数量不足,难以满足不同教学场景需求;更新迟滞,无法及时反映学科前沿与实际应用;质量参差不齐,部分案例缺乏针对性、实用性与创新性,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深度思考,无法为不同专业、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适配的教学资源。

(二)教师科研项目的广度和深度与学生认知水平存在断层

在基础化学创新性教学中,教师参与的科研项目往往具有较高的广度和深度,但与本科教学目标的衔接度不足,导致其与学生认知水平存在明显差距。科研项目涉及的知识领域广泛,教师虽在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与专业知识,但学生的知识多局限于教材与课堂所学,难以理解和掌握项目中的高阶知识与技能。这使得教师在传授科研相关知识时,需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进行知识整合与简化以适配学生的认知水平。

同时,科研项目通常涉及复杂的实验操作和理论分析,教师在长期教科研工作中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深入的理论知识,但学生基础知识掌握尚处于初级阶段,难以达到项目的深度要求——这需要长期的知识与实践积淀,导致学生参与科研项目时,难以理解核心知识、掌握关键技能,直接影响

创新性教学效果。

此外,化学实验与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但当前教学中存在理论教学内容偏重、基础化学实验课时有限、可安排实验项目较少的问题。且学生面临从中学到大学的角色转变^[4],刚步入大学时难以顺利开展基础化学的自主探索实验,需通过持续的课程学习与实践逐步实现知识积淀与创新能力提升。这一现状进一步加剧了科研项目与本科创新性教学的脱节,不利于创新性教学的推进。

(三)理论和实践教学结合缺乏系统融合度,创新性教学停留在表面

在课程设置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存在明显脱节。理论课程内容与实验课程内容缺乏有效衔接,学生难以将课堂所学理论知识直接应用于实验操作。开设的实验课程多为理论课程的补充,导致学生重视程度不足,难以形成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课程体系。在实验教学方法上,受学科兴趣、教学惯性等因素影响,多数仍沿用传统讲授式教学,部分学生将实验课程的目标定位于“完成学分”,而非真正的探索^[5]。此外,实验设备与试剂资源有限、实验室开放时间不足,无法满足所有学生深入实践的需求,进一步制约了实践教学的创新效果。

在师资水平方面,部分教师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性教学需要教师具备深厚且宽广的知识积淀——科学前沿与学术成果既是创新的灵感源泉,也是激发学生前进的动力与强大支撑,通过分享学术前沿成果,可有效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与社会责任感。但对于新建应用型本科高校而言,部分教师虽在知识传授上具备娴熟的教学技能与扎实的理论基础,却缺乏对学生创新性思维培养的系统规划与实施策略,难以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有效结合,在专业教学中引入科研内容时较为生硬,难以开展高质量的创新性教学,教学缺乏创新深度与高度。

在课程评价方面,创新性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教师与学生对创新性教学的成果缺乏明确的认知与衡量标准,评价体系未能有效反映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导致教学方法与学习方式的改进缺乏动力^[6]。虽在课程评价体系中强调“丰富考核方式”^[7],但创新步伐迟缓:扩展后的考核体系中,过程性考核仅为课堂表现、作业、考勤等传统考核方式的简单拆分,忽视了对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的的评价,未能深入探索真正体现创新教学目标的考核方式,难以真正引导教学向“创新能力培养”转型,导致创新评价形式停留在表面。

三、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策略

(一)更新教学方法,师生共建创新教学案例库

系统融合学科前沿动态与教学需求,构建创新性知识案例库,让创新教学从理念落地为具体实践。以“金课”评价标准和 OBE 理念为引领,结合学科新成果与授课教师科研经历,构建创新性知识案例库并推进讨论式教学,让学生在案例研讨中主动探索知识,而非被动接收,逐步构建完善的思维体系和知识结构;同时通过智慧化教学平台和中国大学慕课优质在线资源辅助课堂教学,如通过平台发布案例预习任务、组织线上讨论,延伸课堂教学维度,拓展课堂空间,提升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

建立系统完善的创新性教学案例库,需充分考量学生知识背景、课程目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化学知识在不同专业领域的实际应用。同时,案例设计需具备一定的复杂性、交互性与参与性。这些设计原则既贴合“金课”高阶性、创新性要求,也能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认知需求。教学目标聚焦于让学生掌握大学化学关键概念、原理与技能,培养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及创新能力。案例选取需充分考量挑战性与高阶性,确保体现化学知识在专业领域的应用,建立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关联。此外,可结合不同专业、学情选择与课程内容紧密相关、适配学生发展需求的教学案例,整合课程内容并适当增设跨学科课程(如生物化学、材料科学、环境化学等),联合物理学、生物学、工程学等领域专家共同设计课程^[8],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主动性,培养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以分析化学课程为例。依据专业毕业要求与课程的关联矩阵,确立“认知—理解—知识迁移—应用实践”分层递阶的课程目标;整合课堂 PPT、分析化学助教课件、科普视频等课内外联动教学内容,实施以定量分析为主线,融合理论与应用、课堂讲授、内化吸收及课堂讨论的教学模式;建立包含课程参与度、雨课堂章节测试、小组专题探索、期末考试四种形式的三维协同考核体系;通过考核数据分析评价课程目标达成度,结合督导听课反馈意见开展反思改进,形成“教学实施—效果评估—优化调整”的闭环。

突破传统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通过角色扮演、模拟实验、小组讨论等多元形式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引导学生开展深入分析与讨论。开发创新理论教学环节,将专题探索作为学生创新实践的新途径;针对有挑战性的大案例,在呈现前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与理论知识,帮助学生建立理解基础,再引导

其分解为若干小问题,降低认知难度,逐步深入案例核心;讨论案例时,引导学生聚焦关键问题,鼓励提出假设、设计方案并进行批判性分析;案例分析结束后,引导学生总结关键知识点与技能,讨论如何将知识拓展应用到其他情境,培养知识迁移能力与拓展应用能力。

除课堂讲解案例外,鼓励学生自主提出创新案例,并通过实验报告、探索单、小组讨论等形式在课堂上展示。根据学生反馈与教学效果,将优质案例纳入课堂教学案例库,从而实现师生共建创新教学案例库。例如,大一下学期面向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开设的分析化学课程,在课程体系中设计了以四大滴定为主线的“面包中营养成分检测、食品灰分测定的误差分析、柠檬汁总酸度测定(酸碱滴定法)、胃舒平药品中铝与镁含量测定(配位滴定法)、蛋壳中钙含量测定(高锰酸钾法)、果汁中抗坏血酸含量测定(氧化还原滴定法)、工业盐中 NaCl 含量测定(沉淀滴定法)”系列专题探索。同时,鼓励学生扩展创新性教学探索库,形成如“基于酸碱滴定原理的衣服污渍洗涤、水垢清理”“基于氧化还原滴定原理的补铁剂中亚铁离子含量测定”“基于配位滴定原理的罐头中铁离子含量测定、药品中钙离子含量测定”“基于沉淀滴定原理的鱿鱼丝中氯化物含量测定”等案例,最终构建起集师生智慧于一体、兼具专业特色与实用性的创新教学案例库。

(二)科研项目分层次转化为教学资源

针对教师科研项目的深度、广度与学生认知水平之间的矛盾,教师将科研项目转化为教学资源时,可将项目拆分成符合学生现阶段知识层次和接受能力的小研究课题与阶段性任务,开设分层次实验,遴选大二学生参与“三进”(进团队、进课题、进实验室),并延伸至毕业论文或大创项目,实现创新理念与科研能力培养的连贯衔接。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将科研项目中的高阶知识与技能转化为学生可理解的教学内容,通过案例解析、分步指导等方式传授给学生,并鼓励学生自主学习,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提升认知水平与创新能力,以适应科研项目的广度与深度要求。此外,教师可将自身学术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教学资源,整合其他资源开设创新实践课程或丰富现有实验项目,实现教学内容的更新与完善,提升课程内容的实用性与前沿性,鼓励学生走进实验室,参与实验项目的设计与研究,培养创新实践能力与探究性思维,实现教学研相长。

创设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科研项目。教师可结

合教学目标,依据学生的知识背景和兴趣,通过课前测、问卷调查、作业评价等方式了解学生的知识基础、思维能力、学习兴趣与动机,合理设定教学目标,设计具有适宜广度和深度的探究性、实践性、创新性科研项目——既涵盖基础知识与拓展内容,又确保项目既有挑战性又可达成。这些项目设计既贴合学生现有能力,又能引导学生逐步突破认知边界。针对不同认知水平的学生,提供基础、中级、高级等不同难度的科研项目,让学生自主选择适配的项目。鼓励学生提出问题、设计实验、收集数据与分析结果,教师及时给予反馈与指导,支持他们提出独特见解,并在项目结束后组织成果展示与评价,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基于学生参与课题的科研经验,组织学生开展头脑风暴、参与创新竞赛(如“挑战杯”“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创项目及各类学科竞赛,带领学生参加高水平学术交流活动,激发其创造力与知识迁移应用能力,在项目实施或竞赛过程中全方位提升科研素养与创新思维^{[9][10]}。

(三)创新理论与实践课程体系

构建模块化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体系。密切关注学科发展前沿,构建模块化理论与实践课程体系,探索创新教学模式^{[11][12]}。依据创新性教学特点与理念、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及课程发展需求,整合课程教学内容,重新分配学时,编写教案,更新创新课堂教学资源。按教学阶段在理论与实验教学中构建模块化体系:理论课程设立专业基础、专业提高、专业拓宽等模块;实践教学立足实验教学的基础性、综合性、整体性与创新性,设立基础化学实验、综合性实验、创新性实验、专题探索四个层次的实验课程。以模块化理论课程、基础实验课程、综合开放式实验及延伸的毕业设计构成有机整体,形成基础化学创新型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加强校企合作,充分利用校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如教材、实验设备、网络资源、企业技术资源等),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与实践平台;通过联合企业开发实践课程、邀请企业专家参与教学指导等方式,与企业共同设立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就业机会,加大实验、实习、实训等实践环节的比重。让学生在真实工作场景中运用化学知识解决真实问题,提升实践能力,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创新人才^{[13][14]}。

(四)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推进智慧化创新教学

在课程模式上突破传统单一的线下授课模式,借助中国大学 MOOC 同步线上课程和其他经典“无机化学”视频(如选取与课程章节匹配的优质视频

资源,提前发布供学生预习),辅助雨课堂信息化教学工具,实现师生高效交互、生生深度互动。利用现有“无机化学”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资源,整合课程中的课件、习题、案例等内容,引入创新性设计案例,结合学生认知节奏循序渐进开展课堂教学。

同时,开发以学生为中心的“三醒三思”教学理念,形成“课前唤醒—课中思辨—课后升华”的闭环教学流程:课前通过教师科学导学,唤醒学生对所学章节知识的认知,鼓励学生收集创新性案例、科技前沿资料,有针对性地设计创新性教学内容;课中引导学生勤学思辨,教师实时答疑解惑,帮助学生在解决疑惑中实现认知觉醒,同时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探究式、跨学科教学等方式,邀请具备专业优势的教师 and 开展国际前沿创新研究的课题组参与授课(如开展专题讲座、联合授课等形式),拓展课堂教学空间,培养学生的科学创新能力与前沿科技认知,提升课程的创新性和挑战度;课后进一步拓展课堂学习空间,通过完成探索单、研究报告等探索性学习任务,实现学生高阶思维的升华。从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到课后拓展的各环节,始终将创新素质培养与启发式学习理念贯穿其中,以科学前沿为引领,激发学生探究性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能力与创新创造力。此外,对于高成本实验、高危险实验或难以在实验室中完成的实验,可使用虚拟仿真技术进行模拟实验,既降低实验风险与成本,又能让学生反复操作掌握关键步骤,在安全的虚拟环境中深入学习实验操作与原理^{[15][16]}。

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教师可借助 AI 技术、虚拟仿真等智能化手段辅助开展案例教学、探究式教学等。课前发布探究性问题,推荐学生通过 AI 工具(如清华智谱清言)提问、梳理相关知识,激发学习兴趣,培养主动探究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普通化学”的“气体”章节教学中,课前发布“‘祥云 AS700’载人飞艇”相关视频,引导学生通过 AI 搜集整理飞艇升空原理与载气选择的相关知识。课堂中进一步引导学生运用所学气体性质知识进行载气方案设计,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知识迁移能力。借助雨课堂、清华智谱清言、课程公众号等平台,向学生推送最新学术进展、科技成果,延伸课堂教学边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探究性学习能力与深度思考力^[17]。

此外,需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与选拔,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如定期开展智慧化教学技能 workshops、邀请专家开展专题讲座等),敦促教师不断完善知识架构,学习先进智慧化教学手段,更新专业知识体系与辅助教学资源,为课堂教学持续补充前瞻性、创造

性和技术性研究成果,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与创新能力,为构建高阶性、创新性、挑战性课堂扩充资源^[18]。

参考文献:

- [1] 刘成宝,袁妍,蒋伟娜,等. 省属地方高校材料化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J]. 当代化工研究,2022(2):123-125.
- [2] 秦祖赠,潘远凤,谢新玲,等.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化工创新人才培养探索[J]. 广州化工,2022,50(14):225-227.
- [3] 翟玉娟,王志兵,朱晓飞,等. “五度合一”化学交叉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 教育教学论坛,2023(25):168-170.
- [4] 刘建,秦源,陈冬梅,等. 科研育人视角下大学生创新型人才培养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J]. 教育与人才,2022(6):86-91.
- [5] 韩杰,李一峻,邱晓航. 一流课程建设:基础化学实验[J]. 化学教育,2021,42(18):79-84.
- [6] 张伟. 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高分子材料”课程改革实践[J]. 广东化工,2022,49(10):239-240.
- [7] 曾宪彩,李梦硕,张莉,等. 工程认证背景下大学化学基础课程达成度评价体系构建及教学改革探索[J]. 安徽化工,2024,50(2):189-192.
- [8] 郭鸾欢,刘学春,彭清才,等. “互联网+”背景下生物技术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探索[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22(3):139-141.
- [9] 周淑芳,刘纪新,邵瑞影. 基于成果导向的“专创融通”

人才培养机制研究与实践[J]. 高教学刊,2023(34):145-148.

- [10] 赵坚,赵志国. 地方本科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实践路径研究[J]. 创新与创业教育,2022,13(6):116-120.
- [11] 王焕锋,李玉玲,王利平,等. 分析化学理论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探索[J]. 大学化学,2021,36(9).
- [12] 于录,周建国,杨银慧,等. 地方工科院校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以大学化学为例[J]. 山东化工,2021,50(20):201-202+205.
- [13] 柴波,孙亚,王婷婷,等. 新工科背景下材料化学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3(13):141-143.
- [14] 李玉玲,孙浩冉,王宇飞,等. “双创”背景下本科生人才培养模式探究[J]. 教育信息化论坛,2023(3):69-71.
- [15] 刘洋,姜丹,徐立新,等. “三全育人”视角下化学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与管理[J]. 广州化工,2022,50(13).
- [16] 叶龚兰,尹霞,许峰,等. “四位一体”的无机化学教学创新[J]. 大学化学,2024(8).
- [17] 刘胡海. 基于胜任特征的大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研究[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41(6):135-138.
- [18] 李玉玲,王焕锋,李晓静,等. “221”智慧教学模式在化工专业“分析化学”课堂教学中的实践[J]. 安徽化工,2023,49(5):182-186.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Mode Based on the College Chemistry Course

WANG Huanfeng¹, LI Yuling¹, WANG Liping¹, LI Xiaojing¹, ZHAO Jianbo²

(1.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Henan 450000,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courses of college chemistry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a series of practice strategy of innovative talent training mode strategies including the co-construction of innovative teaching case base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hierarchical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into teaching resources, and intelligent innovative teaching are explored, to solve the single teaching method, lack of systematic innovative teaching case base, gaps between the research projects of the teacher and the cognitive level of the student, as well as the superficial innovative teaching in the basic chemistry courses of newly built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providing a valuabl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Key words: college chemistry;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course teaching; innov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成长母题叙事电影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价值与应用

王安然

(郑州轻工业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在数字化时代,大学生的认知方式与行为逻辑同传统思政教育模式存在适配性冲突,导致思政教育实效性显著降低。成长母题类电影以个体成长轨迹为叙事核心(尤其贴合青少年至青年阶段的成长体验),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具备认知重构与价值引领、情感共振与人格塑造、行为触发与实践引导等核心价值与育人功能。构建“成长电影+思政教育”融合模式,并通过“创新课程体系设计、构建动态评价体系、协同拓展实践平台”的创新策略,提供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创新方案,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实效性,推动主流价值观内化,进而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关键词:成长母题;成长电影;思政教育;教育模式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17

中图分类号:G641;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103-06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电影作为“综合艺术载体”,具有强大视听冲击力与情感穿透力,是文化价值塑造与意识形态传播的关键媒介之一。电影以独特叙事方式、丰沛情感与深刻主题,深度融入当代大学生的文化生活^[1]。在当前文化环境、政策导向与国家文化战略的多重驱动下,顺应“大思政课”建设要求,以电影为教学资源,构建“电影思政”教学模式,借助光影故事激发大学生的情感共鸣,引导学生思考社会现象、人生哲理、道德规范等思政相关问题,促进学生主动提升思想道德品质、塑造正确价值观念,无疑是推动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有效路径。

以成长为叙事母题的“成长电影”,细腻呈现青少年至青年阶段个体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成长轨迹,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价值。成长电影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能创新思政教育载体,为思政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一、成长电影的多维度分析及教育范式比较

(一)成长电影的内涵阐释

以成长为核心叙事母题的电影被定义为“成长电影”,这类电影聚焦主人公从懵懂无知到具备清

晰自我认知与社会责任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成长蜕变过程。区别于普通剧情片,成长电影通过“困境—挣扎—超越”的三段论叙事结构,展现主人公在经历重大生活事件与激烈内心冲突后,通过持续挣扎与抉择实现自我成长与价值观重塑。成长电影以影像叙事将成长母题具象化,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主人公的成长历程。

成长电影具有三大核心特征:一是主体性觉醒,即主人公在故事进程中,逐渐摆脱生活困境与命运束缚,深度思考自身人生目标与发展方向,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抉择的认知跃升;二是价值观嬗变,即主人公在成长经历中,对善恶、美丑、是非的判断标准发生正向改变,形成更为成熟且符合社会正向发展的价值观念;三是自我超越,即主人公突破自身原有能力边界、性格局限或心理障碍,在知识、技能、心智、品德等方面实现全面进阶,完成自我人格的成长飞跃。

(二)成长电影的发展脉络

成长电影的产生与发展可追溯至20世纪初期,伴随电影艺术兴起,成长母题逐渐受到创作者关注。早期的成长电影多以家庭、学校为背景,展现青少年成长烦恼与未来憧憬。如法国新浪潮代表作

收稿日期:2025-08-10

作者简介:王安然(1993—),女,河南周口市人,硕士,郑州轻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四百击》(1959年),真实细腻地描绘少年安托万在家庭与社会环境中的迷茫探索,开创现代成长电影先河。20世纪中期,欧美成长电影蓬勃发展,这一时期的电影更注重个体心理刻画与社会现实反思。如《毕业生》(1967年)展现主人公青春期情感的觉醒,体现青年对传统价值观的质疑。20世纪后期,成长电影在全球呈多元化发展,主题更丰富,叙事手法和表现形式不断创新。《阿甘正传》(1994年)借阿甘从先天缺陷者成长为越战英雄、企业家和精神导师的历程,展现人格成长与美国社会变迁;《死亡诗社》(1989年)因对理想和自由的追求而成为经典。

中国的成长电影也历经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2]。早期的成长电影多为革命历史题材,如《小兵张嘎》(1963年)、《闪闪的红星》(1974年),展现战争年代少年儿童的革命成长。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多元,题材和表现形式更丰富。《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年)聚焦社会转型期青年的迷茫觉醒;《少年的你》(2019年)、《狗十三》(2013年)展现当代青少年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的成长困境与突破;现象级国漫哪吒系列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年)及《哪吒之魔童闹海》(2025年),融合传统文化与科技美学,构建鲜明的民族精神叙事。

(三)成长电影的主题类型

1. 人格成长类。这是成长电影最核心的主题之一。这类电影着重展现人物性格、品质、价值观等方面成长,通过困境、挑战或内心挣扎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当幸福来敲门》中主人公经历失业、被驱逐等困境后努力奋斗,从普通推销员成长为成功金融家,培养坚韧、乐观和责任感等品质。《心灵捕手》中,威尔是一个拥有数学天赋但存在心理问题的年轻人,在心理学家尚恩的帮助下,他逐渐打开心扉、治愈内心创伤,学会正视内心世界。

2. 情感成长类。这类电影主要围绕人物在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关系中的成长展开,通过情感的磨砺与体验,助力人物实现心灵成熟。例如《岁月神偷》细腻描绘香港20世纪60年代普通家庭的生活日常,既展现了手足间的扶持、父母对子女的深沉爱意,也刻画了主人公在爱情中的懵懂与蜕变,传递出温暖且坚定的情感力量。《阳光姐妹淘》以女生间的友情故事为核心,在展现青春美好与纯粹的同时,也体现出友情在时光变迁中的坚守与人物的成长。《怦然心动》则透过少男少女纯真的情感互动,不仅讲述了不同家庭教育背景下个体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也展现出少男少女在情感认知中的逐步

成长。

3. 学业成长类。这类电影以学业场景为背景,聚焦人物在学习过程中克服困难、追逐梦想的成长历程。如《放牛班的春天》,音乐老师用音乐打破问题少年封闭的内心世界,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孩子们在音乐的熏陶下,逐渐端正学习态度,改善行为习惯,实现学业与品德的双重提升。《天才枪手》讲述了学生从最初为满足虚荣心追求成绩,到后来重新认识公平与道德的重要性,深刻展现出学业成长背后价值观的转变。《三傻大闹宝莱坞》则以幽默且深刻的叙事,引导观众重新审视学习的本质意义,同时反思应试教育体制的弊端。

4. 职业成长类。这类电影以职业发展为主线,展现人物在职业道路上的奋斗、挫折与最终的成功。比如《穿普拉达的女王》,年轻记者从职场新人起步,在高压的工作环境中不断学习、突破自我,最终成长为成熟独立的职业女性,并明确了自己的职业方向。《中国合伙人》讲述了三位大学好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从青涩的大学生逐步成长为成功企业家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职业道路上不可或缺坚持、合作与创新精神。

5. 文化成长类。这类电影着重刻画人物在文化冲突或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完成身份认同重构的过程。例如《摔跤吧!爸爸》,主人公突破印度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固有观念束缚,不仅实现了个人的体育梦想,更在体育文化的认知与传承层面完成了自我成长。《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则通过宗教隐喻与海上生存考验的叙事,呈现出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碰撞的图景,细腻展现了主人公在文化认知中的探索,最终实现文化身份的重构。

6. 社会认知成长类。这类电影将成长过程置于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展现主人公对社会规则、人性本质、阶层差异等问题的认知与理解逐步深化的过程。如经典女性主义电影《小妇人》,通过四个女孩不同的成长历程,引导许多女性思考如何应对身为女性的身份认同困境,传递出独立、自强的女性价值观。《少年的你》聚焦校园霸凌这一社会问题,不仅让主人公在面对困境时完成自我成长,更让观众深刻认识到校园霸凌的严重危害,以及维护校园和谐、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责任,进而激发大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培养社会责任感。

(四)中外成长教育的教育范式比较

1. 东方集体主义成长范式。东方文化中,集体主义精神与社会责任意识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文化特质在东方电影的成长叙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例

如《青春派》,讲述高三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与家长的陪伴下,共同面对高考的压力与成长的挑战,生动体现了集体的凝聚力与团队协作精神。《老师·好》则聚焦师生间的情感纽带,学生在班级这一集体环境中,从老师身上汲取人生智慧与精神力量,最终实现自我成长,深刻凸显了集体主义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些东方叙事均着重强调个体与集体的共生共荣关系,不仅为思政教育中家国情怀的培养提供了具象化的影像载体,更与家国情怀的培养目标形成深度呼应。

2. 西方个人主义觉醒范式。西方电影的成长叙事,往往以个人主义觉醒与自我价值实现为核心主题。《死亡诗社》中,基廷老师打破常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摆脱传统教育模式的束缚,勇敢追求内心热爱与人生梦想,有效激发了学生的自我意识与独立思考能力。《心灵捕手》里,天赋异禀却封闭内心的威尔,在心理学家尚恩的耐心引导下,直面童年创伤,突破自我认知的局限,学会与自我、与世界和解,最终实现了个人成长的华丽蜕变。这些影片从西方文化视角出发,为思政教育处理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的关系提供了跨文化参考,帮助学生理解个体价值实现与社会责任担当并非对立,而是可辩证统一的关系。

3. 全球化跨界成长叙事。在全球化浪潮下,电影叙事逐渐突破文化边界的限制,通过多元文化的融合与碰撞,生动展现跨界成长的母题。《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主人公派在横跨大洋的奇幻旅程中,不断跨越文化差异、物种隔阂与心理障碍,不仅实现了身体层面的生存突破,更完成了精神层面的蜕变与成长。此类影片深刻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共性议题:如何在多元价值冲突中寻求共识,如何在不同文化碰撞中构建自我认同。这一核心内涵恰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教学形成对话空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教学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支撑,帮助学生理解多元文化共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二、成长电影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价值与功能

(一) 价值观念的具象传播

从教育学角度来看,教育不仅是知识的机械灌输,更重要的是培育受教育者的“批判性意识”和独立思考能力^[3],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体系中,价值观念的有效传递是核心任务之一。电影作为文化工业的重要产品,在创作、制作与传播的全流程中,承载着特定的思想价值与意识形态^[4]。它通过生动的叙事和具象化的表达,将抽象的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视觉符号,从而实现

主流意识形态和思想价值观念的具象化传播。

成长电影在认知维度上,借助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向观众传递对善恶、美丑、正邪的价值判断,引导观众获取知识,重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我和我的祖国》借助七个故事,把爱国、敬业等价值观具象化,让大学生在故事共情中直观感受主流价值观的内涵。电影用画面和情节突破思政教育“概念悬浮”的难题,提供生动案例,推动大学生从理论认同迈向情感和认知认同,使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等获得可触可感的载体,实现主流价值的引领。同时,成长电影常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对社会现象、教育制度等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激发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确立正向的社会认知。如《三傻大闹宝莱坞》批判了功利主义教育,倡导追求真理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将抽象的价值观具象化,引导大学生反思自身学习动机与价值追求,使观众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价值启蒙。

(二) 情感共振的教育赋能

电影具有移情效应。精彩的剧情故事和生动的人物形象特别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观众与角色产生情感连接后,会不自觉地代入情境之中,深入思考并将电影所传达的价值观与理念内化,实现从情感共振到理性认知的转变。电影的移情效应与教育学理论高度契合,能够构建起“情感共鸣—理性认知—行为转化”的完整激活链条,借助镜像视角下的自我投射,让观众在情绪感染中不断强化价值认同。

成长电影以成长为主题,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元素,极易与大学生产生情感共振,从而在情感层面为思政教育赋能。成长电影展现主人公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奋斗,塑造坚韧不拔、勇于担当的人格特质。观众在电影创设的人生困境中获得沉浸式体验,激发情感共振,反思并调整自身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如《风雨哈佛路》中主人公莉丝在困境中自我救赎的经历,唤起大学生对自身生活的思考,激发同情心与共情力。观众在代入莉丝的困境中,感受其痛苦与坚持,获得情感触动,进而主动调整自身行为与价值取向,从而增强教育感染力,助力大学生人格成长。此外,历史题材的成长电影能够唤醒大学生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如《长津湖》中冰雕连场景以震撼的视觉效果和悲壮的情感力量,增强大学生对历史的理解,让大学生在震撼中深化对家国责任的理解,激发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

(三) 社会认知的实践转化

社会认同理论强调群体归属对个体自我观念的

形成具有关键影响。个体依据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来界定自我,通过与群体内其他成员的比较和互动,形成对自身身份和价值的认知^[5]。成长电影通过个体的成长经历,展现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通过展示人物在社会实践中的自我定位和价值实现过程,对大学生进行社会认知教育,激发大学生的行为动力。《中国合伙人》讲述了三位主人公从学生时代到创业成功的历程,他们在社会磨砺中不断调整自我定位,实现了从迷茫青年到成功企业家的身份转变,其中蕴含的创业精神嬗变,让大学生体会到在社会实践探索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性,为大学生提供了可参考的社会适应与自我实现路径。《棒!少年》记录了困境儿童通过棒球运动实现自我救赎,其“失败—训练—突破”的模式为大学生提供逆境应对策略,鼓励大学生在面对学业、生活困境时积极寻求突破,使思政教育从理论延伸到实践。

三、成长电影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创新融合策略

(一)课程体系设计创新

1. 模块化主题课程设计。搭建“主题模块 + 电影案例库”的课程体系,通过精选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电影案例,将宏观的思政教育目标细化为具体可落地的教学主题,使教学内容更具针对性与系统性,让思政教育从“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象课程”,便于教师系统开展教学,也让学生清晰把握不同主题的思政内涵。如表 1 所示。

表 1 “成长电影”思政课程模块设计例表

思政目标	电影案例	教学重点
家国情怀	《我和我的祖国》	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的紧密联系
梦想与奋斗	《当幸福来敲门》	逆境中坚守梦想的精神内涵
责任与担当	《攀登者》	团队精神、个人责任和坚强意志、拼搏精神
友情与团结	《阳光姐妹淘》	友情的力量与集体成长
命运抗争	《哪吒》系列电影	反抗命运与打破成见,正义与勇敢
心理成长	《心灵捕手》	探索自我、突破心理障碍
青春情感	《致青春》	对青春理想与现实生活的认知与抉择
师生情谊	《老师·好》	努力学习、尊师重道、坚守梦想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文化自信	《长安三万里》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2. 互动式教学方法创新。在组织学生观影的基础上,采用观影报告法、角色扮演法、弹幕共读法开展教学。三种教学方法相辅相成,从“个体思考”“情境代入”“群体互动”三个层面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提升思政教育的互动性与深度。

采用“观影报告法”,能够促使学生在观看电影后深入思考影片中的成长内涵和价值。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为例,在学生观看影片后,要求他们撰写成长感悟报告。在报告中,学生需要分析主人公

派在漂流过程中的成长经历,包括他在面对生存挑战时的心理变化、对宗教信仰的思考以及老虎的关系等方面。通过撰写报告,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影片中关于信仰、成长与自我发现等问题,深化对成长内涵和价值的反思。教师可以对学生的报告进行点评和总结,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和讨论。该方法不仅能深化学生对电影思政内涵的理解,还能培养学生的逻辑思辨与文字表达能力。

运用“角色扮演法”,可以模拟电影中的场景,让学生通过扮演不同角色参与讨论,加深对教育理念和成长价值的理解。以《死亡诗社》为例,组织学生模拟电影中的课堂场景,让学生分别扮演剧中老师和学生角色,就教育的目的、学生的自由与责任等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角色扮演,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电影中不同角色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观。教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不同教育理念的优缺点,以及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构建更加合理的教育模式。该方法不仅能深化学生对电影思政内涵的理解,还能培养学生的角色共情与团队协作能力。

实施“弹幕共读法”,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集体观影与即时评论活动,能够营造群体讨论氛围,促进思想交流碰撞,这种即时互动模式打破传统观影的单向接收局限,让思政讨论更具时效性和参与感。以《千与千寻》为例,在观影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弹幕即时分享自己的感受、疑问和观点。比如,当看到千寻在油屋中努力工作,不断成长时,学生可以在弹幕中分享自己对成长的感悟;当对影片中的某个情节或角色有疑问时,也可以通过弹幕提出。教师可以在观影过程中关注弹幕内容,适时引导讨论,解答学生的疑问。观影结束后,教师可以对弹幕内容进行总结和分析,进一步深化学生对电影主题的理解。该方法不仅能深化学生对电影思政内涵的理解,还能培养学生的即时表达与思想碰撞能力。

(二)动态评价体系构建

1. 设计三维度评估指标。从认知提升、情感认同和行为转化三个维度构建评估体系,设置成长理念理解能力、思政理论理解深度、成长动力强度、社会实践参与度等指标,对成长电影思政效果进行评估,既覆盖学生思政素养的核心层面,也确保评估的全面性与针对性。如表 2 所示。

表 2 “成长电影”思政教学评估指标表

维度	指标
认知提升	成长理念理解能力、理论联系实际水平
情感认同	成长动力强度、榜样认同指数
行为转化	社会实践参与度、价值传播主动性

在认知提升维度,设置成长理念理解能力、思政理论理解深度、理论联系实际水平等指标。成长理念理解能力可以通过学生对电影中成长主题的分析 and 阐述来评估,如在观看《三傻大闹宝莱坞》后能否准确理解电影所传达的关于学习的意义和价值的理念,以及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批判;思政理论理解深度可通过学生对电影中蕴含的思政理论(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阐释来评估。理论联系实际水平则可以通过学生在讨论、作业或实践活动中,能否将电影中的理念与现实生活中的教育现象、个人学习经历相结合来评估。这些指标的设置,既贴合成长电影思政“深化理论认知”的教育目标,也能全面反映学生思政理论素养的提升情况。

在情感认同维度,设置成长动力强度、榜样认同指数、价值情感共鸣度等指标。成长动力强度可以通过观察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积极态度和进取精神来评估,如观看《风雨哈佛路》后是否受到主人公莉丝的激励,在面对困难时更有动力去克服;榜样认同指数可以通过学生对电影中榜样角色的喜爱程度、模仿意愿以及对榜样行为的认同程度来评估,如学生是否愿意学习《中国合伙人》中人物的创业精神和奋斗品质;价值情感共鸣度可通过学生观影后的情感反馈(如感动、敬佩)来评估。这些指标的设置,既贴合成长电影思政“激发情感共鸣”的教育目标,也能全面反映学生思政情感素养的提升情况。

在行为转化维度,设置社会实践参与度、价值传播主动性、日常行为规范践行度等指标。社会实践参与度可以通过学生参与志愿者活动、社团活动、创业实践等实际行动来评估,如看《棒!少年》后是否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价值传播主动性可以通过学生在社交媒体、课堂讨论、日常生活中是否主动传播电影中所蕴含的思政价值观来评估,如是否会向身边的同学、朋友推荐具有教育意义的成长电影,并分享观影感悟;日常行为规范践行度可通过学生是否将电影中的正向价值观(如诚信、友善)融入日常行为来评估。这些指标的设置,既贴合成长电影思政“推动行为转化”的教育目标,也能全面反映学生思政行为素养的提升情况。

2. 建设大数据追踪系统。通过建立学生观影行为数据库,实时记录学生观看成长电影的时间、频率、时长及观影后的初步反馈,全面了解学生对不同类型成长电影的喜好倾向与关注重点。运用情感分析方法对学生在观影过程中发布的弹幕文本进行分析,判断学生的情绪倾向(如积极、感动、反思),了解他们对电影内容的情感反应。例如,如果学生在

观看《长津湖》时,弹幕中出现大量表达敬佩、感动的词汇,说明学生对电影所传达的爱国精神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结合校园一卡通数据、图书馆借阅系统数据、志愿服务登记系统数据,关联学生观影记录与图书馆借阅、志愿服务、课堂表现等行为变化。比如学生在观看了《长安三万里》后,若发现图书馆中与唐朝文化相关书籍的借阅量增加,或学生参与与传统文化传播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增多,说明电影对学生的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通过多维度数据的交叉分析,避免单一数据的片面性,确保对思政教育效果的评估更客观、精准。同时,将数据追踪结果与学生的思政课程成绩、综合素质评价挂钩,形成“评估—反馈—改进”的闭环教学机制。教师可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全面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动态变化,及时发现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部分学生对某类思政主题理解薄弱),针对性调整教学策略(如增加该主题的电影案例或互动讨论),进一步提高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 实践平台协同拓展

1. 建立“观影—研讨—实践”教育闭环。以《放牛班的春天》教学实践为例,通过构建“观影—研讨—实践”的教育闭环,可实现从认知输入、价值内化到行为输出的完整教育链路。在认知输入阶段,组织学生观看《放牛班的春天》,引导学生直观感受马修老师用音乐改变问题少年命运的过程,理解音乐教育在学生成长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深入认知素质教育的理念与方法,明晰教育的本质与目的;同时引导学生记录影片中触动自己的教育细节,为后续研讨积累素材,为深度思考与讨论奠定基础。在价值内化阶段,围绕“教育与成长的关系”开展主题研讨。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影片中教育方式对学生成长的影响,以及现实中如何落地素质教育,鼓励学生分享观影感悟与对教育、成长关系的理解。教师可结合素质教育政策与现实案例进行引导,帮助学生跳出影片视角,形成更具现实意义的认知,促使学生将影片传达的教育理念与自身生活经验结合,深化价值观念的理解与内化。在行为输出阶段,联合教育机构策划校园成长分享会。邀请在学习或生活中曾遇困难、后通过自身努力与他人帮助实现成长的朋辈同学,以及现实中与影片教育案例相似的实践者,分享成长经验。学生在分享会中既能学习实用的成长方法与技巧,也能将观影、研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例如,将影片中学到的关爱他人、尊重他人理念融入与同学的相处中,主动参与

校园文化建设,为营造良好校园氛围贡献力量。该环节将电影中的教育理念从“理论认知”转化为“实践行动”,完成思政教育的闭环落地。

2. 培育创作型学习共同体。设立微电影工作坊,以指导学生拍摄成长主题微电影为核心,是培育创作型学习共同体的有效路径之一。学生组成创作型学习共同体后,共同参与微电影的策划、拍摄与制作。在创作过程中,需在教师指导下深入挖掘成长主题(如自我认知突破、友情力量、面对挫折的勇气),同时结合思政教育重点(如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提炼主题内涵,确保作品既贴合成长属性,又蕴含思政价值。例如,学生拍摄《我的成长故事》时,需回忆自身成长中的重要经历,筛选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提炼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如面对挫折的坚持、感受他人帮助的温暖)后再进行创作。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能提升创作与团队协作能力,还能深度反思自身成长历程,深化对思政教育内容的理解。拍摄《逐梦青春》时,学生可通过塑造不同青年角色,展现其在追求梦想过程中的奋斗姿态与坚守精神,将“青春逐梦”“责任担当”等思政主题融入情节与角色塑造中。通过影像呈现思政主题,学生能将对思政教育的理解转化为可视化作品,在提升综合素质的同时,推动思政教育内容的传播。此外,创作型学习共同体的建立,还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促进学生间的交流合作,实现思政教育与学生自我成长的深度融合。微电影拍摄完成后,可组织校园微电影展映活动,展映后开展创作者分享会,让学生讲述创作思路与思政感悟,进一步扩大思

政教育的辐射范围,让更多学生受到启发。

四、结束语

成长母题叙事电影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素材与生动案例。通过分析电影中的成长故事,可清晰揭示其在价值塑造、人格培养与社会认知方面的教育功能。“成长电影 + 思政教育”模式高度契合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征,其巧妙之处在于将主流价值观融入青年群体的文化消费场景,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从传统的“外部灌输”向“内在生长”的转型,这种范式转型不仅顺应了新时代大学生的认知习惯,也让思政教育更具温度与说服力,既丰富了思政教育的形式与内容,又提升了思政教育的时代感、吸引力与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第31届大学生电影节组委会. 2024 全国大学生观影市场调查研究报告[EB/OL]. (2024 - 05 - 23)[2025 - 02 - 12].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2TA1D5G0511B3FV.html>.
[2]戴锦华. 电影批评(第二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86.
[3]保罗·弗莱雷. 被压迫者教育学[M],顾建新,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56.
[4]白蔚. 大思政视域下以电影意识形态隐身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实效探析[J]. 高教论坛,2021(8).
[5]戴维·迈尔斯. 社会心理学纲要[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68.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Value and Application of Narrative Films with the Growth Motif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ANG Anran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In the digital age, the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logic of college students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PE) model, resulting in a decline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IPE. Coming-of-age films, which focus on the individual growth trajectories of adolescents, have value in shaping values, cultivating personality, and enhancing social cogni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integrated model of “coming-of-age films + IPE” and adopt innovative integr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innovative curriculum design, dynamic evalu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collaborative expansion of practical platforms” to provide innovative solutions for IP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by enhancing its attractiveness and effectiveness.

Key words:growth motif; growth film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ducation model

“岗课赛证”融通背景下商务英语专业育人模式研究现状与热点分析

——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

刘 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运用 CiteSpace 对 2008 年至 2024 年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育人模式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从发文量、作者、机构、关键词等维度揭示研究现状,归纳出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教育主体与类型、人才培养与实践教学三大热点。研究发现该领域存在跨机构合作少的问题,未来应深化跨机构合作、强化实践导向、推进教育创新、加强国际化交流与合作并构建科学评价体系,以培养高素质商务英语人才。

关键词:商务英语;岗课赛证;育人模式;CiteSpace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18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109-08

近年来,我们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强调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例如,《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1]《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2]均提出支持职业院校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商务英语专业领域,“岗课赛证”融通模式旨在更好地对接市场需求,培养复合型人才。深入梳理“岗课赛证”融通背景下商务英语专业育人模式的研究现状与热点,对于推动商务英语专业发展及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工具和文献来源

本研究主要运用 Excel 和 CiteSpace 6.3. R1 进行数据分析。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中检索学术期刊类文献,使用“商务英语”与“岗课赛证+岗课+岗赛+岗证+课证+赛证+证书”作为检索式,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过筛选,共获得 352 条有效文献。将筛选后的结果导入 Note-

Express 文献管理软件,补全相关信息并下载全文,最后导出适合 CiteSpace 分析的文本文件。

二、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育人模式研究现状

(一)发文数量分析

从发文量趋势图可见,国内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育人模式的研究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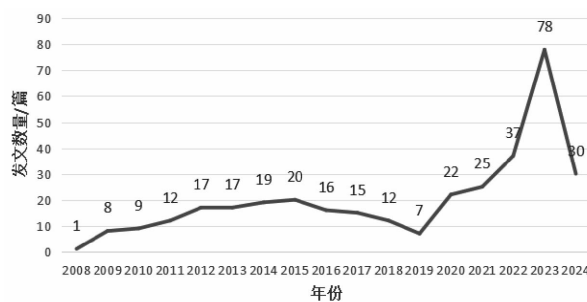


图1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育人模式研究发文数量趋势图

第一阶段是平缓发展时期(2008—2019):2008年开始发文量逐渐增长,学者主要研究“课证”^[3]“双证”^[4]“岗课”^[5]结合的课程体系改革与人才培

收稿日期:2025-08-12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基于OBE理念的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育人模式构建研究”(2024YB0279)

作者简介:刘改(1987—),女,河南焦作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商务英语和英语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

养模式构建;2015 年达到发文量小高峰(20 篇),这一时期学者对“岗课赛证”融通育人模式的具体实施策略^[6]、效果评估^[7]、挑战与机遇^[8]等方面展开研究。此后发文量开始下降,原因可能包括研究焦点转移、研究方法更新,或该领域已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9-11],导致新研究成果减少。

第二阶段是快速发展时期(2020—2024):发文量从 2020 年的 22 篇增长至 2023 年的 78 篇,实现大幅飙升。随着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这促使研究者探索更

完善的育人模式^[12]。部分高校开始与企业深度合作,根据企业实际岗位需求调整课程设置,同时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类商务英语相关竞赛,并鼓励学生获取行业权威证书^[13]。

(二) 发文作者分析

在 CiteSpace 软件中,将节点类型设为“合作作者”以分析作者合作网络,设定时间段为 2008—2024 年、时间切片为 1 年、每个时间切片内的对象数量 N 值为 25,软件自动生成作者合作网络知识图谱(图 2)。

CiteSpace, v. 6.3.R1 (64-bit) Basic
August 28, 2024, 10:34:07 AM CST
CNKI: D:\桌面文件\商务英语“岗课赛证”\citespaceCNKIdate
Timespan: 2008-2024 (Slice Length=1)
Selection Criteria: g-index (k=25), LRF=2.5, L/N=10, LBY=5, e=1.0
Network: N=292, E=78 (Density=0.0018)
Largest CC= 5 (1%)
Nodes Labeled: 1.0%
Pruning: None
Exclud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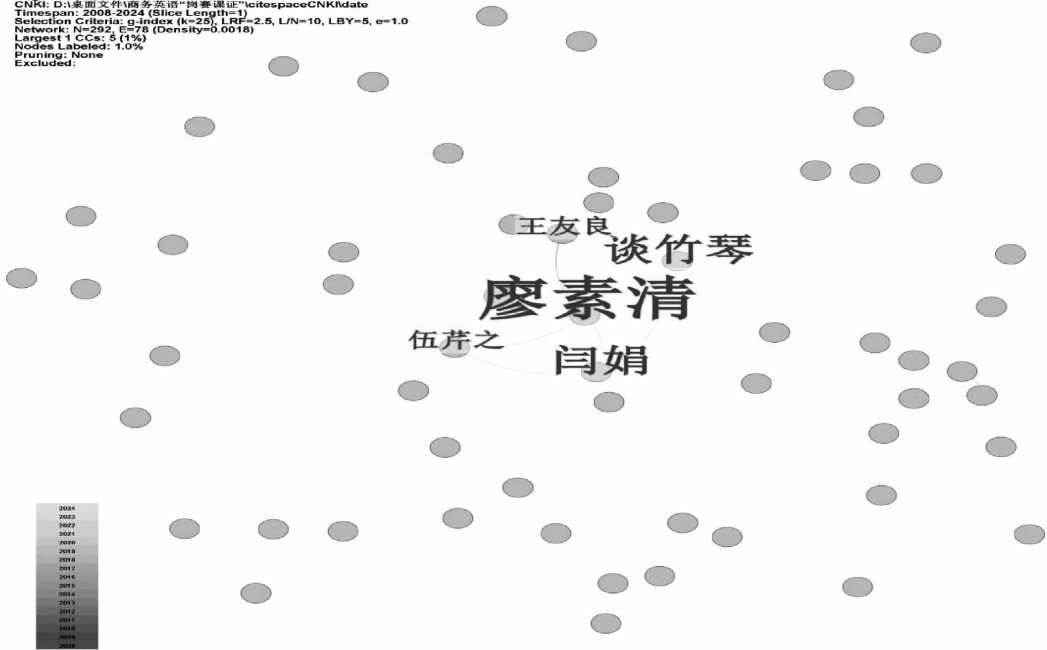


图 2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育人模式研究作者合作网络图

将发文量前十的作者信息按发文量降序排列(含并列情况),得到表 1。由表 1 可知,廖素清(4 篇,2015 年首次发文)与汪小祥(4 篇,2016 年首次发文)发文量最高。参考普赖斯定律($N \approx 0.749 \times \sqrt{N_{\max}}$,其中 N 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 $N_{\max}$ 为最高发文量),将 $N_{\max} = 4$ 代入公式,得 $N \approx 1.498$,故设定发文 2 篇及以上为核心作者筛选标准。最终符合要求的作者共 30 人,发表文献总计 69 篇,占有效文献总数 352 篇的约 20%。根据普赖斯定律,当核心作者发文量占文献总量的比例达到 50% 时才可认定形成核心作者群,因此,该领域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14]。

在 CiteSpace 生成的合作网络中,节点代表作者,节点大小代表作者发表论文的数量,节点间的连线代表学者间的合作情况。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节点数 N = 292(表示有 292 位作者参与合作)、连线数 E = 78(表示共形成 78 次合作关系)、网络密度 Density = 0.0018。这表明网络内合作关系相对稀疏,

学者以独立研究为主,群体间合作较少。图 2 中仅存在以廖素清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其研究集中在通过“1 + X”课证融通、工学结合等路径,推动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主要研究时间段为 2015—2024 年。鉴于合作研究团队稀少,加强学者团队建设与跨群体合作是后续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表 1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育人模式研究发文作者情况(前十,含并列)

发文总数	首次发文年	姓名
4	2015	廖素清
4	2016	汪小祥
3	2020	任瑞娜
3	2013	刘莉
3	2017	周新云
2	2021	余伟琼
2	2009	冉思丝
2	2022	刘婷
2	2017	刘志宇
2	2023	刘文
2	2018	刘瑛

(三) 研究机构分析

在 CiteSpace 软件中选择节点类型为“机构”，其他选项保持默认设置，运行后生成研究机构共现知识图谱(图 3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研究机构共现知识图谱)。该图谱中节点数(N)为 237、连线数(E)为 15、网络密度(Density)为 0.0005。节点间的连线代表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图中独立节点占比高、存在连线的节点数量少，这表明研究机构间缺乏有效交流与合作，尚未形成具有凝聚力的研究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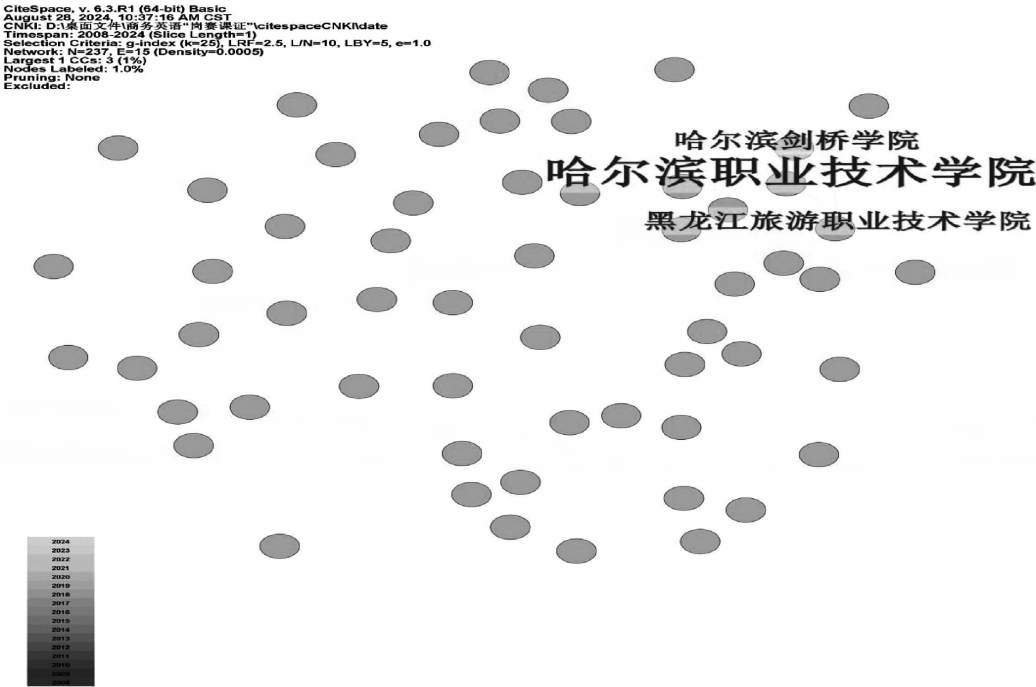


图 3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研究机构共现知识图谱

表 2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研究机构发文量	
发文量	单位
6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6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5	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5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5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4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4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续表 2

发文量	单位
4	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3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3	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学院
3	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
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四) 关键词共现分析

高频共现的关键词往往代表当前领域的研究热

点。由表 2(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研究机构发文量统计表)可知，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与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发文量均为 6 篇，其次为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湖南外贸职业学院，发文量均为 5 篇。这一结果表明，国内研究机构缺乏广泛且紧密的跨学校、跨地区研究合作网络；同时也可看出，职业院校更重视实践教学环节、拓展校企合作深度，着力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及时追踪领域内的热门话题与前沿趋势，为后续研究方向提供参考。在节点类型中选择“关键词”，运行 CiteSpace 软件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图 4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在 2008—2024 年的研究跨度内，共有 275 个关键词参与共现(N = 275)，较大的 N 值意味着研究领域涉及的主题较为广泛，可能存在更多细分研究方向；共形成 366 次共现关系(E = 366)，E 的大小反映知识图谱中关键词间的关联紧密程度，据此可发现共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组合，进而揭示研究热点与趋势。节点越大，说明该关键词的出现频次越高。网络密度为 0.097，该数值表明研究领域的知识体系已相对完善，不同主题间的界限较为清晰。从词频显示结果中提取出现频次 9 次及以上的高频关键词，按词频降序排列得到表 3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研究高频关键词(词频 ≥ 9)词频与中心性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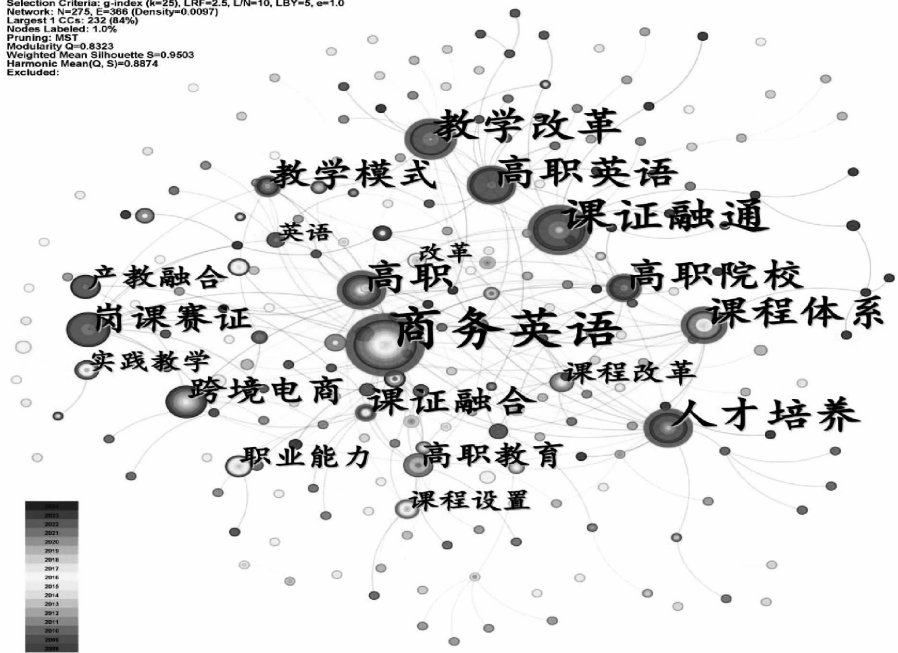


图4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3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研究高频
关键词(词频≥9)词频与中心性表

词频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69	0.52	2009	商务英语
39	0.30	2010	课证融通
29	0.20	2011	教学改革
27	0.21	2009	人才培养
26	0.17	2017	高职英语
26	0.26	2009	课程体系
24	0.21	2010	高职
22	0.12	2008	高职院校
17	0.18	2009	课证融合
17	0.12	2013	教学模式
16	0.06	2022	岗课赛证
15	0.05	2016	跨境电商
11	0.06	2009	高职教育
10	0.00	2015	产教融合
9	0.07	2012	课程改革
9	0.03	2012	职业能力

从表3可见,“商务英语”的中心性值为0.52,表明其在该研究领域占据核心地位。综合关键词的频次与中心性值排序可见,课证融通(39,0.30)、教学改革(29,0.20)、人才培养(27,0.21)、高职英语(26,0.17)、课程体系(26,0.26)等关键词频次较高,且中心性值较高,在研究网络中影响力较大。

“课证融通”频次高、中心性值高,说明商务英语专业重视课程与职业证书的结合,这有助于学生明确学习目标、提升就业竞争力,同时也反映出行业对具备专业证书人才的需求,推动专业教育与市场接轨。“教学改革”词频高,表明当前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模式存在不足,急需改革,这可能是市场需求变

化、教育技术发展等因素所致;教学改革将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培养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商务英语人才。“人才培养”凸显了商务英语专业以培养高素质人才为核心任务,这需要学校、企业等多方共同努力,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学等方式,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与综合能力。“高职英语”研究频率高,体现出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具有独特的定位与特色;与本科英语专业相比,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更注重实用性与职业性,着力培养学生在商务领域的实际应用能力。“课程体系”的高频次与高中心性表明,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人才培养的基础,课程体系需紧密结合岗位需求、竞赛项目与职业证书要求,为学生提供全面的知识与技能培养。

(五) 关键词聚类分析

关键词聚类分析可将相似关键词划分为特定主题领域,进而对主题领域内的关键词再次聚类,形成更具体的子主题,这有助于发现知识间的关联关系、突出主题结构,更利于理解研究领域的核心框架。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基础上,采用LLR(对数似然比)算法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生成图5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关键词聚类分析中,通常认为Q值(模块化度量值)在0.3及以上表示聚类结果具有较好的模块性,Q值越高,聚类结果的模块性越好,即聚类内部关键词联系紧密,不同聚类间联系相对较弱;S值(轮廓系数)可判断每个样本点是否被正确分配至某一聚类——若S值接近1,说明样本点在所在聚

类中适配性高;若接近-1,说明可能被错误分配。S 值在 0.5 及以上表示聚类结果较好,大于 0.7 时通常认为聚类结果非常合理。由图 5 分析结果可知,Q 值为 0.8323,表明聚类结构明显,不同关键词可较好聚合成不同主题簇,为进一步分析研究热点与

趋势提供了清晰的结构基础;S 值为 0.9503,高 S 值表明关键词聚类结果准确可靠,各聚类内部关键词紧密相关,不同聚类间区分度明显,有助于深入理解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人才培养研究的不同方面与重点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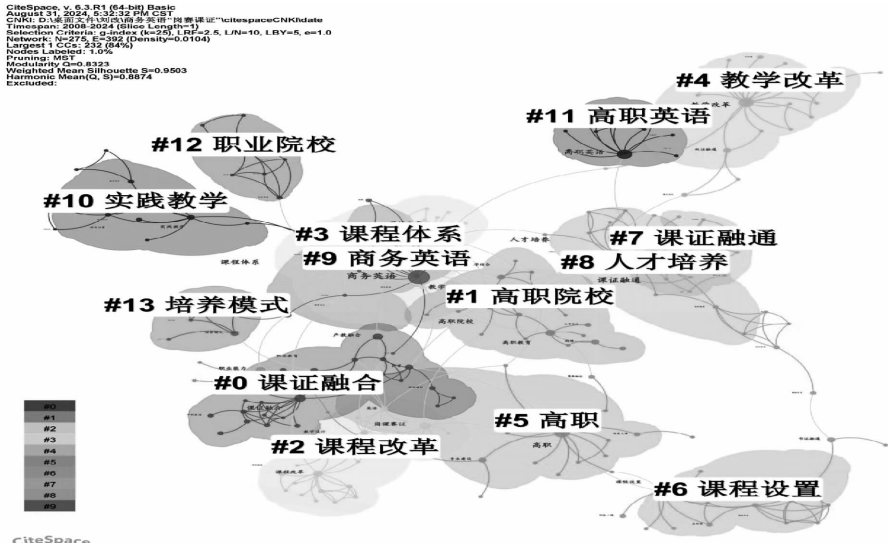


图 5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 4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研究关键词聚类群组表

标签	节点数	轮廓值	平均年份	聚类包含的主要关键词
#0 课证融合	25	0.983	2014	课证融合;改革;课程建设;实训教学;职业导向。
#1 高职院校	23	0.928	2015	高职院校;教学模式;公共英语;应用英语;构建。
#2 课程改革	23	0.968	2018	课程改革;教学设计;信息化;岗课赛证;英语。
#3 课程体系	23	0.934	2016	课程体系;跨境电商;职业资格;课岗证;国贸专业。
#4 教学改革	21	0.923	2017	教学改革;双证融通;创新探究;岗;高职公共英语。
#5 高职	20	0.867	2015	高职;专业建设;旅游英语;职业能力;特色教材。
#6 课程设置	16	0.994	2013	课程设置;英语专业;四位一体;商务;三融合一中心。
#7 课证融通	16	0.996	2016	课证融通;vets;以证代考;职业能力资格考试;双课联动。
#8 人才培养	15	0.907	2016	人才培养;l+x 证书;英语教学;高职教学;商务英语。
#9 商务英语	15	0.939	2015	商务英语;双证书;经济发展;教学团队;翻译专业。
#10 实践教学	12	0.983	2015	实践教学;中职学校;微课程;教学体系;课岗证赛。
#11 高职英语	11	0.991	2021	高职英语;学习效果;“三教”改革;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教学。
#12 职业院校	7	0.992	2023	职业院校;教育水准;张雪梅;职教改革;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13 培养模式	5	0.983	2014	培养模式;建构主义;双语人才;山西经济发展;商英交融。

提取图 5 中的 14 组关键词聚类结果,整理后得到表 4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研究关键词聚类群组表,结合图 5 与表 4 可提炼出以下研究热点:

首先,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包括关键词:课程改革、课程体系、教学改革、课程设置、课证融合、课证融通。高文雅提出,商务英语专业需紧密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改革课程体系设置;相应课程也应依据企业特定岗位的能力需求进行革新,同时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手段及教学评价等方面展开创新,以提升学生的跨境平台操作能力^[15]。邓胜平等提出从师资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改革模式与手段、考核机制、实践基地、教材等方面推进改革,指出课证融

合教学模式可提高学生专业水平与专业水平,将课程教学与就业有机结合,增强教学效果,凸显高等教育宗旨与特色^[16]。由此可见,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是商务英语专业发展的关键:课程改革中需注重课程体系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使其紧密对接行业需求;课程设置应突出实用性,强化课证融合与融通,确保学生所学与实际工作相符;同时需不断优化教学模式与方法、完善考核机制、加强实践基地建设教材编写,全面提升教学质量,为培养高素质商务英语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其次,教育主体与类型。包括关键词:高职院校、高职、职业院校。在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

高职院校与职业院校具有独特定位与使命,它们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更注重实践教学与职业技能培养。这些院校在“岗课赛证”融通人才培养模式中,需结合自身特点与优势,探索适合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培养路径。通过文献调研发现,高职院校与职业院校在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确实更注重实践教学与职业技能培养,例如,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在课程设置中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并与多家企业合作建立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丰富实践机会^[7];进一步分析可见,武汉外语外事职业学院结合自身师资优势与行业需求,优化课程体系,将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内容融入教学,取得良好效果^[17]。此外,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商务英语专业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其在学历层次、教学内容广度及知识深度等方面均高于高职院校,但文献调研显示,关于应用型本科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的研究相对较少,可在该领域展开新的探索。

最后,人才培养与实践教学。包括关键词:人才培养、商务英语、实践教学、高职英语、培养模式。陈琳将商务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商务英语人才,构建“岗课赛证”融通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机生态链,将“产教融合、课程建设、竞赛考证、师资培养”有机整合。为实现这一目标,商务英语专业通过“建设、引进、共享”等方式,大力推动校内外实训实习基地的建设。此举有助于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实践环境,提升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从而更好地满足市场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18]。詹宇灵认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有效途径包括政府加强政策引领以推动校企合作、构建校企协作育人平台以实现岗课赛证融通,以及打造商务英语专业“双师型”教学团队等,从而培养出符合跨境电商贸易发展需求的人才^[19]。由此可见,人才培养与实践教学对于商务英语专业至关重要。通过构建合理的培养模式,加强产教融合、课程建设、竞赛考证和师资培养等方面的工作,同时推动实训实习基地的建设和校企合作,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培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商务英语人才。

(六) 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分析是通过考察关键词的时间分布,探测出频次变化率高、增长速度快的突现词,以识别出在特定时间段内突然变得重要或热门的关键词,从而帮助我们发现研究领域的新兴趋势和热点话题,及时把握学科发展的动态,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方向和参考。

Top 20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图5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

由图5 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研究关键词突现图谱可知,2008—2013 年,高职教育、双证融通、工学结合、双证书、课程体系、改革、职业能力、商务英语、旅游英语等关键词集中突现,表明学者们开始关注高职教育中商务英语及相关专业的发展,注重将课程体系与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推动工学结合教学模式落地,以提升学生职业能力。同时,“旅游英语”的突现也显示出学者们对特定行业领域英语教学的关注,这一时期的改革重点在于探索适合高职学生的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设置。

2015—2018 年,应用型人才、岗课赛证、课程改革、跨境电商等关键词突现,反映学者们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视,强调课程与岗位、证书、竞赛的融合,以适应市场对人才的实际需求。课程改革仍是这一时期的重点,而“跨境电商”的突现则表明,随着跨境贸易经济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商务英语在新兴领域的应用,致力于培养适应跨境电商行业需求的专业人才。

2021—2022 年,书证融通、职业教育、高职英语、岗课赛证、教学改革、课证融通、产教融合等关键词突现,反映学者们对职业教育体系完善与深化改革的关注。对书证融通与课证融通的强调,表明学者们致力于构建更紧密的课程与证书联系,使学生能更好地将所学知识与实际职业需求对接;“岗课赛证”的突现显示出对人才培养模式的综合考量,注重岗位实践、课程教学、竞赛实践与证书考核的有机结合。对教学改革的持续关注,体现了学者们对提高教学质量与效果的追求;而产教融合则强调学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以培养更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三、研究结论

从发文量趋势来看,2008—2019 年为第一阶段,研究呈平缓发展态势,保持一定研究热度;2020 年起研究热度快速攀升,且持续至今。商务英语专

业“岗课赛证”融通人才培养研究热度上升,与我国经济发展及教育改革趋势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跨境电商等新兴行业崛起,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对人才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岗课赛证”融通人才培养模式更能契合企业对高素质复合型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

从作者合作网络与研究机构图谱分析来看,该领域研究团队较少,缺乏跨机构合作。由此可见,虽然国内高校对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人才培养的研究热度较高,但研究多由本机构人员独立开展。这种独立研究模式虽体现了各机构在特定领域的深耕,但也暴露出知识交流不足的局限性:缺乏跨机构合作可能导致研究视角单一化,难以形成全面研究框架与深入理论探讨;同时可能造成研究资源重复配置与浪费,无法最大化发挥科研效益。因此,如何促进研究团队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研究资源优化配置,将是未来该领域发展需重点关注的问题。

通过关键词共现与聚类分析,明晰了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人才培养领域的研究热点与趋势。由表4可知,14个聚类标签的S值均在0.9以上,同质性高,聚类结果可信,据此归纳出三大研究热点: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教育主体与类型、人才培养与实践教学。

教学改革与课程建设方面,强调课程体系优化与教学内容更新,尤其需融入跨境电商、数字化营销等新兴领域知识,以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教育主体与类型层面的研究,则关注如何构建多元化教育平台、促进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深度,以及如何通过国际合作项目拓宽学生国际视野;而人才培养与实践教学的结合,更强调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并重,通过模拟实训、项目驱动等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全面提升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关键词突现分析揭示了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人才培养研究的时间动态演进:从注重通过工学结合提升学生职业能力,到强调课程改革需与“岗课赛证”融通以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再到改革与完善教育体系,明确要求所学知识 with 职业岗位需求对接、深化产教融合。这一演进过程展现出,该领域的实践探索随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调整。

四、未来展望

(一)深化跨机构合作与资源共享

鉴于当前研究中跨机构合作相对较少的现状,未来应大力倡导并促进不同高校、研究机构乃至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通过建立常态化交流平台与机

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承担重大研究项目,推动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这种合作模式不仅能拓宽研究视野,还能有效避免研究资源重复配置,提升科研效率及成果质量。

(二)强化实践导向与产教融合

随着企业对商务英语人才实践能力要求的不断提升,未来研究应更加注重实践导向,深化产教融合。通过与企业深度合作,共同开发课程体系、设计实训项目,确保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高度对接。同时,鼓励学生参与企业实习、职业竞赛等实践活动,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提升综合素质与就业竞争力。此外,引入并完善企业导师制度,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真实职场环境,增强职业认知与适应能力。

(三)推进数字化与智能化教育创新

面对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也应紧跟时代步伐,推进教育创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优化教学手段及方法,实现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智能化学习评估等功能。同时,开发并搭建虚拟仿真实训平台,让学生在虚拟环境模拟商务活动,提升实践操作能力。此外,还应关注新兴技术在商务领域的应用趋势(如区块链、AI(人工智能)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等),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确保学生掌握最前沿知识与技能。

(四)加强国际化交流与合作

在全球化背景下,商务英语专业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未来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项目,与国外高校及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拓宽学生国际视野。通过交换生项目、联合培养项目等方式,为学生提供赴国外学习交流的机会,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商务文化与实践。同时,引进国外先进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提升我国商务英语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

(五)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与反馈机制

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融通人才培养效果,未来应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与反馈机制。该体系不仅应关注学生学业成绩,还应注重评价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综合素质。同时,建立并完善教师教学反馈机制,鼓励师生共同参与教学评价过程,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不断提升教学质量与效果。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的通知[EB/OL].(2020-09-16)[2024-09-02]. <https://www.gov.cn/zhengce/>

- zhengceku/2020-09/29/content_5548106.htm.
- [2]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EB/OL]. (2023-06-08)[2024-09-02].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06/content_6886061.htm.
- [3] 冉思丝. 基于职业导向的“课证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在商务英语教学中的运用[J]. 管理观察, 2009(35): 244-245.
- [4] 申厚坤.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双证融通”课程体系构建[J]. 职业技术教育, 2009(11): 11-13.
- [5] 高鹏. 浅析工学一体化下大学生商务英语翻译技能的培养[J]. 科教文汇, 2011(35): 130, 148.
- [6] 邓霞. “岗、证、课”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以罗定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专业为例[J]. 辽宁高职学报, 2015(2): 13-15, 53.
- [7] 汪先锋. “政校行企协同、课岗证赛融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以广东省高职教育重点专业商务英语专业特色建设为例[J]. 高教学刊, 2016(16): 27-29.
- [8] 尹灵芝, 余倩倩, 刁允, 等. “课赛证岗”协同驱动下的商务英语写作应用能力培养研究: 以湖北理工学院商务英语专业为例[J]. 英语广场(学术研究), 2017(11).
- [9] 刘宁. 基于“OSC”人才培养理念的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 台州学院学报, 2017(1): 74-78.
- [10] 陈敏. 跨境电商背景下商务英语“课岗证一体化”课程体系研究[J]. 当代旅游(高尔夫旅行), 2018(10).
- [11] 汪小祥. 基于课证融通的商务英语口译教学内容改革[J]. 文教资料, 2018(5): 207-208.
- [12] 居永梅. 基于跨境电商的安徽高职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2).
- [13] 陈璧玲. “1+X”证书制度背景下高职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研究[J]. 现代英语, 2020(21): 112-114.
- [14] 赵蕾. 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知识图谱: 基于CiteSpace软件的可视化分析[J]. 秘书, 2020(4): 40-56.
- [15] 高文雅. 基于“速卖通”“出口通”双平台的“国际电子商务”课程改革的探索[J]. 考试周刊, 2016(13): 12.
- [16] 邓胜平, 齐倩.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课证融合”课程体系构建探析[J]. 考试周刊, 2015(3): 76-77.
- [17] 任丽娜, 刘文.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岗课赛证4+X主题菜单式课程体系的构建[J]. 英语广场(学术研究), 2024(10): 95-99.
- [18] 陈琳. 商务英语“岗课赛证”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汕尾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 教育信息化论坛, 2023(21): 78-80.
- [19] 詹宇灵. 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深化校企合作, 实现“岗课赛证”融通路径探索: 助力华南地区跨境电商贸易腾飞[J]. 校园英语, 2023(19): 54-56.

(责任编辑 许峻)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Hot Spot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Business English Majors in the Context of “Post-Course-Competition-Certificate” Integration

—A Visual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LIU Ga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CiteSpace to analyz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al model of “combining posts, courses, competitions, and certificates” in Business English majors from 2008 to 2024. It reveal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from dimensions such as publication volume, authors, institutions, and keywords, and summarizes three major hotspots: teaching reform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entities and types, as well as talent cultivation and practical teaching. The research identifies issues such as limited inter-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is field. The efforts dedicated in the future should focus on deepening inter-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strengthening practice orientation, advancing educational innovation,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Business English talents.

Key words: Business English; posts courses competitions and certificates; educational model; CiteSpace

酰亚胺型 COFs 的合成及阳离子染料吸附性能探究

张琳¹, 李玉玲¹, 赵晓坤¹, 李瑶¹, 穆鹏飞²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2. 华东师范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上海 200000)

摘要: 选用 1,3,5-三(4-氨基苯基)三嗪(TAPT)和均苯四甲酸二酐(PMDA)为配体,成功合成了酰亚胺型共价有机框架化合物(Coalent Organic Frameworks, COFs),简称为 TAPT-PMDA-COF。以阳离子染料碱性品红(BF)和亚甲基蓝(MB)为目标污染物,系统评估 TAPT-PMDA-COF 材料的吸附性能。通过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粉末 X-射线衍射、热重分析、氮气吸脱附和扫描电子显微镜等表征手段证实了该材料具有优异的结晶性和稳定性。吸附实验结果表明:在 pH = 11 的条件下,该材料对 BF(初始浓度 300.00 mg/L)和 MB(初始浓度 400.00 mg/L)的最大吸附量分别为 84.33 mg/g 和 128.00 mg/g。两种染料的吸附动力学均符合准二级动力学($R^2 > 0.997$)模型,说明吸附过程以化学吸附为主。因此,TAPT-PMDA-COF 材料是一种高效的阳离子染料吸附剂,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共价有机框架;有机染料;碱性品红;亚甲基蓝;吸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19
中图分类号:TQ424;X7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117-07

染料行业是与我国民生息息相关的产业,染料广泛应用于食品加工、药品、印刷和护肤品等产业^[1-2]。碱性品红(BF)是一类重要的苯甲烷类阳离子染料^[3-4],具有常温下微溶于水,易溶于乙醇和酸类的特点,在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BF 的结构中存在高共轭苯环,能对许多生物体产生强抑制作用,当其排放到环境中或长期接触人体时,会诱发人体各处组织细胞发生基因突变,危害人体健康。亚甲基蓝(MB)是一种吩噻嗪盐,它不仅可用于纺织、皮革和塑料材料的染色,而且在化学合成中起着指示剂的作用^[5-6]。但 MB 废水若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其强烈的着色特性会显著降低水

体透光率,抑制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危及水生生物的生存。因此,寻找一种高效去除染料的方法迫在眉睫。其中,吸附法大多使用多孔材料(活性炭、共价有机框架化合物等),对染料的吸附量较大,去除率较高^[7],且操作简单,因此成为染料去除的理想选择之一。

共价有机框架化合物(Coalent Organic Frameworks, COFs)是由轻质元素通过强共价键组装形成的具有规则孔道结构的晶态聚合物^[8,9]。这类材料通过精确的分子设计实现了原子级别的结构调控,其周期性排列的孔道展现出独特的物理化学特性。COFs 具有高比表面积、可调控的孔道结构、低密度

收稿日期:2025-05-15
基金项目:202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 类)“以 C(sp²)-H 键与 CO₂ 羧化反应为导向的新型有机催化剂设计”(22502179);2025 年度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新型 COFs 催化剂的合成及其在 CO₂ 催化转化中的关键技术研究”(252102230148);2022 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技术研发推广与转化基金项目“黄河流域郑州段水体重金属离子快速灵敏监测”(zjz202207)
作者简介:张琳(1996—),女,河南郑州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共价有机框架,CO₂ 转化。

和高稳定性的特点,因此,在特定染料吸附场景中展现出优于传统活性炭的潜力^[10]。本论文选择了1,3,5-三(4-氨基苯基)三嗪(TAPT)和均苯四甲酸二酐(PMDA)为单体制备的TAPT-PMDA-COF作为吸附材料,探究该材料对碱性品红和亚甲基蓝的吸附性能。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主要试剂

1,3,5-三(4-氨基苯基)三嗪(TAPT)和均苯四甲酸二酐(PMDA)为分析纯,购自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碱性品红(BF)和亚甲基蓝(MB)为分析纯,购自上海皓鸿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试剂及药品使用时未经进一步纯化处理。

1.2 仪器和材料表征

PerkinElmer Spectrum 3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KBr 压片法,4000 – 400 cm⁻¹);Bruker D8 ADVANCE 粉末 X-射线衍射仪(PXRD,35 kV,25 mA,步长 0.02°,扫描速率 1°/min,2θ = 2 ~ 40°);Netzsch TG 209 F3 热重分析仪(TGA,氮气气氛,升温速率 10℃/min,30 ~ 800℃);Micromeritics ASAP 2020 气体吸附仪;马来西亚安捷伦 Cary 60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Hitachi S4800 扫描电子显微镜;FEI Tecnai F20 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1.3 COFs 的制备方法

使用传统的溶剂热合成方法,准确称取 TAPT

(56.20 mg,0.16 mmol)和 PMDA (52.40 mg,0.24 mmol)于玻璃管中,加入均三甲苯、N-甲基吡咯烷酮和异喹啉溶液各 0.50 mL,超声混合均匀。将上述玻璃管进行三次抽真空-充氮气循环,在保持真空的状态下,使用喷枪将其密封,150℃烘箱中反应 3 d。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将得到的黄色固体粉末依次用 N,N-二甲基甲酰胺、四氢呋喃、乙醇和丙酮洗涤过滤,在 120℃ 的烘箱中干燥活化 6 h,得到 TAPT-PMDA-COF。

1.4 吸附实验

称取 15 mg 酰亚胺 COFs 分别加入 5 mL 不同浓度的 BF 和 MB 溶液中,搅拌吸附 8 h 后,将滤液经 0.45 μm 滤膜过滤后收集,测定其吸光度,计算吸附量和去除率^[11],其计算公式如下:

$$\text{吸附量 } q = (C_0 - C) \times V / M \quad (1)$$

$$\text{去除率 } \eta = (C_0 - C) / C_0 \times 100\% \quad (2)$$

其中: q 为吸附量 (mg/g); C_0 为染料溶液的初始浓度 (mg/L); C 为 TAPT-PMDA-COF 吸附后的平衡浓度 (mg/L); V 为染料溶液体积 (L); M 为加入 TAPT-PMDA-COF 的质量 (mg)。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2.1 材料的合成与表征

本论文利用三角形氨基配体 TAPT 和线性的酸酐配体 PMDA,在溶剂热的条件下反应生成酰亚胺连接的 COF,其合成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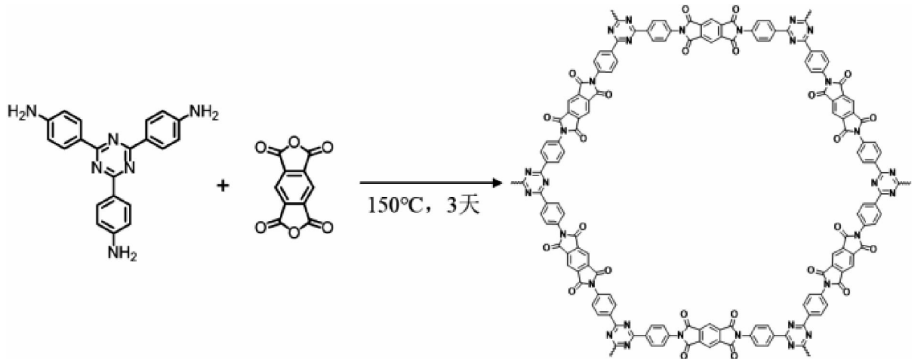


图 1 TAPT-PMDA-COF 的合成示意图

采用粉末 X-射线衍射(PXRD)技术对 TAPT-PMDA-COF 的晶体结构进行表征。如图 2a 所示,在 2θ = 2.78° 出现强度最大的(100)晶面特征衍射峰,其相邻(110)晶面次级衍射峰出现在 2θ = 5.56°。值得注意的是,2θ = 20.66° 处出现的宽化衍射峰可归属为二维有机层状结构中 π - π 堆叠作用引起的(001)晶面衍射。该材料是典型的二维六方晶格,基于 AA 型层间堆积模型进行 Pawley 精修,获得优化的晶胞参数为: $a = b = 37.2255 \text{ \AA}$, $c = 3.4370 \text{ \AA}$, $\alpha = \beta = 90^\circ$, $\gamma = 120^\circ$ 。拟合优度参数 $Rwp = 6.58\%$,

$R_p = 8.53\%$,均小于 10%,说明实验数据与理论模型高度吻合。PXRD 表征结果表明,实验制备的 TAPT-PMDA-COF 不仅实现了目标结构的构筑,同时展现出优异的结晶性。

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对反应的单体及产物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2b 所示。TAPT 单体中伯胺基团(3355 cm⁻¹和 3435 cm⁻¹)和 PMDA 单体中羰基(1671 cm⁻¹)的特征峰在 TAPT-PMDA-COF 中完全消失,证实反应中单体被消耗且没有残留。同时,COF 谱图中出现了新的特征峰,1780

cm^{-1} 和 1721 cm^{-1} 处的吸收峰对应于五元酰亚胺环中 $\text{C}=\text{O}$ 基团的非对称和对称伸缩振动, 1366 cm^{-1} 处的特征峰对应 $\text{C}-\text{N}-\text{C}$ 部分的伸缩振动。这些

变化证实 TAPT 与 PMDA 成功通过胺基与酸酐基团的缩聚反应, 形成了以酰亚胺键连接的 TAPT-PMDA-C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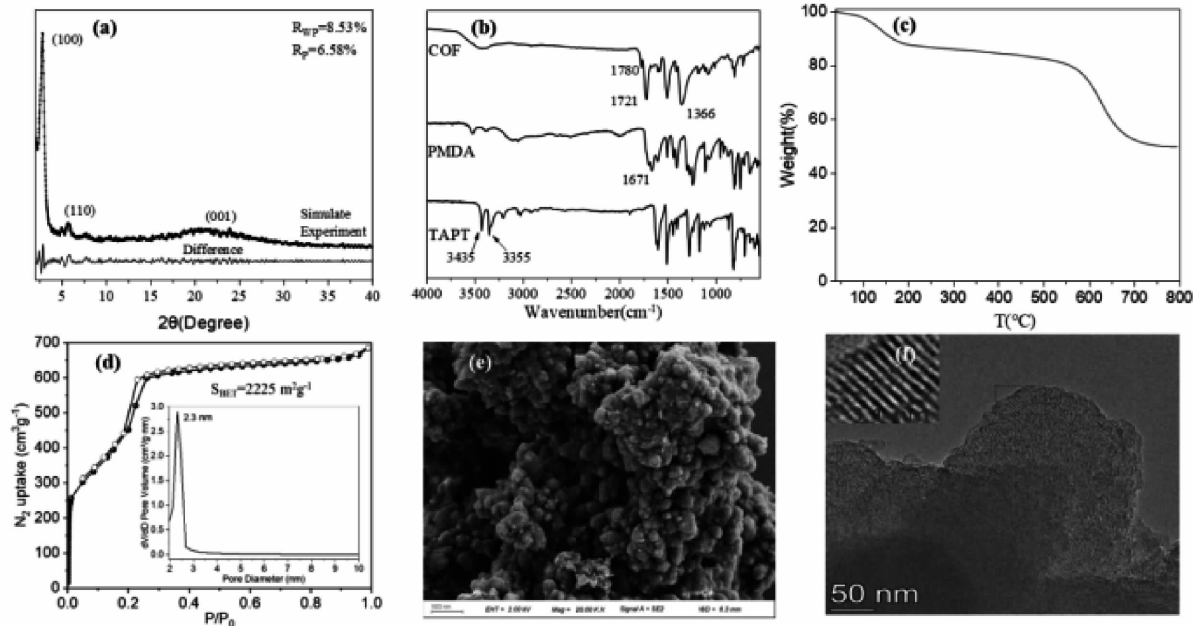


图 2 TAPT-PMDA-COF 的实验和模拟 PXRD 谱图 (a); FT-IR 谱图 (b); TGA 曲线 (c); 氮气吸附等温线以及孔径分布图 (d); 扫描电镜谱图 (e); 高分辨率透射电镜谱图 (f)

热重分析法 (TGA, 氮气气氛, 图 2c) 表明, TAPT-PMDA-COF 在 160°C 以下因吸附水和残留溶剂脱附损失约 10% 的质量; 随后在 $160\sim550^\circ\text{C}$ 区间保持稳定, 展现良好的热稳定性; 550°C 以上骨架分解导致显著失重 (约 30%), 最终质量残余为 50%, 证实高温热解形成稳定碳质残留。在 77 K 条件下, 对 TAPT-PMDA-COF 进行氮气吸脱附表征。如图 2d 所示, TAPT-PMDA-COF 材料展现出 IV 型等温吸附曲线 (主孔径 2.3 nm) 和高的比表面积 ($2225\text{ m}^2/\text{g}$)。在低相对压力区间呈现陡峭上升特征, 说明该材料同时存在一定量的微孔。曲线闭合度高且滞后环狭窄的特性, 证实了该材料孔道高度均一、结构规整, 符合结晶多孔材料特征。使用扫描

电子显微镜 (SEM) 和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 (HR-TEM) 对 TAPT-PMDA-COF 的微观形貌进行表征 (图 2e 和 2f)。SEM 图像显示该材料呈现出不规则的结构, 进一步通过 HR-TEM 分析发现, 材料内部存在清晰可见的周期性晶格条纹, 实测晶面间距为 3.1 nm, 与理论计算结果一致, 表明其具有高度有序的层状晶体结构。

2.2 染料吸附实验及分析

2.2.1 染料初始浓度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将 15 mg 的 TAPT-PMDA-COF 与 5 mL 不同初始浓度的 BF 和 MB 混合, 搅拌反应 2 h 后, 用 $0.45\text{ }\mu\text{M}$ 滤膜将其过滤得到待测样品, 经稀释 100 倍后测试其吸光度, 实验结果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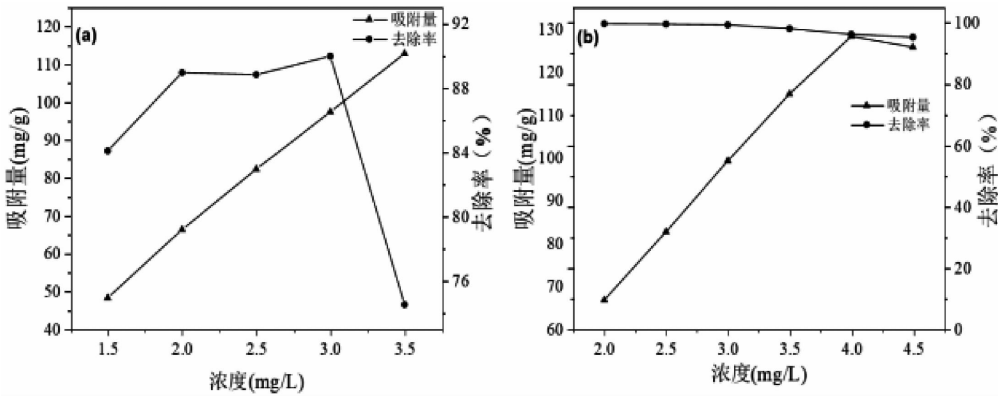


图 3 碱性品红 (a) 和亚甲基蓝 (b) 初始浓度对 TAPT-PMDA-COF 吸附性能的影响

如图 3a 所示,随着 BF 初始浓度的增加,TAPT-PMDA-COF 对染料的吸附量不断增加,当染料初始浓度达到 300 mg/L 时,去除率达到最大(90.0%),继续增加到 350 mg/L 时,去除率急剧降低至 74.5%。如图 3b 所示,当 MB 初始浓度从 200 mg/L 逐渐增加至 400 mg/L 时,材料吸附量从 65 mg/g 显著提升至 128.29 mg/g,去除率始终保持在 96% 以上。但当浓度超过 400 mg/L 后,吸附量下降至 125.76 mg/g,同时去除率降低至 95%。综上所述,TAPT-PMDA-COF 对 BF 和 MB 吸附的最佳初始浓度分别为 300 mg/L 和 400 mg/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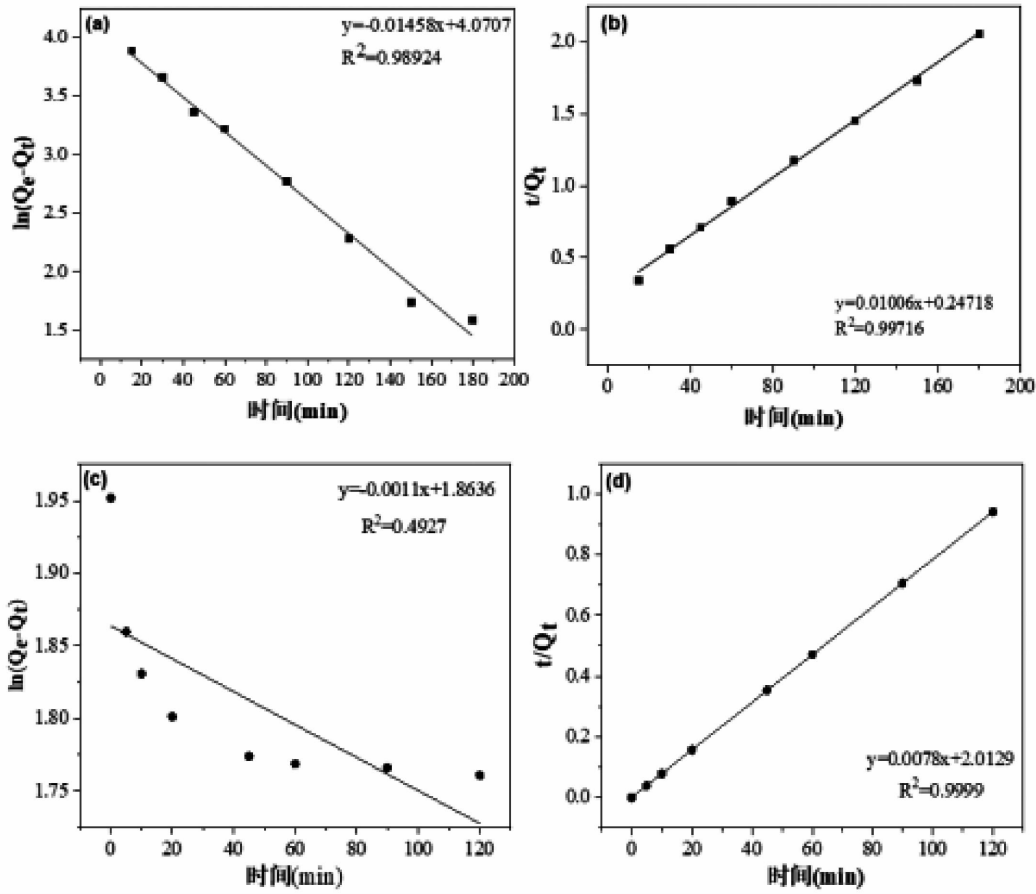


图 4 碱性品红的 Langmuir 等温拟合 (a) 和 Freundlich 等温拟合 (b) ;
亚甲基蓝的 Langmuir 等温拟合 (c) 和 Freundlich 等温拟合 (d)

表 1 TAPT-PMDA-COF 吸附碱性品红和亚甲基蓝等温吸附模型拟合参数

	Langmuir 模型			Freundlich 模型		
	$q_m / (\text{mg} \cdot \text{g}^{-1})$	$K_L / (\text{L} \cdot \text{mg}^{-1})$	R^2	$K_F / (\text{mg} \cdot \text{g}^{-1})$	n	R^2
碱性品红	161.812	2.784	0.764	2.265	2.265	0.403
亚甲基蓝	130.720	1.690	0.999	81.590	5.959	0.933

图 4a 和 4b 为 COFs 吸附去除 BF 染料的 Langmuir 和 Freundlich 等温拟合曲线,计算结果见表 1。实验数据显示,两种模型拟合的相关系数 R^2 均较差,这可能是由于 COFs 同时具有微孔和介孔结构,微孔主导的限域效应易引发单层吸附,而介孔表面

2.2.2 吸附等温线研究

Langmuir 模型是一个理想的单分子层吸附模型,用于描述均质表面的吸附行为。Freundlich 模型用于描述多层非均质表面的吸附行为,并假设吸附位点的能量分布不均匀^[12]。采用 Langmuir 和 Freundlich 两种等温模型拟合 TAPT-PMDA-COF 吸附 BF 和 MB 的机理。

Langmuir 等温式^[16, 17]: $C_e/q_e = C_e/q_m + 1/k_L q_m$ (3)

Freundlich 等温式: $\ln q_e = \ln k_F + 1/n \ln C_e$ (4)

式中: C_e 平衡浓度 (mg/L); q_e 吸附量 (mg/g); $1/q_m$ 和 $1/n$ 为斜率; $1/k_L q_m$ 和 $\ln k_F$ 为截距。

则倾向发生多层吸附,两种机制的并存导致等温线兼具 I 型(微孔)和 IV 型(介孔)特征,因此染料吸附过程兼具单层和多层吸附特征。此外,碱性品红呈现一定程度的非平面性,且分子尺寸通常较大(约 1.5 ~ 2.0 nm),接近 COF 的孔径(2.3 nm),会

导致分子在孔道内受限或部分嵌入,降低 $\pi-\pi$ 堆积效率,所以该 COFs 材料吸附碱性品红的过程无法用单一模型准确描述。

图 4c 和 4d 为 COFs 吸附去除亚甲基蓝染料的 Langmuir 和 Freundlich 等温拟合曲线。通过线性度比较,Langmuir 模型($R^2=0.999$)显著高于 Freundlich 模型($R^2=0.933$),证明酰亚胺 COFs 对 MB 的吸附行为更符合单分子层吸附理论。理论最大吸附容量 130.72 mg/g 与实验值 127.47 mg/g 非常接近,验证了材料表面存在均质分布的有限活性位点。每个活性位点仅允许单个 MB 分子结合,当表面位

点被完全占据后,吸附达到饱和状态。

2.2.3 吸附动力学研究

吸附时间是吸附剂实用性的关键参数,直接影响废水处理的效率和成本,因此,研究吸附动力学对其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将 15 mg 的 TAPT-PMDA-COF 分别与 5 mL 的 BF (300 mg/L) 和 MB (400 mg/L) 溶液在相同温度、pH 下搅拌吸附,取不同吸附时间的样品溶液,过滤去除固体吸附剂后,将所得样品稀释 100 倍并测试吸光度,得到如图 5 所示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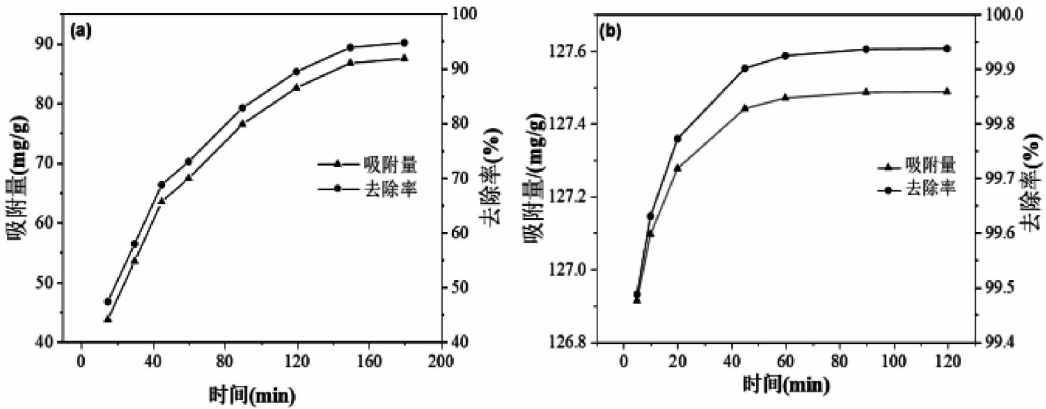


图 5 碱性品红 (a) 和亚甲基蓝 (b) 的时间吸附曲线

由图 5 分析可知,在 TAPT-PMDA-COF 吸附有机染料的初始阶段,吸附量随时间显著增加,一定时间后达到吸附平衡。这是因为该 COF 材料在最开始吸附染料时,吸附剂浓度较高,吸附速度较快。但当阳离子染料被大量吸附在吸附剂中,使得吸附剂也带有正电性,故会排斥同样带有正电性的染料,因此,当超过某一时间时,其吸附效率变慢,然后趋于平衡^[13]。

准一级动力学模型假定吸附剂在多孔介质中的吸附速度与其残余孔径数目成比例,也就是物理吸附;准二级动力学模式假定被吸附的物质是一种采用电子分享或电子损失的化学吸附^[14-16]。通过将二者进行拟合,可以推测反应机制。

准一级动力学模型: $\ln(q_e - q_t) = \ln q_e - k_1 t$ (5)

准二级动力学模型: $t/q_t = 1/k_2 q_e^2 + t/q_e$ (6)

其中: q_e 平衡吸附量 (mg/g); q_t 吸附 t 时吸附量 (mg/g); k_1 准一级吸附速率常数 (min); k_2 准二级吸附速率常数 (g/mg/min)。

动力学拟合结果(表 2, 图 5)表明, TAPT-PMDA-COF 吸附 BF 时,准二级模型($R^2=0.997$)优于准一级模型($R^2=0.989$),理论吸附量 (99.404 mg/g) 接近实验值 (92.389 mg/g),证实过程以化学吸附为主(兼有物理吸附)。吸附 MB 时,准二级模型($R^2=0.9999$)显著优于准一级模型($R^2=0.4927$),理论最大吸附量 (133.69 mg/g) 与实测值 (127.47 mg/g) 高度吻合,进一步说明 COFs 对有机染料的吸附过程主要由化学作用控制。

表 2 TAPT-PMDA-COF 吸附碱性品红和亚甲基蓝的动力学拟合参数

	准一级动力学反应模型			准二级动力学反应模型		
	k_1/min^{-1}	$q_e/(\text{mg} \cdot \text{g}^{-1})$	R^2	$k_2/(\text{mg} \cdot \text{min}^{-1})$	$q_e/(\text{mg} \cdot \text{g}^{-1})$	R^2
碱性品红	0.0146	82.029	0.989	0.000409	99.404	0.997
亚甲基蓝	0.001	6.447	0.493	0.000027	135.14	0.999

2.2.4 pH 对吸附性能的影响

在 TAPT-PMDA-COF 吸附染料时,pH 直接影响吸附剂表面电荷、染料分子形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从而影响反应效率^[17]。在此实验中,所有溶剂均用氢氧化钠和盐酸调至相应的 pH,然后将

15 mg 的吸附剂与 5 mL 的 BF 染料 (300 mg/L) 或 MB (400 mg/L) 搅拌后测试其吸光度,计算得吸附量和去除率(图 7)。由图可知,在酸性或者中性条件下 COFs 的吸附性能比在碱性条件下的吸附性能差,当 pH 为 11 时,对碱性品红和亚甲基蓝的去除

率均最大,故而选择 $\text{pH} = 11$ 为最佳吸附 pH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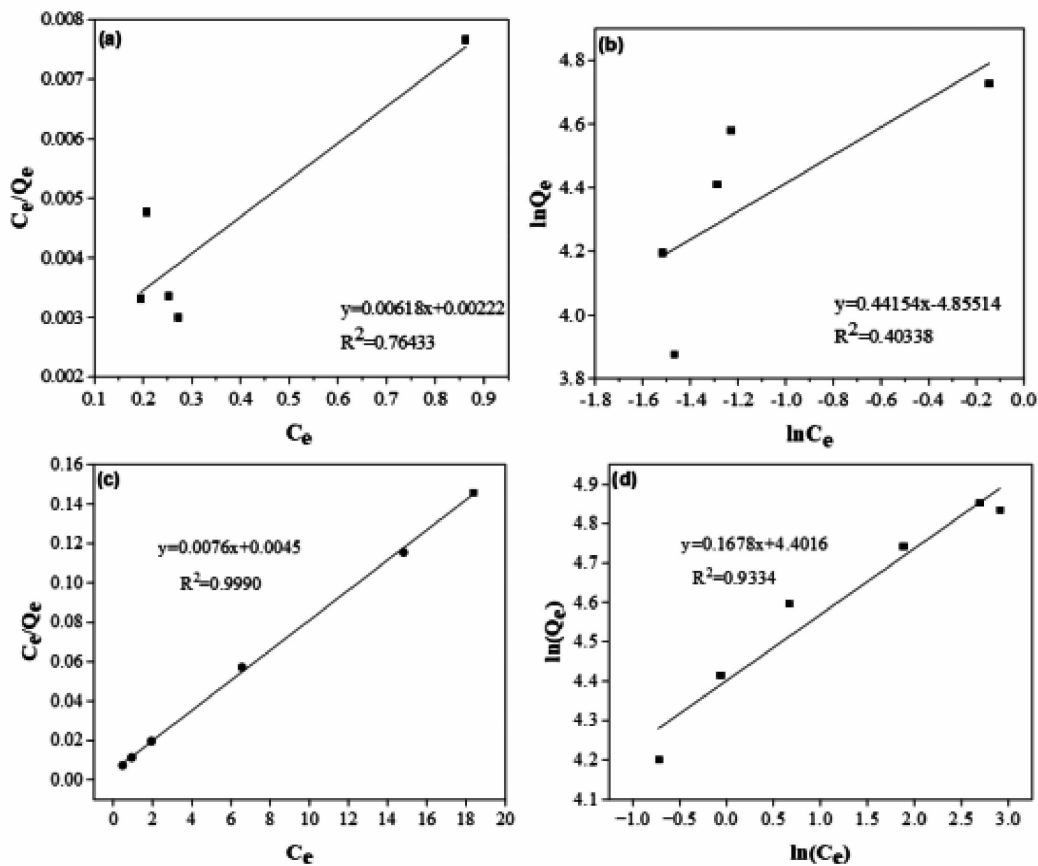


图 6 TAPT-PMDA-COF 吸附碱性品红的准一级动力学 (a) 和准二级动力学 (b) 拟合曲线;
TAPT-PMDA-COF 吸附亚甲基蓝的准一级动力学 (c) 和准二级动力学 (d) 拟合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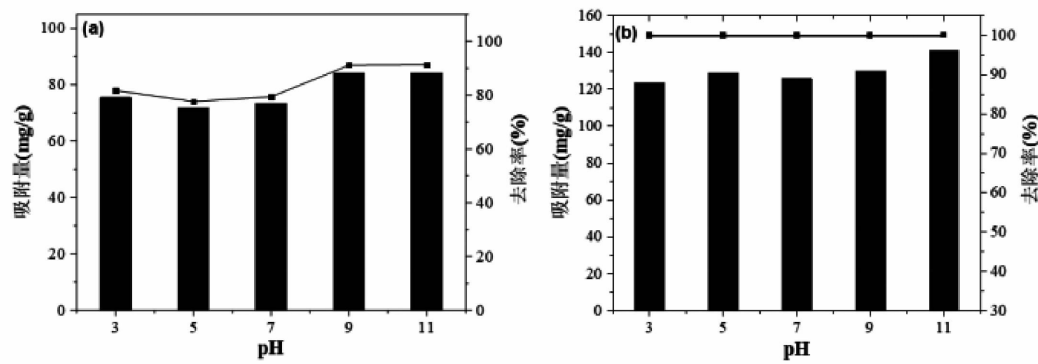


图 7 pH 对碱性品红 (a) 和亚甲基蓝 (b) 吸附效果的影响

2.3 吸附后材料的表征及分析

为了评估 TAPT-PMDA-COF 在吸附过程中晶体结构的稳定性,对吸附染料前后的材料进行 PXRD 分析。如图 8a 所示,吸附 BF 和 MB 后的样品在 $2\theta = 2.78^\circ$ 处的 (100) 晶面衍射峰强度有所降低,但是峰位置没有发生偏移。这说明材料在吸附过程中保持结晶性的高度稳定,周期性孔道结构未被破坏。

图 8b 和 8c 对比了 TAPT-PMDA-COF、有机染料及吸附后复合材料的 FT-IR。实验结果显示,吸附后 COF 中酰亚胺键特征峰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材

料在吸附过程中骨架结构保持完整。吸附后均出现有机染料的特征吸收峰 (BF: 1590 cm^{-1} ; MB: 1598 cm^{-1}),证实染料分子成功负载于 COF 表面。

3 结论

本研究以 TAPT 和 PMDA 作为配体合成了酰亚胺型 COFs 材料 (TAPT-PMDA-COF),并证实它具有优异的结晶性和高的比表面积。以阳离子染料碱性品红和亚甲基蓝为吸附物,探究其吸附性能。研究发现,在碱性品红初始浓度为 300 mg/L ,pH 为 11,反应时间为 150 min 时,吸附量 (84.2 mg/g) 和去除

率(91.1%)达到最大。在亚甲基蓝初始浓度为400 mg/L, pH 为11, 反应时间为60 min 时, 吸附量(128.29 mg/g)和去除率(99%)达到最大。两种染料动力学拟合均为准二级动力学模型, 故吸附过程均为化学吸附。值得注意的是, COFs 材料吸附亚甲基蓝时, 吸附等温线模型符合 Langmuir 模型, 说明

吸附过程主要发生在单分子层特定定位点。然而, 在吸附碱性品红时, 两个吸附等温线模型均不符合, 无法用单一模型进行解释。综上所述, TAPT-PMDA-COF 未来有望作为一种新型材料用于去除带有碱性品红和亚甲基蓝染料的废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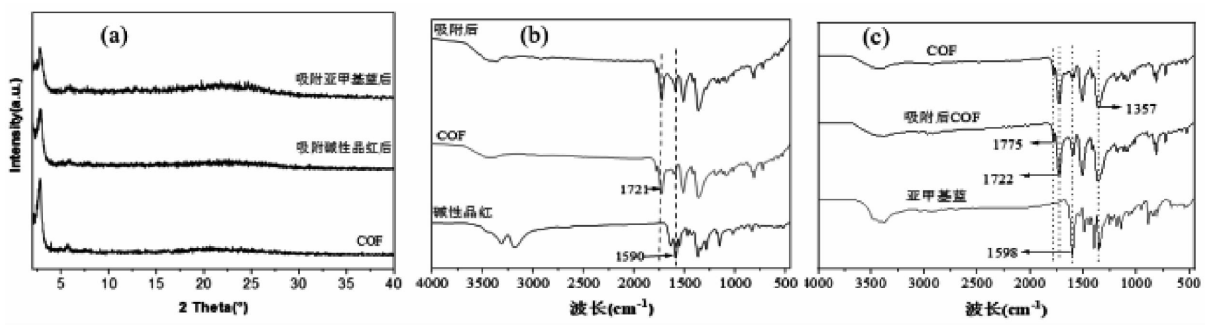


图8 (a)原始、吸附染料后 COFs 的 PXRD 谱图; (b、c) TAPT-PMDA-COF、有机染料和吸附后复合材料的红外光谱图

参考文献:

[1] 田利明. 染料工业回顾与展望[J]. 染料与染色, 2023, 60(01): 1-6.

[2] 岳治杰, 杨佳财. 染料废水处理技术现状与发展[J]. 环境科学与管理, 2012, 37(07): 96-99.

[3] TAAMALLAH A, MEROUANI S, HAMDAOUI O. Sonochemical degradation of basic fuchsin in water[J]. Desalination and Water Treatment, 2016, 57(56): 27314-30.

[4] LU T, WANG L, HE Y, et al. Loess surface grafted functional copolymer for removing basic fuchsin[J]. RSC Advances, 2017, 7(30): 18379-83.

[5] BERK M E, ISIK B, UGRASKAN V, CANKURTARAN O. Adsorptive removal of methylene blue dye onto sodium alginate/polythiophene composite microbeads: Non-linear isotherm, kinetic, and thermodynamic stud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2025, 316: 144757.

[6] LIU H, TIAN X, XIANG X, et al. Preparation of carboxymethyl cellulose/graphene composite aerogel beads and their adsorption for methylene blu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logical Macromolecules, 2022, 202: 632-643.

[7] 陈莉, 熊晓明, 李新. 化学修饰甘薯渣对碱性品红的吸附特性[J]. 现代食品科技, 2019, 35(2): 209-215.

[8] ZHANG L, BU R, LIU X-Y, MU P-F, GAO E-Q. Schiff-base molecules and COFs as metal-free catalysts or silver supports for carboxylation of alkynes with CO₂[J]. Green Chemistry, 2021, 23(19): 7620-7629.

[9] MU P-F, ZHANG L, BU R, XIONG L-F, LIU Y-W, GAO E-Q. Guanidine-based covalent organic frameworks: cooperation between cores and linkers for chromic sensing

and efficient CO₂ conversion [J].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23, 15(5): 6902-6911.

[10] 马艺宁, 赵灵瑜, 何立, 等. 基于磁性 Fe₃O₄ 纳米材料的磁固相萃取技术在食品检测中的研究进展[J]. 食品科学, 2025, 46(9): 364-390.

[11] 王巧玲, 敖晓奎. 速溶茶渣处理含铬(VI)离子废水研究[J]. 湖南有色金属, 2010, 26(02): 43-46.

[12] DOĞAN M, ALKAN M, ONGANER Y. Adsorption of methylene blue from aqueous solution onto perlite[J]. Water, Air, and Soil Pollution, 2000, 120: 229-248.

[13] SUN D, ZHANG X, WU Y, et al. Adsorption of anionic dyes from aqueous solution on fly ash[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10, 181(1-3): 335-42.

[14] SCHÜRMANN G. First-order and pseudo-first-order elimination kinetic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1991, 109: 395-405.

[15] 田林, 谢刚, 郭卓, 等. 介孔分子筛 MCM-41 对污水中 Cr(VI) 吸附动力学研究[J].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10, 33(8): 75-78.

[16] HO Y-S, MCKAY G. Pseudo-second order model for sorption processes [J]. Process biochemistry, 1999, 34(5): 451-465.

[17] EL NEMR A, ABDELWAHAB O, EL-SIKAILY A, et al. Removal of direct blue-86 from aqueous solution by new activated carbon developed from orange peel[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09, 161(1): 102-110.

(责任编辑 李玉玲)
(下转第 128 页)

原位法制备 PW_{12} -SBA-15 催化合成尼泊金丁酯

王少鹏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通过原位合成法制备出负载型磷钨酸催化剂(PW_{12} -SBA-15),运用 X 射线衍射(XRD)、氨气程序升温脱附(NH_3 -TPD)等技术对该催化剂结构及酸性进行了表征。将该催化剂应用于尼泊金丁酯的合成,并利用响应曲面法对合成工艺进行了优化。实验结果表明:SBA-15 及磷钨酸(PW_{12})的基本结构得到保持,具有良好的酸性中心,当 PW_{12} 负载量为 20.3% 时,最优工艺条件为醇酸摩尔比为 3.4:1,催化剂用量为 4.5%,反应温度为 132℃,反应时间为 3.4 h,产品产率可达 90.8%,催化剂重复使用 5 次,催化性能基本稳定。

关键词:原位合成;负载型催化剂;磷钨酸;响应曲面法;尼泊金丁酯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5.020

中图分类号:O643.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5-0124-05

尼泊金丁酯(对羟基苯甲酸丁酯)是国际上公认的高效、安全、广谱的防腐剂,相较于其他防腐剂,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尼泊金丁酯防腐剂使用成本低,在同等抑菌效果下,其使用成本是山梨酸钾的 0.3~0.6 倍,是苯甲酸钠的 0.17 倍^[1-2];其次,尼泊金丁酯防腐剂抑菌范围广,对于霉菌、酵母、革兰氏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等在较宽的 pH 值范围内均能有效抑制其生长,体现了尼泊金丁酯防腐剂的广谱性^[3-4];且尼泊金丁酯防腐剂安全性高,具有在人体内易水解,毒性低的特点,同时因为抑菌效率高,达到相同的防腐效果添加量少,大幅降低对人体的副作用,是国际上公认安全有效的防腐剂,在食品、化妆品、医药、纺织、医疗器械等领域应用广泛^[5-7],也是苯甲酸钠等传统食品防腐剂的重要替代产品之一^[8-9]。目前,有关尼泊金丁酯的工业合成仍以浓硫酸催化为主,存在产品质量差、副反应多、污染环境、腐蚀设备及后处理麻烦等问题^[10],与当前倡导的绿色化工理念不符。

本文采用原位合成的方法制备了负载型磷钨酸

催化剂(PW_{12} -SBA-15),将其用于尼泊金丁酯的催化合成,运用 X 射线衍射(XRD)、氨气程序升温脱附(NH_3 -TPD)等技术对其进行分析,并通过响应曲面法对其工艺进行了优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验结果表明该催化剂具有催化活性高、磷钨酸(PW_{12})分散性好、结构稳定、酸性强等优点,是一种绿色、环保复合型催化剂,对有机大分子的催化合成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1 实验部分

1.1 试剂与仪器

正硅酸乙酯(TEOS), $\text{EO}_{20}\text{PO}_{70}\text{EO}_{20}$ (P123),均三甲苯(TMB),磷钨酸(Keggin 型, PW_{12}),正丁醇,对羟基苯甲酸,环己烷均为分析纯;实验用水为蒸馏水。

CL-2 型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D/MAX-2500 型 X 射线衍射仪;ChemBet-3000 型 NH_3 -TPD 分析仪。

1.2 催化剂的制备及尼泊金丁酯的合成

催化剂制备的基本步骤参照文献^[11]。为进一步增大载体孔径,在溶液 1 的制备过程中,将 2 g P123 转移至 80 mL 盐酸(2 mol/L)溶液中,于 40℃

收稿日期:2025-05-13

基金项目:2024 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24SJGLX0565);2024 年度河南省专创融合特色示范课程《化工工艺学》建设项目(教高[2024]146 号)

作者简介:王少鹏(1980—),男,河南漯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负载型催化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水浴条件下搅拌 3 h 后,补充 0.3 mL TMB,并继续搅拌 1 h 备用,其他制备步骤同文献^[11]。

PW₁₂负载型催化剂的配方为 SiO₂ : PW₁₂ : P123 : TMB : HCL : H₂O = 1 : PW₁₂ : 0.01 : 0.67 : 0.18 : 189.5 (摩尔比),记为 X% PW₁₂-SBA-15,X 表示 PW₁₂在催化剂中的质量百分含量。

尼泊金丁酯的合成及分离参照文献^[12]。

2 结果与讨论

2.1 催化剂的表征

2.1.1 XRD 分析

图 1 是分子筛 SBA-15 和不同 PW₁₂ 负载量的 PW₁₂-SBA-15 催化剂的 XRD 谱图,图 1 (a) 为小角度 (0.5 ~ 2°) XRD 谱图,可以看出,添加扩孔剂 TMB 后,分子筛 SBA-15 特征峰均清晰可见,但与文献报

道^[11]相比,特征峰强度有所下降,表明结晶度有所下降,随 PW₁₂ 的加入及负载量的增加,载体结晶度持续下降,但特征峰仍能显现,表明 TMB 和 PW₁₂ 的加入对载体结晶度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分子筛 SBA-15 的基本孔道结构仍能形成。另外,载体特征峰强度在下降的同时,有向小角度偏移的倾向,表明载体的晶面间距及孔径有增大的趋势^[13]。而对于不同 PW₁₂ 负载量的催化剂来说,随负载量的增大,载体特征峰向小角度偏移的倾向越明显,表明 PW₁₂ 的加入对载体孔径的增大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图 1 (b) 为大角度 (5 ~ 40°) XRD 谱图,可以看出,当 PW₁₂ 负载量达到 20.3% 时,其部分特征峰已略有显现,表明在载体表面已有部分活性组分晶相出现,负载量不宜继续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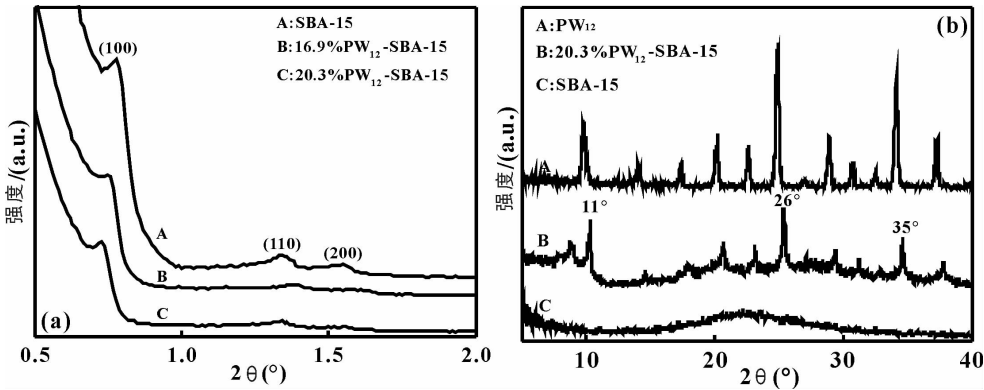


图 1 催化剂的 XRD 谱图

2.1.2 NH₃-TPD 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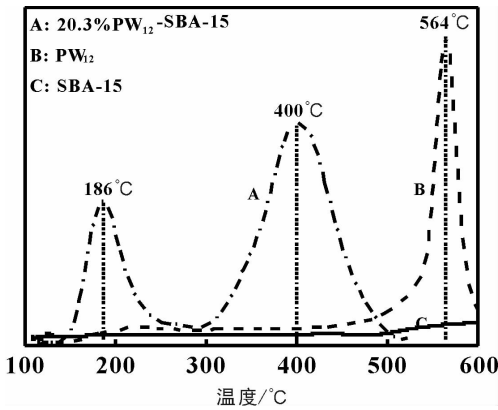


图 2 20.3% PW₁₂-SBA-15, PW₁₂ 和 SBA-15 的 NH₃-TPD 谱图

从图 2 可以看出,20.3% PW₁₂-SBA-15 具有低温 (186℃) 和高温 (400℃) 两个脱附峰,表明 PW₁₂ 负载型催化剂表面具有非常明显的酸性中心,这对于催化过程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4]。与 PW₁₂相比,PW₁₂负载型催化剂的酸强度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这与原位合成过程中载体的 Si-OH 与部分酸性中心结合,以及载体对部分 PW₁₂分子包埋等原

因有关。但与 SBA-15 相比,酸性中心已非常明显,完全可以满足催化的需要。

2.2 PW₁₂-SBA-15 催化合成尼泊金丁酯

2.2.1 实验方案设计

根据前期的实验探索及催化剂表征结果,选取 20.3% PW₁₂-SBA-15 为催化剂,确定催化剂用量 (3 ~ 5%)、反应时间 (2 ~ 4 h)、醇酸摩尔比 (2 : 1 ~ 4 : 1) 及反应温度 (120 ~ 140℃) 等因素为实验变量,利用 BOX-Behnken 实验原理,设计以尼泊金丁酯产率为响应值,上述四因素为自变量的四因素三水平共 29 组实验,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实验变量水平及编码设计见表 1。

表 1 实验变量水平及编码设计

水平	变量			
	D (反应温度/℃)	A (催化剂用量/%)	B (反应时间/h)	C (醇酸摩尔比)
-1	3	2	2 : 1	120
0	4	3	3 : 1	130
1	5	4	4 : 1	140

2.2.2 响应曲面法优化尼泊金丁酯合成工艺

根据实验方案设计,利用响应曲面法对尼泊金

丁酯的合成工艺进行分析和优化,实验方案设计的变量值与实验结果见表 2。

表 2 实验设计变量值与实验结果							
实验号	A 催化剂用量/%	B 反应时间/h	C 醇酸摩尔比	D 反应温度/℃	实际产率/%	预测产率/%	预测偏差
1	1	-1	0	0	82.3	81.7	-0.6
2	0	1	0	-1	76.9	78.8	+1.9
3	0	0	1	1	82.5	81.1	-1.4
4	0	0	-1	-1	69.7	68.8	-0.9
5	0	-1	-1	0	71.3	72.7	+1.4
6	-1	0	1	0	79.9	79.6	-0.3
7	1	0	1	0	86.8	86.9	+0.1
8	0	1	1	0	85.4	85.7	+0.3
9	0	0	0	0	88.4	89.4	+1.0
10	0	1	0	1	79.1	79.9	+0.8
11	0	0	0	0	90.3	89.4	-0.9
12	0	1	-1	0	74.5	74.1	-0.4
13	-1	0	0	1	74.4	76.6	+2.2
14	0	0	0	0	89.8	89.4	-0.4
15	0	0	1	-1	76.4	75.5	-0.9
16	0	0	-1	1	70.0	68.6	-1.4
17	-1	1	0	0	83.3	81.6	-1.7
18	1	1	0	0	87.8	86.9	-0.9
19	1	0	-1	0	72.6	73.4	+0.8
20	1	0	0	-1	77.7	77.3	-0.4
21	-1	0	-1	0	73.3	73.8	+0.5
22	1	0	0	1	80.7	81.8	+1.1
23	0	-1	0	1	79.4	78.1	-1.3
24	0	0	0	0	88.9	89.4	+0.5
25	0	-1	0	-1	74.1	73.8	-0.3
26	-1	0	0	-1	75.1	75.7	+0.6
27	0	0	0	0	89.5	89.4	-0.1
28	-1	-1	0	0	81.4	80.1	-1.3
29	0	-1	1	0	78.3	80.4	+2.1

利用软件 Design-Expert 13 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实验设计变量的编码值与产品产率之间的回归方程如下:

$$Y = +89.38 + 1.71A + 1.68B + 4.83C + 1.35D + 0.9AB + 1.9AC + 0.925AD + 0.975BC - 0.775BD + 1.45CD - 3.31A^2 - 3.5B^2 - 7.64C^2 - 8.23D^2$$

方程中 Y 为产品产率,A 为催化剂用量,B 为反应时间,C 为醇酸摩尔比,D 为反应温度。从表 2 中实验值与回归方程预测值对比可知模型拟合情况较好,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见表 3。

对回归模型进行方差分析,根据系数显著性检验得到,模型 P 值 <0.0001 ,为极显著水平,失拟项 P 值 $=0.0557 > 0.05$,影响不显著,且 $R^2 = 0.9706$,表明该模型显著^[15]。另外,线性项 C 和二次项 A^2 、 B^2 、 C^2 、 D^2 对产品产率的影响较大,达到极显著水平 ($P < 0.001$),线性项 A、B、D 达到高度显著水平 ($P < 0.01$),交互项 AC 达到显著水平 ($P = 0.0275 < 0.05$),由此可见,各因素对产品产率的影响不是线

性关系。

表 3 实验结果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离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F	P	显著水平
模型	1103.66	14	78.83	33.04	<0.0001	***
A	35.02	1	35.02	14.68	0.0018	**
B	34	1	34	14.25	0.0020	**
C	279.37	1	279.37	117.1	<0.0001	***
D	21.87	1	21.87	9.17	0.0090	**
AB	3.24	1	3.24	1.36	0.2633	
AC	14.44	1	14.44	6.05	0.0275	*
AD	3.42	1	3.42	1.43	0.2509	
BC	3.8	1	3.8	1.59	0.2274	
BD	2.4	1	2.4	1.01	0.3326	
CD	8.41	1	8.41	3.53	0.0814	
A^2	71.28	1	71.28	29.88	<0.0001	***
B^2	79.57	1	79.57	33.36	<0.0001	***
C^2	378.61	1	378.61	158.71	<0.0001	***
D^2	439.08	1	439.08	184.05	<0.0001	***
回归	33.4	14	2.39			
失拟	31.17	10	3.12	5.6	0.0557	
误差	2.23	4	0.557			
总和	1137.06	28				

注: $P < 0.05$ 表示影响显著 (*), $P < 0.01$ 表示影响高度显著 (**), $P < 0.001$ 表示影响极显著 (***)。

用实际值代替编码值,实验因素与产品产率之间的回归方程如下:

$$Y = -1381.49833 + 7.80333A + 26.24833B + 21.29C + 20.954D + 0.9AB + 1.9AC + 0.0925AD + 0.975BC - 0.0775BD + 0.145CD - 3.315A^2 - 3.5025B^2 - 7.64C^2 - 0.082275D^2$$

2.2.3 实验变量及其交互作用对尼泊金丁酯产率的影响分析

从四个实验设计变量中任选两个(其余两个变量参数设置为中水平),考察实验变量及其交互作用对产品产率的影响,见图 3。

从图 3 可以看出,随各实验变量值的增大,产品产率均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实验变量两两交互均有一最佳值,表明各实验变量值在一定范围内与产品产率的提升是正相关的。比如催化剂用量,在达到最佳值之前,催化剂用量的增加能提供更多的酸(活)性,然而,在反应物用量确定的情况下,过多的催化剂用量对产品产率提升意义不大,可能还会对反应物的活性位点有一定的吸附及遮蔽作用,不利于产品产率的提升^[12];过长的反应时间及过高的反应温度也会因副反应的增加而导致产品产率下降,同时增加能耗;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醇酸摩尔比的影响最为显著,这是由于正丁醇同时参与酯化反应与共沸脱水的原因,在达到最佳值之前,醇量的增加有利于促进对羟基苯甲酸转化率及脱水效果的提

升,进而提升产品产率,但醇量过大,会造成反应原料及催化剂浓度的降低,影响产品产率提升。因此,

确定合适的考察因素变量值对产品产率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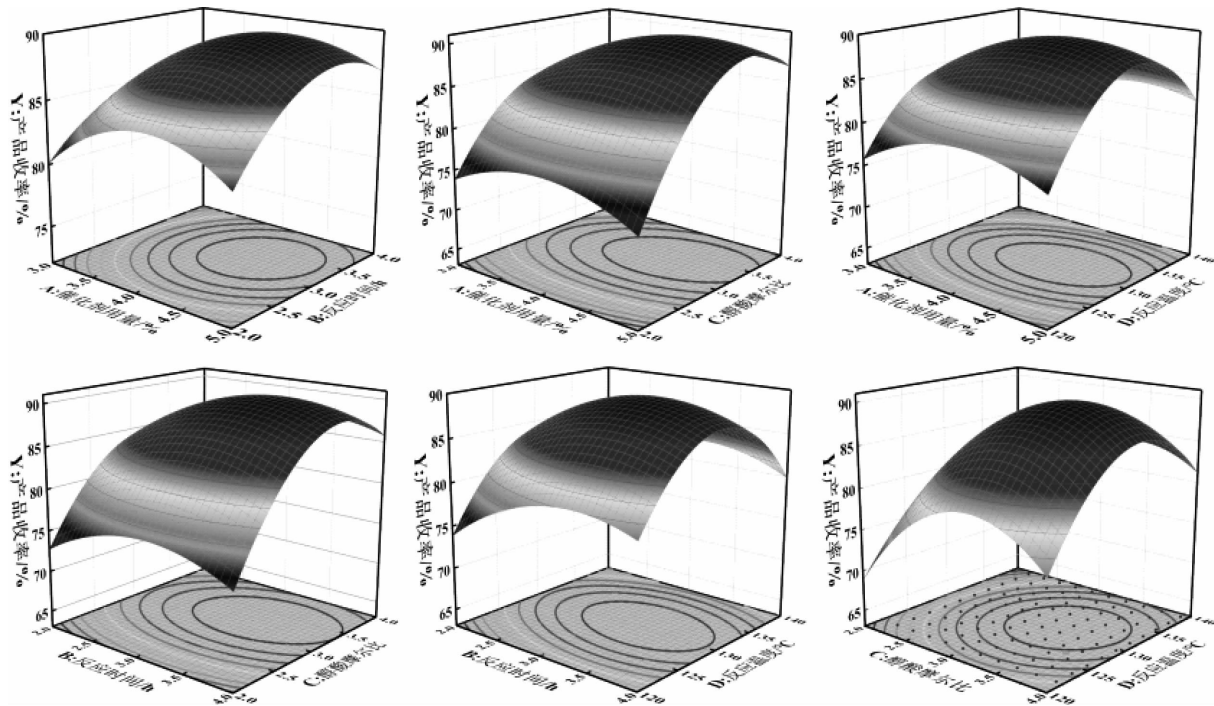


图3 实验变量及其交互作用对产品产率影响的响应曲面图

2.2.4 模型验证及催化剂稳定性测试

根据模型预测得到预期的最优工艺条件为:催化剂用量 4.436%;反应时间 3.338 h;醇酸摩尔比 3.404:1;反应温度 131.260℃,在此条件下尼泊金丁酯最优产率可达 91.097%。考虑到实际操作,将模型预测的最优工艺条件调整为催化剂用量 4.5%;反应时间 3.4 h;醇酸摩尔比 3.4:1;反应温度 132℃,在该条件下进行实验,对模型进行验证,实验结果为 90.8%,与预测值相对误差为 0.3%,表明该模型能有效预测实际结果。为考察催化剂的稳定性,在最优的工艺条件下,催化剂连续使用 5 次,催化剂活性下降小于 1.1%(以产品产率计)。

在催化剂使用过程中,产品产率略有下降,这可能是在合成过程中部分 PW₁₂ 因进入胶束内部而未能与 Si-OH 形成稳定的化学结合导致的,此部分 PW₁₂ 在模板剂(P123、TMB)脱除后裸露在孔道内,在反应初期易于溶脱^[11],最终导致催化活性有所降低;但催化剂在后续使用过程中,催化活性基本保持不变,表明催化剂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3 结论

(1) 通过添加扩孔剂 TMB 原位合成制备的 PW₁₂-SBA-15 催化剂,载体 SBA-15 及 PW₁₂ 的基本结构均得到保持;

(2) 催化剂 PW₁₂-SBA-15 表面形成了非常明显

的酸性中心,当 PW₁₂ 负载量达到 20.3% 时,在载体表面已有部分活性组分晶相出现;选用 20.3% PW₁₂-SBA-15 为催化剂,当催化剂用量 4.5%,反应时间 3.4 h,醇酸摩尔比 3.4:1,反应温度 132℃,产品产率最高可达 90.8%,与模型预测值基本吻合;

(4) 添加扩孔剂 TMB 原位合成制备的 PW₁₂-SBA-15 催化剂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且在最优的工艺条件下重复使用 5 次,催化剂性能稳定,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 梁晓为. 系列尼泊金酯的合成及其抑菌活性研究[D]. 广州:暨南大学,2017.

[2] 廖顺. 尼泊金酯的研究进展[C]. 广东省食品学会. 现代食品工程与营养健康学术研讨会暨 2020 年广东省食品学会年会论文集,2020:39-42.

[3] 刘颖,孙永波,张丽英. 对羟基苯甲酸酯类防腐剂应用现状与展望[J]. 中国饲料,2021(7):13-16.

[4] 王英磊,李文欢,薛超辉,等. 离子液体在尼泊金酯合成中的应用研究进展[J]. 中国调味品,2023,48(12):213-216.

[5] 张殿义. 化妆品原料规格使用手册[M].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2:112.

[6] 章思规. 精细有机化学品技术手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369,999,1295.

[7] 孙晓青,王彤,王粟明. 化妆品中防腐剂的特性与法规沿

- 革[J]. 日用化学科学, 2017, 40(2): 26-31.
- [8] 汤晓君, 吕仁江. 固体酸 $\text{SO}_4^{2-}/\text{TiO}_2$ 催化合成尼泊金庚酯工艺研究[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9, 35(5): 37-39+65.
- [9] 张晋芬, 高翔, 徐华龙. 微波辐射下活性炭负载杂多酸催化合成尼泊金丁酯[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0, 29(11): 217-218, 266.
- [10] 曹小华, 严平, 徐常龙. Dawson 型磷钨酸铝催化剂的制备、表征及催化绿色合成尼泊金丁酯[J]. 功能材料, 2015, 46(22): 22133-22136, 22140.
- [11] 王少鹏, 付长亮, 王会娜, 等. PW_{12} -SBA-15 催化剂的制备及其催化合成增塑剂 TBC 的研究[J]. 塑料科技, 2017, 45(5): 102-107.
- [12] 王少鹏, 付长亮, 王会娜, 等. 响应曲面法优化 $\text{PW}_{12}/\text{SBA}-15$ 催化合成尼泊金丁酯[J]. 中国调味品, 2021, 46(4): 67-72.
- [13] 刘维桥, 孙桂大. 固体催化剂实用研究方法[M]. 北京: 中国石化出版社, 1999: 11-12, 68-70.
- [14] 於霞, 宋晨海, 郭向可, 等. HZSM-5 分子筛中邻近酸中心上的协同催化作用[J]. 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2021, 42(1): 239-247.
- [15] 文宽, 杨国恩, 阳宏祥, 等. 响应曲面法优化芳樟醇合成香叶基丙酮的工艺研究[J]. 应用化工, 2023, 52(5): 1414-1419.

(责任编辑 李玉玲)

Preparation of PW_{12} -SBA-15 by In-situ Method Catalytic Synthesis Butyl Nipagin

WANG Shaopeng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Supported phosphotungstic acid catalyst ($\text{PW}_{12}\text{SBA}-15$) was prepared by in-situ synthesis method. The structure and acidity of the catalyst were characterized by techniques such as X-ray diffraction (XRD) and ammonia programmed temperature desorption (NH_3 -TPD). The catalyst was applied to the synthesis of butyl parabens, and the synthesis process was optimized by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basic structures of SBA-15 and phosphotungstic acid (PW_{12}) were maintained, with good acidic centers. When the loading of PW_{12} was 20.3%, the optimal process conditions were as follows: the molar ratio of alcohol to acid was 3.4:1, the amount of catalyst was 4.5%, the reaction temperature was 132°C , and the reaction time was 3.4 h. The product yield can reach 90.8%, the catalyst was reused 5 times, and the catalytic performance is stable.

Key words: in-situ method; supported catalyst; phosphotungstic acid;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butyl nipagin

(上接第 123 页)

Synthesis of Imide Based COFs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ir Adsorption Performance for Cationic Dyes

ZHANG Lin^{1*}, LI Yuling¹, ZHAO Xiaokun¹, LI Yao¹, MU Pengfei²

(1. School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2.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Molecular Engineeri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0, China)

Abstract: Using 1, 3, 5-tris(4-aminophenyl) triazine (TAPT) and pyromellitic dianhydride (PMDA) as ligands, an imide based covalent organic framework (COF), denoted as TAPT PMDA COF, was successfully synthesized. The adsorption performance of TAPT PMDA COF was systematically evaluated using cationic dyes Basic Fuchsin (BF) and Methylene Blue (MB) as target pollutants. Characterization techniques such as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powder X-ray diffraction, 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nitrogen adsorption desorption,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confirmed the excellent crystallin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material. Adsorp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under pH = 11 conditions, the maximum adsorption capacities of the material for BF (initial concentration 300.00 mg/L) and MB (initial concentration 400.00 mg/L) were 84.33 mg/g and 128.00 mg/g, respectively. The adsorption kinetics of both dyes followed the pseudo second order model ($R^2 > 0.997$), indicating that the adsorption process was predominantly chemical adsorption. Therefore, TAPT-PMDA COF is an efficient adsorbent for cationic dyes with potential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covalent organic frameworks; organic dyes; basic fuchsin; methylene blue; adsorption